

ZHONGGUO
GONGCHANDANG
SHAANXI LISHI



中国共产党

陕西历史

(第一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陕西历史

(第一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编委会

主 任：辛格明 王中新 吴崇信

副 主 任：姚文琦 卢胜利

委 员：孙启蒙 熊美杰 李 彬 赵俊忠 贾自新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编辑组

主 编：姚文琦

副 主 编：刘玉平 康中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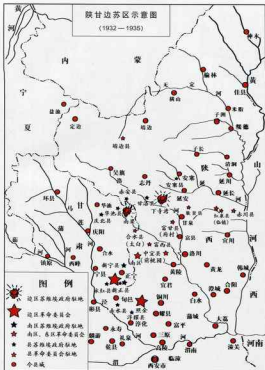
总 纂：贾自新 熊美杰

审 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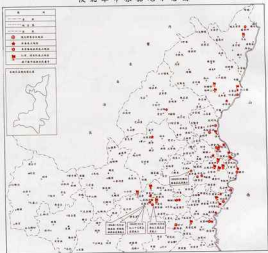
特约审稿：梁星亮 张应超 杨忠虎 袁武振

陕甘边苏区示意图

(1932—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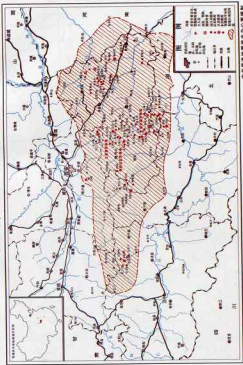


陸北軍中報警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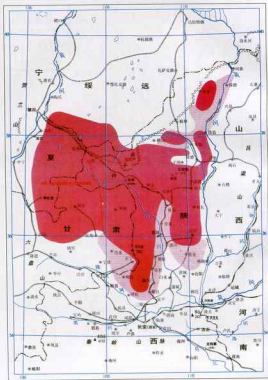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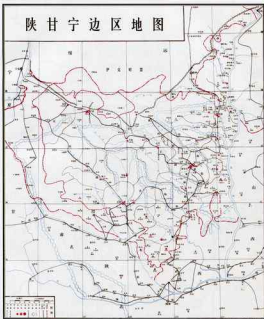
(1934年12月—1937年4月)



西北革命根据地地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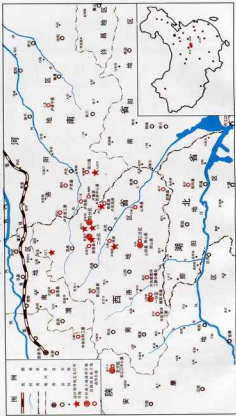


陕甘宁边区地图



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区域略图

(1946年7月~1947年8月)



目 录

第一编 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建及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

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社会状况	(3)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政局	(3)
一 响应武昌起义,全省光复	(3)
二 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分化	(4)
三 北洋军阀势力在陕西的黑暗统治	(7)
四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与失败	(8)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经济	(14)
一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经济状况	(14)
二 北洋军阀势力对陕西经济的破坏	(17)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20)
第一节 五四运动对陕西的影响	(20)
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20)
二 各地响应五四运动	(2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传入陕西	(25)
一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25)
二 马克思主义同陕西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	(29)
第三章 陕西青年团组织的创立及其活动	(32)
第一节 陕西团组织的创立	(32)
一 关中地区团组织的创立	(32)
二 陕北地区团组织的创立	(33)

第二节	团组织的早期活动	(34)
一	发起国民会议运动	(34)
二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36)
三	参与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的斗争	(37)
四	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39)
五	帮助建立国民党陕西组织	(41)
第四章	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43)
第一节	中共陕西组织的建立	(43)
一	关中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	(43)
二	陕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	(45)
第二节	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46)
一	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	(46)
二	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会进行侵略	(48)
三	支持反奉、抗日斗争	(49)
第三节	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	(51)
一	国民军坚守西安	(51)
二	西安党团组织在反围城斗争中的活动	(54)
第五章	中共陕西组织在大革命后期的活动	(57)
第一节	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中共陕甘区委的建立	(57)
一	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的成立	(57)
二	中共陕甘区委的建立	(58)
三	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建立	(60)
第二节	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	(62)
一	参与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62)
二	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	(63)
第三节	参加联合政权组织——国民军联军驻陕 总司令部	(65)
一	推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	(65)

二	协助驻陕总部制定新法规	(67)
第四节	创办学校和报纸	(68)
一	创办西安中山学院	(68)
二	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70)
三	创办《陕西国民日报》	(71)
第五节	领导群众运动	(74)
一	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	(74)
二	支持工人运动	(76)
三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斗争	(77)
第六节	陕西大革命的失败	(79)
一	支持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北伐	(79)
二	陕西大革命的失败	(82)

第二编 中共陕西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六章	土地革命在陕西的兴起	(87)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和中共陕西省委 的成立	(87)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	(87)
二	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的成立	(90)
三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92)
四	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体会议	(94)
第二节	中共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99)
一	渭河起义	(99)
二	渭华起义	(101)
三	旬邑、淳化起义	(105)
四	全省各地的武装起义和“交农”斗争	(106)
第七章	中共陕西省委的艰苦奋斗	(111)

第一节	省委遭遇第一次大破坏	(111)
一	党、团省委遭受破坏	(111)
二	临时省委成立	(112)
第二节	省委遭遇第二次大破坏	(113)
一	领导灾民开展求生存的斗争	(113)
二	省委遭遇第二次大破坏	(118)
三	省委的多次改组与调整	(119)
四	组织发动兵变与武装起义	(120)
五	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25)
第三节	省委遭遇第三次大破坏	(128)
一	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128)
二	省委遭遇第三次大破坏	(129)
三	省委的艰难恢复	(130)
第八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32)
第一节	根据地党军政群组织的建立	(132)
一	中共组织的建立	(132)
二	军事组织的建立	(133)
三	政权组织的建立	(134)
四	群众组织的建立	(135)
第二节	土地分配与反“围剿”斗争	(136)
一	分粮食,分田地	(136)
二	反“围剿”斗争	(138)
第九章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41)
第一节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141)
一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	(141)
二	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陕甘游击队	(142)
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建立	(146)
第二节	创建根据地的党政群组织	(147)

一	党组织的创建	(147)
二	政权组织的创建	(148)
三	群众组织的创建	(150)
第三节	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151)
一	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	(151)
二	予民生息,促进经济	(152)
三	开办学校,培养干部	(153)
第四节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53)
一	照金时期的反“围剿”斗争	(153)
二	南梁时期的反“围剿”斗争	(156)
第十章	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59)
第一节	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根据地	(159)
一	创建根据地的准备活动	(159)
二	革命武装的建立	(162)
第二节	根据地的政权、经济和文化建设	(165)
一	政权建设	(165)
二	土地分配	(167)
三	经济和文化建设	(169)
第三节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71)
一	粉碎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的“围剿”	(171)
二	抗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的“围剿”	(172)
三	红二十七军在战斗中成立	(173)
第十一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建立	(175)
第一节	陕南苏区建立	(175)
一	红四方面军入陕,陕南苏区建立	(175)
二	保卫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	(178)
三	战地支前	(178)
四	土地分配与经济工作	(179)

第二节	中共陕南特委为巩固陕南苏区而斗争	(180)
一	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180)
二	组建红二十九军	(181)
三	领导发动安康起义	(182)
四	扩大红军之友社	(184)
五	建立红色交通线	(184)
第十二章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87)
第一节	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	(187)
一	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鄂豫陕根据地建立	(187)
二	根据地党政军组织的建立	(189)
三	分配土地	(191)
四	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193)
五	红二十五军的反“围剿”斗争	(195)
六	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到陕北	(196)
第二节	中共鄂豫陕特委坚持在鄂豫陕边的斗争	(197)
一	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成立	(197)
二	巩固苏维埃政权	(199)
三	调整政策	(200)
四	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202)
第十三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205)
第一节	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及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205)
一	根据地的形成	(205)
二	党组织的建立	(206)
三	政权组织的建立	(209)
四	军事组织的建立	(211)
五	群众组织的建立	(214)
第二节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216)

一	解放六座县城	(216)
二	劳山战役和喻林桥战斗	(218)
第三节	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219)
一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	(219)
二	直罗镇战役	(220)
三	中共中央对错误“肃反”的纠正	(222)
四	东征、西征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227)
五	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229)
第四节	根据地在执行中央新政策中前进	(232)
一	瓦窑堡会议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232)
二	调整阶级政策	(234)
三	调整经济政策	(235)
四	调整其他政策	(235)
第十四章	中共组织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238)
第一节	中共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工作	(238)
一	十七路军的由来和发展	(238)
二	第十七路军中的中共组织概况	(239)
三	中共与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合作	(242)
第二节	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244)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244)
二	中共西北特支成立	(247)
三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建立	(248)
四	铁佛寺起义	(250)
第三节	西安事变与中共陕西省委的恢复	(251)
一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	(251)
二	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	(256)
三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	(261)

第三编 中共陕西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第十五章 陕西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26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	(267)
一 中共中央为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努力	(267)
二 洛川会议	(268)
三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 前线	(269)
第二节 陕西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272)
一 中共陕西省委就卢沟桥事变发出告各界 同胞书和党内工作指示	(272)
二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支持群众抗日救亡 运动	(274)
三 保卫陕西和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	(277)
四 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	(278)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上)	(280)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巩固	(280)
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	(280)
二 争取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的斗争	(281)
三 “双重政权”局面的结束	(284)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	(287)
一 党组织的发展沿革	(287)
二 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和文化学习	(289)
三 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290)
四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西北历史座谈会	(292)
五 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整风学习	(295)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296)
一	边区的政权体系与职能	(296)
二	边区的两次普选与两届参议会	(297)
三	精兵简政与各项制度建设	(300)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302)
一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和八路军留守兵团	(302)
二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304)
三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304)
四	群众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军	(305)
第十七章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下)	(307)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307)
一	农业生产	(307)
二	工业、交通、通讯	(309)
三	财政、金融、商贸	(311)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	(314)
一	教育和新闻出版工作	(314)
二	卫生工作	(316)
三	文学艺术工作	(317)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活动	(320)
一	保卫千里河防	(320)
二	为抗战人员提供后勤保障	(323)
三	安置外来移民和难民	(325)
四	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	(327)
第十八章	中共陕西省委坚持团结抗战	(329)
第一节	在陕西国统区发展中共组织	(329)
一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壮大中共组织	

.....	(329)
二 创办省委机关刊物《西北》	(331)
第二节 支持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抗战	(333)
一 中共陕西省委公开支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进步政策	(333)
二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发表“对于保卫陕西与西北”的意见书	(335)
三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337)
第三节 加强对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339)
一 全省抗日积极分子会议	(339)
二 积极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341)
第十九章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反共高潮	(344)
第一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344)
一 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的形成	(344)
二 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组织的破坏	(346)
三 中共陕西省委迁人边区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349)
四 国民党陕西当局非法监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350)
五 西安情报处的建立	(351)
六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353)
第二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355)
一 国民党继续破坏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355)

二	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	(357)
三	再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 进攻	(360)
第三节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发动的第三次反共 高潮	(362)
一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三次 进攻	(362)
二	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国统区继续捕杀抗日 志士	(363)
三	恢复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365)
四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在 陕西的建立和发展	(367)
第二十章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369)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369)
一	王树声、戴季英率部挺进豫西	(369)
二	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湘鄂赣	(370)
三	骑兵旅北上大青山	(371)
四	文年生、张启龙率部南下	(372)
第二节	学习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373)
一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373)
二	学习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375)
第三节	延安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377)
一	陕甘宁边区发起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 会议	(377)
二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 成立	(378)
第四节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夺取爷台山反击战	

的胜利	(379)
一 淳化事件	(379)
二 爷台山反击战	(381)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83)
一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383)
二 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 重大贡献	(386)

第四编 中共陕西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第二十一章 中共陕西组织领导的陕西人民反内战斗争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陕西形势	(395)
一 陕北解放区的和平建设	(395)
二 国民党在陕西统治区推行反共内战政策	(403)
第二节 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	(408)
一 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408)
二 陕西国统区的人民武装	(411)
第三节 陕西国统区的反内战起义	(415)
一 新十一旅在安边起义	(415)
二 进犯陕北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在 frontline 起义	(416)
三 横山起义	(417)
第四节 陕西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	(418)
一 民盟西北总支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	(418)
二 西安的反独裁反内战宣传活动	(420)
三 西安等地的反独裁反内战学生运动	(421)

第五节	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424)
一	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	(424)
二	中共陕西组织配合中原局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428)
三	陕东南人民对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贡献	(429)
第二十二章	保卫陕北解放区	(433)
第一节	抗击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433)
一	陕北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斗争	(433)
二	抗击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436)
三	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摧残和破坏	(439)
第二节	收复延安	(441)
一	前方以“蘑菇战术”大量歼灭国民党军	(441)
二	后方努力支援前线	(444)
三	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448)
四	延安光复	(450)
第二十三章	解放陕西国统区(上)	(454)
第一节	解放陕北北部国统区	(454)
一	解放三边和榆横国统区	(454)
二	解放神府国统区	(455)
三	西北野战军两次围攻榆林城	(456)
四	榆林和平解放	(457)
第二节	解放陕北南部国统区	(458)
一	黄龙山战役	(458)
二	宜川战役	(460)
三	澄合战役	(461)
四	黄龙新解放区的政策	(462)
第三节	解放陕东、陕中国统区	(464)
一	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464)

二	西北野战军发动 1948 年秋季攻势	(465)
三	西北野战军发动 1948 年冬季攻势	(466)
四	第一野战军发动 1949 年春季攻势	(467)
第二十四章	解放陕西国统区(下)	(470)
第一节	解放西安	(470)
一	中共西安市工委组织群众迎接西安解放	(470)
二	西安的解放及接管	(473)
第二节	解放陕西西部国统区	(478)
一	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	(478)
二	西府国统区人民的反“清剿”斗争	(480)
三	秦川追击战役	(484)
四	扶眉战役	(486)
第三节	解放陕南国统区	(488)
一	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豫陕鄂边	(488)
二	陕南行政区的建立与巩固	(490)
三	商洛分区发动西进战役,商洛全境解放	(492)
四	解放军第十九军发动西进战役	(494)
五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军会师汉中,陕西 全境解放	(495)
第四节	陕西省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499)
一	中共领导陕西国统区解放战争的组织形式	(499)
二	陕西省级党政军领导机关成立	(500)
结束语	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503)
后 记		(508)
参考书目		(511)

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社会状况

第一编

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建及在 大革命时期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10月11日陕西革命军成立，宣告了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的结束。陕西革命军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各项革命工作。首先，他们着手进行军事上的工作，即组织革命军，进行武装斗争。其次，他们着手进行政治上的工作，即组织革命政权，进行政治斗争。最后，他们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工作，即组织革命经济，进行经济斗争。在军事上，他们组织了陕西革命军，进行武装斗争。在政治上，他们组织了陕西革命政权，进行政治斗争。在经济上，他们组织了陕西革命经济，进行经济斗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社会状况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政局

一 响应武昌起义,全省光复

辛亥革命前夕,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思想在陕西知识界广为流传,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创办的《秦陇》、《夏声》、《关陇》和在国内创办的《兴平报》(后改为《帝州报》)、《丽泽随笔》等刊物,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同盟会陕西分会不断发展壮大,全省会员已发展到近千人。他们发动革命志士,秘密建立据点,联络会党、新军、刀客共图举事。陕西各地人民也纷纷进行各种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当时,西安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歌谣,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同盟会陕西分会发动新军,联合哥老会首领,在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宜。会议推举张凤翔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会后,陕西新军在张凤翔、钱鼎、张飏的带领下,分三路进城,首先夺取了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后,起义军迅速控制鼓楼制高点,占领巡抚、藩台衙门。驻防西安的清旗兵将领文瑞率旗兵千余人在满城^①内与起义军对峙,其他清朝官吏纷纷藏匿,巡防营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迅速瓦解。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

^① 满城,又叫皇城,大革命时期称红城,今称新城。位于西安城内东北方,面积约占全城1/4,当时是旗兵及其眷属驻地。

下,起义军顺利占领了满城以外的西安地区。当晚,起义军首领商定,对外使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并在军装局设立临时司令部。10月23日黎明,在张凤翔的带领下,秦陇复汉军进攻满城,激战竟日,击溃清兵5000余人。25日,秦陇复汉军占领满城,西安光复。

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凤翔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统领。11月22日,武昌中华民国军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12月9日,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改称中华民国秦军政府大都督。

西安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全省各地纷纷响应。在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带领下,各地纷纷驱逐州、县官吏,追杀恶差劣绅,陕北和关中的大部分州、县相继光复。

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时,陕西周围的蜀、陇、晋、豫和鄂西北尚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清政府调集大军,从关中的东、西两路进攻西安,企图扼杀新生的陕西革命政权。在东路,清军于11月4日攻陷潼关,秦陇复汉军政府东征军兵马都督张钫等率军迎击,虽两次收复潼关,并一度出关占据灵宝、渑池等地,终因双方力量悬殊,潼关三次失陷,秦陇复汉军退守华县、渭南一带;在西路,清军于11月21日从长武、彬县方向围攻乾县县城,随后又从郿县、千阳方向进攻凤翔县城。陕西军民为保卫共和制,在关中东西两路作战数月,伤亡甚大。直到次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东西两路的战事始告平息。

二 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分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诞生。

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

军阀掌握政权后,一方面用高官厚禄收买地方实力派,一方面用武力镇压革命党人。

同盟会陕西分会是组织发动西安起义的骨干力量。还在东西两路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陕西的同盟会会员即着手筹组临时省议会。1912年2月,同盟会员李随吾等联合各界人士,发起组织秦省临时省议会。4月初,临时省议会成立。12月,第一届陕西省议会正式成立。临时省议会成立后,制定了府厅州县行政条例及临时议会章程,发布了整顿陕西财政、革除官场陋习、改良教育、禁烟、禁止女子缠足等条令。在此期间,陕西军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新政法令。

袁世凯执掌政权后,北洋政府于7月12日任命张凤翔为陕西都督,10月任命旧官僚高增爵为陕西民政长。与此同时,许多旧官吏陆续进入军政府任职。在旧官吏的影响下,张凤翔一切听从北洋政府的命令,陕西军政府逐步沦为北洋军阀统治陕西的工具。军政府按照北洋政府统一整编军队的命令,缩编陕西军队,将秦陇复汉军所辖33个标、十多个独立营编为陆军两个师、三个独立旅。革命党人井勿幕、曹印侯等被迫退出了军队。

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被推翻后,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成员认为建立中华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应功成身退。于是,有的人解甲归田,有的人出国留学,有的人从事原来的教育工作或编印刊物,有的人创办剧社,发展文化艺术事业。这些人大部分是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骨干,他们的离去,削弱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力量。

袁世凯掌权后,对同盟会采取了拉拢、打击兼施的分化手段。在此情况下,同盟会陕西分会内一部分成员与一些立宪派^①成员联合,于当年4月在南京组织成立了统一共和党,为袁世凯效力。同

^① 20世纪初,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而崛起的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人物所组成的政治派别,其基本主张是,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式加以改变,制定宪法,实行议会制度。

盟会陕西分会成员郭希仁、陈树藩等也与陕西一些旧官僚为伍，成立了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同盟会陕西分会逐渐分化。

鉴于袁世凯阴谋推翻辛亥革命创建的共和制，实行封建专制，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便积极倡议、推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①，走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同盟会陕西分会主要负责人井勿幕根据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努力整顿趋于分裂的同盟会陕西分会组织，为开展议会政治进行活动。为此，井勿幕于6月25日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会员大会，改同盟会陕西分会为同盟会陕西支部。会议选举井勿幕为同盟会陕西支部支部长，张凤翔为副支部长。

为了扩大政党力量，以利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和议会政治，宋教仁联合立宪派等四个政治团体于8月建立了国民党。同时，同盟会陕西支部也与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合并，成立了国民党陕西支部，推举张凤翔为支部长，井勿幕、马凌甫为副支部长，郭希仁、宋伯鲁等为干事，张云山为评议员。同全国一样，国民党陕西组织比同盟会成分更为复杂，内部分歧和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突出。9月下旬，井勿幕被迫离开陕西去上海（后又去日本），胡景翼、宋向晨、曹印侯、杨叔吉等也先后离陕。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为了打击国民党及其推行责任内阁制的活动，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兴师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6月，孙中山、黄兴派杨锐、于化卿带信给陕西，相约共同举事。杨锐、于化卿行经河南，遭到北洋军阀刘镇华杀害。陕西革命党人邹子良、马开臣等积极主张反袁，并组织反袁力量，陕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也举兵反袁。陕西都督张凤翔

①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有一党制、多党制、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等形式。责任内阁制是内阁总揽国家政务，其首脑有权任命所有政府高级官员，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方针与政策。由于内阁制政府是以向议会负责为特征，故称之为责任内阁制或议会内阁制。

听从袁世凯的命令,通电声讨孙中山和黄兴,杀害了邹子良、马开臣,镇压王生岐部,王生岐被迫逃往河南,后与白朗农民起义军会合。同时,张凤翔还奉袁世凯电令,派张钫率部入川,镇压国民党人熊克武领导的反袁活动。

1913年5月,张凤翔下令解散国民党陕西支部。后又严飭警厅与各县知事迅速收缴国民党员的徽章、证书。轰轰烈烈的陕西辛亥革命最终失败。

三 北洋军阀势力在陕西的黑暗统治

1914年1月,河南宝丰县人白朗领导农民起义军成立了“中原扶汉军”,举旗反袁。起义军先后转战于鄂、豫、皖、陕、甘等省,民众誉为“白朗义军”,官府则贬为“白狼匪军”。

3月,白朗义军入陕,袁世凯电令陕西当局“督飭各营相机进剿”,并派亲信陆建章以“进剿白朗”为名,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6月初,陆建章抵达西安,督办陕西军务。尽管张凤翔已听命于袁世凯,但袁世凯对他仍不放心,于7月撤销了他的陕西都督职务,封为“扬威将军”,调往北京。9月8日,北洋政府任命陆建章为陕西将军,任命恒传善为陕西巡抚。10月7日,北洋政府又任命吕调元为陕西巡按使。从此,北洋军阀势力渗入陕西,直接控制了陕西军政大权。

陆建章草菅人命,人称“陆屠夫”。他到陕西后,解散了除陈树藩部之外的陕西军队,将许多民党人士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军队和政府,代之以他的亲信。袁世凯策划帝制时,陆建章与吕调元狼狈为奸,强迫陕西90余县绅士投票赞成。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起兵讨袁,陕西民党人士积极响应,先后秘密组织了讨袁义勇军和护国军,掀起反袁逐陆斗争。1916年3月18日,陆建章杀害了参加反袁斗争的民党人士王绍文、南南轩、杜守信等18人。

在反袁逐陆斗争中,陕西省模范监狱关押的三四百人于5月

15日乘机暴动越狱,陆建章派军队残酷镇压,将捕回的人全部斩首,并沿街搜捕,抓到的就地杀害,甚至连街上的行人、乞丐也以越狱犯罪名加以捕杀。陆建章还私加税款,侵吞军饷,大开烟禁,设妓院,敲诈勒索,敛取民财。他离陕时,装载金银财宝、名人字画、古玩、大烟的骡车竟达几百辆。

陈树藩曾是同盟会成员,参加过陕西辛亥革命。陆建章任陕西督军后,陈树藩投入陆建章门下。陈树藩见陆建章嗜烟成癖,便以大量鸦片烟为礼,拜陆为师,并与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结为盟兄弟。陈树藩还以大量金银、烟土贿赂陆建章左右,以保持其混成旅旅长之职。在民党人士领导的讨袁逐陆斗争中,陈树藩采取了观望态度。5月7日,陈部游击营营长胡景翼举旗反陆,在富平与陆建章的“中坚团”作战时,一举歼灭“中坚团”,活捉了率领“中坚团”的陆建章之子陆承武。陈树藩见有机可乘,一面与陆建章搞政治交易,提出以释放陆承武换取陕西都督之职,一面于5月9日在三原通电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反袁护国,宣布陕西独立。5月18日,陈树藩通电就任陕西都督兼民政长。5月26日,陈树藩护送陆建章离陕。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的声讨声中死去。次日,陈树藩便通电宣布陕西取消独立,颂扬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请为袁厚葬。随后,陈树藩又投靠在北洋政府中掌握实权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门下。7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兼省长。

北洋军阀势力统治陕西长达11年之久,继陆建章、陈树藩之后,担任陕西督军的还有阎相文、冯玉祥、刘镇华。北洋军阀在陕西实行专制统治,摧残进步力量,滥杀无辜,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陕西人民处于苦难的深渊。

四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与失败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

府,领导护法斗争,同时委派国民党人士、众议院陕西籍议员焦冰(焦子静)以西北护法军陕西招讨使名义来陕,组织陕西护法军。焦子静回陕后,委任驻防白水的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民党人士高峻为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委任驻防西安的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组织护法军,反对陈树藩在陕西的统治。

同年冬,高峻与耿直及郭坚等秘密联络,策划反段(段祺瑞)驱陈(陈树藩)方略。12月3日,高峻首先在白水率部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发布讨陈檄文,历数陈树藩罪状,同时与陈树藩的“围剿”部队激战三天。数日后,高峻率部撤至白水县城北20公里的纵目镇。耿直闻讯后,乘西安城空虚之机,于12月11日在西安起兵反陈。驻渭南的陈树藩部骑兵团连连长刘锡麟率部增援耿直;郭坚也从凤翔率部向西安进发,行至三桥时,耿直已从西安撤至户县。12月中旬,郭坚、耿直会师于户县,接着在周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坚任总司令,耿直任副总司令,下设八个支队,耿庄、李夺等分任支队司令。部队分左右两翼,王珏统领渭河以南各部,为右翼,驻户县;简吉顺统领渭河以北各部,为左翼,驻兴平;刘锡麟为前敌指挥,耿直率部策应两翼。在陈树藩主力部队的围攻下,耿直退至岐山,后转移至耀县^①。郭坚部退出凤翔向东转移。这时,陈树藩任命胡景翼为渭北“剿匪”司令,阴谋唆使民党人士互相残杀,同时派嫡系曾继贤部到渭北三原一带布防督战。

12月下旬,郭坚、耿直东进与高峻会合,接着攻克白水。1918年1月25日,靖国军又进攻蒲城,战斗中耿直中弹牺牲。

1918年年初,陈树藩命驻防三原的张义安部撤出,由他的嫡系部队接防。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等乘换防之机,于1月25日全歼陈树藩接防部队。接着,胡景翼、曹世英率部到达三原,经与张

^① 今铜川市耀州区。

义安等协商,再次共组陕西靖国军,胡景翼为右翼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军总司令。2月2日,陕西靖国军发出讨陈檄文,随后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

陈树藩被陕西靖国军两路夹击,难以支持,求救于北洋政府,同时请求驻在豫西、依附段祺瑞的刘镇华部镇嵩军就近增援,并以刘镇华任陕西省省长为酬谢。3月上旬,刘镇华奉北洋政府之命率部入陕,就任陕西省省长,并率部进至户县一带,阻击进至户县的靖国军张义安部。

3月13日,张义安赴前线督战时阵亡,部队由董振五率领撤回三原。靖国军围攻西安的两路部队均退守渭北,在渭北与陈树藩部激烈战斗。

陈树藩乘靖国军受挫之机,率东路军与刘世琬率领的西路军分东西两路向靖国军进攻。4月16日,陈树藩部进攻临潼界坊,杨虎城、王祥生部予以抗击,李云龙、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及弓富魁相继率部增援,给陈军以重创,迫使陈部于20日停止进攻,向渭南下邽、固市撤退。靖国军乘胜攻占固市镇,在下邽等地又给陈部以沉重打击。4月25日,郭坚在弓富魁部的增援下,击退陈军对茭白镇的进攻。陈树藩的西路军亦在泾西一带受挫。这样,陈树藩企图占领渭北、消灭靖国军的计划破产,以三原为中心的靖国军辖区得到初步巩固。

为了加强对靖国军的领导,胡景翼、曹世英等派王玉堂、张庆豫赴上海邀请于右任回陕主持靖国军大计。7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回到三原,被公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总司令。8月8日,于右任、张钫通电就职。靖国军各部统一改编为六路,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卢占魁分任各路司令,另编惠又光部为陕北游击支队,延聘李元鼎、茹欲立等为顾问。陕西靖国军重整旗鼓,对加强各部团结、统一指挥起了积极作用。但军队实权仍掌握在各路司令之手,各自为政的现象依然存在。

陕西靖国军统编后,各路军都有所发展。郭坚经耀县、礼泉攻占省西十余县,弓富魁占领扶风、岐山等地,高峻部收复合阳,胡景翼部在上津渡大败陈军,攻克马驹寨,逼近灵口。9月18日,胡景翼在渭南固市被陈树藩部所劫,囚禁于西安。张钫、樊钟秀部一度从商县^①、洛南出击渭南,占领潼关,9月又出击蓝田,攻占户县,进军周至。靖国军辖区已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被迫困守于西安及东路几个县。

为了摆脱困境,陈树藩一方面请出民党人士井勿幕、彭仲翔前往三原与靖国军调解,作为缓兵之计,一方面再次向北洋政府求援。井勿幕到三原后,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同年冬,北洋政府派奉军师长许兰洲为援陕军总司令,直军旅长张锡元为副总司令,率率直军2万人入陕,援助陈树藩;同时命令晋军一个旅从禹门口入陕,占据韩城、合阳;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率甘军万余人进攻长武、彬县等地;川军刘存厚率2.5万余人,从川北入陕,占据陕南。一时间,陈树藩各路援军从四面八方拥来,向陕西靖国军反扑。与此同时,南方军政府也呼吁各省护法军派军队援助陕西靖国军。11月6日,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入陕,与张钫、郭坚部驻凤翔,鄂军王安澜部进入陕南宁陕、平利等地;川军熊锦帆部、石青阳部、颜德基部至宁强、勉县。当时,陕西南北各军合计约20余万,关中道成了大兵营。

11月中旬,井勿幕赴凤翔慰问叶荃等部,11月21日返回时,在兴平县南仁村被郭坚部李栋才杀害。

12月16日,陕西靖国军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筹划围攻西安,于右任因途中遇阻未到。由于北洋军大举入陕,其兵力大大超过陕西靖国军及其援军兵力,使靖国军围攻西安的计划落空。1919年春,陕西靖国军与陈树藩和援陈军进行了激烈战斗。1月27日,

^① 今商洛市商州区。

董振五在武功东北的大王村战斗中阵亡。王珏部守乾县苦战至5月底,始奉命撤退。于右任表彰了该部,并晋升王珏、郭英夫为靖国军第七路正、副司令。被困于凤翔的靖国军郭坚、樊钟秀部先后与奉军许兰洲“局部议和”,分别被编为许部第一、二支队。樊钟秀后随奉军出潼关,张枋同行,郭坚部团长刘锡麟也随奉军东去。叶荃拒编,与卢占魁部东撤至耀县。陕西靖国军第三、四路主力与从西路撤回的第一路部分军队在相桥、交口等地与陈树藩援军进行了战斗,击退援陈军的进攻。

2月20日,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派代表在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会议商定派国会议员张瑞玘赴陕划界停战。4月底,陕西划界基本结束。

划界后,陕西靖国军所辖区域为渭河北岸的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①八个县的全部或一部,与陈树藩隔渭河对峙,战事进入相对缓和时期。

此时,靖国军开始注意辖区内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靖国军总司令部明令禁止北洋政府在辖区征收各项苛捐杂税,撤销盐禁,推行调节民食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地主高租、高利盘剥,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利商贾,活贸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在三原建立了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影响。靖国军实行的政治措施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使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新思想、新文化在辖区内得以广泛传播。许多学校公开演出反映进步思想的话剧《列宁传》、《新理想图》等,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带头参加这些活动。靖国军总司令部还注意军政人才的培养工作,各军普遍设立了军事教育和普通教育机构。除设立军官研习所、经武学校、军官教导团、简练队外,总

① 今铜川市印台区、王益区。

司令部还先后选拔 200 多名下级军官送至四川讲武堂及广东韶关讲武堂深造。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倡导地方教育事业,致力恢复原有的各级学校,大兴办学之风,先后建立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和一大批小学。靖国军也很重视报刊的导向作用,利用报纸宣传革命主张,介绍中外各种政治思潮,分析和评论时政。其中较有影响的报纸有《战事日刊》、《启明日报》、《正义日报》、《救国日报》、《捷音日报》等。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段祺瑞下台,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陈树藩为了维持其在陕西的反动统治,打出“陕西自治,于右任主陕”的招牌;同时,释放胡景翼,使其掌握靖国军。胡景翼到三原后,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1921 年 5 月 25 日,北洋政府调陈树藩入京,派直系军阀相文督陕。陈树藩抗令不服。阎相文奉命率直军第二十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后改编为第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于 7 月 7 日入陕,就任陕西督军,逼陈树藩卸任。陈树藩败逃汉中,后又被逐出陕西。阎相文为了维护其陕西督军的职位,命冯玉祥设法杀害不服收编的陕西靖国军将领。8 月 13 日,冯玉祥在西安诱杀原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8 月 22 日,阎相文因直军内部矛盾激化而自杀,冯玉祥被任命为陕西督军。

9 月 19 日至 21 日,胡景翼在三原主持召开国民代表会议,25 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11 月,胡景翼接受冯玉祥收编,任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不久,靖国军第五路高峻部被刘镇华收编,靖国军实际上已解体,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仍然存在。1922 年 1 月 17 日,胡景翼派部队包围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索走印信,焚毁文书,查封办公室。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退居三原县城北的东里堡半耕园。3 月 23 日,于右任率少数参佐抵达武功杨虎城部队驻

地,并复设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驻地凤翔,设行营于武功,委任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继续坚持陕西靖国军的旗帜。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率部出关参战,刘镇华代署陕西督军。于右任遂令杨虎城、李夺夺取马嵬。4月22日,杨虎城部攻占马嵬,歼灭直军阎治堂二十师两个营,后退至凤翔。鉴于处在被刘镇华部四面包围的形势下,于右任决定取道甘南、四川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杨虎城率部撤退至陕北,投靠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以保存实力。于右任、杨虎城走后,李夺、麻振武接受了刘镇华的改编。至此,陕西靖国军以失败告终。

陕西靖国军的反段驱陈斗争前后坚持了六年,是我国北方地区积极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中,陕西靖国军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敬的,反映了陕西人民为寻找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苦过程,同时,陕西靖国军在辖区内实行的文化教育措施,为新文化运动在陕西的传播营造了一定的氛围。陕西靖国军的斗争在陕西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

虽然段祺瑞下了台,陈树藩也被逐出陕西,但这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势力统治陕西的局面。冯玉祥离陕后,刘镇华在陕西的反动统治比过去更加残酷,陕西民众迫切要求推翻北洋军阀势力在陕西的统治。

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民党志士虽然进行了艰苦奋斗,但是并没有完成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任务,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经济

一 辛亥革命后的陕西经济状况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

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后,陕西地方当局在经济方面虽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战事频繁,且革命很快遭到失败,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决定了它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无力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陕西的自然经济状况基本未能改变,仍然占统治地位。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已存在微弱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陕西的各个城市包括省会西安在内,个体手工业和商业仍占主体地位,其业主不少为地主、官僚兼营,在经营管理上带有浓厚的家族制特点。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陕西还没有近代机器工业,能显示出某些进步特点的仅有电信业。这一时期,陕西的工商业规模较小,基本上属于手工业作坊和零售商业。在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据统计,1917 年陕西有可耕地 3272.77 万亩,有农户 133.52 万户,占有耕地不足 10 亩的农户有 61.58 万户,占总农户数 40% 多;占有耕地 10 亩以上 30 亩以下的农户为 36.88 万户;占有耕地 30 亩以上 50 亩以下的农户 18.85 万户;占有耕地 50 亩以上 100 亩以下的农户为 9.8 万户;占有耕地 100 亩以上的农户有 6.4 万户。1918 年陕西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与 1917 年相比略有变化,占有耕地不满 10 亩的农户 49.6 万户,占有耕地 10 亩以上 30 亩以下的农户 44.3 万户;占有耕地 30 亩以上 50 亩以下的农户 21.4 万户;占有耕地 50 亩以上 100 亩以下的农户 9.85 万户;占有耕地 100 亩以上的农户 5.57 万户。从这两年土地占有情况可以看出,陕西农村将近一半的农户只占有少量耕地,同时也可看出,陕西农村阶级结构的特点是中间比例较大。两年来的土地占有情况基本上反映了辛亥革命后陕西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与这一土地占有情况相联系,农村基层政权及当时存在的族权、神权基本上掌握在少数地主、土豪劣绅及其代理人手中,长期束缚农村的宗法制仍然紧紧地捆绑着陕西农民。统治陕西的北洋军阀势力没有也

不愿意去触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因为这对维持其反动统治是有利的。

本来就十分落后的陕西经济,在北洋军阀势力的破坏下,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工业生产方面,据 1918 年统计,全省有各种工厂 339 个,但规模都很小,总计有工人 4996 人,其中男工 4298 人,女工 697 人,杂役 252 人,平均每个工厂只有 10 多名工人。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更为落后,只有 1912 年张聚庭任实业部(后改为实业厅)部长时领导创办的一个面粉厂,有一部不过 100 匹马力的单缸蒸汽机,其他的都是手工业,工具是一些原始的木、石器工具,靠人工操作,产量很低。从 1912 年到 1914 年,陕西工业发展速度虽不快,但每年还能建厂十多个。在北洋军阀势力统治下的 1915 年到 1918 年,则每况愈下,1915 年建厂 9 个,1916 年 1 个,1917 年 1 个,1918 年 2 个。4 年总共创建了 13 个工厂。

当时,陕西农业生产工具仍然是沿用了千余年的落后生产工具,除极少数地区可灌溉外,绝大部分地区是靠天吃饭。肥料缺乏,种子老化,经营方式陈旧,加上不断的天灾人祸,农业产量很低。1918 年,作为主粮的麦子播种面积为 1595.2 万亩,产量为 1269.72 万石,亩产为 0.796 石;水稻播种面积为 204.23 万亩,产量为 170.02 万石,每亩产量为 0.832 石;棉花播种面积为 679.88 万亩,产量为 40792.51 万斤,亩产 60 斤多一点。这样的产量,除用以维持农民生活外,提供的商品粮、棉十分有限。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掠夺、剥削,广大人民的收入非常微薄,不少人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裹身的生活。据记载,1918 年,陕西工人工资男工最高每天 22 分,最低 13 分,女工最高每天 18 分,最低 12 分,是当时全国工人工资最低的省份之一,居倒数第二位。农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靠打工或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维持生存,挣扎在死亡线上。

二 北洋军阀势力对陕西经济的破坏

在北洋军阀势力统治的十余年间,陕西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尤其是陆建章、刘镇华统治陕西期间,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的发展。

第一,大开烟禁。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毒害人民的一种特殊武器。19世纪40年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后,鸦片很快流毒全国,陕西也未能幸免。辛亥革命时期,陕西军政府曾宣布严禁种植鸦片,收到了积极效果。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者不顾鸦片对人民的毒害及禁烟明令和民众的反对,为了中饱私囊,公然大开烟禁。陆建章到陕后,开始打着“禁烟”招牌,派部下将商民完过前清统税后所储藏的数百万两大烟全部搜出,设局熬卖官膏,得银六七百万,尽入私囊。随后,派员从周至、户县开始,劝民种烟,索取税款。他还招用甘肃烟贩,派兵保护;派部下驻陕北,专门收购三边^①大烟,转售牟利。陈树藩名义上禁烟,实则强迫农民种烟,按各县土地面积,强征50%烟亩罚款,种烟者罚,不种烟者也罚。陈树藩还在各地设卡,征收烟土运销税,并公开熬膏出售。刘镇华任陕西省省长时,与陈树藩狼狈为奸,大开烟禁。仅以周至县为例,1919年,刘镇华给其摊派了1000顷^②种烟任务,比清末烟亩增加了4倍;规定每亩征收烟款白银10两,比清末烟亩款增加了10倍。全县烟亩款总数为100万两,比清末增加了58倍多。1922年给周至县强派2000顷种烟任务,比过去又增加了一倍。当时烟价下跌,刘镇华便将每亩征收烟款白银10两,改为征收银元10元,勒令该县交纳烟款200万银元。在刘镇华强派烟亩、强迫种烟的压力下,1923年,周至县烟亩扩大到3000顷以上,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0%左右。

① 定边、靖边、安边的合称。1949年安边县撤销,辖区划入定边县。

② 亩顷的通称,1顷等于100亩。

陆建章、陈树藩、刘镇华等大开烟禁,使他们自己和各级贪官污吏,各地土豪劣绅大发其财,广大农民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是,种烟占去大量良田,使农业日趋凋敝。由于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大批强壮劳力骨瘦如柴,丧失了劳动能力,很少有人从事农业生产。于是农村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混乱,使本来就极贫穷的农民走向破产。

第二,多摊滥派。除大开烟禁外,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统治者还在征收田赋、税、款等方面多摊滥派,使工、农、商界负担愈来愈重。从北洋军阀势力统治陕西前几年的情况看,田赋预算收款,1914年为351万元,1916年增至579.4万元;正杂税预算收款,1914年为14.67万元,1916年增至38.09万元,1919年又增至39.64万元;货物税预算收款,1914年为70.25万元,1916年增至109.83万元;正杂捐1913年为0.44万元,1916年增至39.1万元。据1918年7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统计,陕西有油捐、警捐、斗捐、炭捐、货捐、乡捐、秤捐、木匠行捐等杂捐多达26种。多摊滥派最严重的是军费。北洋军阀势力统治陕西后,曾大量裁汰、遣散原陕西军队,但减兵不减军费;他们尽力扩大自己的军队,使军费不断增加。从1913年到1917年,每年军费300多万元。1918年陕西军队10万人左右,军费则成倍增加。这年预算经常性军费支出372万元,特别军费为230.72万元,临时军费为10.8万元。到1923年,陕西预算全年收入至多不过600万元,但军饷一项就有1200万元,庞大的军费支出严重地破坏了陕西经济。

第三,其他经济掠夺。陆建章主陕后,曾宣布停止纸币兑换银元,军政等费均索取现银,使流落人民群众手中的纸币如同废纸,造成无数商店倒闭,农民倾家荡产。陈树藩督陕期间,曾发行地方公债数百万元,借外债500万两白银,这些款项最终都转嫁到人民身上。他还强制发行所谓“富秦钱票”^①,进行变相掠夺。陆建章和

^① 1914年,陈树藩下令强制发行“富秦钱票”为其敛财,钱票毫无信誉,如同废纸,百姓深受其害。

陈树藩等大卖官产,收入名义上归督署作军政费用,实际上转入私囊,所缺之军政费用又加派给老百姓。军费不足则命令军队就地索取,甚至纵兵掠夺,对陕西经济的破坏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虽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甚至未能达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平均地权的预期目标,但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民族工商业较前有所发展,对陕西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失败后,经受打击和挫折的陕西民党人士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与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新的斗争。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们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继续努力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第一节 五四运动对陕西的影响

一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陕西地处西北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五四运动前,陕西教育文化非常落后,就连清末在中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①等进化论思想也很少流传。

1915年9月,陈独秀等人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宣传、提倡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要求青年解放思想,破除陈旧学说,冲决束缚人们思想的罗网;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造就有利于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这里看到了曙光,于是纷纷开始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爱国运动和追求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结合。一时间,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文化运动在京、津、沪等地蓬勃兴起。一些在京、津、沪、汉求学的陕西青年学生纷纷投入到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之

^①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译述的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的著作,作者根据自然界的“食物链”现象提出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

中,积极向家乡传播新文化与新思想。

1919年5月,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奋。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讲演,反对巴黎和会决定,要求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①会后游行示威,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大中学校求学的陕籍学生,大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杨明轩等积极参加了5月4日北京学生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并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参加游行示威的还有北大陕籍学生杨钟健、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张耀斗等。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中有陕籍学生杨明轩、郝梦九。在“六三”大逮捕^②中,陕籍学生刘天章、刘含初被捕。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学生有雷晋笙、严信民,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学生有王尚德等。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汪世衡曾写文章鼓动反日。

五四运动爆发后,陕西旅外学生中的一些进步分子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及时向陕西同学和好友写信,报告五四运动的消息,寄送有关五四运动情况的报纸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这些旅外学生在向陕西传播五四运动的消息及新思想、新文化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① 曹汝霖时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签订“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陆宗輿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

② 5月4日,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史称“六三运动”或“六三”大逮捕。

二 各地响应五四运动

陕西首先响应和支持北京学生斗争的是西安和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及其渭北辖区,其后波及陕北和陕南地区。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奔走相告,积极响应。他们书写标语,张贴传单,或私下传阅。为了统一行动,有力支持北京学生斗争,开展西安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西安法政专科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三中、第一师范、成德中学等校学生推举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全体罢课,游行示威,组织讲演团,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宣传抵制日货。联席会议还先后派代表去省教育厅、省督军公署,要求予以支持。督军陈树藩秉承北洋军阀政府命令,对学生横加指责和威胁,极力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不许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声言如不遵者即行枪毙,还命令省电报局不准为学生向外拍发电报。随着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运动的迅速发展和西安各校学生的坚决斗争,陈树藩被迫答应学生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要求,但不准游行示威。于是,各校讲演团每日轮流在省议会门前讲演,把五四运动消息传播到学校以外的广大群众中。5月中旬,西安教育界、商界的爱国人士也行动起来,支持学生行动。5月22日,陕西省教育会、总商会联合向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国民外交协会发电,呼吁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国人应誓死力争,万万不可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5月下旬,各校学生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丢”等旗帜,走出校门,在文庙集会,发表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讲演。会后,部分学生进行了游行。5月25日,《长安日报》报道了各界开会讨论向外通电的情况。5月30日,陕西学界发出通电,表示决心与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维护国家主权。

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选举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屈武为会长,下设总务、宣传、编辑三个部。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出版《白话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报道陕西和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同时,在西安成立了陕西学生救国讲演会、陕西公民救国会、基督教救国会等团体,积极开展爱国活动,促进西安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西安各校学生把抵制日货作为一项具体的爱国活动。学生们把自己家庭用品中的日货拿出来焚毁,受到学生影响的一些商人也销毁了部分日货,或停进停销日货。《长安日报》多次报道这方面的消息。

为了压制日益高涨的爱国学生运动,陕西当局宣布提前一个月举行考试、放暑假,迫使各校学生离校回家。

6月中旬,全国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陕西学联接到通知后,派成德中学学生屈武、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前往参加。屈武赶到上海时,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已开过,他们与全国学联取得联系,了解了会议经过及所通过的全国学联章程等,与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各地学生代表进行了广泛接触。屈武还拜见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加强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联系,省学联于6月下旬选派屈武和李伍亭赴北京。屈武、李伍亭到京后,与旅京陕西学生联系,并与北京及各省学生进行广泛接触,互通情况。他们还参加了6月27日北京各界代表在新华门前举行的请愿活动,屈武被推为面见大总统徐世昌的10名代表之一。6月28日,徐世昌接见北京各界代表,回答学生代表所提问题。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不满,相继发言批驳。屈武激于义愤,言辞激烈地说:“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就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以头撞地,血流如注。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消息传出后,

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终于迫使北洋政府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学生放假后,西安学生运动一度低沉,但各界爱国运动并未停止。8月21日,陕西公民救陕会发出“力争青岛电”。屈武于8月回西安后,向各校传达了外出活动情况。为了更新陕西学联,西安法政专科学校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40余人于9月6日在西安青年会召开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公推刘道洁为临时主席,屈武做了外出活动情况报告。9月9日,大会选举省学联领导机构,屈武、刘道洁当选为会长,副会长,高尚贤、邹遵当选为评议长,副评议长。省学联发表了宣言,谓“哀莫大于心死,耻莫甚于国亡,苟知国亡可耻,牛马难为,则当起而挽回之补救之”。省学联以此为已任,提出“须知求学所以为国,为国敢忘求学”,把求学和救国结合起来。

继西安之后,陕西三原和渭北地区及陕北、陕南一些地区也积极响应,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三原是全省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区之一。由于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在三原,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靖国军的大力支持,三原学生除集会讲演、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外,还举行了罢课。部分市民、商人和靖国军军官也主动参加了这些活动。在三原县城隍庙戏台前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集会讲演及会后游行,参加的群众达数千人;各学校的教职员及部分学校的校董、校长和学生一起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并于6月2日与学生联名致电广东护法军政府、参议院及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和团体,谓“青岛交涉,存亡攸关,一有蹉跎,国将不国”,“务期达到直接收回目的,万勿让步”。在靖国军辖区建立的救国团体,有三原学生建立的救亡团和高陵县建立的西北救国会。西北救国会于6月16日在高陵县城隍庙召开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农工商界及城郊附近各校学生数千人,并印发《西北救国会布告》。

陕北首先响应五四运动的是榆林中学。该校时为陕北仅有的一所中学,由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接受了新思想的杜斌丞任校长。他得悉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后,及时向学生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支持学生组织讲演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通过榆林中学的宣传,五四运动的影响逐渐波及陕北许多县。

在陕南,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是汉中中学。该校校长联系南郑中学、农业学校、女子学校等,一致举行罢课,支持北京爱国学生斗争。各校学生、教职员及各界人士数千人在汉中北校场召开声援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西乡、城固等县学生也积极响应并宣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9月以后,五四运动在陕西转入学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主要是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传入陕西

一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的陕籍学生、同盟会会员井勿幕就以“侠魔”的笔名在日本出版的、由陕西同盟会会员创办的刊物《夏声》第三号和第七号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之新思潮》的长篇文章,其中就介绍过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虽然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局限,加之刊物发行量有限,影响很小,但对当时封闭的陕西社会 and 有志于改革的人们开阔眼界、接受新思想,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和影响通过各种形式逐渐扩大并不断深入。

旅外学生创办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夏,在上海震旦大学上学的雷晋笙与严信民等主编《秦铎》、《新时代》旬刊,在上海南方大学上学的刘秉钧等创办《汉钟》、《南针》月刊,《新鲜》半月

刊。这些刊物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宣传反帝、爱国、民主思想。同年冬,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杨钟健主编《秦劫痛话》刊物,揭露北洋军阀势力在陕西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1月,杨钟健与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同学创办《新潮》、《励进》、《秦钟》月刊。《秦钟》停刊后,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共进》创刊号于1921年10月10日出版。他们通过这些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唤起陕西人民的革命自觉性,并明确提出反抗国内封建势力及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直至解除他们的武装,使其投降。魏野畴在《秦钟》创刊号上发表的《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中,鼓励陕西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1922年初,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武止戈、屈武、邹均等创办《贡献》、《促进》、《改进》刊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论述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7月10日出版的《共进》第17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0月10日出版的《共进》第23期发表了武止戈的《驱刘^①,我的主张与陕西的将来》一文,提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指出:“全世界都将随着俄罗斯而起社会革命了,在这革命将起的时候,远在后方的陕西当也是免不了的!不过是时间的问题。”1923年5月1日出刊的《共进》第37期发表了题为《“五一”》、《“五五”》两篇文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105周年。武止戈撰写的《“五五”》文章中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始祖”、“大社会学者兼大历史哲学者”,指出马克思阐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意义,发现了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也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该刊还陆续转载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共青团刊物《中国青年》的文章以及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此外,熊

① 指刘镇华。

外学生创办的刊物还有南通陕籍学生创办的《竞进》、湖北陕籍学生创办的《陕南旅鄂同乡学会》等。这些刊物在评论陕西政局和宣传民主思想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省内报刊一度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省内创办的报刊中,较早系统刊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西北日报》。该报从1919年9月到1920年10月,连续以社论、代论或专件等形式刊登《马克思(思)之剩余价值论及其批判》、《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一斑》等文章,同时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国内形势及社会主义建设等情况。1920年7月创刊的《鼓吹日报》连续刊登了《布尔塞维克主义论》、《俄国联工会之实力》等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刊登了李大钊《全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讲演词。尤其是席石生撰写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称赞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万国社会主义史上奇光异彩”,赞扬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该文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向读者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陕西靖国军管辖的渭北地区出版的《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也刊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其中《正义日报》在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宣传社会主义等方面比较突出,受到广大读者的特别关注。

1924年到1925年间,陕西各地以共产党人为主创办的刊物主要有:魏野畴主办的《青年文学》(后改为《青年生活》),雷晋笙、崔孟博等主编的《西北晨钟》,蒲子政、亢维恪主编的《渭北青年》,何镜清、黄宪之主编的《新社会报》,赵葆华、宋树藩等主编的《青天白日报》,王森然等创办的《榆林之花》、《塞声》,魏野畴、张秉仁、关中学等创办的《西安评论》等,这些报刊与外地陕籍学生创办的刊物

互相配合,遥相呼应,对促进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团员以课堂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夏,魏野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陕,先在华县私立成林中学任教,后应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的邀请到陕北榆林中学任教。期间,他以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世史》书稿为教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历史,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介绍并帮助学生阅读革命书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培养和影响了潘自力、刘志丹、吉国桢、王子宜、曹力如等一批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西北地区党和红军的骨干。

1922年8月,王尚德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受党团组织和董必武的派遣回陕组建团的组织。他在家乡渭南赤水镇约朋友张浩如、田涵蒙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在此基础上集资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民主革命的道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回陕,他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林中学任教。翌年秋,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李大钊的帮助支持下,从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延聘了王德廷、王复生、田伯英、杨明轩、常汉三、韩叔勋、李瑞阳等一批进步教师,作为革除旧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课堂上公开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浅说》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等革命理论,向学生推介《向导》、《先驱》、《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引导下,白明善、王兆卿、马文瑞、乔国桢、贾拓夫、张达志、安子文、霍维德、唐洪澄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成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骨干。

1924 年底,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刘含初回到西安,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科长、西北大学教务长。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向师生宣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络西安各界人士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二 马克思主义同陕西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较为系统地传入陕西虽然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同陕西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一些中等学校教育改革紧密结合。五四运动后,一批从京、津、沪、汉等地高等学校毕业的陕籍学生陆续回陕,北京大学云南籍学生、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王复生及其胞弟王懋廷,北京大学毕业的河北籍学生吕佑乾等也先后来陕任教。他们在各自任职的学校提倡、促进和从事教育改革。首先提倡和采用进步的新教材,废除宣传封建文化的旧教材。魏野畴曾说:若用现在出版的课本作教材,那就牺牲光阴多了。新教材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民主革命的原理及一些进步书报刊的文章。其次,引导学生建立读书会、研究会,把课堂学习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他们为读书会、研究会提供进步书刊并予以指导,和学生一起研究、讨论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与水平。成林中学、榆林中学、省立绥德第四师范都成立过这样的读书会和研究会。再次是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校内外一些实践活动,使学生从读死书中解放出来。魏野畴在成林中学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会,由学生代表参加学校校务会议,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与学校领导、教职工一起讨论教学和学校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在进步教师指引下,学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1921年11月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①通过了损害中国利益的《九国公约》。消息传来,许多学校学生罢课、游行,反对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血腥镇压时,咸林中学等校学生通过集会等各种形式支持罢工工人,并为受害工人募捐。1924年以后,陕西各地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更为突出。在王尚德支持下,赤水职业学校等校先后创办了平民学校或平民夜校,吸收学校附近的农民、工人入校学习,一方面教他们识字,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传播马克思主义同驱逐陕西军阀势力相结合。陕西的革命进步青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认识包括“驱陈(树藩)、驱刘(镇华)”在内的反军阀斗争的性质、必要性和意义,以及斗争的方式方法。武止戈提出:打倒军阀,一是联合全国被压迫兄弟,向军阀老巢进攻;一是采取“散兵战术”,分头向各地军阀迎头痛击。1923年3月10日出版的《共进》第33期刊登的《本社宣言》,提出把反军阀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目前应解除两大恶势力,就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政治,打倒军阀是对内谋取政治清明的唯一的方法,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则是釜底抽薪。8月25日出版的《共进》第44期刊登的《“打倒军阀”的意义》一文提出,打倒军阀武力,必须用革命武力,要建立联合战

① 全称是“关于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会议。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九国。会议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主持。12月13日签订了美、英、法、日“四国公约”,重新划分了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1921年2月4日签订了美、英、日、法、意“五国公约”,规定了五国海军的比例,同一天还签订了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公约”,这几个公约构成了所谓“华盛顿体系”。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是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利益的冲突。《九国公约》实质上是要求中国执行“门户开放”,对各帝国主义列强“机会均等”原则。

钱,发动工人、农民、商人、教育界、实业界等各阶层被压迫人民,去打倒封建军阀。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陕西革命进步青年已把反对地方封建军阀的斗争提高到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

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建立青年进步组织结合起来。1922年至1923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较早的成林中学、榆林中学、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学生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为了加强对这些积极分子的培养并发挥他们在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作用,王尚德、王复生在成林中学吸收潘自力等10名积极分子建立了青年励志团(一说为青年励志社)。1924年春,在王尚德指导下,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渭北中学的一些先进分子成立了青年自进团,开始有七人,后来发展到数十人。在西安,魏野畴、王尚德于1924年指导张性初(张秉仁)等成立了青年文学社(后改为青年生活社)。此后,各学校的进步青年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普遍建立了青年社组织。这些早期的进步青年组织是马克思主义和陕西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团结广大青年学生、传播新文化、从事进步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广泛传播及其与陕西革命斗争实际的结合,逐渐引起陕西人民思想领域的变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陕西的建立,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陕西的顺利进行,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方面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陕西青年团组织的创立及其活动

第一节 陕西团组织的创立

一 关中地区团组织的创立

1921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魏野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陕,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次年秋,北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王复生也到咸林中学任教。他们在该校领导学生建立学生会、读书会、青年励志团等进步组织,为后来西安、渭南地区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8月,受武汉党、团组织和董必武派遣,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尚德回陕发展组织。王尚德回到家乡渭南,发展张浩如、刘建侯入团。王尚德、张浩如又在渭南赤水镇创办了职业学校,以学校为阵地,指导渭华地区的革命斗争,从事建团活动。

1924年3月,团中央召开二届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西的西安、华县、三原等地建立团的组织。嗣后,团中央派共产党员武止戈在去苏联学习前先行回陕,帮助建立团的组织。5月30日,武止戈到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向王尚德传达了团中央的指示。同时,团中央负责人林育南也写信给王尚德,促其建立团组织。王尚德即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建侯从临潼三育学校请到赤水职业学校任教,并于6月中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王尚德为书记,张浩如为干事会会长,这是陕西地区最早建立的团支部。团赤水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同年发展了武维化、程养廉、张宗逊等九名团员。到1925年,赤水团支部已有团员18人,隶属团

中央领导。

1924年6月,武止戈到西安开展建团活动。他通过在西安省立一中、三中任教的魏野畴介绍,认识了一些暑假留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发展张秉仁、宋建旭(宋树藩)、杨宏德(杨起雄)三人为团员,上报团中央,经团中央批准,建立了西安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8月,共产党员雷晋笙从上海回陕,参加和指导了团小组的活动。雷晋笙和杨宏德又介绍了四人入团,并报告团中央,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后称团西安第一支部),张秉仁为书记。到1925年初,青年团西安支部团员人数增加到16人。

1924年秋,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邹均奉团中央之命回西安发展团组织。年底,他同魏野畴一起又成立了一个团支部(后称团西安第二支部),两个支部分别同团中央联系,归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5年1月28日,西安团支部的张秉仁与赤水团支部的王尚德邀请华县成林中学青年励志团和三原共进社的负责人到赤水,经商谈,于2月1日在赤水职业学校开会,决定在三原、华县成立团支部。2月23日,三原团支部(一说特支)正式成立,有团员七人,姚志哲为书记。11月,华县团支部成立,书记岳炳光,隶属赤水支部。

1925年10月,团中央派吴化之来陕,他与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安存真一起,对西安团组织进行了整顿,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归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

二 陕北地区团组织的创立

陕北团组织的创立始于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4年夏,李子洲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常汉三、王懋廷、田伯英等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来校任教。王懋廷到校后,除宣传革命思想外,还在李子洲的支持下,同田伯英一起在学生中物色、培养进步分子,进行建团活动。12月29日,王懋廷给邓中夏写

信,请邓中夏向团中央介绍,批准田伯英及白明善等14名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团组织。1925年2月,王懋廷根据团中央的批示,在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王懋廷任书记,下辖绥德、榆林、汾阳三个团小组。榆林团小组于3月改为团支部,书记先后有张肇勳、刘志丹等,6月,团员发展到17人。同年春,绥德团组织在驻瓦窑堡的井岳秀部队石谦团李象九连发展了几名团员,成立了团支部,书记先后为李象九、史唯然。

1925年,省立第四中学在延安设立,呼廷震东任校长。他聘请陈俞廷、易厚庵、王超北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王超北奉西安团组织的指示在该校发展组织,于当年秋冬之际建立了四中团支部,书记王超北(一说杨和春)。该支部于同年底改为肤施团特支,有团员七人,隶属于团西安特支。

第二节 团组织的早期活动

一 发起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军阀政权的号召。北京政变^①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924年11月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1月10日,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的邀请,决定北上,共商统一全国大计。他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召集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中国共产党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各

^①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在国共合作的影响下,原直系将领冯玉祥率部于1924年10月下旬从前线调回北京。10月25日,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取消了曹锟帝制的皇帝称号,将其逐出皇宫,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在全国形成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1925年1月21日,魏野畴、王授金等在西安召集律师公会、报界公会、实业会等17个团体开会,决定发起建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并发布启事,号召各团体加入。23日,筹备会举行第二次会议,36个团体的63名代表到会。经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将此次筹备会改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推举俞嗣如为临时主席,魏野畴为临时书记。会议通过了《促成会宣言》和《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3月22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第四次大会,推举王授金为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

段祺瑞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用“善后会议”^①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此前,孙中山为促使国民会议的召开,先后派出一批代表赴各地做工作,派到陕西的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屈武和董汝成。1月,屈武、董汝成回到陕西。此时,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已成立,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成立。2月,渭南赤水团组织负责人王尚德等发起成立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有八九个群众团体参加,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和通电。2月4日,李秉乾(李子健)等联络三原30多个团体发起召开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在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宣言和通电。绥德团组织一成立,即从事国民会议运动,建立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1924年寒假,王懋廷和绥德团组织鼓励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学生到民间去,宣传和组织国民会议

^① 段祺瑞违背民愿于1925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代表军阀官僚利益的政治分赃会议。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断然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有大勋劳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及制止内战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贤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保荐者。根据上述规定,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除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士外,几乎都是军阀、官僚和政客,人民团体完全被排除在外。善后会议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普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促成会,散发有关传单 8000 余张。他们把“鼓吹民众对于政治的兴趣,与其自决及阶级斗争的观念”作为奋斗目标,很快便在 9 个县成立了 11 个分会。之后,又有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陕西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三原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其活动主要是反对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陕西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许多工农学商兵联合会、学生会、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学校等团体纷纷发出宣言、通电,召开群众集会,反对“善后会议”,主张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1926 年 1 月 7 日,在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召集的代表会议上,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改名为西安国民会议促成会。

陕西国民会议运动对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动员陕西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处在初创时期的陕西党团组织也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得到实际的锻炼。

二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平民教育运动是五四运动后,由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掀起的旨在对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进行文化、技能教育的运动。恽代英等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人物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其领导机关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施者是各级学联,活动主体是青年学生。

平民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平民教育界的运动,现在有发展壮大的趋势,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机会。

陕西的平民教育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与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团组织建立较早的赤水、三原、绥德、榆林等地,平

民教育运动是团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平民学校也是培养训练团员和进步青年的场所。1925年1月27日,王尚德等在赤水成立平民教育服务团,并指导青年生活社在各学校建立平民学校,一方面教青年农民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培养训练团员。到当年夏,赤水已办平民学校两所,妇女半日学校一所、夜校一所,其中仅平民学校和妇女半日学校就有学生80余人。在这些学校中,除读书识字和学习文化知识外,团组织还十分注意农民运动人才的培养,把平民学校当做培养农运人才和开展农运工作的场所。三原的平民教育运动最早起源于三原西关民治学校,由青年学生中的团员主持成立平民夜校,学生60多人,多为青年农民。平民教育运动在陕北比较活跃的地方是绥德、榆林。团组织除利用平民学校训练青年农民外,还把平民学校作为训练团员的基地。1925年初,绥德平民学校已有学生90余人。此外,刘志丹、史唯然等人分别在榆林、宜川创办了平民学校。

除创办平民学校外,团员和进步青年还成立了许多进步团体。西安有青年生活社、青年文学社、陕西青年社、西北青年社、西北晨钟社,华县有青年勵志团,三原有渭北青年社、青年共进社,绥德有绥师青年社(后改名陕北青年社)等。这些团体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是培养和选拔团员的场所,其主要领导人都是团员。

三 参与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的斗争

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在北方树立起国民军的旗帜,北方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此形势下,作为直系军阀政府任命的陕西省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影响。刘镇华自入陕后,残酷镇压人民,其部下曾在蓝田、镇安、山阳交界处一次洗劫六条川的财物后,将六个村子烧毁,屠杀群众,连老人、儿童也未能幸免,其残暴劣迹为陕西人民所发指。

从1921年到1923年底,陕西人民始终未停止过驱逐刘镇华的斗争,多次在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上刊登驱刘文章,要求北京政府调刘镇华部离陕,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武力反抗刘军的行动,但最终均因为军阀政府的包庇和刘镇华的残酷镇压而失败。随着北京直系军阀政府的倒台,陕西人民的驱刘怒火又一次燃起。西安、三原、渭华等地的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印制大量驱刘宣传品,鼓动和号召群众进行各种驱刘斗争。陕西学生联合会、陕西旅京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都先后发表了对陕西局势的宣言,对陕西人民的驱刘斗争予以积极声援。

驱刘运动的高涨,使得隶属国民军系统的一些陕军受到影响,纷纷加入驱刘行列。1924年11月中旬,国民军第二军所属的两部陕军六七千人在华阴、华县一带发动了驱刘战斗。斗争虽然失败,却进一步激发了陕西军民驱刘的决心。12月,胡景翼率国民军第二军从京津南下进攻河南,与刘镇华的第二十五师憨玉琨部在黄河两岸对峙。1925年2月,刘镇华为准备和国民军二军决战,让吴新田代理陕西省督军、省长,并亲临洛阳指挥作战,胡憨战争正式爆发。到3月上旬,由于国民军攻势强劲,加上全省人民的声援,憨玉琨自杀,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运城。战争结束后,刘镇华在北京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但立即遭到陕西人民的坚决抵制。在陕西党团员的参与支持下,西安、三原、渭华等地的群众纷纷集会,发表宣言,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决定,坚决拒绝刘镇华回陕。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陕西同乡会、学生会也极为愤慨,表示不驱逐刘镇华出陕西誓不罢休。陕军各部也在群众驱刘声势的影响下,对刘镇华的归陕企图进行了坚决抵制。杨虎城部还从韩城、合阳、朝邑^①到潼关的黄河渡口把守,堵死了刘镇华的归路。在归陕无望的情况下,刘镇华于3月21日表示下台。统治陕西人

① 旧县名,1958年撤销,镇区并人大荔县。

民八年之久的反动军阀刘镇华被赶出陕西。

驱刘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陕西人民并未摆脱反动军阀的残酷统治。1925年5月1日,接替刘镇华代理陕西省督军、省长的吴新田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1921年随阎相文入陕,翌年,借追剿陈树藩余孽为名进驻汉中,被任命为汉中镇守使。从此,吴新田独霸汉中,极尽搜刮之能事,其行径早为陕西人民所不齿。

吴部进驻西安后,骄横恣肆,继续欺压人民,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5月4日,西安省立一中学生踢足球时,将球踢出校园,落入隔壁西仓院内,被驻在那里的吴新田部士兵捡去。学生前去讨还,反被士兵殴打。更有甚者,在吴部军官指使下,大批士兵闯入一中校园,用砖头、铁锹、刺刀、木棒等凶器追打学生,有的还追到学生宿舍行凶。结果40多名学生被打伤,4人伤势严重,生命垂危,这就是震惊陕西的“五四惨案”。事件发生后,一中师生全体罢课并发表宣言,揭露吴军暴行。一时间,西安数十所学校闻声而起,声援一中,并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组织学生后援会,要求吴新田惩办凶手,保护学生。吴新田置若罔闻并袒护凶手。于是,西安团组织领导各校学生从5月10日起一律罢课。5月中旬,西安学联办事处迁到三原,与三原学联一起开展驱吴运动。5月中下旬,两地学联先后派人到全省各地开展宣传活动,并派代表到杨虎城部和国民军二军等部队做工作,要求支持、参加驱吴运动。在团组织的号召下,全省学生纷纷响应,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驻陕部队也积极参加。经过两个月的斗争,7月15日,吴新田被迫率部撤离西安,逃往陕南,国民军进驻西安,驱吴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四 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陕西,正在三原领导驱吴运动

的西安部分团员和三原团组织领导人及时印发传单、宣言,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恶行径,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接着,由学联发起召开西安市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6月13日,三原、西安团组织部分负责人召开会议,决议由陕西学联与渭北学联分别通告各县,做五卅运动宣传。学联主办的驱吴日刊《血泪》刊出《五卅反帝》特刊。6月14日,三原教职工召开紧急会议,发表通电,称“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存亡攸关,愿共同策励”。随后,学联组织了讲演团,分赴乡间讲演。6月初,在西安的党团员雷晋笙、吕佑乾等联络各团体和各界代表先后成立了反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委员会、各界雪耻会、西安学生雪耻会等组织,并发表宣言,提出收回租界、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的要求。6月18日,西安本康行工人在东大街端履门十字精业公司举行大会,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西安学生打着“西安学界反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大旗,每人手执白旗一面,上书“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与英、日绝交”等口号,游行示威,并沿途散发传单。6月21日,西安3万多群众举行盛大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集会,各商店举行了罢市。6月22日,西安人力车夫罢工,支持上海人民斗争。

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师生在团组织负责人王懋廷、田伯英及该校校长李子洲的倡议、支持下,于6月7日召开教职员、学生紧急会议,发表宣言、通电,支持五卅运动。次日,绥德团组织发起召开市民大会,并成立了绥德各界救国办事处,创办《救国闻日刊》。王懋廷还亲自到米脂、榆林,指导当地团组织开展活动,并联络各界在榆林成立了陕北各界反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6月25日,榆林、绥德两县城同时罢业半日,下半旗志哀,游行示威。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渭南后,团赤水特支召集附近团员开会,决定立即用赤水职业学校学生会名义发表通电,印发传单,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函告团咸林中学支部及三原支部,令其大肆宣

传。团赤水特支还成立了沪案后援会，组织宣讲团到渭北等地宣传。王尚德与当地驻军国民军第三军团长张兆丰联合各界成立了关中工农商学兵联合会，先后开会两次，反对五卅惨案秘密解决，并举行游行，参加人数达五六千。

此外，各地还开展了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募捐活动和反对使用英、日货的斗争。6月间，榆林各界捐款1000余元，绥德各界捐款300余元，绥德师范学生举行了募捐演出活动。

陕西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进行的反对关税会议^①、沪案重查，支持省港大罢工等，都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五 帮助建立国民党陕西组织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适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第30号通告，要求各地运用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组织，加强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发展国民党党员；要求立刻成立国民党的县（市）党部，并在7月1日以前成立各省的正式党部。随后，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中共北方区委相继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到陕北、关中等地，帮助陕西团组织开展此项工作，并积极筹备建立国民党陕西省的统一领导机构。

1925年上半年以前，国民党在陕西地区只有一些零散的党员和松散的基层组织，没有全省统一的组织，谈不上有什么革命活

^① 五卅运动后，北京政府与英美等12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因有损中国关税利益，受到国人反对，加上时局动荡，会议无果而终。

动。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主持下,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于8月18日在西安成立。国民党党员俱乐部以联络党员、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9月5日,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的国民党员64人,公推刘含初、杨明轩、赵葆华为书记。会议决定将西安市划分为六个区,每区设干事二人,负责宣传工作。之后,党员俱乐部陆续派人分赴各县筹建国民党临时党部。

9月初,国民党华北军事特派员焦易堂受于右任、刘允臣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回陕组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2日,全省国民党党员谈话会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杨明轩、焦易堂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筹备委员的议案,会后设立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筹备处。此时,陕西已有榆林、绥德、佳县、华县等县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县党部。26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处召开临时省党部成立大会,通过了临时省党部组织大纲,推荐杨明轩、刘含初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傅守命、王圣域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当选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大多数,从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革命性质和坚决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方向。此后,在临时省党部的协助下,又有一些县成立了临时县党部。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帮助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四章 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第一节 中共陕西组织的建立

一 关中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

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思想上、干部上为党组织的建立做了准备。1925年,特别是五卅运动和陕西驱吴运动之后,陕西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迅速高涨,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中共组织,以便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共陕西组织是在团组织建立较早的关中地区首先建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豫陕区委的具体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根据国共合作后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作出了关于发展党组织的决议。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强调要重视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大会认为,现在组织问题已成为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会议强调除在工业工人数量多,具有党的组织发展基础的地区发展组织外,还要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革命斗争和党组织的领导,192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同时,在河南成立了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王若飞。豫陕区委负责指导、管辖河南、陕西地区党的工作。1926年2月,中共中央将陕北地区党组织划归北方区委管辖。

1925年九、十月间,中共北京区委(1925年10月改为中共北方区委)派安存真(体诚)来陕西做军事工作,并发展党的组织。同

时,共青团中央派吴化之(华梓)来西安整顿团组织。他们在赴陕途中路过河南时,中共豫陕区委委托他们在陕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安存真、吴化之到西安后,鉴于西安已有五名党员,便根据中共四大党章规定,于10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支,书记安存真(1925年底安存真离开后,由吴化之接任),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党务报告》称西安特支是党在“西北上的萌芽”。

1925年底,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组织及团组织青年化的指示,发出第121号通告,提出超过20岁的共青团员都应该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同时仍为共青团员;不满20岁的团员如果担任重要职务时,也应加入共产党;凡是超过23岁的团员,条件具备时均应转为党员,不再兼团员,但在团内担任重要职务者除外;某一地区如果只有团的组织而无党的组织,团的组织要设法建立党的组织。西安党、团组织负责人吴化之积极贯彻这一通告精神。他于12月去三原,将张仲实、王之鼎、赵宗润、鹿诚斋等共青团员转为党员,成立了中共三原特支,书记张仲实,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归西安地委领导)。同月,吴化之又去渭南赤水,将王尚德、张浩如、张宗适等六七名团员转为党员,成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书记王尚德。中共赤水特支开始由中共豫陕区委直接领导,后由中共西安地委领导。

关中地区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要求在关中地区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1925年底,中共豫陕区委派区委委员、郑州地委书记黄平万来西安组建西安地委。黄平万到西安后,参加了中共西安特支的领导工作,在西安地区进一步发展党员,并在中共西安特支的基础上,于1926年初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平万任书记。中共西安地委隶属豫陕区委领导,下辖西安支部及三原、渭南党的组织。

到1926年底,兴平、富平、岐山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同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

二 陕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

陕北地区是陕西党组织建立最早的地区之一。陕北党组织也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北方工作的决议》精神指引下,在团中央发出第121号通告后创建的。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陕北党团组织的发源地。继绥德师范之后,榆林中学和宜川驻军李象九部、谢子长部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延安地区党组织也随之建立。

从1926年1月中旬绥德团地委书记冯景异给团中央写的两份报告内容来看,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创建于此时。冯景异在1月14日的报告中称,“通告121号已收到”,“组织CP^①一层,此处已决定成立,惟CY^②方面,人材缺乏,做事的人,不敷分配,望设法指导,再请将CP章程及刊物等,寄来些”。1月17日的报告中称,“此地CP已成立支部,有同志八人,旧CP同志一人,由CY提出七人,二人与CY完全脱离关系,五人于两方面工作(同志姓名及思想等,另有报告表),指定书记一人——田伯英,他现赴省出席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代表大会,大概于三月间才可回校,CP同志马瑞昌,亦出席陕学联代表大会……请中央批准事,请兄处代为接洽,并即时将文告章程等寄来,以便有所准绳。书记暂推定本校校长李子洲代理”。关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党组织成立时间的说法,一些当事人写的回忆资料或谈话记录,有的与上述报告相一致,有的存在分歧。时任绥师英文教师的田伯英在1963年5月1日写的《陕北建党及活动情况》中说,王愿廷“在北方区(北京)党组织有熟人,我们俩就给北京党组织写了一封申请入党的信。约有半个多月(1924年10月间),北京党组织回信说,已经批准我们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在陕北开展党的组织

①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② CY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工作”。“我们先吸收共进社社员和其他方面先进的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在绥德四师起初只有三四人,到年底增加到八九人。超过五个人就成立四师的党小组,我任组长”。“四师的小组到1925年初扩大成为支部,我任书记,王懋廷任宣传,李瑞阳任组织。”团北方区委派到陕北整顿、发展组织的耿炳光在全国解放后写的回忆录中说,他于“1925年春去陕北绥师,建立了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书记为李子洲”。^①

1926年,陕北地区受刘镇华进攻的危害较小,因此党组织发展较快,至6月,共建立党组织7个,其中,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建立党支部3个,有党员31人;宜川建立党的特支2个,有党员21人,全是军人;榆林中学建立党的特支1个,党员7人。

为了便于管理,中共中央于1926年2月将陕北党、团组织划归北方区委管辖。同年5月,团北方区委再派耿炳光赴陕北考察,整顿党、团组织。耿炳光对陕北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在加强教育的基础上,将一些团员转为党员,并于6月成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田伯英任书记。耿炳光于6月14日和18日给北方区委写了书面汇报。

延安地区党组织建立于1926年。当年夏,李蕃蓁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去延安四中,与校长呼延震东在四中建立了党的特支,书记呼延震东,归中共豫陕区委领导。

第二节 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 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

陕西地区党组织建立后,担负起了领导陕西地区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重担,与团组织一起,多以国民党组织的名义进行活

^① 田伯英和耿炳光都没有见过1926年1月绥德团地委书记冯景昇给团中央的报告。本文采取二说并存并以1927年9月团省委文件表述为准。

动,推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继续发展。

陕西地区的国民党组织,主要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建立并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积极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坚持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民众书》,号召人民实行孙中山遗嘱,完成国民革命。11月,国民党右派分子谢持、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员。会后,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12月,国民党华县、三原县党部发表通电,驳斥西山会议派。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作出《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给予处分,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推选共产党员魏野畴、师守命和国民党左派王圣域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2月,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召开全省代表大会,贯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陕西许多地方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合作,以国民党名义举行纪念活动。绥德县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召开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七八百人,与会国民党党员皆臂裹黑纱,其余皆戴白花。会上宣读了《总理遗嘱》,演讲孙中山事略,散发坚持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等内容的传单七八百份。三原县在渭北中学操场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300多名国民党党员和众多的来宾参加了纪念大会,会后进行讲演,散发传单。各地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对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坚持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会进行侵略

1925年下半年,以学生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在全省各地掀起高潮。非基运动是一场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争取民族平等的群众斗争。

陕西虽然地处西北,但也深受基督教之害。基督教势力依仗不平等条约,欺压人民群众,进行文化侵略活动。延安是基督教势力聚集之地,县东一带的地产多掌握在基督教堂手中,教堂以此掠夺、剥削、欺压群众。一些传教士还通过传教,极力散布迷信思想,毒害人民,并控制了一部分教育权。圣诞节前,延安四中共青团组织和团员以学生会名义组建延安“非基”大同盟。圣诞节前一天,延安“非基”大同盟组织全城400余人游行示威。游行群众人人手执小白旗,上书“打倒帝国主义”等字样,至县署前示威,提出废除延安县署过去割让城东一带土地给教堂的承诺,收回教育权等要求,后又封锁了教堂。在“非基”运动中,延安许多教徒都宣布退教,有些教徒还发表了脱离教会宣言。

三原一带也是教会势力集中的地方。三原共青团组织通过渭北学联和渭北青年社发起成立了“非基”同盟,并组织了临时行动委员会。12月25日圣诞节,非基同盟领导数千人游行示威,迫使县知事签字答应收回教育权。

在西安,党、团组织通过省学生总会,联合各校学生会及各团体恢复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讲演队四出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使各教会不敢明目张胆地举行圣诞节活动。一些教会学校怕学生参加“非基”运动而提前放假。为了破坏“非基”运动,一些打着宗教旗帜的帝国主义分子四处散布谣言,说学生要“烧教堂”,“杀洋人”,“打官厅”,要求官厅禁止和镇压“非基”运动。慑于帝国主义的壓力,省督署逮捕了两名宣传“非基”运动的讲演者。12月25日,非基督教大同盟在南院门召开群众大会,军警强迫其解散。

于是,集会群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游行讲演,一部分继续开会。不久,集会群众又被军警强行驱散,先后反复七次之多。当天,西安各城门、教堂、学校门口军警林立,控制学生行动。尽管如此,26日和27日,仍有讲演队冲出学校到街头讲演。在“非基”运动的影响下,教会学校——西安中学学生三次发表宣言,指出“教会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机关”,要求收回教育权。1926年1月10日,省学生总会和西安学生联合会发表了《援助西安中学学生会收回教育权宣言》,对西安中学的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在“非基”运动中,党、团组织严格区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行径与教会进行的正常宗教活动,争取和团结广大教会学生,使他们加入革命阵线。

三 支持反奉、抗日斗争

1925年10月18日,控制浙江的北洋军阀孙传芳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斗争。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所有军阀的利益,而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此次反奉战争虽掺和了一些军阀势力,但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号召全国人民站在反奉运动的主体地位,集合全国所有反奉的力量,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此时,关中已属于国民军辖区,西安的反奉斗争得以广泛开展。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西安特支利用西安有利的政治形势,领导开展了支持反奉战争的活动。10月,魏野畴在《西安评论》第18期上发表《双十节敬告陕西同胞》,指出:“在目前需要认清英、日帝国主义者携手共同利用奉系之军阀,为民众势力发展之最大障碍,应有条件地赞成国民各军实行大联合以推倒张作霖及奉系军阀。”张秉仁在11月27日刊出的《西安评论》第25期上发表

《为反奉运动告西安各界同胞》一文。文章写道：最近反奉战争运动的发展，已继承五卅运动的精神而普及全国，号召西安同胞拥护广州政府对于战争的宣言，即一致对奉的目标应当是对内召集国民会议，建立国民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要保护人民及政府的一切自由与独立。党团组织通过《西安评论》，宣传反奉战争的目的与要求，在《西安评论》第25期刊登了张作霖的罪状14条。在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对此次反奉战争的宣言》、《反奉战争的宣传大纲》，揭露奉系军阀的罪恶和反动本质，动员全省人民支持反奉战争。西安党团组织还联合各界成立了西安各界反奉运动协作会。渭南、三原、绥德、榆林等地的党团员也通过一些进步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反奉宣传活动，揭露和声讨奉系军阀，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奉系军阀的反动本质及反奉的目的和必要性。

11月23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日本帝国主义以取得在东北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助张作霖。消息传来，陕西民众将反奉斗争与反帝斗争相结合，强烈反对日本出兵东北。

1926年1月5日，三原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提出开展反对日本出兵的群众运动。随后，国民会议促成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于10日召集代表会，讨论开展反日运动。8日，中共三原特支与共青团组织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建立有关组织、进行讲演、起草宣传提纲、拟定大会口号等准备工作。10日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反日行动委员会和抵制日货委员会；大会前一天，各学校放假一天，组织学生上街讲演宣传，草拟宣传大纲。13日，三原召开市民大会，各团体各界代表登台演讲，愤怒声讨、谴责日本出兵东北、侵略中国的行径。大会一致通过了各项

提案及致日本劳动团体电,要求共同抗议日本出兵满洲。三原学联还利用农历“腊八”古会,从1月13日起进行讲演,印发了许多传单,抗议日本侵略,宣传达十余日。

1月18日,陕西省学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传达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精神。26日,与会代表和各校学生示威游行,向市民散发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为日本出兵东三省事敬告西安市同胞书》。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京广大群众先后于3月14日、18日集会,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北京大学等校的陕籍学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军警开枪镇压集会群众,打死47人,重伤199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北大陕籍学生、共产党员张仲超牺牲,李维屏等人受伤。“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绥德后,党、团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召集市民大会,游行示威,组织讲演队,要求商人罢市半日并发表宣言通电,还决定定期追悼殉难烈士。根据共青团绥德地委的通知精神,3月30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生会、陕北青年社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发起召开绥德市民大会,杨明轩主持大会并报告“三一八惨案”的经过,韩叔勋等讲演,会后游行示威。正当这一斗争深入进行时,西安等地遭到军阀刘镇华的围攻,陕西党团组织的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反对军阀刘镇华的斗争。

第三节 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

一 国民军坚守西安

1926年,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并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相勾结,企图先进攻北方的国民军,然后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了消灭国民军,

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鲁联军进攻由京津退到南口、张家口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第一军，吴佩孚余部进攻驻守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1月20日，吴佩孚发出讨伐冯玉祥通电，随即命靳云鹗、寇英杰、刘镇华部从豫东、豫南、豫西分三路进攻河南的岳维峻国民军第二军。国民军第二军被迫于2月16日退出开封。时任陕西军务督办的李虎臣率部赴河南增援。3月初，岳维峻、李虎臣从郑州退到豫西，在靳云鹗、寇英杰部的追击和刘镇华部的堵截下，国民军第二军在陕州、灵宝间全军溃败。岳维峻由陕州茅津渡过黄河，为阎锡山晋军俘获，李虎臣夹杂于乱军中，经潼关返回西安。

4月2日，吴佩孚委派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以柴云升为前敌总指挥，率部进攻陕西。同时配合刘镇华进攻的还有驻汉中的吴新田，甘肃的孔繁锦、张兆铨及阎锡山晋军一部。进攻陕西的军队，除吴新田、孔繁锦等部外，计有镇嵩军7个师及投奔刘镇华的陕军2个师，人数最多时达11万。刘镇华、吴新田部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陕西人民的极大愤慨。4月18日，刘镇华、吴新田等部进攻至西安附近，对西安实行合围。

西安城的守军是：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国民军第二军卫定一部，共约万人。5月19日，杨虎城、李虎臣及各方将领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守城部队的统一领导、指挥和部署等问题。经杨虎城提议，会议决定取消国民军第二、三军名称，改称陕军，公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驻防三原、泾阳的田玉洁为陕军副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杨虎城为陕军副司令兼第三师师长，邓宝珊为总指挥，卫定一为副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20日，李虎臣、杨虎城等宣布就职，杨虎城部守东城和北城，李虎臣部守南城，卫定一部守西城。

从4月中旬到5月15日，刘镇华部从东、北、南三面对西安进行包围，留下西城门，企图迫使陕军从西门退出，然后与吴新田东西夹击，予以消灭。但这一企图未能实现。从5月15日起，刘镇

华连西面也包围起来,断绝出路,围困西安。李虎臣、杨虎城率西安军民英勇战斗,粉碎了刘镇华的一次次猛烈进攻。守城军民虽然死伤惨重,但反“围城”的决心不移。

刘镇华久攻西安不下,又于6月间分兵围困三原、咸阳县城,企图把西安军民完全困死。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驻三原、咸阳的陕军英勇战斗,县城始终未被攻破,有效地配合和援助了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

9月16日,赴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回到绥远^①。17日,冯玉祥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遵照孙中山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军联军全体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先后派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大批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工作,帮助国民军联军举办政治训练队、军事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开展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先后派到国民军联军中工作的党团员达200余人。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接受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建议,并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冯玉祥先派遣佟麟阁、孙连仲两师入甘,帮助原留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吴佩孚在甘肃的势力,接着任命孙良诚、方振武为援陕军正、副总指挥,率部进军陕西。孙良诚部自陇东出发,经彬县、兴平等地向西安进攻;方振武部于10月8日从五原出发,经宁夏固原、甘肃平凉、陕西乾县至咸阳与孙良诚会合;孙连仲部由宁夏出发,马鸿逵部由固原出发,张维玺部从天水出发,经陇县、千阳向咸阳、西安挺进。

10月上旬,孙良诚部前锋抵达兴平。10月12日,刘镇华部被迫从三原撤围。于右任与史可轩部随后到达三原,组织国民军二军、三军参加西安解围战斗。国民军联军入陕后,受到当地群众的

^① 旧省名,1954年撤销,辖区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热烈欢迎和支持。10月15日,孙良诚先头部队和陕军向咸阳地区的镇嵩军发起进攻。刘镇华部垂死挣扎,一面加紧围攻西安,一面加派援军阻击国民军联军。孙良诚部伤亡惨重。11月下旬,国民军调整作战计划,重新部署兵力。孙良诚部担任正面攻击,新到的刘汝明部为右路,经斗门镇、韦曲进攻东十里铺;孙连仲部为左路,在夺取大白杨后,直逼灞桥,向刘镇华部后方出击。守城部队虽精疲力尽,仍积极出击,对刘镇华部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刘镇华见大势已去,率镇嵩军撤出陕西。11月28日晨,西安解围。

在近八个月的守城斗争中,西安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死、饿死者达数万人。

西安反围城斗争是陕西军民直接进行的一场反军阀斗争,这场战斗把直系军阀10万余人吸引在陕西,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了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

二 西安党团组织在反围城斗争中的活动

刘镇华部围困西安时,中共西安地委和共青团西安地委中断了与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党、团豫陕区委的联系,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创建不久的西安党、团地委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毅然决定支持关中军民的反围城斗争,以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

西安党、团地委一方面在西安城内与守城军民一起战斗,一方面积极在陕东和渭北刘镇华部驻防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刘斗争。

西安城被围时,西安党、团地委的领导成员黄平万、吴化之、魏野畴、刘含初、雷晋笙、张含辉、张秉仁、吕佑乾、王观政等均坚守在城内。他们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陕西省学生联合会、西安学生联合会等名义,开展多种活动,支持陕军坚守西安城。魏野畴、刘含初、吕佑乾等还利用各自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赞誉杨虎城部由三原进驻西安城的革命行动,以坚定杨虎城的守城决心。暑假期间,西安约有1000多名学生留校,为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发挥

他们的社会作用,党、团西安地委在西安省立一中举办了暑期学校,参加学生约五六百人。在此期间,党、团西安地委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团组织。这些学生走向街头进行宣传,慰劳守城将士。上海五卅惨案一周年时,西安城虽然遭受刘镇华部队的炮火轰击,但在中共西安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爱国反对惨杀同盟运动委员会,西安各界妇女也纷纷加入雪耻会、女子外交后援会,上街游行示威、演讲、募捐。为配合反围城斗争,西安妇女协进会提出了“反对男尊女卑,破除三纲五常”的口号,号召各界妇女组织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向群众揭露军阀刘镇华祸陕殃民的罪行,动员市民团结一心,支持守城将士。她们还成立妇女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坏人破坏捣乱。在守城最困难的时候,妇女协进会的工作人员带头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粮食、衣物送给守城部队,慰问将士,并成立“红芽社”剧团,排练戏剧《花木兰》、《天涯姐妹》等剧目到部队和街头演出,鼓舞军民守城斗志。坚守西安后期,最严重的问题是粮食奇缺,粮价飞涨。7月后,市民即有饿毙者;九、十月之交,因食绝而死者日多;入冬后,饿殍遍地,无人收埋。在这种情况下,党团员积极参加社会救济工作,组织市民义务掩埋遇难者遗体,开展自救活动,并派代表出城求援。共产党员王授金主动把自己家中存粮捐出来救济他人。他的女儿王现政多次把一些党团员带回家中吃饭。共产党员方鉴昭动员家中拿出几百斤粮食,支援反围城斗争。

为配合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西安党团地委多次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出城,到渭北、东府一带进行反对刘镇华镇嵩军的斗争。1926年5月,由党团员主持的三原学生联合会发表《对陕局之宣言》,揭露北洋军阀残害陕西人民的罪行,号召全省军民迅速联合组织起来,合力抗击北洋军阀,积极参加反对刘镇华、吴新田的斗争。张含辉从西安到乾县后,建立了中共乾县特别支部,并帮助建立了国民党乾县党部,国共合作一起揭露军阀的罪行,反对刘镇

华、吴新田的祸陕行径。在陕东一带,虽无正规军队抗击刘镇华部,但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不少地方的群众和地方武装组织起来与刘军进行英勇战斗。中共赤水特别支部领导群众设置障碍,破坏镇嵩军交通运输线。5月初,华县五家庄地方武装与刘镇华部一个营英勇战斗。5月10日,渭南崇凝镇群众和庆里寺红枪会^①将刘镇华部梅发奎所属一连人赶走,14日进攻渭南县城,打死刘部连、排长各1人,士兵10余人。此外,蓝田、周至等地的群众也纷纷与刘镇华、吴新田部展开斗争,给他们以重大创伤,有力地配合了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

① 一种民间武装组织,成员多系青年农民,具有防匪防盗、反官兵、抗捐税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

第五章 中共陕西组织在大革命后期的活动

第一节 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中共陕甘区委的建立

一 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的成立

西安解围后,旅外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纷纷回陕,党的骨干力量云集西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西安党、团地委在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前,于1926年12月在西安成立了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作为陕西党团临时最高指导机关,书记黄平万,副书记吴化之,委员有魏野畴、雷晋笙、张性初等。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管辖西安和关中地区党、团组织,陕北党、团组织仍归北方区委领导。

西安解围后,陕西地区出现了有利于党、团组织活动和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首先是加强自身建设,发展壮大党、团组织。1926年12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张秉仁、罗承运去渭南整顿党、团组织,建立了中共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雷光显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党团联席会议还派人去兴平、泾阳等地建立了党的支部或特支。到1926年底,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下辖党的组织有西安、渭南两个地委。西安地委下辖东九府街、西九府街、政治队、长安^①等14个支部和肤施^②、旬邑、岐山、乾县、富平、临潼、

① 今西安市长安区。

② 今咸阳市宝坻区。

三原等9个特支；渭南地委下辖谷堆小学、大王、郑村、包氏庙、咸林中学、杨尧村、王埝村等12个支部及赤水、固市、隆兴3个特支。全省共有党员388人（含不属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管辖的绥德地委党员人数）；党团联席会议下辖团组织有西安、三原、渭南3个地委，16个支部或特支，有团员525人。在党团员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和训练。12月，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先后派魏野畴、李子洲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政治队，组织党团员骨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般的军事技术。

其次，陕西党团联席会议非常重视做好同国民军联军的统战工作。西安解围后，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派魏野畴等党团员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国民军二、三军中工作，陕北党组织也先后派马明方、曹力加等到国民军中工作，他们除做政治工作外，还注重做同国民军的统战工作。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还特别注重做于右任和国民军二军的工作，劝说其服从冯玉祥的统一指挥，不致使革命力量分散，并在国民军二军中选择最有进步倾向的史可轩部开展工作。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部及国民军一军中的统战工作，主要由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及由北方区委派到冯部工作的党团员进行。冯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常常和陕西地方党组织联系。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陕西党团联席会议结束，前后约三个月时间。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做了大量工作，对陕西大革命高潮的来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中共陕甘区委的建立

在陕西地区革命趋于大发展的形势下，为加强对陕甘地区党组织和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于1926年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对于陕西问题的意见》，建议：派耿炳光为党的工作临

时特派员,指挥全陕党的工作,在最短时间内成立陕西境内党的区委组织;陕西党的工作由中央直接管理与指导。为此,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前往上海请示中共中央。192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任命耿炳光为书记,负责领导陕西、甘肃两省党的工作。同时,共青团中央任命曹趾仁(团沪区闸北部委书记)为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

耿炳光、曹趾仁来到西安后,与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负责人黄平万、吴化之及李子洲等取得联系,于2月25日在西安桃胡巷召开第一次区委会议,耿炳光、曹趾仁、黄平万、吴化之、李子洲、赵慕华等参加。会议决定召开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陕甘区委。

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11人,代表9处党组织。耿炳光、曹趾仁主持大会,黄平万作关于过去工作情况的报告,曹趾仁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耿炳光作关于西北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情况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由5名正式委员、2名候补委员(暂缺)组成的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工作,李子洲负责组织工作,亢维恪任农委书记,陈家珍任军委书记。会议决定改组中共西安、渭南、绥德3个地委,区委兼西安地委;组建中共三原、延安、榆林3个地委;临潼、咸阳、兴平、岐山、乾县、旬邑6个特别支部归区委直辖。会议要求充分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区执行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区委的工作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在陕西要集中于东至潼关,西至长武、渭河南北这一区域,渐及陕北、陕南;在陕北目前集中于绥德,渐及榆林、延安。

为了贯彻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陕甘区委于3月份发出《关于组织宣传工作及农民军事国民教育学生职工妇女青年等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发展组织是我们党目前

的重要任务,要求从支部到区委,都必须有健全的组织,要经常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党的工作;在军事工作方面,要求集中力量在政治基础比较好的部队(如史可轩部)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对分布在宜川、清涧、安定^①等地的军队支部,除继续归有关地委领导外,特任命曹必达为该地军队中党的特派员;在宣传工作方面,要求除办好区委刊物《陕甘区通讯》(月刊)、《政治通讯》(半月刊)外,还要大量翻印《向导》等书刊和画报,成立书店,扩大发行范围,使革命宣传深入人心,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办党校和干部训练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组织才能,提高党员素质。

五六月间,中共陕甘区委决定成立中共五一^②、泾阳两个地委和一些支部、特别支部。至6月底,陕甘区委共辖7个地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4个支部、17个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177名,分布在陕西的33个县(市)和甘肃的4个县(市)。6月,为健全区委组织,中共陕甘区委增补刘天章、杜衡(杜振庭)为候补委员,刘天章负责宣传,杜衡分管组织并负责西安各支部的指导工作,魏野畴接替陈家珍负责军事工作。

三 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建立

1927年2月26日,共青团陕甘区委在西安桃胡巷成立,隶属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领导。

3月14日,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在西安中山学院召开,曹趾仁、吴化之等10人出席会议,绥德、延安两地派党员代表参加。团的代表大会与党的代表大会有分有合,耿炳光、曹趾仁、黄平万在两个大会上分别作了报告。大会提出“工作青年化、组织群众化”的行动口号,决定以努

^① 今子长县。

^② 1927年5月1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决定将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固市镇一带划为“五一县”,大革命失败后,五一县撤销,中共五一地委未能建立。

力进行党团分化、大力发展团组织、全面开展青年运动、加速农村青年工作作为活跃陕甘共青团工作的目标。会议选举张金印(张慕陶)为陕甘区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曹趾仁,组织委员吴化之,宣传委员张金印,青年委员张文彬,学运委员王蒂南。6月,中共陕甘区委对团区委进行了改组,书记潘自力,组织委员曹趾仁,宣传委员由潘自力兼任,其他委员未变。

共青团陕甘区委先后下辖西安、渭南、三原、泾阳、绥德、延安6个地委和直属的2个支部、37个特别支部,共有团员2400余人,机关刊物为《C.Y 陕甘区委通讯》,外围组织有陕西青年社和陕西全省学生联合会。

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在陕甘地区的组织,除党、团陕甘区委公开外,其他各级组织和党团员都是秘密的。在此期间,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立场,并连续发出许多指示,严厉地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①,因此,中共陕甘区委也曾一度认为:我们的党在西北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危险,就是党已离开群众而跑入机关。现在我们是在野而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不必要的政府机关,我们的同志应全部退出。致使一些还有可能加入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没有继续参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权机关。但是,中共陕甘区委关于扶助冯(玉祥)、于(右任)在西北发展,使冯、于本着革命的合作精神,和我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团结革命力量,打破种种困难,造成革命的西北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后来的实践中,中共陕甘区委逐渐改变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政权工作的态度,开始积极支持已经参加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驻陕总司令部和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组织和新的政权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工作促进了陕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发展。

第二节 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

一 参与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1月20日至25日,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西安、榆林、佳县、绥德、安定、清涧、延川、延长、延安、宜川、富县、中部^①、耀县、旬邑、长武、永寿、乾县、兴平、三原、泾阳、富平、蒲城、澄城、华县、渭南、临潼、蓝田27个县(市)的7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大部分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全省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于右任、史可轩先后为大会主席。在大会秘书长赵葆华宣布大会开幕后,于右任致欢迎辞,黄平万代表全体代表致答词,表示唯有遵照总理遗嘱及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去努力,国民党才有希望。魏野畴传达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大会决议接受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刘含初代表临时省党部作了党务报告。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苏联顾问团团长赛夫林应邀讲话,他说,列宁认为,世界革命要联合东方民族,关注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帮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就是实行列宁遗嘱,也就是实行孙中山遗嘱,因为对东方革命的看法,列宁和孙中山遗嘱是一样的。

25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会议,刘含初、李子洲先后为大会主席。魏野畴代刘含初作了财政问题的报告,

^① 今黄陵县。

提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财政原则是：统一财政；建立预算；整顿金融；施行银行政策；施行公债政策。会议依次通过关于青年、党务及组织、工人运动、商人运动、政治、军事、农民、妇女、教育、党报问题的决议案及大会宣言。最后，大会选举冯玉祥、于右任、雷晋笙、杨虎城、刘天章等7人为正式监察委员，井岳秀、郝梦九等5人为候补监察委员；邓宝珊、史可轩、黄平万、张秉仁、张含辉、刘含初、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王授金、赵葆华、甄寿珊、吴碧云13人为执行委员，徐九龄、马云程、王尚德、陈俞廷、呼廷震东等9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赵葆华、刘含初、杨明轩为省党部常务委员，黄平万、魏野畴先后任宣传部部长，张秉仁任组织部部长，张含辉、王尚德先后任农民部部长，王授金任工商部部长，李子洲任青年部部长，吴碧云任妇女部部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和各部部长均为共产党员，省党部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共产党员掌握。

二 帮助发展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后，省级机关的国民党组织也相继建立。

1927年3月8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成立，中共党员陈家珍、葛霏云、史可轩、刘维曾、马文彦当选为执行委员，魏野畴、邹均、张守约为监察委员。驻陕总部特别党部第五次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所属各机关区党部，主管地方性质的属西安市党部管辖，主管军事性质的属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特别党部管辖。3月下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区分部成立，共产党员杨晓初为区分部常务委员。4月30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司法厅国民党区分部召开成立大会，刘天章、赵葆华到会讲演。7月2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粮秣总监

部国民党特别支部举行成立大会,王授金到会宣布特别支部选举结果。学校里的国民党组织也相继成立。3月9日,西安中山学院国民党区党部成立,李子洲报告筹备经过并作政治报告。区党部成立后,以学生班级为单位成立了三个区分部。5月23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张汉泉为常务委员,分管组织、宣传工作,李林、许权中、杨国栋为监察委员。

各县(市)的国民党组织发展更快一些。到1927年6月,有国民党组织的县份由全省代表大会前的26个增加到67个,潼关、白水、礼泉、凤翔、周至、商县、柞水、宁强等41个县新建了县党部或临时县党部、县党部筹备机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民政厅制定的《县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三名)是县务会议的当然组成人员。这样,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县的政权机构,参与了县政建设。遵照中共陕甘区委关于“巩固下层基础”的指示,在建立健全国民党县党部,不使“省党部只是一个空架子,离开群众,单独存在着”的同时,县(市)党部也注意发展区党部、区分部。西安市党部建立了五个区党部及省立第一师范、省立女子师范、制造局区分部等一大批基层组织。三原县民治小学、绥德县扶风寨中山小学、商县、龙驹寨^①等处的区党部或区分部也纷纷建立。

陕西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实际完全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他们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形式推动国民革命。

2月18日,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冯玉祥任主席,于右任任副主席,国民军联军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为常务委员、秘书,杨明轩等为常务委员。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为西北革命工作的最高指挥机关,负责处理国民军区域内的党务、军

^① 今丹凤县城。

务、政务等一切重要问题，常务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受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领导，并经常派员列席临时政治委员会常务会议。

应冯玉祥的邀请，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派出一批军事政治人员到国民军联军担任顾问。他们经常同中共陕甘区委联系，取得工作上的相互支持。

第三节 参加联合政权组织——国民军 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一 推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

西安反围城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军联军进驻陕西，使陕西成为国民军联军统辖和领导的中心区域。为了支援和配合北伐战争，在陕西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组织非常必要。关于如何看待冯玉祥、于右任及中共陕西组织今后的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多次指出：冯玉祥自莫斯科回国后，思想的确有很大的进步，很左倾，陕西的共产党员或蒙蔽于偏见，或站在乡土观念上反对冯玉祥的态度必须注意改正；要努力使冯玉祥与于右任团结，促使冯玉祥把陕西交给于右任，并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主持领导陕西工作；于右任在陕西政治上自然处于领袖的地位，将来组织省政府时，当推于右任为主席；要整顿国民党，我们今后一切工作完全可以用国民党名义进行。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指示精神，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中共陕甘区委努力推动冯玉祥、于右任在陕西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共产党、国民军联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政权组织，形成革命运动领导机构的新格局。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于右任到达三原后即着手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赞同并积极支持这一举

措,指示魏野畴、史可轩等积极参与筹建活动。西安解围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移驻西安西大街社会路。1926年12月22日,于右任就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

1927年1月1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改革旧政制的命令,宣布立即取消陕西省议会,废止陕西省长、道尹、全省警务处、实业厅的各处员缺,其公文案卷及所属各机关由驻陕总部民政厅接管;陕西各级审判厅与检察厅均改属驻陕总部司法厅;陕西省烟酒公卖局、省印花税局改属驻陕总部财政委员会;省会警察厅改为西安市公安局,暂属驻陕总部民政厅;各县知事改称县长,未经驻陕总部委任不得改称;前陕西军务公署公文案卷及所属机关由驻陕总部参谋处接管。1月5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组织法》正式公布,宣布在陕西省民大会尚未召开、正式省政府委员会未成立以前,所有陕西军政、民政统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理。为管理军政,特设参谋处、副官处、政治部、军事裁判处;为管理民政,特设民政厅、财政委员会、粮秣总监部、教育厅、司法厅、监察院,并设政治保卫部、秘书处、专门顾问团。

为了支持陕西新的政权,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中共陕甘区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工作,魏野畴、陈家珍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杨晓初任财政委员,葛霏云任民政厅副厅长,王授金任粮秣总监部副总监,王尚德任印刷局局长,邹均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派驻武汉全权代表。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领导形式为联席会议。3月15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联席会议组织法》正式公布,规定“联席会议在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为处理陕西全省军民政务最高机关”,联席会议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副总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委员(两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三人)为成员组成。据此,联席会议由于右任、邓宝珊、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特别党部代表李兴中、史可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代表赵薇华、刘含初、杨明轩等七人组成。驻陕总司令部的命令，经联席会议决定后由总、副司令署名，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名义公布。

共产党员刘继曾、马文彦任联席会议秘书。联席会议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共产党员实际上参与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领导工作。

二 协助驻陕总部制定新法规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既是国民军联军驻陕部队的司令部，又是统领陕西民政的省政府，同时也是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联合战线组织。它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实行新三民主义政策，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奋斗。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中心任务是领导陕西人民进行军事政治斗争，彻底打垮一切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建立全省新的社会秩序，形成陕西新的政治局面。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推动下，驻陕总部吸取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大胆尝试，破旧立新，除弊兴利，对陕西省政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旧律条，颁布新法令；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地租；颁布临时劳动法，提高工人待遇；修改民法和刑法，支持群众运动；制定《暂行婚姻条例》，支持妇女解放；改订百货税率，统一税收，促进物资交流；颁布教育法令和施行强迫义务教育，积极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同时制定并颁布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侨民等有关法规。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摧毁了北洋政府在陕西的政权及其体系，建立了隶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的新的政权体系，并统一了全省行政。驻陕总部在管辖范围内委派新县长，撤换旧县长、知事。为了革除封建官场的积弊，建立勤政廉洁的政府，国民军联军总部和驻陕总部在思想教育、奖励惩戒、行政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驻陕总部明令革除民众为军政机关支差的陋习,指出支差实际上是夺取工商业者的利益,这种苦害人民的弊政,自然应予废除。民政厅训令指出,旧日官场的种种恶习陋规和腐败行为,若不努力铲除,则国民革命不会胜利,廉洁政府的基础无由成立。联军总司令部训令军政机关,严禁官吏经商,以避免操纵市场、囤积居奇、保护价格等弊端的出现。驻陕总司令部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总的来说,还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时局变幻,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没有认真贯彻执行。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后,魏野畴利用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有利条件,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部,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仅驻陕总部政治保卫总队(又称政治保卫师)就有共产党员近百名。共产党员在其中担任了上至总队长下至排长的许多职务,使政治保卫总队成为一支由中共组织完全掌握的武装力量。魏野畴领导的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还为驻陕总部所属的国民军起草了《政治训练大纲》,规定通过政治教育,使全体官兵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及军阀的反动政策,熟悉中国农民状况和农民的要求,明确认识中国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要在国内摆脱剥削者的压迫。驻陕总部的这些革命措施,得到陕西人民的热烈拥护,也使陕西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四节 创办学校和报纸

一 创办西安中山学院

西安中山学院是利用西安城内原西北大学校址及设施建立的。1927年1月中旬,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决定收买西北大学,组建西安中山学院,并成立了有共产党员刘含初、李子洲、赵葆华等

参加的中山学院筹备委员会。筹委会首先按照革命要求改组了西北大学,吸收该校部分比较进步的学生进入中山学院学习,接着进行建立学院领导机构、制定教学计划和制度等工作。学院设立招生、事务、教育三个委员会,呼延震东、吴化之、张汉俊、杨怀英等共产党员分别任各委员会委员。2月19日,中山学院筹备处在《陕西国民日报》发布启事和招生广告,明确规定学院宗旨是为了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3月10日,中山学院举行成立大会,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代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及苏联顾问赛夫林等出席并发表演说。

西安中山学院名义上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办,但学院的各级领导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实际上是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用以培养革命干部和人才的学校。院长刘含初、副院长兼教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均为中共党员,学员大队和中队的领导职务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

西安中山学院先后开办了农民运动班、组党班、军事政治班、妇女运动班、教育行政人员养成班。学员大多是陕甘地区中共组织介绍来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其中以建立中共组织较早、群众基础较好的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榆林中学及三原地区的学员最多。学院先后培养学员900多人。学院各班都开设有专业课、政治课和军事训练课。政治课主要有《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农民运动》、《革命的三民主义》等。此外,学院还给各班购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书籍,订购了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期刊,大大提高了师生们的革命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

在学院担任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李子洲、魏野畴、潘自力、刘继曾、杨明轩、亢心裁(维恪)、吴化之、杨慰祖、冯文江、金鸿图、

钱清泉、冯带周（一航）、严信民、王子休、杜松寿、吕佑乾等。学院还先后邀请刘伯坚、邓希贤等校外共产党员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人来校作“精神讲话”。

西安中山学院既是共产党人的战斗堡垒，又是锻炼和造就革命军政人才的熔炉。由于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努力工作，中山学院坚持了正确的革命方向，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

1927年7月冯玉祥公开反共后，西安中山学院被迫停办。

二 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为了培养党的军事人才和军队政治工作骨干，中共陕西组织在领导创办西安中山学院的同时，还领导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由于该校在陕西国民革命时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西北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一些人把它与广州黄埔军校相提并论，称之为“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由中共陕西组织直接领导和掌握，学校重要领导职务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任校长，共产党员李林担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共产党员邓希贤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许权中担任学员总队长，主持军事训练。全校共分三个大队（相当于营），由共产党员高致凯、张汉俊、杨浪波分别担任大队长。所有的中队长、分队长和绝大多数军事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为保证党对学校的领导，学校设有中共特别支部，高克林任书记。

中山军事学校校址位于西安城内北院门。1927年3月，学校开始招生，5月12日开学，共招收学员700多人。该校以“政治军事教育练成革命军人干部人才为宗旨”，学员一方面学习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一方面学习《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等政治理论课。

冯玉祥公开反共后,为解散中山军事学校,命令将该校人员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总队合编为一个旅,由史可轩带领开往河南。为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将这支部队开往别处,以便继续坚持斗争。7月下旬,史可轩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带领这支约千人的武装部队离开西安,开往临潼。中山军事学校宣告结束。1928年5月,这支部队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渭华起义,成为起义中的骨干力量。

除西安中山学院、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外,中共陕西组织在1927年上半年参与创办的干部学校还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主办的军官学校和政治训练班,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的政治队,政治保卫部的政治保卫队教导队,财政委员会、司法厅、教育厅分别举办的讲习会等,中共陕甘区委也举办了秘密的初级党校。这些学校、训练班、讲习会虽然都是短期培训,但由于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了核心和骨干作用,在教学中突出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思想教育,注重政治训练和军事化的生活管理,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其中不少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 创办《陕西国民日报》

《陕西国民日报》是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创办的,社长先后由雷晋笙、刘天章担任,总编辑杨慰祖,编辑白超然、袁禾生,印刷厂厂长王尚德,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报社还成立了由白超然任书记的中共支部。

1927年初创办的《陕西国民日报》,为陕西革命战线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共陕西组织的领导下,该报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以及各阶层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活动给予热情报道和舆论支持,对陕西国民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起到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1927 年的反英运动，“非基”运动，反蒋运动，反何经纬运动^①，平民教育运动，拥护国民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运动，以及“三一八”、“四二八”、“五一”、“五五”、“五卅”等纪念日，都是《陕西国民日报》报道的重点内容。该报就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发表社论和评论，其中绝大部分为社长刘天章撰写，如 4 月 14 日《江南肃清后中国革命的局势》一文，明确支持国民军联军东征，参加北伐战争；4 月 25 日《护党运动和蒋介石背党》的社论，明确指出蒋介石与英日帝国主义妥协，包庇研究系^②余孽，有企图做反动领袖的倾向，号召人们根据孙中山遗嘱，在党的纪律之下，努力护党，反对背叛党的蒋介石，救党救国，保持革命的胜利，并提出“打倒蒋介石就是护党”的口号。这些文章为群众斗争指明了方向，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陕西国民日报》通过对人民群众革命活动的热情讴歌，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对共产党的会议、党组织负责人的讲话等进行了广泛报道，同时介绍全国的革命斗争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鼓舞了革命斗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该报每日销售量达 2000 余份，成为当时陕西地区销售量最大的革命报纸。

《陕西国民日报》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遭到一些右倾动摇分子的攻击。他们诬蔑刘天章、白超然等共产党员是“投机跨党分子”，胡说报纸犯了“不会走就想跑”的过激错误。冯玉祥公开

^① 1927 年春，陕西发生饥荒，而驻防户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何经纬却勾结豪绅，摊派苛捐杂税，私囤粮食，哄抬市价。4 月底，中共户县组织发动群众查出何经纬私囤粮食 750 多石，何经纬恼羞成怒，以武力包围农民协会。5 月 11 日，何经纬又以 4 个营的兵力包围新田路东寨村农民协会，屠杀会员 11 人，伤 40 余人。当晚，何经纬又派士兵闯入各村，捣毁农协，杀害无辜，史称“户县惨案”。

^② 研究系，指改良派依附于段祺瑞，组织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幻想在军阀庇护下实行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改良，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反共后,创刊半年的《陕西国民日报》被迫停刊。

在创办《陕西国民日报》的同时,中共陕西组织支持、参与创办的进步报刊还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主办的《国民军政报》(后改名为《第二集团军公报》),联军总部政治部主办的《国民军周报》、《革命军画报》,驻陕总司令部主办的《陕西政治公报》,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新国民军》、《中山画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部主办的《党声》,陕西省总工会筹备处与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合办的《工农之友》,陕西省农民协会主办的《耕牛》周刊以及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秘书处主办的《会场日刊》,驻陕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主办的《财政周刊》、建设厅主办的《建设汇报》、司法厅主办的《司法公报》等。中共陕甘区委也创办了党内刊物《陕甘区通讯》、《政治通讯》以及公开发行的《西北人民》旬刊。

为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陕西组织还编辑出版了《孙中山先生传》、《马克思主义概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唯物史观》等18种革命理论书籍,其中一部分是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革命书籍编印会等名义编印的。中共陕西组织还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创办了廿四书报社^①,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名义设立了十一书店^②,专门经销省内外出版的革命报刊和书籍,各种书刊的代销数量由二、三千至一万份不等。

上述书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多由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持。这些书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国民革命与国共合作,推动并指导群众运动以及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① 廿四书报社是以西安解围的时间192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命名的,后按公历11月28日改名为“廿八书报社”。

② 十一书店是以西安解围的时间1926年公历11月命名的。

第五节 领导群众运动

一 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陕西是全国农民运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在中共陕西组织的领导下,陕西农民运动发展迅速,规模愈来愈大。在西安被围困期间,从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 16 名陕籍学员^①回陕后,分赴渭北、陕东、陕北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同军阀刘镇华、吴新田进行斗争,配合国民军联军解围西安。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不断发展,陕西的农民运动很快出现了高潮。

1927 年 1 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规定农民协会有直接参加地方行政的权力,有协同政府铲除恶保、劣绅、土豪、土匪的权力。这次大会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成立了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农民部西安、渭北、陕东三个办事处。^②广大共产党员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直接领导农民运动,促进了陕西农民运动的发展。到 5 月底,全省 91 个县中已有 50 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其中 17 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8 个县成立了

① 16 名陕籍学员分别为从北京去的乔国桢(佳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李维屏(渭南人,北京大学学生)、李秀实(渭南人,北京大学学生)、鲁德之(鲁德,蒲城人,北京大学学生)、李拔涛(绥德人,北京中俄大学学生)、亢维修(亢心裁,蒲城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冯文江(子洲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刘益(刘友琳,蒲城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张超(张克敏,渭南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杜松寿(华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苏士侧(渭南人,北京朝阳大学学生)、郭志仁(郭树藩,渭南人,北京国民大学学生)、从天津去的马价人(马致远,蒲城人,南开中学学生)、韩崇正(富平人,南开中学学生)、从上海去的王述慎(宁强人,上海大学学生)、从黄埔军校转入的雷世杰(绥德人)。

②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黄平万、张含辉、李维屏、亢维修、陈家惠(陈家惠)五人组成;陈家惠、刘益、黎天智、马价人、乔国桢、严本三、李秀实、王述慎、冯文江九人分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西安、渭北、陕东三个办事处的负责人。

县农民协会筹备处,25个县成立了区、村农民协会。全省共有区农民协会179个、村农民协会3828个,农会会员41.49万人,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10万人以上。^①组织起来的农民,积极投入到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维护地方治安、支援北伐战争的斗争中来。在农民运动特别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的政治局面,广大农村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

在县、区、村农协会广泛建立的基础上,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员,根据中共陕甘区委3月份关于“成立省农民协会,以健全指导机关”的指示精神,于6月1日至8日在西安召开了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84人,其中54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检阅了农民的革命力量,通过了《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及《政治报告决议案》、《会务总报告决议案》、《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决议案》、《惩办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清除县政积弊决议案》、《铲除反动派决议案》、《改良雇农及佃农生活决议案》等26个决议案,赋予农民协会自行逮捕、处决土豪劣绅,必要时可自由处理掌握证据的反动分子,监督县级财政,协同县政府铲除政府中的不良分子等权力。会议选举产生了全部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王授金、马价人、亢维恪、张含辉、陈家惠五人为常务委员,杜松寿为秘书长。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省农民协会的正式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西广大农民一方面荡涤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切污泥浊水,一方面创造着新的环境、新的秩序和新的生活,充分发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的伟

^① 关于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的县、区、村农民协会及会员统计数字,中共陕西省委1927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等历史资料的记述不一。本书采用1927年6月8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报》第7期的统计数字。

大作用,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二 支持工人运动

西安解围后,在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中共陕甘区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支持下,陕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927年2月上旬,西安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随后,陕西邮务总工会、西安印刷工会、西安制造局工会、陕西电话工会、西安鞋业工会等行业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起来。这些组织发表宣言,号召工友们积极组织起来,改变以往一盘散沙、任人剥削、任人宰割的状况。一向沉寂的陕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开始走向高潮。《陕西国民日报》以《陕西工人运动大起声色》为题,赞扬西安工人运动适应时势,很有起色,前途甚为乐观。

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各行业工会的建立,为建立全省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陕西省总工会创造了有利条件。3月29日,陕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在援沪罢工大会上宣布成立。4月9日,筹备处通电全国:“现在革命的空气弥漫了西北,我们工友应积极的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树立西北革命之基础。”5月1日,陕西省总工会在西安正式成立,并连续三天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宣传教育、统一工会组织、接受全国总工会决议案、接受国民党工人政纲等九项决议。会议决定组织武装纠察队,并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颁布劳动法,同时致电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表示愿意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指导,与敌人决一死战。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张含辉、严振五、李子静为常务委员,周志学为总干事。

在全省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的领导下,各地工人积极开展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和各种政治斗争,进一步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西安一些工厂的工会为反对厂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这些斗争大部分取得了胜利。协济工厂工人罢

工斗争胜利后,工厂厂主被迫完全答应工人的复工条件:每天工作不超过 10 个小时;学徒工有工资;工人、学徒在工作时间外绝对自由;遇有特别事故准予请假,遇有疾病除准予假外,并发给医药等费;遇有纪念会及群众大会,准予工人、学徒参加;厂主不得折扣参加纪念会,群众大会及请准病事假工人、学徒的工资或借故开除他们。新履公司的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西安学联与出席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省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工人一起庆祝罢工斗争的胜利。国民党西安市党部执行委员师守命(中共党员)到会讲话。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修械处对待工人苛刻,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并以军纪惩治工人。修械处工会即致函省总工会转达冯玉祥、于右任,要求逐条解决,答应工人的要求。经省总工会出面调解,最终妥善解决了问题,避免了工人与修械处之间的冲突。工人运动还与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相互配合,促进了西安地区革命运动的全面高涨。

三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斗争

随着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帝国主义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面目日益暴露后,陕西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决心更加坚强,反帝运动更加高涨。

1927 年 1 月初,汉口发生了英国水兵打死、打伤 50 多名中国人的惨案。消息传来,中共陕西组织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安市党部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报纸上连续刊登反英紧急启事,号召民众起来参加反英斗争。2 月 15 日,陕西反英大同盟成立,随后于 2 月 25 日发表了反英通电。3 月 5 日,西安各界 3 万余人集会反英。6 月 9 日,西安各界反帝大同盟成立,统一组织反帝活动。在此期间,在各地党团组织的领导支持下,西安、绥德等 26 个市、县通过各革命团体,举行了纪念列宁逝世 3 周年,纪念孙中山逝世 2 周年,纪念巴黎公社成立 56 周年,纪念“五一”、“五四”。

“五五”、“五七”、“五九”、“五卅”^①以及援助上海罢工、庆祝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拥护国民军联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庆祝第二集团军东征胜利等一系列群众集会。这些群众集会的显著特点是揭露、声讨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了搞好在西安举行的各种集会，中共陕甘区委单独出面或同共青团陕甘区委联名，印发了10多个宣传提纲和宣言，指导群众反帝运动的开展。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及19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5月11日，驻户县的第二集团军何经纬师捣毁农民协会，残杀农协会员和农运工作人员，打死11人，打伤40多人。新旧军阀的暴行激起了陕西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对。中共陕甘区委编印了反蒋宣传大纲，翻印了郭沫若撰写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广为散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电，《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社论，2000多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讨蒋大会，抨击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分化、破坏民众组织的反革命罪行，号召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打倒新旧军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陕西省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西安妇女协进会等，代表全省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表示，一致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制裁。蒲城、泾阳等县也举行讨蒋大会并通电全国。为悼念李大钊，声讨张作霖，中共陕甘区委印发了宣传大纲，冯玉祥也发出通电，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陕西省党部发出文告，各人民团体或作决议，或发通电，对李大钊等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对奉系军阀表

^① “五五”，卡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七”，1915年5月7日，日本舰队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北方各省将这一天定为国耻纪念日。“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全国教育联合会将这一天定为国耻纪念日。

示强烈愤怒和谴责,号召全国民众打倒张作霖,打倒日、英帝国主义。5月16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举行追悼会,于右任报告李大钊的革命生平。5月20日至22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设灵堂悼念李大钊,5000多人参加守灵。为了组织好这次守灵活动,中共陕甘区委在追悼会筹备会中秘密设立党团组织,进行具体领导。同时,临潼、渭南、蒲城、富平、咸阳、兴平、旬邑、醴县、清涧、安定、延长、商县等地也举行了悼念活动。一些学校和机关的图书馆、俱乐部还以“大钊”或“守常”命名,以示纪念。户县惨案发生后,省农民协会筹备处致电时在潼关的冯玉祥,并发表宣言,指出摧残农民运动、屠杀农民的何经纬是陕西的张作霖,全陕民众应速起而讨之。为了开好大会,中共陕甘区委发了通告。5月15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举行追悼户县死难农友大会,强烈要求惩办何经纬。富平、兴平、醴县、清涧、延长、商县等地也举行了悼念大会,追悼户县死难烈士。

1927年1月15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将西安的皇城改为红城。在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省、市举行的重大庆典和群众大会多在红城举行。在中共陕西组织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革命群众运动,使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红城。

第六节 陕西大革命的失败

一 支持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北伐

1927年1月26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进驻西安。为统一部队的编制和指挥,联军总司令部先后下令取消原国民军各军和各路援陕军的番号,对驻陕北的井岳秀部和驻陕南的吴新田部进行改编,将国民军联军统编为17路,任命方振武、弓富魁、孙良诚等17人分别担任各路总司令,并将其中的李虎臣、杨虎城、田玉洁、卫定一、邓宝珊5路和陕西3个独立师划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

司令部统辖,从而改变了陕西境内军队名目纷繁、归属不一的局面。

在共产党员的影响和推动下,从3月下旬起,冯玉祥相继发表告民众书、告军队书和告商民书,广泛进行参加北伐的舆论准备。

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20日,冯玉祥改国民军联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他在誓词中表示,要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的决斗,完成国民革命。

5月6日,冯玉祥发布命令,按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政府商定的军事计划,率师东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冯玉祥实现了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计划。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关东征,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苏联大力帮助的结果。苏联政府除了在武器弹药方面大力装备国民军联军外,还派出了以乌斯曼诺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团,从政治领导到军事指挥方面对国民军联军进行帮助,对国民军联军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以刘伯坚为首的一批中共党员担负了国民军联军几乎所有部门的政治工作。中共陕甘区委调派刘志丹、方仲如、宣侠父、蒋听松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联军驻陕各部队,组织各级政治处,进行政治训练,要求全体官兵人人了解政治,成为为中国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勇士;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顽强战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对国民军联军各部门实施了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工作,从而为第二集团军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基础。

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迅速会师中原的胜利,还取决于陕西、河南等省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援。在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下,陕西广大工农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出钱出力,交粮纳草,参军参战,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为第二集团军出关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

众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4月10日,当国民军联军通电全国誓师东征的电文发出后,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立即代表全省700万农民热烈拥护,表示除以全力帮助国民军出师外,并愿与全国革命民众结成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4月16日,西安30多个革命团体莲花池举行拥护国民军联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6万余人。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全国一致讨奉,要求冯玉祥保护农民组织、扶助农民武装、肃清后方。会后,群众整队游行,赴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与驻陕总司令部请愿。共产党员刘伯坚代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讲话,对人民群众的行动表示极力拥护。共产党员史可轩代表驻陕总司令部讲话时指出,歼灭奉军是国民军应负的责任,欲达此目的,尤须民众组织起来,帮助国民军肃清后方。此后,关中、陕南、陕北许多地方也先后举行了拥护国民军联军会师中原运动大会。

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时,沿途人民箪食壶浆,热烈欢送。长安、华县、华阴等地农民协会积极组织群众修路、架桥、栽电线杆,并组织大批民夫、车辆,帮助军队运输粮草等物资。西安各界还组织前敌宣传慰劳队,随军开赴河南前线,对将士进行宣传慰劳工作。第二集团军出师东征后,各地农民自卫团协助留守部队剿灭土匪,维护地方治安。华县农民协会还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县农民自卫团的总机关,以便更有效地保卫地方。这些活动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前线的作战,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陕西人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尽最大努力支援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战争。当时数十万军队聚集在西起长武、东到潼关的渭河两岸数百里狭长地带。冯玉祥为解决部队粮饷,先后发行不兑现的军用流通券数千万元,富秦加字票数百万元,发行地方公债合白银数百万元。刚刚经历过北洋军阀摧残的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紧咬牙关,节衣缩食,无偿地为第二集团军

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布匹、草料、鞋袜,并无偿承担各种差役,以巨大的牺牲描绘出支援北伐战争的宏伟画卷。

二 陕西大革命的失败

西安解围和陕西国民革命出现新的高潮后,陕西党、团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冯玉祥是寄予厚望的。中共陕甘区委一成立,就指示党内要拥护冯玉祥统一国民军,成为西北唯一的军事领袖,要民众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利益,真心实意地维护冯玉祥在西北的统治地位。但是,当陕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冯玉祥却认为农民运动妨碍了他筹集军费,“扰乱了社会秩序”,公开进行“训诫”,令各级国民党党部和政府进行“约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一方面对还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表示拥护,要求继续出师北伐;另一方面,又对武汉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在陕西各界公开讨蒋的时候,冯玉祥始终未表明态度。

1927年6月1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会师郑州。6月8日,冯玉祥、于右任分别由潼关、西安到达郑州,10日至11日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会晤。冯玉祥在“调解宁汉纠纷”的幌子下,促使会议决定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将河南与西北的军政大权完全交给冯玉祥独揽。郑州会议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6月16日,冯玉祥亲笔致书蒋介石,表示唯蒋介石马首是瞻。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随后,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要求将苏联顾问鲍罗廷解职,送回国内,并在河南将其军队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大批政治工作人员解职。

6月25日,冯玉祥电示于右任、邓宝珊等人,要求将陕西的国民党省、市、县各级党部一律解散,另行组织,各群众团体立即停止活动。6月28日,冯玉祥致电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提出三条反共原则: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

党的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加以严密监视;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也不准借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在此期间,冯玉祥还几次电令石敬亭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主要内容是:凡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必须声明退出工作,愿继续做国民革命者须宣誓退出共产党,否则查出枪决;做反三民主义宣传者,开秘密会议者枪决;逮捕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刘天章,编辑白超然,教育厅厅长杨明轩与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并押解郑州;驱逐西安共产党员全部出境;把中山军事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并,由史可轩带领开往郑州;在陕各部队政治处处长到郑州“听训”,并以宣传反蒋是“反宣传及不服从命令”为由,捕押、审讯政治工作人员。

7月16日,石敬亭通电改组国民党省、市、县各级党部。1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宣布结束,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失败。

陕西大革命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陕西的代表势力以沉重打击,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教育和锻炼了共产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陕西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表现出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但是,同全国一样,陕西大革命也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不充分,而且各地工农运动的发展也不平衡;陕西党团组织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缺乏独立判断能力,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同时,党没有自己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

陕西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陕西组织和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没有停止陕西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共陕西组织从失败的经历中获得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受到了血与火的考验。

第六章 土地革命在陕西的兴起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成立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从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时期。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陕西政局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首先,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中心形成。1927年6月,郑州会议决定成立冯玉祥统辖范围的豫、陕、甘三省政府委员会,并以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有感于当时政治风云的诡秘莫测,托故不就,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遂改由冯玉祥部将领石敬亭代理。7月1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重组陕西省政府,取代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26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成立。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右任、宋哲元、石敬亭、岳维峻、井岳秀、邓宝珊等12人为省政府委员,于右任为主席。于右任仍未就职,由宋哲元代理。陕西省政府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中心的形成。

其次,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缉捕和残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解散革命团体,陕西全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徐州会议后,冯玉祥首先在河南将所部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接着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遣送回国,强迫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任职的共产党员离职。同时,力图抹掉革命

标记对人们的思想影响,下令将西安“红城”改为新城;原驻陕总部决定设立的五一县被诬为亲共分子擅自所为,宣布取消;原为纪念李大钊而命名的“大钊图书馆”被明令改为“平民图书馆”;公共场所中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标语也被清除。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反共活动甚嚣尘上,不断发出缉捕共产党人的通令。为了免遭不测,魏野畴、雷晋笙、杨明轩、刘含初、黄平万、杨晓初、王授金、吕佑乾、张含辉、赵葆华、师守命等被迫离开西安。7月上旬,《陕西国民日报》被冯玉祥下令停刊,共产党员、报社社长刘天章、编辑白超然被捕,并被押往郑州。7月下旬,冯玉祥电令史可轩率部开往河南,企图将该部一举消灭。后来,史可轩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率部开赴渭北,行至富平美原镇,被当地驻军田生春杀害。史可轩牺牲后,部队交由共产党员许权中指挥,先后归属冯子明、李虎臣部收编,驻扎三原、高陵、洛南等地。8月中旬,省农运负责人亢维恪、共产党员吕佑乾、王学习、鲁珩等在华阴被捕。同时,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和反动地主豪绅联合起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共产党员刘含初因在西安不能立足,被井岳秀派人枪杀于黄陵。原中共榆林地委负责人马云程、郭洪涛被通缉,绥德县委负责人蔡南轩、关中哲等人被逮捕,延安县委书记田伯英被迫逃离陕北。8月下旬,井岳秀又将倾向革命的第十一旅旅长石谦杀害。不久,陕南的商县、城固、南郑、洋县等地也开始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共”、“清乡”活动。在“清共”活动中,要求全省各机关、学校、团体、城镇、乡村对所谓“共党嫌疑者”、“行踪可疑者”、“有通匪情事者”,一经查实,将依法惩办,对庇护者以同谋罪处治。国民党的“清乡”活动从关中地区开始,将关中数十县分为几大防区,每防区派军队一个团驻防,并要求无论城镇乡村,每十家设为一排,每十排为一甲,相邻各户互相监督,如有藏匿违禁物品及有行踪可疑之人,务必报告,

否则所有邻舍犯连坐之罪。国民党的“清共”、“清乡”活动,使许多无辜民众遭受残酷迫害,陕西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

陕西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冯玉祥在河南将中共党员“礼送出境”后,以所谓纠正以往革命中的“幼稚病”为由,下令封闭进步团体。7月下旬,陕西青年社被查封,西安中山学院被解散。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会、农会、妇女协进会等革命团体统统被解散。8月4日,井岳秀派军队将中共在陕北的活动中心——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封闭,将在校师生强制集中,逐个搜查,押送出校。陕西城乡的反动势力向革命力量展开了猖狂反扑。据统计,到1927年9月,全省的共产党员人数由2177人减少到1681人。党、团组织的活动被迫由公开、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

再次,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荒灾,给陕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冯系将领主陕后,为扩大势力范围,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争。1927年10月,冯部将领刘汝明部攻克东府重镇大荔,歼灭刘镇华残部麻振武部,占领东府数县。同时,冯部将领宋哲元部与陕军田玉洁部在泾阳、三原地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泾原之战”。陕军各部或缴械投降,或逃出潼关。1928年春,宋哲元部又西进凤翔,消灭陕军卫定一部党玉琨旅。此时,冯玉祥基本控制了关中平原。遍布陕西各地的军阀部队,为了攻城略地,消灭异己,强行征兵拉夫,强征苛捐杂税,许多人家被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三秦大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28年和1929年,在国民党军阀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人民武装力量的时候,陕西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谨(史称“民国十八年年谨”),尤以关中为甚,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连年不断的战乱、荒灾,使陕西人民的痛苦达到了极点。

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局表明,国民党新军阀在陕西建立了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但是,引发中国

革命的诸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不畏强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二 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的成立

1927年5月上旬,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按行政区划来建立各级领导机关的决定,撤销了区和地方执委会,建立省、市、县、区委员会。

5月14日,根据中共五大做出的新规定,中共中央决定耿飏光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20日,中央又决定:李子洲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平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秉乾由莫斯科回国后参加省委工作。此时,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还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还以公开的形式领导着反对新军阀蒋介石和旧军阀张作霖的群众运动。

冯玉祥在陕西公开“清党”反共后,已经公开的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难以开展活动,大批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无法在西安立足。骤变的形势迫切需要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继续领导陕西的革命斗争。

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秘密成立。因当时政治环境恶劣,未能召开党的全省代表大会,由中央指定的省委成员与中共陕甘区委共同商定,省委设正式委员13人,候补委员5人。省委正式委员是:耿飏光(书记)、李子洲(常委,负责组织)、崔孟博(崔物齐,常委,负责宣传)、魏野畴(负责军事)、亢雄恪(负责农运)、张金印、张秉仁、李秉乾、杜衡、蒲克敏(蒲子敬)、何挺杰、张国藩(张资平)、陈家惠。中共陕西省委省委机关设在红埠街9号,由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①活动范围包括陕西全省和宁夏银川以南、甘肃兰州以东的地区。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党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减少省委与下级组织的直接联系,将全省划分为六路,由省委委员做特派员,分赴各路指导工作。六路是:东路何挺杰(后为潘自力),西路耿炳光,北路李子洲(一说李秉乾),南路(长安、蓝田、周至、户县)陈家惠,东北路(五一、蒲城、澄城、合阳、朝邑)蒲志敏,陕北路魏野畴。同时,根据新的党章规定,取消各地委,成立县委(市委)、区委。经过调整,省委下辖西安市委和绥德、肤施、长安、渭南、三原、五一(固市)、华县7个县委,泾阳、岐山、乾县3个区委,以及兰州、宁夏、平凉、潼关等20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员1681名。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认真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积极部署和发动各地武装起义,领导土地革命运动。

1927年7月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即由中央指定的团省委书记、组织与共青团陕甘区委决定团省委组成人员,正式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团省委正式委员是张金印(书记)、程士诚(常委,组织部主任)、李畅英(李大章,常委,宣传部主任)、王鸿俊、曹趾仁、杜松寿、王文彬、焦维炽等。

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后,制定了《共青团陕西省委组织及办事细则》。同中共陕西省委一样,共青团陕西省委也将全陕划分为七路,每路设一名特派员指导工作。团省委11名正式委员,除3名

^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省委的隶属关系多次变动。1927年7月成立时由中共中央领导;10月划归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同年12月长江局撤销后,复归中央直接领导;1930年10月以后,又先后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领导;1931年3月以后复归中央直接领导。

常委和秘书长主任外,其他7人均分任各路特派员。此时,团省委下辖的组织有西安市委(团省委兼)和五一、长安、三原、华县、渭南、肤施等县委以及其他21个县的区委与特支,共有团员1924名。

三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政策,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亦称九二六会议或九二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各县委负责人和青年团代表,共15人。省委常委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耿炳光代表省委做了《政治报告》。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政治报告》对省委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检讨。报告指出:从1927年2月至郑州会议期间,我们政策的错误是对冯玉祥的革命作用估量太过,无条件地帮助了冯;我们不是从政治上加以领导,而是成为冯的宣传机关;在冯部工作的同志不是对冯加以影响,而是做了冯的秘书长;要求民众不反苛捐杂税,不与冯冲突,要民众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利益,就是为了冯玉祥与我们的联合而牺牲一切民众的利益。郑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我们在这一阶段中的政策动摇不定,出现了机会主义倾向,没有制定积极的反冯策略,对冯玉祥和国民军二军皆不反对;在农运方面停止斗争,只打入红枪会组织民团,这样便无异于帮助了冯。报告还指出,省委在冯玉祥反共后所采取的就豫动摇和右倾政策,不仅我们有责任,而且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实行的错误政策也有密切关系。省委虽然对中共中央右倾错误“心实不满”,但仍继续执行,以至造成了不良影响和一定的损失。

会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明确提出目前工作的总原则,即“在我们正确的指导与策略之下,坚决的有计划的

斗争,注意“部分的深入”,逐渐取得广大的民众,巩固我们的组织,使革命得到重新的进展”^①。决议案同时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军事政治方面,“在党的总政治口号之下,勇猛的继续反帝国主义、反新旧军阀的斗争,以期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促进中国革命”,“在西北坚决的反冯,使冯的统治不能稳定以至于崩坏,组织秘密的斗争机关,对敌人施行秘密的破坏”^②,并在斗争中积极培植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农民运动方面,要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抗捐、抗税、抗粮,取消高利贷,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决议案还就国民党工作、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党务工作等作出规定,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等口号。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对大革命时期党务工作的成绩和缺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检查。报告认为,大革命后期,党虽然犯了右倾错误,但在领导全省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对每一阶段的工作,我们都很严格的去批评,似乎缺点和错误很多;但若整个儿的观察起来,并非全无进步,它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与力量”^③。这个结论是客观的、正确的。

会议还通过了《组织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文件。

会议改选了省委,常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宣传)、委员瓦维格(农运)、张金印(共青团)、刘继曾(秘书长);候补委员张含辉、潘自力。此时,省委下辖县(市)委 8 个、区委 10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3 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1 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5 页。

个、支部 153 个、特支 32 个。

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检查和纠正了陕西党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开始了策略上的转变，成为陕西地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从此，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 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体会议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的精神，检查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从 1927 年 11 月到 1928 年 2 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

1927 年 11 月 30 日，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议决案和省常委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党务报告。会议通过了《两月来工作之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增选刘继曾、张金印为省常常委，新选苏士杰为省委候补委员；成立了组织、宣传、军事、农民运动等委员会，分别由李子洲、李秉乾、苏士杰、潘自力负责；决定省常常委轮流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以加强对各地工作的领导。会议对全国和陕西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重申农民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

关于全国形势，会议认为，中央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及革命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并没有被根本地镇压下去，反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表面的不稳定的暂时胜利。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仍将高涨起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完成彻底的中国民权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会议指出：中国革命的两个前途仍然存在，没有任何根本性变化；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这一阶段中的正确策略和斗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终究要战胜资本主

义前途,现在正是这两个前途斗争的关键时期。

关于陕西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与策略,会议认为:陕西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农民也比较落后,党的力量比较弱小,在冯玉祥背叛革命后,党员人数减少。省委扩大会议至今,从指导机关至下层党员群众受错误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一些党支部没有形成领导群众战斗的核心。这就使我们对民众及党的力量不能不重新估量,以便统一认识,制定切合实际的斗争计划,否则,我们的工作会日见虚夸。会议指出:“陕西农民的力量并不如中央所估量的与同志口头上说的那么厉害,这种过分的估量,必定要影响到党的政策不能正确,同志的工作不能切实”^①,从这种估量出发,“我们要积极的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准备总暴动,暴动是空口说不得的,也不是一说便可成功的”^②,“苏维埃在中国革命的现状下尚莫有需要,而党的主观方面又未做准备工夫,不但马上实行组织苏维埃不可能,即宣传也非马上便可收效”^③,只有先做好宣传准备工作,然后逐步深入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民众及党的力量,继续组织民众开展抗税抗捐斗争,打破冯玉祥统治的农村封建基础,用各种方式恢复农民协会,全力宣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这次会议对全国和陕西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对暴动和苏维埃问题的分析,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并且对某些“左”的指示有所抵制。

但是,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却遭到团省委的反对。此时,团省委收到团中央《致陕西省委会函》和团中央《驻汉委员全体会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其中团中央的《致陕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69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省委会函)对陕西团省委进行了严厉批评,对形势和党的政策提出了许多“左”的错误主张,认为,“中国革命虽然部分的失败,但是革命依然是高涨的。”“现在的局面是,炸药已经埋好,只看点药的人有无决心”^①,主张“反对一切军阀”,“杀尽一切地主豪绅买办反革命的大资本家贪官污吏与一切反革命者,每个已死的革命者的性命,要拿十个反革命者的性命来偿还”^②。11月28日,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团中央的文件,通过了坚决贯彻团中央文件的决议案。会议在讨论当前形势与任务时,联系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对省委进行了激烈的不客观的批评,并且通过了《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批评了省委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案中关于“陕西农民落后”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认为陕西的反动统治“崩坏动摇”,革命“更有发展之机”,因此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工人农民暴动上,“乘资产阶级军阀的更大危机,可立即组织大暴动,仍旧由彻底的民权革命毫无间断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③,实际上是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起来。

团省委的决议对省委前一阶段的工作做了过火的批评,持否定一切的态度,“总之,党省委常委会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的政治路线,充分表现动摇、犹豫、矛盾,阶级意识缺乏,机会主义的成分仍保存许多。”^④实际上,九二六会议后,省委在执行政策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团省委的决议案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对党的策略的主张,都和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页。

③ 《C.Y.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12月第3期。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青年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当时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相一致。虽然这时党、团省委都还没有收到中共中央“左”倾盲动错误的文件,但团中央给团省委的指示却带来了中共中央“左”倾盲动错误的信息。因此,这个决议案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左”倾盲动错误在陕西贯彻的先声。

由于团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不同意省委常委会对陕西政治形势的分析,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又因故未能出席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于是,省委于12月4日召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团省委的意见。会上,张金印陈述了团中央文件精神及团省委的决议案,认为省委提出的西北农民落后和发动起义要经过一个准备过程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尽管省委书记耿炳光等人与他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常委会还是表示接受团省委的意见,修改政治报告,并决定召开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

12月7日,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张金印对省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指名批评了省委书记耿炳光。耿炳光虽有辩驳,但省委还是承认“在最近的政治报告上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犹豫与动摇”,对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两月来工作之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做了修改,将“准备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推翻冯之统治”^①。在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国民党已变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工具,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的目标。耿炳光由于在政治报告中对陕西农民落后的估量而受到会议的批评。

1928年1月4日,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清除右倾错误的影响。耿炳光与张金印在会上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张金印说耿炳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耿炳光批评张金印把团省委引向脱离党的领导,犯了“先锋主义的错误”。耿炳光认为自己受到右倾错误的影响,工作中也有不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页。

少错误,提出辞去省委书记的职务,为会议所通过。

1月5日,省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对省委进行改组,推选潘自力为省委代理书记,徐梦周(组织),刘维曾(秘书主任)、张金印(共青团),王松年为常委。后又增补李子洲为常委。

2月12日,耿炳光致信省常委会,对省委1月29日发出的第29号通告及党在陕西的右倾错误、党团关系、西北农民落后与否,特别是对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批评省委对暴动操之过急,认为暴动必须有相应的环境、时机和准备,现在应集中党的力量于农运,实现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

2月13日,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大纲草案》和中央给陕西省委的第九号公函,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认为陕西党目前工作的总方针是:“彻底的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念,刻苦耐心的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从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去使工农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自己动手的夺取政权,没收土地之必要。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历久潜伏的积愤尽(快)的开发高涨,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的局面,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①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认为耿炳光2月12日致省常委会的信,意见大部分是对的,决定派耿炳光为中共陕南特委书记。耿炳光认为难以完成年关组织暴动的任务而未就职。

① 中共中央陕西省委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

第二节 中共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斗争

一 清涧起义

1927年10月,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第十一旅中建立了军队支部。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阎揆要、李瑞阳等都曾在第十一旅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旅长石谦逐渐倾向革命,支持党的活动,使党团组织在十一旅有了较快发展,许多连队班、排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井岳秀步其后尘,在陕北地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封闭进步团体,并借给自己祝寿为名,将石谦诱骗至榆林杀害,任命他的亲信营长康子祥代理旅长,同时企图以“换防”为名,解除石部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原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唐谢以及白乐亭(白明善)到石谦部,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他们研究了石谦被杀害后陕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决定成立由唐谢、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组成的陕北军事委员会,唐谢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随后,军委在清涧县城召开党员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对起义做了具体部署,并派李维峻、白锡林去宜川,联络由共产党员李瑞成率领的第十连配合起义,由白乐亭联系地方上的一些党团员共同参加起义。

1927年10月12日清晨^①，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起义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李象九宣布了南下攻打宜川的命令，起义部队随即沿清涧河南下，途经延长县城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井岳秀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驻宜川的国民党军闻讯后，向驻防该县准备参加起义的三个连发起攻击，双方激战一昼夜。15日，起义队伍赶到宜川城下，井部代理旅长康子祥见势不妙，带10余人仓皇逃跑，余部投降。清涧南下部队与宜川城内的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占领宜川后，起义领导人之间在部队整编、行动方向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唐澍提出要公开打出红旗，清理内部，各级军事指挥员改由党团员担任。李象九认为大敌当前，应维持部队现状，不应大量撤换干部。为此，唐澍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随后，起义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担任旅长，原旅部参谋孟微斋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营，分别由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任营长，全旅近千人。

清涧起义爆发后，井岳秀急令师长高双成率部围攻宜川。由于行动方向不明，加之缺乏灵活机动的应变战术，造成起义部队滞留宜川城被困挨打的局面。高双成在加紧围攻的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煽动一些连、排长倒戈。起义部队不得不仓促突围，部分转移到韩城西庄镇，被杨虎城留陕部队王保民部改编，其他人员被冲散，辎重全部丢失。

11月，唐澍携带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与阎揆要等前往宜川，途中得悉部队已转至韩城，遂转道韩城西庄镇，找到部队。到部队后，唐澍任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队长，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然组成军事委员会。接着，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发动第二次起义。起义部队决定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

^① 关于清涧起义爆发的时间，历史文件记载和当事人回忆不一致，另有10月10日、10月14日之说。

渭、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1日,起义部队向北进发,由于轻信宜川城内兵力空虚的传闻,遂决定突袭攻城。实际上,宜川守城部队有高双成师的师部和师直属队,兵力不少于一个营,激战半天,攻城未克,工农革命军伤亡10余人,遂向西北撤退,途中又遭井部袭击,减员甚多。最后经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①到达陕甘交界的洛河川时,部队仅剩下20多人。唐澍、谢子长去省委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分散隐蔽。

由于种种原因,渭河起义最终失败,但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渭河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地区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鼓舞了党和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对陕北地区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二 渭华起义

1928年5月,继渭河起义之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军民联合的武装暴动——渭华起义。

冯玉祥“清党”时,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虽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仍有渭南、华县、五一三个县委和一些基层支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配合农民起义的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的许权中旅。许旅是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基础组建的。1927年7月,史可轩被陕西地方军阀杀害后,部队由许权中领导,暂属冯子明部,冯子明委任许权中为旅长。全旅共1290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53人,共青团员13人,组织比较健全。1927年底,许旅由三原、高陵等地进驻商洛山区,归属陕军李虎臣

^① 今志丹县。

部,许权中继续担任旅长,驻防洛南县寺坡、三要司等地。该旅设中共旅委员会,高克林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高致凯为委员。为了加强许旅党的工作,1928年1月下旬,陕西省委陆续派刘志丹、唐谢、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等人到该旅工作。中共旅委员会下辖18个支部,党员增加到165人。

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省委先后派出一批干部充实渭南、华县地区的党组织。1928年1月28日,省委在向各级党委发出的通告中,要求渭南、华县等县委在短期内添设军事部,并采用各种方法,派人打入当地武装团体,争取武装群众,并在其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28年2月29日,渭南爆发了由党、团县委领导的数百农民和学生反抗反动豪绅强占宣化高小的斗争。^①这一事件被陕西省政府宣布为“反革命”行为,要求“严办共党分子”。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告,称宣化事件“是一新纪元”,要求各级党组织扩大宣化事件的影响,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开发农民游击战争,由陕东各县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民众的大暴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并于4月1日成立了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准备暴动。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李大章、萧明、王林(王帝南)、徐振化为委员。4月下旬,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潼关一带了解陕东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中共渭南县委随即发出《通告

① 渭南县槐树村宣化高级小学是中共渭南县委机关。1928年2月28日,暂寄宣化办学的渭南乐育学校一些反动教师纠集一批流氓暴徒捣毁宣化高小,将师生逐出校门,并打伤数人。事件发生后,渭南党、团组织发动组织农民和学生,于29日打死两名捣毁宣化高小的反动分子。党、团组织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陕西当局的镇压,许多学校被关闭,40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共产党员、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忠、教师黄月亭被杀害。史称宣化事件。

第三号》，决定利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机会，从5月1日到5月4日，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此前，为了加强农民武装力量，陕东特委曾从渭南、华县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到许权中旅学习军事。4月下旬，这批受训人员在许旅营长张汉俊（李大德，共产党员）的率领下，携带枪支弹药返回渭南，陕东特委将其正式编成陕东赤卫队，任命张汉俊为队长，冯莽浩为中共支部书记，薛自爽为副队长，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大刀队，约百余人。

5月1日，渭南县崇凝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由中共渭南县东南区区委书记金子毅兼任主席。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人民、土地、军事、粮食分配等专门委员会，辖18个村苏维埃政府。接着，渭南和华县地区的仅合区、阳郭镇、三张镇、高塘镇、薛家村、东王村等也先后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

省委将陕东五县划为暴动区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许旅“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群众发动斗争”的指示精神，指示许旅党组织将部队开往渭南地区，配合农民起义。5月10日，李虎臣部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潼关北山，李部被击败。当晚，唐谢、刘志丹率领部队撤出战斗，向渭南地区进发。许权中、杨晓初也随后赶往渭南地区。部队抵达华县瓜坡镇时宣布起义，并进行了初步整编。抵达高塘镇后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谢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顾问兼骑兵队队长，杨晓初任经济委员。工农革命军下辖四个大队及骑兵分队、赤卫队，赵雅生、武丕漠、谢子长、雷天祥分任大队长。全军近千人。

工农革命军与农民暴动队伍会合后，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起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渭南、华县、五一等县

共建立了 48 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大部分村建立了赤卫队。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广大农民惩治豪绅和极端反动分子,烧毁地主的契约,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基层苏维埃政府大都办起了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放足,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吸食鸦片和赌博,多有成效。

由于渭华起义爆发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害地带,致使国民党陕西当局十分震惊。从 5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宋哲元调集主力部队,对渭华地区起义部队先后发动多次进攻。6 月 19 日,宋哲元亲率魏凤楼、田金凯、孙连仲三个师,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高塘和塔山合击。在刘志丹、唐谢、许权中等人指挥下,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与宋哲元部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向渭华南山。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等人在战斗中牺牲。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6 月 25 日,唐谢、刘志丹率工农革命军大部退到洛南县两岔河和保安镇,许权中、杨晓初率一部退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隐蔽。7 月 1 日,工农革命军一部在保安镇遭李虎臣部五个旅及民团的袭击,总司令唐谢和陕东赤卫队队长张汉俊牺牲。后来,部队转移到蓝田县张家坪,与许权中、杨晓初会合。在这里,工农革命军党代表刘继曾召集活动分子开会,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和军事委员会,转入秘密活动,同时决定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将部队暂归李虎臣部刘文伯师。8 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逼出商洛,进入河南,许旅在邓县被当地武装打散。历时四个月的渭华起义终告失败。

渭华起义是以军事力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起义之一。这次起义虽然由于客观上敌我力量悬殊,主观上缺乏对形势的正确估计,缺乏领导经验,在策略方面也有某些失

误,致使起义最终遭到了失败,但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西北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势力,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同时也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人民,培养了干部,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渭华起义首先在工农革命军中设立了政治委员,开了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使中共陕西组织和人民群众初步认识到,军队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再接再厉,在陕甘边、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西北高原上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三 旬邑、淳化起义

1928年春,中共旬邑区委根据省委“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指示精神,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5月6日,在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佑乾和共产党员许才升、吕凤岐等人带领下,旬邑县清水堰附近几个村庄的140多名群众,手持农具、梭镖和大刀,以反抗县粮秣局额外征收粮食为号召,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纷纷响应,队伍不断扩大。7日拂晓,起义队伍攻入县政府,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处决了县长李克宣及恶差数人。5月12日,起义农民在旬邑县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许才升,军事总指挥程永盛,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交通、宣传、外交等委员会,同时在县城周围的张家村、那坡子、底庙、职田、土桥等村镇打土豪,分粮食,起义烈火燃遍旬邑,波及彬县、淳化、永寿以至甘肃宁县、灵台等地。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派代理县长李焕章率民团反攻县城,一面暗中收买混进起义队伍的刘兴汉、程振西等人,指使

他们在县城发动叛乱。5月30日,起义遭到镇压,反动当局逮捕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程永盛、王浪波、程国柱、王廷碧等起义领导人,并于次日将他们杀害。

5月7日,中共淳化区委在西屯庄开会,决定以“交农”^①的方式围攻县城,抗粮,抗捐,抗税,抗差。9日清晨,在总指挥、共产党员赵新三等人带领下,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周围一带万余群众,肩扛农具,手持大刀、长矛,从四面八方拥向县城,包围县城北门、南门和东门。围城群众不断高呼“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等口号,并提出开仓放粮、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离开淳化等条件。国民党当局拒绝了群众要求。11日中午,围城指挥部组织进攻,段桂田等仓皇逃窜。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五六百人汇集淳化县通润镇,由田望秀主持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新三。30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正规部队和保安团队六七百人包围了县城,起义农民在田望秀、赵新三的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退出县城。田望秀在突围中牺牲。在城内战斗中,30多名起义农民壮烈牺牲,10多人受伤或致残,赵新三被捕。7月6日,赵新三在淳化县城英勇就义。

四 全省各地的武装起义和“交农”斗争

1928年春,为了策应渭华起义,形成全陕暴动的局面,中共陕西省委在全省各地先后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和“交农”围城斗争。

麟游起义。麟游起义的领导者是王泰吉。王泰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共组织派往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工作。1926年春,国民军二军在河南失败后,王泰吉又被中共组织派往陕军甄寿珊部工作,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1927年末至1928年春,冯玉祥令甄寿珊部开往陕西西部,攻打反冯的地方军事势力。

^① 农民不堪忍受高额田赋、地租、高利贷盘剥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所造成的痛苦,集合起来,到当地政府上交农具,以示罢耕的一种反抗形式。

1928年3月,甄寿珊率部围剿陇县关山的王友邦部,将教导团移驻他的家乡麟游县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王泰吉借机发动起义。4月,王泰吉召集全营党员开会,传达省委指示,研究起义具体事宜,决定发动教导团第一营第一中队起义。当晚,第一中队队长刘清和集合全队五六十人,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由王泰吉率领离开县城,经崔木镇向礼泉县南坊镇方向急行军,准备到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部队到南坊镇时,天已大亮。该镇驻有地方民团百余人。民团头子李世龙企图在部队吃饭休息时,收缴其武器。王泰吉识破其诡计,遂召集党员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分散隐蔽。

三原“交农”围城斗争。1928年4月中旬,中共三原县委决定以武字区为中心,发动农民进行“交农”斗争,并派黄子文等人到武字区具体组织和领导。武字区有五个农民协会分会,县委决定由农民协会分会出面,组织农民参加“交农”,并指定了每个分会的带队负责人和联络员。富平农民协会分会也参加了这次斗争。4月24日,在黄子文的领导下,武字区农民手持农具,高呼“天不下雨,天道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的口号,与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等地“交农”大军汇合,奔向三原县城。中午,两三万“交农”群众包围了县城,不断呼喊“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并焚烧农具示威,迫使县长马润昌答应免除当年粮款。5月1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为配合渭华起义,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武装围城,并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指挥部。由于城内驻军早有防备,第一次攻城未能成功。二次攻城时,参与武装围城的地方武装马仙舟叛变,收缴了武字区农民的枪支,扣押了黄子文、雷展如等围城领导人,武装围城遂告失败。

泾阳“交农”围城斗争。泾阳县的“交农”围城斗争是和三原县的“交农”围城斗争互相配合、同时开展起来的。1928年4月中旬,中共泾阳区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在张家山召开会议,决定以“交

农”形式举行农民起义。随后,区委又在千云乡三郎庙学校召开干部会议,确定起义时间、攻城方案,设立总指挥部,指定城内和围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指挥和联络人员,并发出鸡毛传帖,通告各乡农民按时参加。4月26日,在起义总指挥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等人带领下,万余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农具,分别由崇文、永乐、梁宁、鲁桥、口镇、白王、兴隆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沿途各村农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队伍不断扩大。西北乡农民途经石桥时,烧毁烟膏局的账簿。傍晚,起义农民包围了县城,但攻城未能成功。27日黎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命令三原驻军马鸿宾部骑兵连前来镇压。起义农民撤退,围城结束。党、团区委被破坏,张焕文、雷志学、苗家祥等起义领导人被通缉。

礼泉“交农”围城斗争。1928年春,新任礼泉县县长朱家骅到职后,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中共礼泉县委书记秋步月、共青团礼泉县委书记曹佑武等人转入农村,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准备起义。秋步月起草了《告礼泉农民起义书》、《起义歌》及标语、口号、传单,发到各乡村,为起义做政治思想动员。4月29日晚,秋步月在金家寨的万缘寺主持召开党、团县委扩大会议,决定5月1日“交农”围城。4月30日,全县党团员全部深入各乡,按划分的区域组织农民进行“交农”围城的准备工作。5月1日,近两万起义农民围攻县城。从早晨到下午,先后对北门、南门和东门发起围攻,均遭到镇压。次日,县城周围村民纷纷给围城农民送饭、送水,制造云梯,为登城做准备。下午,朱家骅派部队出城镇压围城农民,围城结束。在此次围城斗争中,雷德田、徐连宽、郭志义等14人牺牲。

永寿“交农”围城斗争。1928年5月,在礼泉、旬邑等县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永寿县农民窦玉明、张秉和、张文正等以“交农”方式,组织5000多名农民起义。5月18日至20日,起义农民包围永寿县城三天。群众不断高呼口号,要求减免粮款。县政府口头答应

三年不征不派,欺骗群众,并拒绝将恶绅李凤清交农民处治。20日午后,县长唐介仁派警察出城镇压群众,张文正、杨奖娃、都建英、葛二雄等五人牺牲。

澄城农民围城斗争。1928年5月,中共东府特委领导澄城、大荔、朝邑、蒲城等县农民,以红枪会形式开展了驱逐韦庄镇反动驻军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赵桂堂部移驻韦庄镇。他们禁止农会活动,烧杀抢掠,抓夫派丁,私设征收局盘剥乡里。为了同这支欺压人民的军队进行斗争,东府特委先后派王育真、吴卜亭、雷振东等人打入红枪会组织,建立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自卫总团。在农民自卫总团的指挥下,武装农民占领了酃酃、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地,控制了交通要道。6月22日,数千农民兵临韦庄城下,将韦庄四面包围。周围群众为围城农民送饭、送水,支持攻城。7月5日晚,围城群众集中扫帚,准备火攻。赵桂堂率部从韦庄镇城北门逃窜,驱逐反动驻军的斗争取得胜利。

绥德农民的反苛政斗争。1928年夏,为保护农民利益,中共绥德县委领导农民开展了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县城,共青团员马仰西、高承恩等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抬起二郎庙、三官庙、娘娘庙、老爷庙里的四座龙王龛楼,“敬神祈雨”,向恶绅进行示威。后又闯进县政府,迫使县长艾崇德和驻军营长田润民、杨向枝答应惩办恶绅,灾年减租减税,由富户出钱出粮赈济灾民。在四十里铺,共产党员崔正武等领导农民同顾家杂税局进行斗争。顾家杂税局是大恶霸地主顾士明设立的,专门征收牲畜交易税和屠宰税。崔正武、贺加昌等向县政府控告顾士明私自提高税率、随意强征滥罚的不法行为,反被扣押,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数百人包围了县政府,崔正武等获释。后来,群众砸毁了顾家杂税局,私人设立杂税局被废止。

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和“交农”斗争,有些因事前准备不足、客观条件不具备而导致失败;有些由于领导者不

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犯了主观思想上的错误遭到挫折;只有少数斗争条件较成熟,领导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并实行比较正确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陕西革命乃至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调整政策,实行“联共”政策,以争取共产党,以对付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2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当局开始着手解决西安事变后的善后问题。首先,国民党当局要求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次,国民党当局要求共产党停止一切反蒋活动。最后,国民党当局要求共产党停止一切反国民党的活动。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向共产党提出的。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同意了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履行其诺言。在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停止内战,也没有真正停止反共活动。相反,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事变后,反而更加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了信任。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开始重新考虑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问题。最终,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决定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合作。这一决定,为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七章 中共陕西省委的艰苦奋斗

第一节 省委遭遇第一次大破坏

一 党、团省委遭受破坏

渭南等地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向革命力量发动了疯狂进攻。他们派出大批密探，侦查中共各级机关住址；在西安全城实行宵禁，军警到处横行，勒令“街上行人，不准三五成群，不准交头密语，违者以军法论处”。白色恐怖笼罩了西安，中共组织屡遭破坏。

1928年11月27日，中共长安县委在西安太阳庙门开会，被国民党特务察觉，县委书记张鼎安和部分委员被捕。28日，在省委尚不知长安县委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省委书记潘自力如约前往太阳庙门参加会议，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潘自力被捕后，省委书记由李子洲代理。

1929年1月下旬，省委在富平县美原小学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六大会议精神，总结了“左”倾盲动错误失败的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失误。会议改选了省委，曹赴仁任书记，李子洲（组织）、蒲克敏（宣传）、徐梦周（秘书长）、王林、张国藩、薛永寿、马云藩为委员。

2月初，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程士城、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先后被捕叛变，致使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曹赴仁、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刘映胜（杨声）、王有章被捕，党、团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省委下辖的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六个县委外，关中地区只剩下渭南、韩城、乾县、蒲城、富平县委。全省党员从近

3000 人锐减到 1300 人,其中关中地区仅剩 200 多人。

二 临时省委成立

1929 年 3 月 1 日,幸免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王林、薛永寿以“现存之省委”的名义,在渭南县龙背乡白家庄召开有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党、团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党、团临时陕西省委。王林任临时省委负责人,薛永寿任临时团省委书记。王林、张蔚森(张雨森)、薛永寿为临时省委常委,刘志丹、徐振化为候补常委,委员有张国藩、李凌云等。

1929 年 3 月 23 日,临时省委在渭南开会,重新调整省委成员,杜衡任临时省委书记,增补徐振化、章子文为省委常委,王林、张蔚生改任候补常委,并决定由杜衡、王林、薛永寿代表临时党、团省委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并检讨陕西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5 月 4 日,杜衡等向中央写出《政治、党务、农村经济概况》的报告,总结了陕西前一段工作中执行“左”倾盲动错误和军事冒险错误的教训。6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冯军集中陕西,陕西所受战争、灾荒的痛苦比别的省更甚,群众斗争有普遍发生的可能,陕西党目前的总路线是建立城市工作,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杜衡等人返回西安后,临时省委于 7 月中旬在渭南辛市召开第三次全会,传达中央决议和指示,确定今后工作主要是恢复组织,抓紧士兵和救济难民工作。会议再次调整了省委领导成员:杜衡(书记)、王林(组织)、张蔚森(宣传)为常委,徐振化、刘志丹为候补常委。8 月 23 日,临时省委第二次常委会增补薛永寿为常委,吉国桢为省委委员,担任陕北特委书记;张蔚森改任候补常委,负责西安市的工作;刘志丹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不再任候补常委。

1930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 70 号通告,提出“变军阀

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首先争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接到中央通告后，临时省委立即通报各地党组织和军队支部执行。

中共中央这些“左”的主张，在陕西地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执行。7月1日至8日，临时省委在蓝田县枫村小学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大会通过政治、职运、农运、兵运、组织、宣传及C、Y问题七个决议案，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杜衡为书记，王林、古国桢为省委常委。会后，省委派古国桢兼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王林去渭北巡视工作，赵伯平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杨子才（梁益堂）去陕南，恢复中共陕南特委并任书记。省委特别讨论了陕北工作，认为陕北已有发动游击战争的可能，决定以绥德、米脂为中心，发动游击战争。

7月中旬，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草坪小学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第70号通告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改临时团省委为正式团省委。团省委由薛永寿（书记）、贾拓夫、杨珊、张养诚、王作宾组成。

7月25日，省委发出通告（第一号），认为，陕西“革命的客观斗争也是高涨的趋势，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比全国为成熟。因此陕西的党的任务，只有在全党整个任务和政治路线之下，努力的加强主观力量，准备全省的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①。

第二节 省委遭遇第二次大破坏

一 领导灾民开展求生存的斗争

1929年是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年羹”。连续大旱三年的地方，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加上军阀、土匪的掠夺和骚扰，三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秦大地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据统计,截至1929年2月,全省灾民达655.03万人,到当年11月23日,全省因灾死亡人口达250万,外出逃荒的达40万人,全省人口从940万锐减至650万。灾荒以关中各县最为严重:眉县原有9.07万人,死亡6.93万人;泾阳县地户的达3400家;千阳县人口由15万减至10万。许多地方田园荒芜,饿殍遍野。地主豪绅则乘机催租逼债,高利盘剥,兼并土地,鱼肉乡民。根据这种情况,陕西省委决定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抗款、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求生存的斗争。

1929年至1930年,许多地方灾民组织自救团体,自发开展了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交农”罢耕、要求减免粮款和苛捐杂税的斗争。三原县有灾民自救军,周至县有灾民救济会,米脂、绥德县有饥民自救团,横山、神木县有发赈请愿团,“要吃会”等组织。城固、石泉县农民抗交地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周至、绥德、清涧、延长等地都发生了数千农民“交农”围城,要求救济灾民、减免苛捐杂税的斗争。临潼县交口镇农民反抗保安队下乡搜粮,将其全部缴械。到1932年春,关中24县及陕北、陕南一些县的农民掀起了大规模的“交农”围城运动,有些县的农民运动还一度发展为武装斗争。

周至、户县、眉县等地的武装暴动。1929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陈云樵为西府地区负责人,具体任务是: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暴动;进行军事活动,开展游击战争。4月初,陈云樵到达周至,先后领导建立了几个党支部,建立了一些单线联系网,同时与当地一些地下武装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11月间,陈云樵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时,周至县属临川寺的警察下乡催款,吊打农民,激起民变。贫农周七率农民数十人打跑了警察,并乘势一举攻进终南镇,砸烂乡公所,痛打作恶多端的乡吏豪绅,激发了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参加农民军,反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志。当天,农民军增至800多人。次日拂晓,农民军到达

周至县城。县长杨增润紧闭城门，并召集土豪和官吏商议对策。这时，农民军从东、北城墙架起云梯，奋勇攀登，杀向城区。县长急率警察由西门向眉县方向逃窜，到哑柏镇以西地区时，被中共地下武装陈其美部截击俘虏，缴获长短枪 10 余支，俘警察 10 余人。农民军打开监狱，放出“人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第三天，农民军撤离周至县城，向东攻打户县县城。攻入户县县城后，农民军将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法院、税务所全部捣毁，开仓放粮，市民鸣放鞭炮，夹道欢迎。农民暴动的胜利，使西府各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急将开往河南的门致中旅星夜调往户县，围攻农民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用梭镖、马刀、木棍武装起来的农民军死伤惨重，队伍瓦解。

农民军暴动的消息传到西安后，陕西省委当即派回省委汇报工作的陈云樵和李特生前往领导。陈、李尚在途中，灾民暴动已被镇压。二人到达周至后，通告各县的地下武装和农运负责人到渭河北岸的尼空寺镇集合，准备二次攻打周至县城。到约定时间，各地集合了 2000 余人、近 200 支枪，成立了总指挥部，陈云樵任总指挥，牛汉质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下分五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入夜，各支队接近周至县城，包围四门，指挥部设在主攻的西门外。由于进攻受挫，为了保存实力，各支队向眉县方向转移，退至眉县横水时，受到国民党军前后夹击，农民军被打散。

渭北地区的灾民武装斗争。1929 年 5 月，为了解决群众断炊的燃眉之急，中共三原武字区委在西王堡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在成立大会上，黄子文宣布：“赈灾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在此期间，武字区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形同虚设。黄子文自捐出粮 7 石，不到一天，就筹粮 80 余石。区委通过筹粮委员会解决了 3700 多无粮群众的饥荒。在武字区的影响下，富平淡村先后筹粮 3 万

斤分给无粮群众。他们还把筹粮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秦悦文、郭效曾率领淡村赤卫队于11月武装突袭民团驻地石家堡,俘虏民团团团长张长庆,收枪10多支。

1930年5月下旬,陕西省委召集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开会,讨论渭北的政治经济形势及群众斗争情况,决定以三原北区为中心,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队,以广大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6月上旬,黄子文、陈云樵到武字区传达省委指示,并同农运负责人研究决定,黄子文除负责武字区工作外,去高陵联系马学道所领导的武装;陈云樵去三原陂西镇联系马德修领导的武装,并去富平领导灾民武装斗争。

6月14日,黄子文率领武字区11名武装人员和数十名群众在陵前镇捣毁武字区公所,分了第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洲的粮食。6月16日,黄子文等人联系的武装汇集于武字区。马德修部由张成义(外号刀客遂儿)率领,约30人、20多支枪;马学道部由赵千甫率领,100多人、数十支枪;武字区的农民武装和富平田裕国组织的独立大队(其成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约四五十人枪。几支武装会合后,成立了渭北灾民自救队,陈云樵为队长,黄子文为政委,下编4个大队,并成立了中共军支,书记黄子文。全队近200人。6月下旬,灾民自救队在长墙堡分了地主豪绅赵应科、牛振和、叶子青的粮食,捣毁了武字后区马歇乡公所,并处决了宜君县卸任县长潘恩桐,收缴长短枪七支。

7月初,地方民团毕墨轩部和王平部进攻武字区。13日,灾民自救队向富平转移,在康之洞与富平民团遭遇,损失部分枪支。部队行至瓦窑头附近的清华洞时,一大队的分队长张成义突然叛变,打死独立大队分队长王笃,并收了其他大队的枪。灾民自救队被迫解散。陈云樵和前来视察工作的省委常委王林脱险,返回西安。黄子文到富平美原一带活动,武字区委和各支部的负责人及大多数党员被迫出走,武字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

陕北地区的“三要”、“三抗”斗争。1929年7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灾民开展了“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和“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7月9日,在中共绥德县委常委马文瑞、呼永华、冯启民等人的带领下,绥德四五千农民带着预备装粮的口袋,拿着棍棒和农具,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他们高呼“我们要饭吃,我们要活命!”的口号,直奔县政府。县长闻讯,仓皇出逃。农民闯进豪绅家里搜粮,在一个资本家开办的蛋粉厂拣食蛋粉充饥。灾民与资本家斗争了一整天,仍然不散。井岳秀部营长杨向被派人与躲在城外的县长密议后,决定给每个农民发一块银元,斗争暂告结束。在绥德县委领导灾民进行斗争的同时,陕北各地党组织领导了多次类似的斗争,如榆林县镇川农民抗地亩捐的斗争,米脂、佳县一带饥民“吃大户”的分粮运动,吴堡县岔镇农民清算县财政局长薛有年经济账目的斗争,清涧、神木、府谷县为抗粮而进行的“交农”斗争,安塞县饥民的“三抗、三要”斗争。这些斗争总计有10多个县、10余万农民参加,群众运动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汉中地区的抗租、抗捐、抗税斗争。汉中地区素有“小江南”之称,但当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计有钱粮地丁税、牲畜税、屠宰税等50余种。农民饱受苛政摧残。当时,陕南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团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加上土匪武装的洗劫和自然灾害,汉中地区出现了农民外逃、田地荒芜的惨状。在此情况下,中共陕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号召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抗税,杀催款委员和反动官吏的斗争。1932年4月,城固县木槽口周围五六个村的农民协会联合组成了冲虚观农协总会,清算民团账目,游斗催款委员。国民党当局派军警包抄农协总会,枪杀农协总会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张振藩,逮捕农协会员9人,打伤10余人。惨案发生后,中共陕南特委和城固县委迅速组织领导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罢耕,支援木槽口的群众斗争。

接着,南郑、褒城^①、洋县、西乡、勉县、宁强等县派出代表到城固声援,并募集 400 余银元和一批物资,慰问、救济被捕的农协会员家属,同时,组织 3000 余人集会游行,包围国民党城固县政府,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强烈抗议。慑于群众威力,城固当局接受了农协总会提出的惩办凶手、撤销肇事民团、释放被捕农会会员、减免田赋、停收多种捐税、对死难者进行安葬并给家属发放抚恤金等条件。木槽口斗争的胜利,大长了城固农民的士气,也大大激励了汉中地区的农民群众。

二 省委遭遇第二次大破坏

1930 年 10 月 8 日,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薛永寿被捕。10 月 10 日,党、团省委在西安组织游行示威,由于叛徒告密,党、团省委负责人吉国桢、贾拓夫等 30 多人被捕,党、团省委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各地党、团组织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北方局转陕西省委的指示信,指出陕西党最主要的任务是抓住目前城市和乡村自发的群众斗争的领导,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主要方针是要引导群众斗争到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中去。

1930 年 10 月,国民党在陕西的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中原混战中,离冯附蒋的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杨虎城由豫西南进军陕西,10 月 25 日占领潼关。26 日,冯玉祥系的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以视察渭北公路为名向晋南逃遁。29 日,杨虎城部先头部队进抵西安。当日,国民政府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此时,西安形势混乱,监所管理松懈,被捕入狱的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负责人潘自力、刘继曾、蒲克敏、徐梦周、吉国桢、贾拓夫等人乘

① 田县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撤销,辖区分别划入勉县和今汉中市汉台区。

机逃出监狱。^①

杨虎城思想进步,早年与共产党员魏野畴等交往颇深。大革命失败后,杨虎城一面继续默许共产党在其部队中发展建立组织,依靠共产党员为其主办军政干部学校;一面多次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希望“做第二个贺龙”。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函复中共东京市委,批准杨虎城在日本东京履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手续。但因杨虎城在中央复函到东京前已经回国,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此次入陕主政,任用了南汉宸、杜斌丞等一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在此情势下,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同杨虎城之间出现了多方位、多层面的复杂关系。

三 省委的多次改组与调整

1931年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团省委多次进行改组和调整。省委改组和调整的情况是:1931年3月26日至28日,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会,会议通过了拥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批判了杜衡在执行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中所犯的错误,选举高维翰(李杰夫)为省委书记,杜衡改任省委常委,黄平为省委委员,焦维织为省委秘书长。8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少文来陕视察工作,批评省委犯了右倾、动摇错误,再次改组省委,杜衡复任省委书记(兼管组织),高维翰改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刘万海为省委常委兼巡视员,李昆、刘映胜为省委委员。12月5日至7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三原、富平、蒲城及西路农民武装斗争和陕西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党要集中力量领导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苏区。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坚决执行中央

^① 在此之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子洲已于1929年6月在狱中病逝。

北方会议精神^①，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并派孟坚（孟用潜，曹长青）任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改任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陕西省委再次进行改组，李昆、王松年为常委，贾拓夫、刘映胜、汪锋（王烈）、杨珊（杨荫川）、杜衡为委员。12月，省委成员重新进行了较大调整，孟坚仍任书记，贾拓夫、刘映胜为常委，杨佑章、李茂堂（李白靖）、金理科（李奎）、杜润芝、杜衡、袁岳栋（小章）为委员。1933年3月23日，省委接受了杜衡要求改组省委的意见，重新改组省委，袁岳栋为省委书记，杜衡、孟坚、李世英为省委常委，新增刘宗沛为省委委员。

团省委改组和调整的情况是：1931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团省委，刘映胜任书记。5月，因全省团员数量减少，活动范围缩小，根据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强城市青年运动的指示，团省委改为团西安市委，并领导陕南团的工作，陈浅伦、刘映胜先后任市委书记。1932年7月，共青团中央指示恢复团陕西省委，刘映胜任书记。12月，团中央决定袁岳栋任团省委书记。1933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调整团省委的组成人员，李盛弟、刘宗沛先后任团省委书记。

从1931年到1933年，党、团陕西省委着重做了三项工作：第一，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二，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发动组织兵变；第三，领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城市抗日救亡运动。

四 组织发动兵变与武装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始终坚持以开展土地革命、

^①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北方各省省委立即组织红军，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陕西省委代表杜衡出席了会议。

创建革命武装为中心,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从1930年3月至1933年7月,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发动了多次兵变和武装起义。

乾县兵变。1930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乾县是临时省委划定的发动武装斗争的中心区域,中共乾县县委书记王敬之联络吴好善、许庚辰等组建了一支武装。为了扩大力量,王敬之率队接受驻乾县、永寿、礼泉等县的国民党军西北民军第十七师师长张西昆改编,任第十团第一营营长。3月间,中共周至县委书记陈云樵向王敬之传达了省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同年夏,王敬之随部队驻防乾县城内,秘密与上官克勤联络,发展力量,准备发动起义。不料事泄,王敬之即带领上官克勤、许桂林、吴好善、吴宗汉、许庚辰等隐藏在陆陌村油坊,遭到张西昆部丁万林团包围。王敬之、上官克勤奋力冲出包围,其他人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被俘后被杀害,起义失败。

两当起义。1932年4月,刘林圃、习仲勋等人在甘肃省两当县城组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一个营举行的起义。

1929年至1931年间,省委先后派李秉荣、习仲勋、李特生、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人到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相机举行武装起义。到1931年底,他们在该营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营党委,除机枪连外,3个步兵连都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班、排长都是共产党员。

1931年春,该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九一八事变后,该部由凤翔县进驻陕甘边境的风县和两当县整训。1932年3月,一营奉命与驻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陕西关中人,不愿离开家乡,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认为这是举行起义的极好机会,即派营部文书刘书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情况,省委认为营党委举行起义的意见是可行的,即派省委军委成员刘林圃为特派员到风县传达省委指示。刘林圃到风县后,当晚即召开营党委会,决定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起义,地

点在两当县城,还确定了起义后部队的番号和行动计划。4月1日拂晓,第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三连驻两当县城)从凤县双石铺出发,黄昏到两当县城。当晚,习仲勋主持召开有营党委委员和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刘林圃传达了省委指示,讲了举行起义的意义及起义后的行动计划,推选许天洁为总指挥,并拟定了起义的具体部署。4月2日凌晨,起义官兵先后处决了一、二、三连连长,枪声震动了机枪连和营部,使其有所戒备。吕剑人率一连攻击,战斗激烈。为了避免伤亡,一连撤出战斗。到凌晨两点多,除营部和机枪连外,三个步兵连的200多名官兵均撤出了两当县城,向陕西省境内转移,第二天上午到达太阳寺。根据省委指示,营党委将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为支队长,习仲勋为政治委员。部队继续北上,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到达宝鸡县赤沙、香泉时,遭到保安团的攻击,部队绕道前进,到通渭略时又遭伏兵包围,被迫撤退。几天后,部队从陇县朝阳岗八度镇出山,经高崖镇时,收缴了当地民团的枪支,进入甘肃灵台县境时,被国民党军杨子恒部堵截,经数次反击,未能通过。指挥部决定派吕剑人、刘林圃去乾县侦探消息,设法把部队拉到乾县;派习仲勋、左文辉去秦包公路侦察敌情;由许天洁、李特生率部去永寿县的岳御寺休整,待两路侦察人员回来后再商定部队去向。部队到达岳御寺时,陷入土匪武装的包围,伤亡惨重,起义失败。

靖远起义。1929年,中共陕北特委派共产党员张东蛟到宁夏盐池苏雨生部王子元团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春,王子元被甘肃军阀雷中田改编为工兵营,张东蛟任副营长。同年冬,王子元部被杨虎城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张东蛟任副旅长。他和打入该旅的其他共产党员十分重视兵运工作中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到1932年4月,在该旅建立了3个支部,有党员近百人,其中军官党员36人。这时,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向王子元做党组织传达省委关于组织起义,成立红军游击队的指示。他们有

开该旅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计划利用王子元和新上任的旅参谋长召开会议或王子元参加教导队毕业典礼的机会将反动军官拘捕缴械,争取全旅起义。不料事泄,王子元派兵包围了张东蛟住所,收缴了他的枪,同时扣押了营长王儒林(共产党员),并收缴了党组织掌握的执法队和教导队的部分武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谢子长、焦维炽和另一营长吕振华(共产党员)率领该营和教导队一部共约200余人,于5月5日傍晚率先在靖远起义,次日宣布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吕振华代理总指挥。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加之强敌追击,游击队被打散。后经党组织营救,张东蛟、王儒林脱离险境。他俩先后到了兰州,同谢子长、焦维炽、杜润滋等人取得联系,决定再次组织起义。5月中旬,王子元旅连长杜鸿范到兰州领取枪弹等军需,谢子长、张东蛟对其进行策反。杜鸿范表示愿意携带军需参加游击队。5月30日,谢子长、杜润滋等筹到武器后,在靖远永泉堡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旗号,再次发动起义,游击队很快发展到200余人,整编为一、二、三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参谋长杜润滋,杜鸿范、张东蛟、王儒林分任三个支队司令。6月,起义部队合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司令员王儒林,政委杜润滋,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孙作宾到部队参加领导工作。由于部队发展很快,又扩编了第四支队,孙作宾任司令员兼政委。7月,游击队遭驻防靖远的国民党军王云山部偷袭,后又受到国民党军冶成章部追击,部队分散隐蔽。战斗中,张东蛟受伤被俘,壮烈牺牲。

西华池起义。1932年7月9日,驻扎在陇东西华池的国民党陆军第十一旅特务营一、二连,在中共党员高鹏飞(一连连长)等人率领下举行起义。10月,起义部队170余人在甘肃宁县盘志原与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耀县起义。麟游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转押于南京,后经杨虎城营救出狱,加入杨部,升任团长。1933年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委任总部直属队骑兵第一团团长王泰吉为渭北“剿匪”总指挥,率部驻防耀县,“进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王泰吉虽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的信仰并没有改变,加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王泰吉毅然决定起义,同红军一道反蒋抗日。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托人到西安寻找中共陕西省委,自己又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周芝轩,汇报起义的计划。6月中旬,省委派余海丰、何离础等人到耀县,同王泰吉进一步商量起义计划。省委也先后派杜衡、刘映胜帮助王泰吉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并指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给王部以支持和帮助。

7月21日,骑兵第一团打起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贴布告,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起义。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刘映胜任政治处主任,下辖五个大队,共1000余人。起义军收编了耀县雷天一民团,收缴了驻耀县城内的三原民团总指挥胡景铨的全部枪支和两门迫击炮,逮捕了县城里的一些豪绅地主,令其为义勇军提供军费,并没收了豪绅地主的粮食、衣物,散发给贫民。部队在耀县据城七天。后离开耀县县城,开往三原县武字区。原计划到三原县城打垮杨竹荪团(事前和该团一营长有联系,准备里应外合),因大雨未遂。7月底,起义部队进军淳化方向,行至三原辖护把地区,与国民党军孙友仁团遭遇,激战许久,伤亡惨重。部队大部被冲散,王泰吉带领少数人马向小丘撤退,后绕道进入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薛家寨,仅百余人。

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组织领导的起义和兵变还有:1931年12月赵伯经组织领导的起义,1932年4月的凤翔路口起义,7月的碗口起义,8月的晋王、永丰起义,10月下旬的嵩店兵变等。这些起

义和兵变,有的因准备不足,有的因指挥失当,特别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根据地,所以大部分都失败了。尽管如此,这些兵变和起义对启发和教育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培养和锻炼军事干部,配合陕甘边一带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 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沈阳、长春等 20 多座城市。东北三省及 3000 多万同胞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日军侵占东北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三秦大地很快兴起。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9 月 25 日,省委发出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反帝运动组织,举行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游行,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9 月 22 日,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范一被广大师生驱逐出陕。李范一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骨干分子,到任以来倒行逆施,深为广大师生所憎恨。9 月 16 日,李范一出席省教育厅举行的全国运动会陕西选手预选赛,忽然出现了 200 余人的群众队伍,沿途散发传单,直奔会场,并高呼“打倒李范一”的口号。会场人员热烈响应,遂成立了陕西教育界驱李大会,推举 19 人为执委。9 月 17 日,陕西省政府机关报《西安日报》详细报道了教职员和学生驱逐李范一的情况。

全文刊登了《陕西教职员驱逐李范一宣言》，历数李范一九条罪状，李范一被驱逐出陕。

10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0月30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陕西民众书》，11月15日发出《关于反日救国会工作大纲》，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指出反日救国会是反帝运动中各阶层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组织，要在其中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争取、教育群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

从9月下旬起，陕西各界纷纷行动，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各地先后举行有数千乃至数万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抵制日货，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西安民众六七万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潼关县3万民众举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通过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惩办辱国外交当局》、《组织救国铁血团》等项决议案。

韩城返乡学生和小学教师成立农民夜校，组织话剧团，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汉中各校师生结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痛斥日军侵略暴行，宣告成立汉中中学生抗日外交后援会，准备大规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中小学校教职工代表集会，要求南京政府惩办贻误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和不战而退兵关内的东北军首领。从西安到各县，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反日救国会、铁血团、牺牲团等纷纷建立，遍及三秦大地。

1932年春，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打着“开发大西北”的旗号来陕“考察”。其真正的目的，一是探测杨虎城对时局的意向；二是压制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4月23日，陕西省教育厅决定于4月25日在西安民乐园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并请戴季陶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各中等学校师生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和共

青团西安市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与戴季陶进行斗争,并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4月25日下午,戴季陶在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百龄的陪同下,在民乐园礼堂对3000多名西安学生“训话”。他诬蔑马列主义,只字不提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抗日救国问题。学生们对此渐渐发出不满的声音,许多人向讲台上递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了东北大片国土,政府为什么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什么?为什么要在西安建立陪都?等等,要求戴季陶回答。戴季陶对学生的质问不仅不正面回答,反而以训斥的口气诬蔑“陕西学风不正”,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会场顿时大乱,质问声、口号声、谴责声响成一片,砖头、瓦片一齐掷向讲台。戴季陶见势不妙,在军警的保护下狼狈逃走。学生们找不到戴季陶,情绪越来越激愤,当场烧毁了戴季陶乘坐的小汽车。当晚,党、团组织紧急决定,第二天举行全市总罢课,举行驱戴反日大会。当局得知消息后,事前派出大批军警,对西安实行戒严,封闭各校大门,不许学生外出。4月26日清晨,学生们冲出校门,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同镇压学生的军警展开斗争。学生被枪击重伤10余人,轻伤40余人,被捕50余人。酿成了陕西现代史上著名的四二六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西安市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学生继续进行罢课斗争,要求陕西当局抚恤和释放受伤与被捕的学生,驱逐戴季陶出陕;号召全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农民抗租、抗税、抗债。4月28日,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并向外地发出快邮代电,公布四二六惨案真相,以求声援。三原、大荔、凤翔等县的学生也行动起来,声援西安学生的驱戴反日斗争。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陕西当局不得不为受伤的学生医治,并释放被捕的学生。戴季陶也狼狈地离开了陕西。

第三节 省委遭遇第三次大破坏

一 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未间断,而且愈演愈烈。在杨虎城主持陕政的几年间,“荒旱惨重,连年不休”,“农村日趋衰落,商市复报疲滞”,“人民生活愈发艰窘”,“财政空前拮据”^①。而蒋介石对杨虎城则实行财政控制政策。一是减少以至停发中央军费拨款。杨虎城共有三个师,原来全由军政部拨付经费。后来,蒋介石将一个师的经费改由陕西负担;继而又把另两个师的经费改由“中央协饷”,将其经费的大部分甩给陕西。九一八事变后,包括杨虎城的两个师在内的所有中央驻陕各军的经费一律改由陕西就地筹措。二是少给、迟拨,挪支赈济粮款。三是多计陕西国税数额,致使陕西财政“兵民争食,官民争食,兵抢民食,官抢民食”,使杨虎城陷入困难境地,企图迫使杨虎城辞去陕西省政府主席。

1933年3月10日,杨虎城奉命到河北石家庄“听训”。4月11日至14日,杨虎城奉命到江西南昌参加赣、苏、浙、皖、鄂、豫、陕七省“治安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蒋介石指责杨虎城军务不专,“进剿”红军不力,意在由杨虎城主动辞去政务,专理军务。5月4日,国民政府以“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杨虎城呈请辞职以便专理军务”为由,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6月19日,邵力子宣誓就职。

^① 1932年12月21日陕西省政府委员杨虎城、田汉旗、寿岳秀等给宋子文等2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电报。

二 省委遭遇第三次大破坏

1933年4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要求在五一、五三^①、五四、五五、五七等纪念日,组织标语队、粉笔队、毛笔队,写标语,散传单,制造小红旗,遍插西安全城。这一行动暴露了党的组织,一个月内,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与省委交通处、妇委机关四人相继被捕,但省委仍未警觉,又组织纪念八一起义的游行示威。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省委巡视员高岗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店开会,研究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发展问题,被国民党特务发觉,贾拓夫、高岗破门而出,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当晚,袁岳栋、杜衡叛变投敌,特务把省委的全部文件搜走。第二天,袁、杜在大街上盯梢捕人,不久,又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带领特务到全省各地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国民党陕西当局利用叛徒组织“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遣“肃反”负责人和专员,以致西安、三原、富平、高陵、韩城、大荔、合阳、渭南、华县、南郑、城固、洋县、西乡以及甘肃等地的党组织都受到严重摧残。党、团陕西省委机关和各地的党、团组织受到空前大破坏。仅在渭北地区就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害。关中幸存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低潮。

8月上旬,脱险的贾拓夫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决定由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新发、省委组织部干事和中共西安市委负责人卢志远三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与各地党、团组织建立联系,开展工作。贾拓夫由于身份暴露,无法在西安立足,在安排善后事宜后,与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刘宗沛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①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犯山东济南,枪杀军民及外交官员,酿成济南“五三惨案”。

三 省委的艰难恢复

贾拓夫、刘宗沛离开陕西后，刘映胜（书记）、张新发、樊德音、雷振东（雷致远）、李冲霄（李鼎新）于8月底在西安组织了临时省委。同时由雷振东（书记）、史克寿、邢崇道（邢子舟）组成了团的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派高维翰到陕东、汪锋到陕南工作，还派人到蒲城、韩城、蓝田整顿党的组织。9月19日，临时省委在西安大差市东十道巷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问题，被打入省委机关的国民党坐探王治国夫妇出卖，刘映胜、李冲霄、樊德音、雷振东等被捕（张新发在此之前已被捕）。

9月下旬，原省委交通陈子敬和干部管玉祥联络在西安的党团员胡明伦、杨文谟、王好勤、姚选科等人，准备再次建立党、团临时领导机构，因叛徒告发，除陈子敬、管玉祥外，其他人尽落敌手。陈子敬即同中央交通李自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10月，管玉祥与原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负责人孙作宾、原省委发行部部长余海丰，从陕甘边苏区到西安的崔廷儒及在杨虎城部搞军运的胡振家等再次成立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组织孙作宾，宣传管玉祥，军事胡振家，秘书长崔廷儒。由于临时省委成员多在杨虎城部和民团中从事军运工作，遂决定首先在军队中开展工作。为了打击叛徒、特务，保护党的组织，临时省委成立了以赵成璧为队长的特工队，活动于西安城郊及临潼、周至、兴平、礼泉、乾县等地，保卫党的各级组织。11月，余海丰被捕，临时省委随之解体。

11月初，团中央派陕籍共产党员韩学亚回陕，帮助恢复各级党、团组织。韩学亚同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魏光波接上关系，又联系西安市的党员郑福平、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刘庚以及来省委联系工作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和高维翰等人，于11月18、19日在渭南开会，韩学亚报告了目前形势和来陕的任务。会议成立了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委员会，书记韩学亚；同时派人分别去联

系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南特委，并派魏光波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34年1月20日，韩学亚接到中央来信，决定2月初在渭南召开扩大会议，准备成立正式省委。后因国民党当局追捕，韩学亚离开陕西，回到上海，党、团共同恢复委员会遂停止活动。

1934年4月，魏光波回陕，与孙作宾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书记魏光波，孙作宾、严克伦、崔廷儒、苗建平为委员。后孙作宾去陕南工作，魏光波被捕，西安中心市委解体。

1934年冬，孙作宾、崔廷儒先后由汉中国到西安。1935年5月，孙作宾、崔廷儒、高克林在西安组织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负责西安和东路工作；组织孙作宾，负责杨虎城部队及地方民团中党的工作；秘书长崔廷儒，负责西路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15次遭受破坏，多次进行改组、重建，但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始终未减，革命的火种始终不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前进的明灯塔。

第八章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第一节 根据地党军政群组织的建立

一 中共组织的建立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从恢复武字区的中共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是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包括三原、富平、耀县、泾阳、淳化五县的交界处和高陵、蒲城、白水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 750 平方公里,人口 4 万多。

三原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发展较快的县份之一,武字区是三原县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农民运动在逆境中继续开展。1928 年 2 月 9 日,黄子文和唐玉怀主持成立了抗敌委员会。2 月 22 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抗敌委员会和游击队活跃在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石川河西的溪村一带,抗粮,抗捐,打土豪,先后处决了国民党武字区区长和前武字区、后武字区的民团团总。在 5 月的三原农民“交农”围城斗争中,黄子文带领的武字区农民武装起了骨干作用。7 月,中共武字区委成立,孙平章任书记。1929 年,黄子文和唐玉怀领导成立了武字区筹赈委员会,实际主持了武字区的地方行政和筹赈救济工作。1930 年,武字区的农民武装是渭北灾民自救队的主要力量。

1931 年 5 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马先民任书记,黄子祥、侯守恩、孙平章、胡德润、孙铭章、王曲贤为委员。

1932 年 2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织和由外地

回陕的黄子文到武字区开展工作。他们为培养干部,举办了党员训练班,每期三四天,历时月余,先后培训干部40多人。4月12日,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被捕。6月初,在渭北巡视工作的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指定孙海章任武字区区委书记,后又选举孙铭章为区委书记,胡德润、赵应奎、邓万祥、孙平章为委员。7月,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金理科为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9月,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三原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三原县有3个区委,县委所在地武字区委有7个支部,农民联合会有10个分会。

1932年10月8日至9日,中共陕西省委主持召开渭北各县联席会议,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20余人参加,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渭北特委,创造渭北苏区;任命高维翰为特委书记,李冲霄、金理科、黄子文、汪锋、曾楚川、黄子祥、顾先臣、邢彦青、程建文为委员。渭北特委领导三原、蒲城、耀县县委和富平县刘家卓区委,共有党员150多人,机关设在武字区。

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贾拓夫在富平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撤销高维翰渭北特委书记职务,由李冲霄(书记)、邢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渭北特委的决定。后来,省委书记杜衡又宣布省委关于以金理科为书记组成渭北特委的决定。12月中旬,省委撤销中共渭北特委,组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刘林生为书记。1933年,省委多次调整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成员:1月16日增补汪锋为副书记;3月29日任命刘映胜为书记,赵伯平为副书记;5月上旬任命赵伯平为书记。三原中心县委辖耀县、富平县委和三原、高陵、白水等六个区委。

二 军事组织的建立

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首先抓军事工作,准备建立红色武装,用军事力量创造苏维埃区域。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决定,各村都要组织赤卫队,并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勇敢分子30多人组成区武装赤卫队,由区委委员孙铭章兼任队长。

1932年3月中旬,武字区游击队成立,孙铭章任队长。4月下旬,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和武字区委决定,由黄子祥负责组建武字区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建立后,孙铭章任大队长,下设3个分队,由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分任队长;队员40余人,长短枪34支,活动在西至心字区,东至富平石川河,北至耀县西原,南至心、武两区的原畔一带。

8月1日,武字区委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渭北游击队,队长马志舟,政治委员金天华,共60多人,30多支枪。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害,该队由习仲勋带到武字区,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一带。

1933年3月,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平,政治委员金天华。7月,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治委员杨森。

三 政权组织的建立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经历了一个由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过程。1931年9月下旬,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成立,侯守愚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下设五个分区,各村设村反日救国会。反日救国会代行革命政权的职能,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同国民党的基层政权进行斗争。1932年3月上旬,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改为农民联合会,黄子祥为主任。农民联合会发动农民群众反捐税,分粮食,继续代行革命政权的职能。8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祥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李鸿儒、唐德宽等为委员。这是依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成立的革命政府。

9月22日,中共三原县委在武字区召开渭北革命委员会(亦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共三原县委代表、共青团三原代表、农民联合会代表(共11个分会,每个分会2名代表,由分会全体群众大会选举产生)、雇农工会代表、游击队代表、少年先锋队代表,共计28人。大会选出1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5人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各部。会议选举黄子文为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马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马宗德为肃反部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渭北革命委员会设有中共党团,领导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党团由李冲霄(书记)、黄子文、孙平章组成(后由郑彦青、黄子文、马志舟组成,郑彦青为书记)。大会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与中农等12条决议,通过《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及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共陕西省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通电。

四 群众组织的建立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共青团。1932年10月,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程建文任书记,奥天斗、金天华、习仲勋为委员。12月,团渭北特委撤销,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李盛弟、习仲勋、李云波、魏光波先后任书记。团渭北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机关均驻武字区。同年冬,省委派魏光波到武字区开展团的工作。魏光波到任后,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很快建立了武字区团委,书记李文义,秘书魏光波。

武字区还成立了雇农总工会,领导雇农在区农民联合会中发挥骨干作用;成立了太和堡妇女联合会,组织动员妇女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参加政治军事工作,为游击队做鞋、做衣服、做饭、送信;石桥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吴大新任队长,刘光远任副队长,主要任务是站岗

放哨,张贴标语,收集情报,传递信件,配合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1932年11月,武字区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石桥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身背大刀,肩扛红缨枪,维持秩序,巡逻防范。

第二节 土地分配与反“围剿”斗争

一 分粮食,分田地

由于灾情极为严重,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主要是打土豪,分粮食,以解救灾民为首要任务。

1931年5月,武字区武装赤卫队在耀县西部、富平县石川河以西及三原县的心字、武字两区,领导和掩护群众收割地主豪绅的庄稼,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增加灾民口粮,减轻农民负担。10月,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斗争反动区长薛荫堂,迫使他取消了按地向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对大革命时期农协会令其将霸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的事一直心怀不满,企图反攻倒算,事实被揭发后,武装赤卫队将他处决,并烧毁了他记的“变天账”。

1932年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祺在武字区召集区委成员和耀县、淳化县代表20余人开会,讨论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4月上旬,黄子文领导农民分了太和堡地主张玉泉家的粮食20余石。农民联合会组成分粮委员会,具体组织农民开展分粮斗争。4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道:“最近在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由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1500人之多,整个的继续的分配五六天之久,分了武字区20余家所有的粮食与财产。”^①由于发动了广泛的分粮斗争,使得群众的斗争积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极性大为提高,农民联合会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1500人,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

10月5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指示渭北游击队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活动,帮助建立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保护群众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在高山槐分粮3天,300多名群众参加,分粮300多石。耀县西原,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的群众也在农民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分粮斗争。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分粮斗争的开展已经深入到分土地的阶段,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非常迫切,认为分配土地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抗捐、抗债、分粮、分财产是引导广大劳苦群众走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没收与分配土地必须鲜明地提到群众面前,在武字区必须立即实行。

根据省委指示,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于10月10日决定在武字区南原分配土地。20日,特委召开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在有利于雇农、贫农的原则下(如将麦苗地分给贫雇农),立即进行土地分配工作。26日,特委和三原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要求各党支部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27日,党、团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的方式”,在五六天之内实行土地分配。28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38个村堡代表会议,总结南原土地分配的经验教训。后来,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在1932年11月19日给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分配土地过程中虽有错误,但党坚决领导和进行了这一工作,已经分了的有一个分会,其他在马上分配之中,差不多每人都能得到12亩至15亩土地。武字区群众分土地的积极性很高,街谈巷议中谈论的都是分地话题。

但是,武字区南原的土地分配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周围六个

县的民团和国民党军队对渭北根据地的“围剿”就开始了,根据地其他地方未能来得及进行土地分配工作。

二 反“围剿”斗争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三原地区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根据地军民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则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和力量,遭到三原周围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连续“围剿”。

1932年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中,指示“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的准备这一工作”^①。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10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在11月6日至8日连续三天召开群众大会,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11月6日,庆祝大会正式召开,黄子文主持并致开幕词。7日,参加大会的群众达2000余人。8日,举行游艺大会。整个活动波及三原、富平数镇,展示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风貌和斗争勇气。但是,庆祝活动也暴露了根据地的力量。11月9日,国民党陕西当局集中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县民团和三原、庄里、小丘的驻军联合行动,向根据地发动“围剿”。国民党部队占领武字区后,对根据地军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黄子文家乡30多人被抓,群众财物被抢,房屋被烧。不到一个月,根据地中心武字区被洗劫六次。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被迫分散,工作一度停止。渭北游击队被冲散,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

渭北根据地遭国民党军“围剿”后,中共陕西省委立即派干部到根据地恢复和重建工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调整党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织五次,先后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同时加强了对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恢复后,立即着手游击队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三原中心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曾楚川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在南原和武字后区各组建了一支游击队。不久,黄子文将两支游击队合并,恢复了渭北游击队。1933年3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设渭北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及第一、第二补充支队。总指挥部指挥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配合行动,共同打击敌人。4月底,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团全歼侯家堡驻军一个骑兵排。6月,攻打驻扎在长塄堡的富平淡村民团。7月,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县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大队长雷家祥,党支部书记刘清和,下设三个中队。游击队除配合红二团打击国民党保安团队外,还组织发动群众在富平、耀县等地打土豪、分财物,并帮助富平、耀县、三原等地建立了五支游击队,约一百六七十人。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简称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治委员杨森,参谋长李天保,下设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7月底,红四团为策应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三原和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

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的兵力,再次对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根据地进行“围剿”。国民党军队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许多村堡群众倾家逃离,十室九空。据不完全统计,被押解到三原县城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四五百人之多。

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情况下,红四团虽奋力反击,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于8月上旬撤离心字、武字两区,北上照金。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秘书李俊藻等被捕,根据地被国民

党军占领。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北方地区领导建立较早的根据地之一，在中共陕西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从1931年5月开始创建，到1933年8月失守，坚持红色割据两年之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教育和发动了群众，培养和锻炼了党、政、军等各方面的干部，对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第九章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一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以开展兵运工作为基础,在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中共六大以后,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分析了在西北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的有利条件,加强了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和部署。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乘院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成功组建了一个团,在陕、甘、宁边界活动。同年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在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世麟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甘肃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部队整编后,在甘肃宁县张皮原遭国民党军陈珪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率部编入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刘志丹在以补

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被苏雨生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以陈连璋部第十一旅旅长的名义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后来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

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雄炽到甘肃靖远发动国民党警备第三旅起义,因联络失误而失败。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来到甘肃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击溃合水县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二 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陕甘游击队

1931年9月,由于受到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围剿”,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处境十分危险,在拓克宽、阎红彦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安定县委和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保安、定边、靖边和安边

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武装”^①首领师锦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地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10月下旬,阎红彦率领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为加强对两支队伍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部队。谢子长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指战员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此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甘肃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3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锦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训部队。

中共陕西省委十分重视反帝同盟军的建设。1932年1月20

^① 在陕、晋、蒙交界地区,一些商人在运输货物(主要是鸦片),进行贸易时,为保证运输安全,防止货物被抢,经常雇用一些武装人员押运。这些武装押运货物的人员被称为“保运武装”。

日,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同盟军加强政治、军事和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向渭北一带游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同时要求部队进行整训,为建立红军游击队做准备,并派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到反帝同盟军主持改编工作。在整训过程中,部分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军心不稳,于2月6日缴了第二支队的枪,并打死打伤部分干部和战士。师储杰乘机拉走自己的部队,造成了部队的损失和内部的不团结。“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①。

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四个大队,并建立了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高维翰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编后,按照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向渭北的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游击,2月13日攻克旬邑县职田镇。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获胜,接着袭击了耀县照金民团。随后,陕甘游击队在同官、宜君、中部一带活动,3月中旬回师正宁县柴桥子。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原,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4月18日,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不切实际地指责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

^① 《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

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

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会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个月內作战9次,8次获胜,歼敌1400余人。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真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时再遭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陕甘游击队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激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革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在游击队无休止地“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的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激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使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三嘉原突围的三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命令谢子长重新返回游击队,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建立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遭挫折,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发展。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按照省委的指示,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力量逐渐增强。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镇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400余人。11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

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决定。他错误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来,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12月22日,部队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26日,红二团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红二团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红二团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横扫了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随后,红二团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1933年4月,红二团奇袭洛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与彬县龙马、高村民团。经过这些战斗,到1933年秋,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根据地。

第二节 创建根据地的党政群组织

一 党组织的创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依照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与要求,开始在照金苏区建立党的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并不断健全和完善。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苏区,筹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委员有李妙斋、史克寿等。6月,秦武山接替调回省委的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被补选为特委委员。10月,陕甘边区特委驻地照金失守,特委成员不能集中,领导机构很不健全,难以行使领导职权。

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师长王泰吉,政治委员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师党委书记杨森。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师党委代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职权。

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重建,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张静源(张静元)、蔡子伟、刘景范、李生华、龚逢春为特委委员。

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陕甘边“已经进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陕甘边党、政、军目前的任务是: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中共赤漳工委(书记金理科)、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书记马文瑞)、中共礼泉县委(书记苏宝泉)、中共赤川县委(书记蒋振昌)等县级党的组织,同时在一些乡村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二 政权组织的创建

从1932年4月至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先后成立过四次。

第一次是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原召开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期间,各村推选70余名代表,举行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10名农民代表和5名游击队员代表组成,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等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了由三至五人组成的村革命委员会。

第二次是1933年4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粮食委员姬守祥,经济委员杨在泉。革命委员会机关先在照金镇薛家寨,

后转移到甘肃华池县南梁堡一带。

第三次是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庆阳县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先后任副主席,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张步清为土地委员,牛永清为劳动委员,武生秀为财政委员,呼志禄为粮食委员,边金山为军事委员,贾生秀为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负责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大队长郭锡山。

第四次是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根据特委7月决议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任政治秘书长,李生华为土地委员会委员长,张汝贤为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呼志禄为粮食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惠子俊为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为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张景文先后为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

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5月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改三路地区办事处为南区革命委员会,黄子文任主席。10月,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下辖富西、富甘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和宁县办事处。1935年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马文瑞去甘泉、宜川开展工作,不久建立了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辖红泉、赤川两县革命委员会。

在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县级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到1935年2月,陕甘边区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有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贾生秀兼任)、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

席王巨德)、赤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飞)、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富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富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主任刘永培)、南区革命委员会驻正宁办事处(主任郭廷藩)。

三 群众组织的创建

1932年春,寺村原村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民团,积极支持陕甘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后来,湫头、三嘉、杨坡头等地也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群众组织,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1932年至1933年初,照金地区各村普遍建立了农会组织。有芋园村农会(主任王文强)、房上村农会(主任马长贵)、陈家坡农会(主任王满堂)、韩家山农会(主任李三少)、黑田峪农会(主任杨玉财)、碌碡坪农会(主任李龙发)、大崖子农会(主任张老五)、老爷岭农会(主任潘克军、朱贵)、金盆村农会(主任潘克顺、丁月良)、北梁农会(主任陈开榜、白明礼)等。在农会普遍成立的同时,妇女联合会也纷纷成立。阮金莲、王氏、杨秀珍等人分别为北梁、老爷岭、绣沟妇女会负责人。

南梁地区最早建立的群众组织是金盆沟农民联合会,1933年秋成立,主任白杨珍。之后,白马庙、玉皇庙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在华池成立的群众团体主要有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等。这些群众组织有的是半政权性质的,他们代表农民管理部分政务,如召开群众大会、分配牛羊等。

1934年秋,甘肃的东华池、合水、平定川、太白镇,陕西的白豹川等地普遍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1935年初,庆北地区柔远一带成立了7个农民联合总会,分

管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等地的 20 多个农民联合会。

第三节 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一 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

陕甘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战时的实际出发,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区域都进行了土地分配,但在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上,各个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寺村原时期。开始是打土豪,分财物,以军事行动没收土豪的粮食、牲畜和其他财物,一部分留作军需,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而没有没收、分配其土地。以后又在五顷原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了全部土地。由于苏维埃政权不巩固,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最后土地分配没有落实,或是明分暗未分。

照金时期。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富农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的公共土地,根据人口与劳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分地过程中,采取谁租种就分给谁的办法。仅茅园、金盆、香山等地就分配土地 7000 多亩。

南梁时期。主要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土地不足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维持基本生活。分配方法为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川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在根据地中心区域进行,而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

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消灭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

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二 予民生息,促进经济

陕甘边界地区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即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并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主要做法是:第一,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分得土豪的粮、财解决。第二,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过程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收成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红军及游击队食用。第三,兴办小牧场。将没收地主的牛羊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供军需。第四,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第五,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边区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

为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根据地内开设了贸易集市。照金时期,薛家寨亭子沟曾设立集市,五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南梁时期,荔园堡也设立了集市,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对来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开明商人建立合作关系。

为确保苏区经济稳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并禁止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在苏区流通。苏币采用木刻版,印在白平布上,涂以桐油而成。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4种,共发行3000元,与银元等值。为取信于民,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元兑换处,以方便群众,使苏币博得了很高的信誉。

三 开办学校,培养干部

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前,南梁荔园堡及其周围一些偏远地区没有一所学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提倡兴教办学,首先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在校学生 60 余人。学校教材采用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为全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形式,通俗易懂,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教材。后来,边区政府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其次,苏维埃政府注重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同时,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生活》和《红色西北报》,对团结、教育人民,建设根据地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部队和地方急需大批干部。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4 年 10 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由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军事主任吴岱峰主持日常工作,教员有马文瑞、蔡子伟(兼)等。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中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干部。教学内容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红军干部学校前后举办了三期,共培训干部 200 多人。

第四节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 照金时期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主要发生在照金和南梁时期。

1933 年 2 月,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三个团的正规军和耀县庙

湾等地的民团,联合进攻照金苏区。由于红二十六军二团主动转入外线作战,苏区游击队英勇反击,渭北游击队及时在敌人侧后突袭,使国民党军疲惫不堪,被迫撤出。

4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又调集四个团的正规军和六个县的民团,分四路围攻照金。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总指挥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游击队和群众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十六军转入敌后寻机歼敌。会后,红二十六军转战旬邑、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苏区军民团结一致,以各种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国民党军,取得多次胜利,加之此次“围剿”苏区的总指挥王泰吉本是共产党员,无意与红军作战,只是虚与应付,对上虚报战绩,边区反“围剿”斗争很快取得胜利。

正当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作战时,杜衡回到部队。6月中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反“围剿”问题和下一步行动计划。杜衡否定了刘志丹等人提出的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强行作出了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的错误决定。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回省委汇报工作,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6月下旬,红二团渡过渭河,虽有小胜,但终因国民党军队四面围攻,部队被迫进入蓝田、商洛山区,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照金苏区处境十分危险。在此艰难时刻,驻防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于7月下旬率部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和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进入照金。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军事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军民斗争的信心。

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独立担

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已恢复党籍的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后,新组建的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红军在让牛村、庙湾一带歼灭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并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陕甘边苏区的失败,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照金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西安绥靖公署调集正规部队及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同国民党军刘文伯部及地方民团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弱。战斗中,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危急时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从绣房沟赶回,猛烈反击,取得了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李妙斋在战斗中牺牲。

9月下旬,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时,与强世清率领的红军陕北游击队一部相遇并一起战斗。9月25日,在国民党重兵“围剿”薛家寨时,红军在彬县底庙歼灭旬邑民团一部,继而智取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黄罗斌、牛岗等2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18日深夜攻克合水县城,消灭驻防军一个连及民团数十人。下旬,红军主力在庆阳县三十里铺和毛家沟门接连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人,缴枪200余支。

在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时,国民党军数千人从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边界向照金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边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守,连连破敌。15日夜晚,国民党军由叛徒陈克敏带路,从后山巍峨旁的一条石崖缝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定,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向黑田峪方向撤退。10月16日,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陷落。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革委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及不少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被迫转移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

二 南梁时期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南梁地区后,国民党对陕甘边苏区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多次对南梁地区发动进攻。

1934年2月至4月,国民党陕甘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部署是:驻守庆阳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合围红军和苏区,驻耀县的杨虎城部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冯钦哉部一个团、延安张瑞卢团等严守防地,相机堵截红军。据此,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甘边区特委军委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吸引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2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耀县瑶曲、宜君县石板、五里镇,中部县店头等地。3月上中旬,红四十二师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县刘家砭,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接着,奔袭庆阳县元城、高桥、赵渠子国民党驻军和民团。4月2日,红军主力在合水县西华池全歼王子义团5个营和1个机枪连,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西华池战斗后,红四

十二师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先后取得了三里原、和尚原、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入南梁的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仓皇退出。

7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等率领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在外线作战，来到南梁。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争取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治委员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三团、红军陕北游击队北上后，刘志丹指挥骑兵团和各地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伺机歼敌，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了陕甘边苏区。

10月，国民党军再次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围剿”，分兵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分析敌情后，决定留少数游击队和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寻机歼其一路，以打乱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计划。先是红军骑兵团在保安吴堡川打了一个伏击战，随后红二团和骑兵团相继袭击了保安县楼坊坪张廷芝部和骑兵二团。11月6日，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奔袭环县曲子镇，击毙区长朱文成，俘虏民团团长李恒泰以下近百人。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参加“围剿”苏区的各路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纷纷撤退，国民党军分路蚕食陕甘边苏区的计划破产。

经过三年多艰苦的反“围剿”斗争，到1935年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建立了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

新设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 11 个苏维埃政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章 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根据地

一 创建根据地的准备活动

在刘志丹等人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中共陕北特委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下,带领陕北人民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下辖绥德、米脂、清涧、神木县委和榆林、延安、延长、横山区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9月28日,陕北特委主要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部分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杨国栋、贾拓夫分别代理特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大会拥护中共六大的决议,认为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陕北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目前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批评了杨国栋独断专行的错误,并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正式委员、常委,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3月上旬,部分特委委员在清涧县高杰村开会,强调要继续发动群众,开展以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为中心的斗争,采取各

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4月,清涧、延长、延川、延安等县委、区委书记在清涧把子山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六大和省委四次扩大会议精神。

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杨国栋政治上右倾、军事上消极、生活上腐化等错误,撤销了他的代理书记职务,决定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了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会后不久,刘志丹前往保安,做当地民团的工作。10月,吉国栋接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为团陕北特委书记。

1930年9月底,赵伯平接替吉国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杨璞与中央新派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斌和高维翰带着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任务到了绥德。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县城西合龙山的古庙里举行。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合并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委员会,赵伯平为总暴动委员会书记,孔祥斌为军委书记,谢子长为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会议期间,特委秘书长刘澜涛、府谷县委组织部长张德生被国民党绥德县当局逮捕,赵伯平等移至义合镇继续开会。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林到陕北,宣布撤销陕北总暴动委员会,恢复党、团陕北特委和各群众组织的正常工作;陕北党、团组织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1931年3月,由王林、赵伯平、常应麟(常黎夫,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组成的陕北代表团赴北平^①,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工作,特委工作由孔祥斌主持。代表团离开陕北后,因团特委发动学生举

① 今北京。

行纪念红五月活动,导致10多人被捕,孔祥斌等被迫离开榆林,特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赵伯平、常应黎和接替孔祥斌职务的张国藩回到陕北后,分路巡视指导各县工作。7月,党、团特委机关由城市转入农村。经过整顿,特委下属府谷县委和神木、米脂、佳县、吴堡、绥德南区、绥德北区、清涧、安定区委,横山、榆林、三边特支,共有支部81个,党员765人。

代表团返回陕北后,河北省委长期未与陕北特委联系,陕北特委派往河北省委联系的人员又被河北省委留在省委工作,陕北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事实上已经中断。为此,1932年11月,由赵伯平、崔逢运(崔瑞生)、鲁学曾(鲁賁)组成的陕北代表团经山西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要求解决陕北党、团组织的归属问题。陕西省委因和陕北特委只是横的平行关系,故帮助崔、鲁二人去北平与中共河北省委联系,派赵伯平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常学恭、鲁学曾、王兆卿以及神木、府谷、佳县、绥德、米脂、清涧、安定7个县和游击队的代表20多人。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特委工作报告。会议抵制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部分“左”的错误指示,制订了切合陕北实际的斗争策略,提出要在陕北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个游击区域,建立和扩大游击队;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舟,军委书记王兆卿,农运委员张达志,特委委员还有马文瑞、崔田民、常学恭、鲁学曾、崔逢运、高长久。

高起家城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标志着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已经转向全面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个转折,对后来陕北党、红军、革命根据地乃

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8月3日,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毕维舟、王兆卿和米脂区委负责人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及共产党员高禄孝被国民党米脂县当局杀害于无定河畔。8月中旬,特委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毕维舟、王兆卿等六人被害后的应变工作。

12月11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到北平汇报请示工作的崔逢运、鲁学曾留北平另行分配工作,派郭洪涛、李铁轮回陕北参加特委领导工作。

二 革命武装的建立

第一,二次扩大会议后,陕北特委派出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陕甘宁晋边界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到1930年,已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了10多个中共支部,为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积累了经验。

中共陕北特委创建的第一支工农武装是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1932年3月12日,延川县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等智取清涧县淮宁湾民团,缴获了民团邱树凯的六支步枪,13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治委员。不久,游击队开展了清算绥德地主白登高的斗争,袭击了永坪镇刘广汉民团,缴枪10余支。4月,延川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计70余人,30余支枪。10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治委员,并确定其任务为“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造陕甘新苏区”。

1933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为政治委员(后为杨重远)。5月10日,红一支队南下陕甘

边苏区,随红二十六军活动。月底,红一支队返回陕北,在安定县谭家峪遭国民党地方民团包围,杨重远牺牲。9月,红二十六军派魏武继任支队政治委员。此时,红一支队已发展到80多人枪,下辖5个分队,在安定西区、北区建立了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并建立了10多个赤卫队。

9月,红一支队二次南下陕甘边苏区,先后配合红二十六军攻打旬邑县张洪镇和甘肃合水县城。后来,红一支队返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接连失利,强世清受伤被俘后牺牲,魏武阵亡。红一支队返回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不久,部队被打散,白德胜被俘,游击队员分散隐蔽。

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返回陕北,着手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恢复红一支队。2月13日,被俘的红一支队代理支队长白德胜、中队政治指导员任志贞夫妇在安定县瓦窑堡南门外就义。3月8日,红一支队在安定县刘家圪圪村恢复,李盛堂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治委员,谢绍安^①任副支队长。恢复后的红一支队继续坚持打击土豪劣绅,摧毁地方保甲,消灭小股民团的斗争。6月,窑子砭河战斗后,红一支队发展到50多人,谢绍安任支队长,贺晋年任政治委员。

高起家凤扩大会议之后,特委委员分赴各地,传达会议精神,帮助各县创建红军游击队,革命武装迅速发展起来,陕北游击战争从组织准备、初创阶段转向全面发展和迅速壮大的阶段,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阶段,由小规模出击转向大规模活动,由创建小块游击根据地转向建立全陕北根据地时期。从1933年8月到1934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先后领导建立了四支游击支队。

1933年8月5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县王家山成立,支队长罗永宽,政治委员高朗亭,有队员10余人。红二支队成立

^① 与国民党军陈瑞璋部谢绍安的谢绍安重姓重名,并非一人。

不久,镇压了绥德县南区反动区长薛永通,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出示布告,历数其罪恶。1934年1月21日,红二支队在红一支队部分人员配合下,袭击清涧县解家沟国民党军据点获胜,镇压豪绅、地主,收款委员九人。绥、清边界为之大震。

1933年11月7日,由神木特务队改建的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松树峰成立,支队长王兆相,政治委员马万里。红三支队在沙坡西沟、呼家庄、红交寺等地镇压了几个土豪劣绅和收款委员,声震神木、府谷、佳县。

1933年1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到佳县木头峪,与在民团中担任教练的共产党员刘子义联系,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随后,特委又派马佩勋到吴堡,领导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治委员马佩勋。1934年2月15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义勇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下设两个分队,共有20余名队员,3支枪,活动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边界。后来,红四支队配合红二支队袭击清涧县店则沟李成善民团取得胜利,缴枪十余支。

1934年4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县王家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崔正冉,政治委员马万里,副支队长王海山。红五支队配合红二支队开辟绥德、清涧、延川东区游击根据地,使绥德南区成为全县的中心苏区。

从1934年6月到1935年初,中共陕北特委又相继组建了陕北游击队第六至第十五支队,以及二十一、二十二支队,这些游击队在配合红军反“围剿”战斗和保卫各级苏维埃政权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共陕北特委非常重视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在每个支队都建有党支部、队委会,支队直接受特委领导,和当地县级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

在党和红军游击队公开活动的地方,村有赤卫队,区有游击小

组。到1934年10月中旬,赤卫队的组织在神木有5000余人,佳县、吴堡各千余人,绥德300余人,清涧5000余人,安定、横山西区、安塞、靖边共3000余人,多半有土炮、土枪、长矛、大刀等武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肃清反革命,配合游击队作战。为了解决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缺乏武器的问题,一些县、乡建有地下兵工厂,生产枪支弹药。

第二节 根据地的政权、经济和文化建设

一 政权建设

1933年2月15日,赴西安和北平向中共陕西省委、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的陕北代表团在《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陕北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游击运动和扩大游击队,创造陕北新的苏维埃区域”^①。7月,陕北特委高起家板扩大会议提出,在条件比较成熟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从建立县级政权开始,然后建立全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共陕北特委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颁发了县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要求根据地各县参照执行。按照条例规定,先在各县县委领导下成立筹备委员会,由筹委会确定党、团、游击队、群众组织代表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中的人数,再由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工农民主政府。从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陕北根据地先后有九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

1934年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在洞峪岔景家河村成立,刘光显任主席。11月下旬,安定县改名赤源县,在龙嘴子河村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赤源县苏维埃政府,薛兰斌任主席,康润民任副主席,下辖安定西北二区、横山石湾一区、靖边东区等10个区苏维埃政府。

9月12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在鹿儿原村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产生,白世杰任主席,王文随任副主席,下辖7个区苏维埃政府,辖区东西50余公里,南北90多公里。

9月18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在王家庄成立,11月7日改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均由呼子威任主席,王恩惠任副主席,辖区北至府谷约15公里,南至佳县约25公里,西至榆林界,东至黄河距佳县约40公里,下辖6个区苏维埃政府。

1934年9月下旬至1935年初,陕北根据地又相继建立了佳县、吴堡县、绥德县、赤光(延川)县、延水县和秀延县六个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各县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粮食、经济、军事、肃反、文化教育、劳动委员会及秘书长。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政府后,各委员会及其负责人均改称部和部长,分别主持开展县内各方面的工作。

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到会代表100多人,会期3天,正式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惠子明,土地部部长辛兰亭,粮食部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部长祁明珍,裁判部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部长陈蓬飞,保卫局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大会通过了《陕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陕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令。

随着各县党组织、工农民主政权的恢复和建立,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也都相应建立,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共青团陕北特委自1928年4月成立以来,虽曾遭到破坏,但一直坚持了下来。各县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绥德、清涧、佳县、吴

堡、神木、府谷等县都建立健全或恢复了团县委,一些区、乡也建立了团的组织。团组织的工作主要是:整顿和发展团的组织,宣传群众,为党组织培养和输送干部,尤其是在动员广大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共青团领导赤少队和儿童团,教少年儿童学文化,组织他们承担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传递情报等工作。

在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前,贫农会既管地方的民事,又负责游击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起到了地方政府的作用。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贫农会主要是在党组织和政府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实施土地分配工作。贫农会的组织主要在乡、村,但是少数区、县也成立了贫农会。

妇女会主要设在乡、村,区、县的妇女联合会是个别的。妇女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斗争,为红军游击队做鞋袜、缝补衣服、护理伤病员,有时还送信、放哨、侦察敌情。在“扩红”运动中,妇女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宣传、教育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扩大红军游击队。1934年6月,清涧县高杰村白振纪烈士的遗属刘景如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带领本村九名姑娘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共陕北特委和清涧县委的领导下,妇女会大胆开展工作,走乡串户,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帮助妇女剪短发、放脚,组织妇女给红军缝衣做鞋,护理伤病员,受到群众的称赞。

二 土地分配

1934年5月,陕北红军游击队与苏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提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应该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依照劳动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红军战士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

“地主不能在任何名义之下分得土地”^①。当年,清涧县的部分区、乡开展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工作。由于当时不懂如何具体分配土地,加之又值春耕,有的便以村为单位,依靠贫农会集体耕种。白家川等少数村庄出现了集体吃饭的现象,影响了群众的利益和积极性。

8月,中共陕北特委寺塬里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分配土地的问题。9月11日,中共陕北特委在《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中再次重申,“土地委员会立即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分配土地。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地主不能在任何名义之下分得土地。在中国的富农有特殊的情形,多半兼高利贷的剥削者,应该把他的土地完全没收。给他分配坏的土地,以让他自己耕种为条件。”^②特委总结了清涧部分区乡土地分配的经验教训之后,由郭洪涛、马明方到清涧袁家沟、圪刺孤村和安定王家湾村进行分配土地的试点工作。圪刺孤村、王家湾村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第一,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第二,中农土地不动;第三,红军、贫雇农分好地;第四,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第五,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第六,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到以后成家)。通过以上试点,陕北特委举办了分配土地训练班,培养骨干,带动了整个陕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11月19日,党、团特委在给各级党委、团委及红军游击队政治员的信中,再次要求“立即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劳苦人民,反对因白匪‘围剿’而放弃或延迟分配土地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的执行”^①。

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地方党组织、政府土地委员会通过贫农会把雇农、佃农、贫农和可靠的群众组织起来,以一个村或几个毗邻村为分地单位,划分阶级成分,丈量土地,划分土地等级(分上地、中地、下地、荒坡地),登记有权利分配土地的人口(分壮年、青少年、妇女、儿童、老年人),然后根据分配土地的政策进行分配,并张榜公布分配方案,最后以颁发土地证的办法把土地分配到户。

从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土地分配工作在赤源、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秀延、神木等县普遍展开。虽然分地过程中也执行了“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等“左”的政策,但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它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田租、赋税等负担,特别是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进而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34年10月1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报告中写道,“最近苏区的劳苦群众参加分配土地的斗争异常热烈。这些群众的斗争形势直接的普遍的开展了陕北的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红军与白匪作战时,经常有几百几千的农民武装配合,游击队、红军不论需要多少农民配合,随时就可以号召来,甚至农民一听见枪声自动的跑来帮助红军作战,这一顺利的客观形势直接地创造了陕北新红军与苏区。”^②

三 经济和文化建设

陕北革命根据地从开始创建就遭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战时经济。各级政府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没收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粮食、财物,还有一部分是开明绅士、地主、富农的捐献。在群众中还组织有“互济会”,筹集一些自用经费,或给红军、游击队作军需,或用于受灾的群众和红军家属。

土地分配后,农民除缴纳公粮外,再没有任何捐税负担。大多数村庄都有红军公田,收获的粮食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烈属,一部分供给往来红军食用。红军家属无劳力的,由村贫农会组织人员代耕,先种先锄先收;为革命而残废了的红军战士由全村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年迈孤独的贫雇农,在分土豪劣绅财物时给予重点照顾。

由于长期处在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和轮番“围剿”之中,苏区的布匹、火柴、食盐等日用品极为紧张,医药用品更是短缺。苏区政府支持开明地主和商贩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进行商贸活动,同时组织群众“赶脚”,搞长途贩运,既活跃了苏区经济,又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大革命时期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在苏区初创阶段,党组织曾派大批党团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兴办小学和农民夜校,普及文化教育,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工作。苏区政权建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干部每到一地,办黑板报,刻油印传单,书写标语,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文艺工作者借用陕北民歌的形式,创作了《刘志丹》、《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大量革命歌曲,歌颂红军,歌颂土地革命,深受苏区群众的喜爱。同时,各县苏维埃政府很注意抓文化教育工作,创办列宁小学,编写新课本。各乡、村普遍建立了农民夜校和识字班,不少投身革命的工农干部接受专门的文化教育后,短期内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陕北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社会教育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 粉碎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的“围剿”

陕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迅速发展,革命政权的纷纷建立,红色割据局面的不断形成,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惊恐和不安,他们对根据地连续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

1934年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所部第八十六师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用1.5万余人的兵力,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国民党军在绥、清中心地区的清涧县城、高杰村、河口、店则沟等地驻扎重兵,修筑寨堡,建立据点,组织保甲,破坏赤色村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地方游击队虽奋勇抵抗,但由于缺乏统一部署和指挥,兵力分散,加之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以致反“围剿”斗争遭受重大损失,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敌人杀害。

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面前,中共陕北特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加强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集中力量,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保卫根据地。

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乡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总指挥部以红一、二、五支队为主力,在200多名赤卫队员配合下,向安定县城发起进攻。17日,攻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释放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人。安定城战斗胜利后,谢子长率部南下陕甘边,以取得红二十六军的帮助和支持。25日,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两军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转战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

8月15日,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约300余人)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返回陕北根据地。17日,首战安定县景武家塬。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南北夹攻,毙国民党军30多人,俘80多人,缴长短枪100余支。

景武家塬大捷后,红军挥戈东进,经过南沟岔、老君殿,于22日到达绥德县张家圪台。国民党军驻店子沟一个排扑来,被红军全歼,同时击溃从薛家窑来援之敌。红军乘胜向东南前进,经下武林、白家川,直逼驻清涧县东南河口镇的国民党军。

8月26日深夜,红军冒雨从袁家沟出发。27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三团担任主攻任务,从山顶直扑国民党军。陕北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国民党军的东逃之路,从东西两面夹击。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慌忙退至碉堡和村边工事里,凭坚固守。红军虽然多次进攻,但终未奏效。谢子长亲自到前沿阵地查看,被敌军从碉堡中射出的子弹击中胸部。经过一天激战,红军主动撤退。国民党军东渡黄河,绕道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解放。随后,红军北上攻打横山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

经过景武家塬、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等战斗,红军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拔掉国民党军据点3个,击毙国民党军200余人,俘100余人,缴获步枪160余支。与此同时,在神府、佳吴地区活动的红三、四、六等支队,也积极寻机作战,打击国民党军,加之国民党军不断哗变,也削弱了力量。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粉碎。

二 抗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的“围剿”

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驻防豫西的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到陕北,配合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围剿”陕北红军。

12月23日,第八十四师抵达绥德,以绥德、吴堡、清涧、安定四县为重心,部署兵力;四九九团担任绥德至宋家川镇的东路交通维

护任务；五〇〇团担任绥德东北区及南区的“进剿”；五〇一团、五〇二团一个营担任清涧、安边“进剿”；五〇二团两个营担任绥德西川及安边边境的“进剿”。1935年1月，蒋介石又令第八十四师担负延安、延川、延长、安塞四县的“围剿”任务，八十四师遂将驻防绥德西川的五〇二团两营调防定边、靖边，五〇〇团一个营接防绥德西川，五〇〇团另一部赴绥德北区、西区。同时，第八十四师师部及各团、营均举办所谓“感化院”，派“训练员”到乡村编查户口，编练保甲组织和“铲共义勇队”，屠杀苏区群众。榆林行政专员杭毅到清涧“视察”，仅在县城外一次就枪杀30人。

由于第八十四师四个团的兵力驻防11个县，故重要城镇仅能驻兵一排至一连，其中尚有重要村镇未能配置兵力，红军主力不时袭击第八十四师。2月1日，陕北红军袭击安定县南沟岔国民党军一个连，歼灭一个排。2月13日，红军在清涧县东区川口镇阎王砭夜袭五〇一团一个连，歼灭一个排，击毙排长。同时，在红军的影响下，第八十四师四九九团第三营第七连驻慕家原的一个排、第三营机枪连驻石堆山的一个排，枪杀排长，携枪哗变。

经过此次失败，第八十四师仍以连为单位分驻各县要隘，并抽调五〇〇团的两个营组成游击队，向安定边界“进剿”。陕北红军及游击队则在不断获胜的信心鼓舞下愈战愈勇，士气越来越高。

三 红二十七军在战斗中成立

1934年7月，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战斗中，为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共陕北特委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9月，总指挥部撤销，组建了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193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中共陕北特委将红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朱子休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沙晋年，政治委员马佩勋；第二团团长沙玉人，政治委员马万里；第三团团长沙尧相，政

治委员杨文藻。①《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到1935年2月，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安定、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秀延、延水九个苏维埃政权，形成了神（木）府（谷）和绥（德）清（涧）两块苏区。神府苏区包括神木、府谷县的大部，佳县和榆林接合部的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县的大部，靖边、安塞、米脂县的东部，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见《陕西革命史》。

第十一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建立

第一节 陕南苏区建立

一 红四方面军入陕，陕南苏区建立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0余万大军，对包括鄂豫皖在内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10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转战湖北郧县南化塘，准备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到达南化塘的第三天，国民党军尾追而来，红四方面军遂放弃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征，欲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

11月5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从商南县赵川区三官庙乡河坪村入陕，在白鲁础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后经山阳县碾子坪、任岭、商县夜村、杨家斜，于20日抵达柞水县红岩寺作短暂休整。

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中共陕西省委于11月21日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宣言》，号召全陕一切劳苦群众，在工厂里、在兵营里、在学校里，全体动员起来，工人罢工，不替国民党制造一枪一弹；农民武装起来攻击白军，围剿民团，不缴租，不纳税；知识分子罢课，罢教；国民党军士兵哗变，带枪械投到红军中去。

11月24日，红四方面军北出秦岭，相继抵达蓝田县汤峪，长安县库峪、太乙镇、子午镇、王曲，户县庞光、焦杨、化羊，周至县马召镇等地，重创国民党陕军一个团，并在中共地方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的斗争。红军在西安近郊的军事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和人民。12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连续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告士兵警察书》、《欢

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士兵斗争纲领》两个文件，号召国民党军队士兵和警察举行兵变，反对开往前线进攻红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行动。

12月3日，红四方面军从周至县辛口峪进入秦岭，向汉中地区进发。其时已届严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红军将士，昼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夜宿于雪地密林之中，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连翻9座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高山，于9日抵达城固县小河口镇。此时，中共城固县委派出的张仁俊等已先期到达，专此等候。根据中共地方组织提供的情报，红军突然走出秦岭，在城固县升仙村、许家庙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团，进入汉中川道。

红四方面军进兵陕南，人民欢欣鼓舞，沿途送茶水，抬担架，运粮草，纷纷支援红军。后来，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泪水给我们洗脚、上药。到了这时，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

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固后，根据中共陕南特委、城固县委的汇报和调查研究，了解到汉中地区连年受灾歉收，屡遭兵匪蹂躏，群众生活贫苦，筹集全军粮食困难等情况，同时又因汉中盆地回旋余地较小，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国民党军实力也较强，而此时，四川的各派地方军阀正在成都混战，川北防务空虚，川陕边的大巴山区又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遂决定放弃在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全军人川。

12月11日夜，红四方面军徒涉汉江。为保证红军安全渡江，城固县桃花店中共支部组织数百名熟悉渡口及水情的党员和群众，护送红军将士涉水，大大减少了红军渡江中的损失。渡江后，红四方面军在城固县上元观和西乡县延水、私渡河一带作短暂休整，19日，全军人川。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连克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城。12月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县城宣告成立,邝继勋任主席。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了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为主席。为了创立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进行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相继建立了近3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其管辖区域,东起川北城口县城近郊,西抵嘉陵江畔,南起川北营山、渠县,北至陕南镇巴、西乡、南郑、宁强、勉县,总面积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其中在陕南建立了5个县苏维埃政权,包括治所在川北的两个县所管辖的陕南区域,陕南苏区先后下辖22个区、镇,95个乡,320个村。

在22个区、镇中,有1个区(下辖3个乡、14村)直属川陕省领导;21个区、镇,92个乡,306个村分别属于川北的赤北、红江和陕南苏区的陕南、宁强、阳平、勉县、南郑7个县领导。

1935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在陕南战役中设立了汉中道委,任命张德生为道委宣传部部长。全区共成立县委3个、区委6个、乡支部10个。政权组织,县、区、乡、村均成立有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

陕南苏区的中共组织和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机构比较健全,县委设有书记、秘书和组织、宣传、妇女等部,设有少共县委、妇女委员会、贫农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区委一般由书记及组织、宣传等若干委员组成,也设有少共区委、妇女委员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按照《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县级苏维埃政府一般由主席及若干委员组成,并设有军事指挥、财政、经济、交通、土地、粮食、内务、劳工、文化教育等部、委、局以及保卫局、革命法庭等机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一般设主席和分管土地、粮食、劳工、内务、经济、文教等项工作的委员。

陕南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虽然多数建立较晚,且存在的时间也较短,但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红四方面军的支持下,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二 保卫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

陕南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县、区和绝大部分乡村都建立了游击队、赤卫军、童子团。全苏区先后组建游击队 164 支,有 7000 多人。各级地方武装除配合红军作战外,主要是镇压反革命,清剿土匪,保卫苏区人民群众安全从事生产。1933 年 1 月 21 日,红江县坝溪区的民团头子朱有守、赵天节纠集数十名匪徒,以“庆祝”程家坝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为名,闯进乡苏维埃政府,捣毁机关,杀害八名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红军小分队立刻组织区、乡游击队击溃了这帮匪徒,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赤北县长坪区核桃乡苏维埃政府 1933 年 2 月成立后,开展了 4 次剿匪斗争,捉拿土匪 14 人。2 月至 5 月期间,赤北县筒池区游击队和窑罐厂乡游击队联合作战,连续 4 次清剿民团和土匪,先后毙伤团丁、土匪 100 余人,缴获 30 余支步枪和一批弹药。1934 年 11 月 8 日凌晨,中共陕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青鹤观被镇巴县民团包围,县委书记潘天成指挥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同千余名国民党地方驻军和民团激战一天,青鹤观失守,中共陕南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文先和赤化区委书记陈忠瑞牺牲。红军闻讯驰援,组织县、区游击队反击,接连获胜,保卫了陕南县的大部分苏区。1935 年 2 月红军撤离镇巴,陕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又组成陕南工作队,随军踏上新的征程。

三 战地支前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和陕南进行了几次战役,陕南苏区党组织

和苏维埃政府每次都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救护伤员、运送物资、缝补、洗衣,在支前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中共勉县县委书记殷锐多次召开各支部负责人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动员起来,组织群众做好支前拥军工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芝林兼任供给站主任,筹措粮食 5 万多斤、肥猪 30 多头,慰劳红军。各地群众也主动给红军送粮食、酒肉、草鞋、毛巾,一片军民鱼水情。苏区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力量。据汉中地区有关县的不完全调查统计,陕南苏区共有 4374 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扩红”中党员带头,群众争相报名,地方武装人员一批接一批集体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子、夫妻、兄弟以至全家几代人同时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中共宁强县委书记袁鸿化、勉县县委书记殷锐带领一批青年参军。宁强县烈金坝乡共产党员陈锦章全家三代 10 口人,高家坝乡游击队队长黄有姓全家 5 口人同时参加了红军。南郑县的 1800 余名地方武装人员中,有 1400 多人集体参加了红军。仅红三十军,就在陕南战役中扩充了 1600 余人。

四 土地分配与经济工作

陕南山区的大部分农民长期以租种地主田地或出卖劳力为生,一经解放,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强烈要求分配土地。根据群众的要求,陕南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首先组织群众控诉土豪劣绅的罪行,公开处决罪大恶极者,而后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物。这方面,全区的做法不尽相同。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早的陕南县和长滩、楼房坪、简池、坝溪区,一般是既没收、分配土地又没收、分配财物。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晚、存在时间较短的宁强、阳平、勉县和南郑县,一般只是没收、分配财物,未来得及没收、分配土地。没收、分配土地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是谁佃种分给谁,只将其超过部分(按乡、村人均占有土地量计算)抽出,分配给其他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有的地方以乡或村为单位,平

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也有极少数地方,按照乡、村人口平均分配。据汉中地区有关县的不完全统计,陕南苏区共没收分配土地 5.1 万亩、粮食 1.456 万斤。长滩区长滩乡的 210 户贫苦农民共分得土地 975 亩,户均 4.6 亩。赤化区宝山子乡钟家岭村 78% 的农户分得了土地,毛埡乡化吉沟村的 40 多户农民分得粮食 3 万余斤。宁强县 8 个乡部分村共没收地主房屋 306 间,分配给 91 户无房的农民。分得胜利果实的农民喜气洋洋,生产积极性倍增。坝溪区碑坝乡焦岩溪村共有 78 户,1933 年分配土地前全村粮食总产量为 8 万多斤,分配土地后连续两年丰收,每年的粮食总产量均在 16 万斤上下。

中共简池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工人委员会,专门组织集镇和乡村的木匠、石匠、瓦匠、篾匠等小手工业者,生产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红江县坝溪区苏维埃政府接收大恶霸蒲大华濒临倒闭的铎厂,组织工人恢复生产,日产铎 24 尖,支援农业生产。红江县苏维埃政府在坝溪区芭蕉坪兴办的工农纸厂,日产纸 1.2 担(约 2400 张)。宁强县苏维埃政府及时派出干部,进驻全省有名的保惠火柴厂,宣传党的政策,由政府拨出专粮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很快恢复了生产。宁强县、阳平县的多数区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和农村集镇兴办经济公社、工农合作社、工农饭店等公营企业,经营日用杂货、中药材和熟食品,有的工农合作社还设有药铺和坐堂医生,方便群众看病购药,很受群众欢迎。苏区小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公营企业的兴办,对于克服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方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节 中共陕南特委为巩固陕南苏区而斗争

一 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1932 年 12 月 20 日,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创建革命根据

地的第二天,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同日,中共陕南特委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提出:创造汉南新苏区的任务提到了汉南党的面前,必须坚决领导群众抗捐税、反对差役委员、反对豪绅地主,动员雇农、贫农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土地,游击队积极解除豪绅地主武装,组织攻击国民党军小部队,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夺取敌人粮秣,配合红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发动群众在西乡、城固、洋县、褒城、南郑、勉县、宁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

1933年3月,中共陕南特委决定建立城(固)洋(县)西(乡)、洋(县)华(阳)宁(陕)、城(固)南(郑)褒(城)、南(郑)褒(城)勉(县)四个边区的苏维埃政权,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建立边区政权的过程中积极发展游击战争。这些边区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未完全建立起来,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群众经常在夜间袭击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没收其财物,并以红军和游击队的名义发传单、贴布告,宣布他们的罪状。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卫团(中共党员张汉民任团长)中的中共组织根据陕南特委的指示,将分散在宁强、勉县等地的八九十名游击队员集中在勉县整训,配给长枪60多支,命名为勉县垦荒游击队,开往黎坪,解除了当地民团的武装。警卫团的党组织还派部队内的共产党员化装成农民,分成若干小分队,由地方党组织派人做向导,经常在夜间进行游击活动,既打击了土豪劣绅,又牵制了驻汉中的国民党中央军。对于反动地方官吏、民团头子和为非作歹的差役,他们则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公开予以处决。这些活动,使得国民党军和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

二 组建红二十九军

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之前,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的红二十

九军游击队就已经建立。红四方面军抵达川陕边后,中共陕南特委于1933年1月6日作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二十九军的决议》,要求陕南各级党组织利用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活动的有利形势,建立正式的红二十九军,创造新苏区。2月13日,红二十九军正式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任命陈浅伦为军长,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李艮为政治委员。红二十九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先后同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作战20余次,以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西乡马儿岩为中心,开辟了面积400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并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建立了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1.8万余亩,粮食1200多石。

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恐慌,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搞垮红二十九军和苏区。4月1日,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领导干部40多人在西乡县马儿岩开会,突然遭到率部叛变的原神团^①头子张正万包围,陈浅伦、李艮等被杀害。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又派出一批干部,恢复和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三、第十等几个游击大队,继续在西乡、城固、洋县、南郑、褒城、勉县边界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活跃在南郑西南区的第三大队处决了数十名土豪和民团头子,发动农民反摊派、反捐税,抗租、抗粮,分地主的粮食、庄粮,有力地配合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 领导发动安康起义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境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12月20日作出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群众的政治鼓动工作”,“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革命兵变”。1933年2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陕南特委的指示信中进一步指出:红四方面军的胜利给汉南国民党各部士兵极大的政治影响,使他们从实际

^① 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地方武装势力。

中了解到红军是劳苦群众的军队,从而加深了对长官的不满与仇恨,推进士兵哗变,要动员大批同志打入国民党军内部,在士兵中积极开展工作,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他们兵变。

安康地区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东部接壤,安康绥靖军是国民党在北线对川陕苏区实行包围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中共陕南特委指示安康军特支积极组织士兵举行暴动。

1934年2月22日,在中共安康军特支的领导下,国民党安康区绥靖军司令部所属的特务第三连、手检连和迫击炮营的部分官兵举行武装起义。当天上午,中共安康军特支召开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部署起义工作,决定当晚9时起义。迫击炮营第三连的共产党员詹屏藩去动员本连班长和连部司书参加起义,不料事泄,特务第三连在王泰诚和王辛德率领下,于下午6时提前起义,攻打安康区绥靖军司令部。由于绥靖军司令部已得知起义的消息,遂派补充团团长孙鹤年带部队前往镇压。特务第三连同补充团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终因双方力量悬殊,王泰诚、王辛德率起义人员撤出安康城,溯汉江西去。

由于提前三小时起义,迫使迫击炮营仓促应变。军特支军事委员袁作舟一面命令詹屏藩接应攻打司令部,一面率其他起义士兵撤出安康城。詹屏藩等13人被俘,詹屏藩当晚殉难。

迫击炮营和特务第三连的69名起义人员会合于西药王殿山下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政治委员,王泰诚任游击指挥。他们提出“打倒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建设汉江流域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带领部队向川陕根据地行进。3月中旬,部队在紫阳县毛坝营盘大梁遭到国民党地方民团的截击,王泰诚在战斗中牺牲,王辛德等40多人被俘,英勇就义。

安康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受第三次大破坏,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势下发动的,对于教育人民,鼓

舞革命斗志,特别是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斗争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 扩大红军之友社

红军之友社是在共青团组织领导下,以宣传工农红军、教育组织青年支援工农红军为主要任务的群众组织。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境后,中共陕南特委在1932年12月20日发出的紧急通知中,要求红军之友社“发起广大的为红军募捐的运动,组织红军慰劳队,宣传红军战斗消息,揭破敌人反宣传”^①。1933年4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在《红色五月宣传大纲》中提出,要在每个工厂、作坊、农村、兵营、学校里组织红军之友社,组织广大群众的募捐运动(一枚铜元、一粒子弹)来帮助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陕南红军之友社迅速发展壮大,社员人数最多时有500余人。他们运用公开或秘密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在群众中为红军募捐物资。汉中女子师范学校的红军之友社社员在汉中城内秘密散发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取得胜利的传单,并秘密募捐到鞋袜、红旗等不少物资。南郑西南区的红军之友社社员以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名义为红军募捐物资,一次上交铜钱200余串,鞋袜400余双,八音手枪1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卫团里的红军之友社社员以“子弹内的火药能治心痛病和烫伤火伤”为由,公开在官兵及其亲属中为红军收集子弹。有的红军之友社内还有游击小组,采取打土豪的办法为红军征集物资。红军之友社募集到的财物通过党、团组织秘密送到川陕边区,支援红军。

五 建立红色交通线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境后,蒋介石严令十七路军主力移师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陕南特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汉中,协同川军进攻川陕根据地,同时又调其嫡系胡宗南等部队进入陕甘,对非嫡系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实行“监军”,企图在地方部队与红军的互相攻杀中坐收渔利,既消灭红军,又剪除地方军事势力。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将胡宗南等部挤出陕甘,杨虎城经与高级参议杜斌丞商议,决定与红四方面军达成谅解,实现秘密合作。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特科也指示在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司令部任参谋的中共党员武志平,利用公开职务和社会关系,为中共组织收集川陕国民党军情报,并秘密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对外交通线。

1933年5月4日,杨虎城写信给武志平,让他“佐理”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努力工作”。本着杨虎城的意向,孙蔚如密派武志平为代表,持其亲笔致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的绥书,于5月13日从汉中出发,赴川北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对第十七路军此举极为重视,派川陕省委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代表,与武志平赴汉中,同孙蔚如进行谈判。经过数次商谈,双方于6月24日圆满达成以“互不侵犯,联合反蒋”为中心内容的秘密协议。同年10月初,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赴汉中,劝孙蔚如莫为流言所惑,不为蒋介石的威胁改变初衷,将与红四方面军的合作继续进行下去。

第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协议的达成,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川陕革命根据地北线出现了较为平稳的军事局面,从而使得红四方面军无后顾之忧,挥师南下,在川北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此情势下,中共陕南特委和十七路军中的中共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了三条通往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回军坝、羊圈关、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城固县的二里、天明寺,再经南郑县的法慈院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城固、西乡、镇巴边境进入川北苏区。为组织好各条交通线的运输工作,中共陕南特委在汉中城

内国民党邹职县长、民主人士李世英的公馆和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袁作波(中共地下党员)的公寓建立了两个交通站,负责集中物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川北苏区边界组织了物资转运站,负责接收转运物资。红色交通线不断将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大批军用物资送往川北苏区,有力地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

从1933年到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反“围攻”作战时,因诱敌深入,根据地两度缩小,红军退守到巴山南麓一带。红军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多数部队每天仅以少量的洋芋和玉米充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千方百计支援红军,数次派人向川北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在川陕地区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红军先后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頌尧、刘湘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扩大了根据地。红色交通线不仅负责运送军用物资和粮食,而且护送一大批领导干部和革命青年如潘自力、张德生、杨珊、白耀亭等到川北苏区参加革命斗争。红色交通线不仅是一条运输线,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曾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的张含辉,就是在为红四方面军总部送军事地图,从川北苏区返回汉中途中遇难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时间,但它在陕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后来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十二章 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

一 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鄂豫陕根据地建立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长征过程中创建的。它以今陕西省的商洛市为中心区域，包括湖北省的郧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洛南、商南、丹凤、商州、山阳、镇安、柞水、蓝田、长安、宁陕、佛坪、洋县、旬阳等县（区）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50万。

1932年11月21日，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贺龙和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率领下，红三军从鄂西北根据地进入陕西商洛山区，12月4日经旬阳县小河口进入湖北。红三军在陕西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为陕东南地区革命斗争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也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继续在苏区坚持斗争。

1934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制定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计划，妄图在三个月内将鄂豫皖红军全部消灭。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被压缩分割为几个小块，人口锐减，生产遭到破坏，鄂豫皖苏区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

9月，中共中央军委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11月11日，鄂

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根据中央2月指示信和6月、7月军事训令原则及程子华传达的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并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立即实行战略转移。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下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从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的何家冲出发,进入桐柏山区。经过20余天的艰苦转战,红二十五军长驱900公里,打垮了2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2月8日,红二十五军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洛南县境内的箭杆岭)入陕,在洛南县的鸡头关击溃当地民团,在三要司全歼国民党守军一个营,9日进驻庾家河镇。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在洛南庾家河^①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出席。会议认为,鄂豫陕边界地区是三省接合部,群众基础比较好,地理条件有利,适合创造新的根据地。会议作出《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创建新的苏区。决议草案提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截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②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任务,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会议正在进行时,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先头部队一个团抢占有利地形,向庾家河街发起进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迅

① 今属丹凤县。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鄂豫陕革命地的创立和发展》,第39页。

速赶到前哨阵地，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向军部报告。参加会议的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赶到前线，国民党军后续两个团也相继赶到，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斗中，徐海东、程子华先后负重伤，全体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殊死奋战。经过 20 多次的激烈战斗，红军毙伤国民党军 300 多人，迫使其向卢氏方向退去。红二十五军伤亡百余人，移至蔡川镇进行整编。庾家河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尾追，使红军站稳了脚跟，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和红色政权及革命思想，中共鄂豫陕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司令部的名义，先后印发了《什么是红军》、《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省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拥护红军、参加红军，组织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造成自己的苏维埃天下。

1935 年 1 月 9 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在陕西的镇安、山阳、旬阳和湖北的郧西等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伕、抗丁等斗争，摧毁了国民党基层保甲政权，在镇安、郧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2 月上旬，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等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2 月 19 日，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为郭述申（后为戴季英、郑位三），统一领导已创建的两块根据地。2 月下旬，红军开辟洋县华阳地区，建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和七个乡革命政权。4 月 18 日，红二十五军东进，攻克洛南县城，接着进至豫陕边的洛南、商县、商南、卢氏四县边界地区，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鄂陕和豫陕边的几个苏区连成一片。

二 根据地党政军组织的建立

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1934 年 12 月 10 日，庾家河会议改中

其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时,因战事紧急,未能确定新省委的组成人员,暂由原鄂豫皖省委成员代行新省委的职权。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蓝田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委成员,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才、田守尧十人为委员,徐宝珊任书记,吴焕先任副书记。以后又增加郑位三、郭述申、陈先瑞为省委委员。5月9日,徐宝珊病逝后,省委书记由吴焕先代理。

各级党组织建立。1934年12月,省委派手枪团政治委员宋兴国、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等四人率手枪团第二分队开展地方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宋兴国任特委书记,程启文任少共特委书记;1935年2月上旬,中共鄂陕特委成立,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任书记(后戴季英、郑位三继任)。5月11日,中共豫陕特委在庾家河宣布成立(实际是原商洛特委的继续),郑位三任书记(后为李隆贵)。省委和特委还先后领导组建了镇安、五星两个县委和宁(陕)佛(坪)周(至)工委、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

各级政权建立。1935年2月14日,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李明德(一说李贵),副主席阮士春、刘蔚瑶,政府驻地店子,下辖7个区、47个乡、104个村。4月上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成立,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下设供给部、保卫处、法庭等部门。4月中旬,五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田银斗,办事处设在红岩寺街,下辖袁家沟口、红岩寺、葛牌镇3个区、29个乡苏维埃政府;因其管辖镇安、柞水、山阳、商县、蓝田五县边界地区,故名。5月,山阳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成立,主席王义庆,后因形势发展不利,停止活动。

组建地方武装。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先后派团政治委员宋兴国、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领红军分队到豫陕边和鄂陕边组建地方武装。宋兴国组建的抗捐军失败后,二二三团副营长方升

香又带领第八连到豫陕边组建游击师。他们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并争取、团结和改造刀会组织,仅数月时间,地方武装就有了较大发展。在豫陕边先有陕南抗捐第一军,后有豫陕游击师所属第一、二、三、四大队。在鄂陕边,有鄂陕游击司令部所属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分散独立的还有华阳、茅坪等游击队以及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所属游击队、赤卫队等。这些地方武装,经常保持四五千人之多,最多时达万人,成为党领导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分配土地

鄂豫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基本上沿用了鄂豫皖根据地《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中的主要条款,结合鄂豫陕边的实际做了一些调整,主要包括:“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土地一律无偿地没收之”,“凡祠堂、庙宇、祖积、公积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一律没收”。分配土地的主要对象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及愿安家耕种的雇农、红军家属等。在分配土地前,各级苏维埃政府张贴布告,召开各种会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土地革命的意义,广泛发动群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当时,洋县华阳地区划分阶级成分时,流行这样的口诀:“无产阶级,空着两只手,什么都没有,专替人做活,才能糊住口;贫农:他还有点田,不够吃和穿,还卖劳动力,生活很艰难;中农:他不剥削人,人不剥削他,他受谁压迫?豪绅和军阀;富农:自己种有田,还有田出租,既放高利贷,又请人做工;地主豪绅:田地非常多,自己不耕作,收租又逼债,农民受剥削。”可见干部群众对划分阶级成分的熟悉程度。

根据省委的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严格掌握政策,使土地落实到贫苦农民的手里。其工作进程是:首先对所有被分配的土地进行丈量,造册登记,在掌握土地数量和人均数量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动(富豪户和少地户)方案,没收地主的土地,一般分给原佃耕户,按照原来的边界耕种。原佃

耕户佃耕地过多、超过标准的,调整给其他无地或少地户,并插标立记,标明户主姓名。本村地主的土地在外村的由外村分配,外村地主的土地在本村的由本村分配。在分配土地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根据地一时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治局面。

在根据地东部地区,龙驹寨、刘家花屋、梨园岔、孙家山、蔡川、庾家河等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在油坪沟、石灰窑、柏树坪、卢氏县的兰草、官坡、毛河等地打土豪 27 户,镇压了清油河恶霸保长李春州,没收了地主年收租 1355 石的土地,同时没收粮食 2.8 万斤,瓦房 14 间,衣物用具 2100 件,分给了 500 户贫苦农民。

在根据地北部地区,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镇压了联保主任鲍学义,没收分配了张志武等地主的粮食、棉花和钱财。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没收了廖维富、周军兴、张明礼等恶霸的土地 2755 亩,分给了 525 户无地农民,没收粮食 90 万斤,肥猪 85 头,腊肉 2000 斤,大部分给了贫苦农民。

在根据地南部地区,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所辖的县、区、乡进行了均田工作。镇安县苏维埃政府派人到神园子、花水河等地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领导均地运动;在二里湾、花水河、神园子村,没收蒋邦昌等 6 户地主及黑龙庙庙地 420 亩,分给 35 户贫雇农;没收房屋 37 间,分给 39 户无房群众。郧西县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庙川一带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粮食和其他实物,仅一、二、三天门就有 1000 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旬阳县的农民没收、分配了 66 户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衣物。袁家沟口区 304 户佃农和无地、少地的农户分得了土地。镇安县西沟河区江西村将没收的 80 亩地仍分给原租种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书。西沟河的 6 个村共没收地主土地 2700 亩,分给了 470 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西沟村将没收的

500 亩旱地和水田,分给附近的红军家属。

在根据地西部地区,洋县华阳革命委员会提出了“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打土豪,有饭吃”的口号,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华阳革命委员会在 7 个乡没收冯登才、黄元庆等恶霸地主土地 3200 亩,分给了 1200 户农民;没收粮食 600 石,分给 200 户无粮的农民。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更加热爱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支援红军。当地流传的歌词“腊月梅花开,建立苏维埃,地主豪绅垮了台,穷人搬回来”,就是对翻身农民心情的写照。

四 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根据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革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破坏,也来自根据地内部的分化和工作人员的蜕变等因素。如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流寇思想日渐暴露,不愿受严格的革命纪律约束,对游击师工作置之不理,并将没收的土豪浮财据为己有,甚至与共产党为敌。1935 年 6 月中旬,师政治委员李洪章率部回山阳县合河乡天坑梁休整,军粮无着,阮开科不但避而不见,而且对李洪章怀恨在心。随后,阮开科经密谋策划,调开副师长朱国发,密派心腹吴高亮、宋本善等六人,以商议军机大事为由,到大亚岭找李洪章,将其枪杀,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两个政治指导员。6 月 20 日,阮开科又带亲信到合河乡,打死与李洪章同时派到第九路游击师的红军老战士吴茂林、农会主席刘尚明等人。

还有个别苏维埃政权领导干部目光短浅,小农经济意识严重,在得到一定的权力和实际利益后,便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他们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多吃多占,贪污财物,腐

化堕落,奸污妇女,给新兴的工农政权造成极坏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为纯洁革命队伍,保证土地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和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进行肃反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中共鄂豫陕省委在193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一次执委会上就指出,敌人的进攻不单是军事力量,他们还要设法打入苏区和红军游击队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加紧肃反是粉碎敌人从内部瓦解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惩治腐败、清除蜕变分子方面,鄂豫陕苏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严肃审慎的态度,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果断处理蜕化变质分子。如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土地委员姚启才掌握权力后,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奸污妇女,作恶多端,民愤极大,中共豫陕特委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处决了姚启才。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法庭及各县、区苏维埃政府也分别处决和撤换了部分腐化堕落的乡、村苏维埃政府及赤卫队的领导干部。

但是,在惩治腐败、纯洁队伍的同时,也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叛变后,省委和红军中一些人误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将其他几路素质较好、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游击师领导人错杀。阮开科叛变后,给第五路游击师师长毛仪彬写了一封策反信,故意送到一名红军战士手里。红军进行肃反时,在镇安县西沟河将毛仪彬及第一团团长李春秀、第三团团长解吉三、第五团团长谢世成、第五团第五连连长谢发昌逮捕错杀。

8月初,国民党镇安县仁和乡乡长吴昭启以阮开科的名义,给第七路游击师师长阮仕春写了一封策反信,有意转交给鄂陕游击司令部工作队队长余德心(余占才)。鄂陕游击司令部以开会名义,派余德心把阮仕春和师特务队队长阮英元从其活动区郧西县大新川调回小新川,错杀于小新川石梯子。

这次“肃反”扩大化给鄂豫陕苏区武装力量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五 红二十五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国民党先后调集豫鄂陕地区 30 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堵截和追剿,企图在红二十五军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于商洛山区。

1935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军对鄂豫陕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采取大步进退的战术,于 2 月 1 日在柞水县蔡玉窑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一个团予以突然反击,歼灭一个营,击溃两个营。5 日,红二十五军又在蓝田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猛烈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歼灭两个多营,余敌慌忙溃退。经过这两次战斗,国民党军一时不敢再进犯。

2 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自郧西地区急速西进,途中先克宁陕县城,全歼县保安队,据城三日;后克佛坪县城,全歼县保安团。3 月 10 日,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华阳镇石塔寺伏击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击溃 5 个多营,毙伤旅长张飞生以下 200 余人,俘团长以下 4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500 余支。4 月 9 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误将与其有联系的、由中共组织掌握的陕西警备第三旅大部歼灭,将被俘的旅长张汉民等 30 余名共产党员错杀,造成了很坏的影响。^①4 月 18 日,红军攻克洛南县城,救出被关押的“抗捐犯”70 多人。

4 月下旬,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妄图在三个月内将红军消灭。中共鄂豫陕省委进一步加强红二十五军的建设,积极进行备战,作出反“围剿”作战的方针政策,同时决定各游击师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

^① 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张汉民等人为革命烈士。

五军主力部队采用“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6月初，各路国民党军分别向根据地开进。红二十五军主力由郧西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4日夜在商县以南与国民党军激战，毙伤国民党军团长以下200余人，缴枪100余支。战后，红军继续北上，继而向东到庾家河地区。6月10日，红军在各路敌军的密集包围中掉头向东南疾进，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攻占富水关和青水街，俘国民党军营长以下170多人。随后，红军远程奔袭，攻占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和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师补给站荆紫关，歼国民党军一个多连，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时，国民党军向荆紫关蜂拥而来，但官兵疲惫，大量减员，苏区内地方武装乘机在各地袭扰国民党军。红军主力则于25日迂回到山阳县以北的小河口地区，稍事休整后，又后撤到袁家沟口和桃园岭一带设伏。7月2日，红二十五军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毙伤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还击溃、歼灭了一大批地方民团，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

六 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到陕北

袁家沟口战斗获胜后，为了把敌人调出根据地，在外线寻机歼敌，扩大政治影响，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三个大队乘胜东进，佯攻商县。7月12日，红二十五军从商县杨家斜北出秦岭，前锋抵达距西安城南十余公里的长安县杜曲、韦曲一带，威逼西安。

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石健民给鄂豫陕省委送来了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带来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会师于川西，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省委在长安县洋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到西北苏区，与西北红军会合，巩固

西北苏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并决定留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洋峪口出发。7月22日第二次攻破佛坪县城。25日和30日,省委两次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领导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组建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成为一个师,开展游击战争,开展苏维埃运动,巩固与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8月初,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国民党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的压力。8月21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泾川王母山原战斗中牺牲,省委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受到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胜利完成了长征,成为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

第二节 中共鄂豫陕特委坚持在鄂豫陕边的斗争

一 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成立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十分危险、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当国民党当局判明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后,调集了20多个团的兵力,实行“划区清剿”,企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根据地的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中共鄂豫陕省委7月25日和30日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鄂陕、豫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落入敌手,致使两特委和省委中断了联系;同时,两个特

委之间也失去了联系,斗争极端困难。

1935年8月底至9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分别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陇东的消息。为了保存力量,避免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两特委相互靠拢,9月9日会合于商南县的梁家坟。在此,两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堤等。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认为在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形势下,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群众基础好,地方反动势力较弱,地理条件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两特委有半年多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社情、民情、地形较熟悉,有近300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是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的。会议统一了认识,坚定了在鄂豫陕根据地继续斗争的信心。会议决定,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宁陕、佛坪边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根据地;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堤为常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合编各路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

梁家坟会议后,中共鄂豫陕特委的主要成员分头在鄂陕、豫陕边收拢武装力量和伤病员。10月6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骡子坪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治委员,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堤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营、第二营、手枪团、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全师约700人。

梁家坟联席会议是在两特委与省委联系中断、国民党大军压境、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作出的成立鄂豫陕特委、组建红七十四师等决定,既符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鄂豫陕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统一了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为在鄂豫陕边长期坚持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

可靠的组织保证。

二 巩固苏维埃政权

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后,根据地内的斗争形势暂时陷入了低潮。在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的同时,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纷纷反攻倒算,一些逃亡的地主恶霸和反动地方武装头子也卷土重来。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级苏维埃政府立足本地,坚持斗争,各自为战,积极领导人民群众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在危险的处境中,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苏维埃干部不屈不挠,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坚持苏维埃政权。

在北部地区,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民团相互勾结,向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发起进攻。叛徒赵九海杀害了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治委员李志英,抢走省委文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在秦岭山区继续领导武装斗争。1936年1月,田银斗带领的游击队在柞水县丰北河遭国民党军阻击,他和游击队队长黄照明各率一部分游击队员突出重围。黄照明等在蓝田县汤峪岭浴血奋战,全队覆没。田银斗带领数十名家乡子弟兵继续坚持战斗,同年2月,在甘家坪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中部和南部,“鄂陕边铲共义勇队”纠集地方民团数千人,配合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对鄂陕边的郧西县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进行血腥报复。期间,很多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抗捐队员及其亲属惨遭杀害。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世让全家16口,11人遭敌残杀。国民党军的淫威没有使二天门区人民屈服,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出没于郧西一、二、三天门和陕西山阳、镇安、旬阳边界的广大地区,打击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

镇安县西沟河区苏维埃政府是第七路游击师组建的。1935年冬,红七十四师转战到西沟河,区苏维埃政府配合红军打击当地的

反动势力,分配的土地仍掌握在农民手中。1936年7月,国民党保长带人先后杀害了均地委员丁宪田、丁宪富、齐和平、虞真易、朱诗和游击师队长李学清及红军家属李学前、虞胜祥。

在东部,商南县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遭到进攻,土地委员余从海、郑老二、姚胜亮被活活打死,游击队长李邦正全家被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石常安和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占魁联合豫陕游击师第四大队李春银中队和豫陕游击师直属赤卫军李高升部,连同各地苏维埃政府干部和赤卫队员共180多人,整编为赤卫军游击中队,李春银任队长,继续活动在豫陕边境的深山密林中。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战斗中,李春银英勇牺牲。石常安带领幸存下来的10余人,坚持在七盘磨一带活动,并把各地零星的苏维埃政府干部和赤卫军游击队20多人收拢在一起,整编为赤卫军游击小分队,由石常安、王占魁率领,坚持在七盘磨、琉璃庙、官坡、毛河一带打游击,长达半年之久,保卫贫苦农民分得的土地,保卫苏维埃政权。

三 调整政策

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实际斗争需要,对土地革命中的一些政策做了调整。

1935年12月中旬,宁佛工委和宁陕土地委员会成立后,领导根据地西部地区人民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在5天内共没收地主土地200亩,分给了47户农民,同时也给地主分了一份田,开始纠正过去土地政策上一些“左”的做法。

1936年3月,中共鄂豫陕特委接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有关文件后,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举行会议,学习中央文件,讨论贯彻执行中央新的政策问题。此后,中共鄂豫陕特委和七十四师开始注意改变政策,在根据地的一些方针和具体做法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不再没收、分配地主的田地,打土豪

也只是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在对极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重点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他们解决部队粮草和伤病员的治疗休养等问题,同时,团结他们共同反蒋抗日。在商南县小栗园附近,红军战士抓了个名叫石老八的财主,同时还抓了石家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那位三和陈先瑞听说后,批评了这位战士,并安排警卫连负责照顾好小孩的生活和安全,又对石老八表示道歉。在行军途中,那位三与石老八走在一起,对其讲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一路上,石老八亲眼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深受教育,提出要为抗日出力,回去后为红军筹办物资。回家不久,石老八就派人挑着棉花、布匹、药品等,跋山涉水送给了红军。此事在当地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许多豪绅都自愿为红军捐款筹粮,红军不再没收、分配他们的财产,对待被俘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经过进行反蒋抗日的教育后一律释放。

当时,活动在长安、柞水、宁陕一带的宋登贤神团是一支抗捐、抗税和反对土匪的农民武装。后来,宋登贤被红七十四师宁佛独立团误抓。在查明情况后,团政治部主任刘奎挺即向宋登贤赔礼道歉,赞同他参加革命的要求,并发给他活动经费。宋登贤在西安、长安、周至、户县、蓝田、临潼等地组织起 400 多人的武装,对外仍称“神团”。他们一面生产,一面在东江口、沙沟、旬阳坝一带打土匪,在长安、柞水的大峪、小峪、石砭峪、天子峪、津峪一带维护治安,受到群众的称赞。后来,宋登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红七十四师补充团团长。

为了进一步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特委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只没收其剥削部分的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对家庭富裕、民愤不大的反动头目只处以罚款。旬阳县圣驾乡团总李阴汉,年收租 300 多石,由于他平时对待百姓比较宽容,没有大的恶迹和民愤,因而只罚交银元 1000 元了事。宁陕县两河

口区区长宋承义等能配合红军活动,区苏维埃政府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特委还实行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营活动,保护城镇商业的政策。红七十四师多次到过旬阳县通往西安的潘家河街,每次都勉励街上做小买卖的做好生意,教育区乡干部保护商业经营,保障供需,促进社会稳定。

红七十四师攻占龙驹寨后,在邮局门上张贴布告,指出邮局“不是财东”,“不准乱动”其财产,对于截获的邮件,除没收国民党政府及反动官吏的函件外,其余一律发还给投递员,允许邮务人员在根据地内自由投递。由于红军保护邮务人员,邮务员知道红军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常将国民党政府的公文和反动官吏的书信主动送给红军,红军则报之以高额酬谢。这种做法使红军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也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的通信自由。

鄂豫陕特委还很注意保护学校,不干预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尊重教师,不没收学校的来往函件等。

上述斗争策略的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对于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根据地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从1935年10月起,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红七十四师在苏区内驰骋奔袭,坚持斗争。

11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鄂陕边扑来。为摆脱敌人的进攻,红七十四师经郧西县二天门一带向宁陕、佛坪一带挺进。12月初,红七十四师抵达镇安县青桐关时,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个营已先期到达青桐关,企图阻止红军西进,另一个营紧随其后。特委决定趁尾追之敌尚远,守敌还不知红军虚实之机,诱敌出关。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毙伤营长以下百余

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轻机枪5挺。红军继而折北向西,再次攻克宁陕县城,全歼守城保安团300多人,处决国民党县长胡文绍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据城8天,开仓济民。特委在宁陕县四亩地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宁佛地区工作。

1936年初,红军向西挺进,抵达城固、洋县附近,继而又挥师东进,沿途消灭荆紫关、西坪、官坡、兰草、三要司、雷庄、庾家河等处民团5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2月中旬,红军由豫陕边西进,从佛坪县北出秦岭,在户县境内横扫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在洋县华阳、留坝县西江口歼灭民团150余人,缴枪近百支。在凤县双石铺、黄牛铺消灭保安团4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军用汽车5辆。复又向东,歼雷庄、官坡、兰草等地民团200余人,缴枪130余支。继而打开西坪、富水关、荆紫关,歼保安团300余人,缴枪300余支。

4月下旬,红七十四师由梁家坟西进,在漫川关消灭民团百余人,缴枪60余支。5月中旬,红军到宁、佛边后,特委将红七十四师的所属部队分编为第一、五、六团,由特委主要领导人率领分散活动。第一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于镇安、柞水、蓝田边,在蓝田县张家坪捕获了由西安到商县上任的国民党第四行政区专员汤有光,接着奔袭两岔河,回兵瀛龙庙,消灭保安队、民团200余人,缴获各种枪150余支;第五团由李隆贵率领,活动于汉阴、旬阳边,消灭桃园、林达庙民团50余人,缴枪30余支;第六团由陈先瑞率领,活动于山阳、商县、郧西、商南边,击毙作恶多端的商南县赵川民团头子赵平甫,缴获长短枪200余支。

9月底,红七十四师集中在宁陕县的猴子坪进行休整。继而东进至豫陕边,在西坪毙国民党军公秉藩部近百人,缴获各种枪67支;在雷庄、兰草歼灭民团百余人,缴枪70支;在官坡歼灭卢氏县保安团一个加强连170多人,缴获步枪130支,轻机枪2挺。12月初,红七十四师由豫陕交界西进到洛南,歼灵峪口、石家坡民团,经

黑山、黄龙铺进入蓝田县,再歼许家庙民团,共缴枪 200 余支。

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国民党军四面包围“清剿”的艰苦条件下,中共鄂豫陕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歼灭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和反动地方武装约 4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3000 余支,从而保卫并巩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西安事变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对外改称“抗日南路军”,开赴灵宝县和潼关县之间,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入陕,同时成立了鄂豫陕边区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任主席,李涛为副主席,统一领导红七十四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和地方武装在鄂豫陕边进行革命斗争。

1937 年 1 月 22 日,红七十四师与南下商洛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于商县县城。2 月,中共鄂豫陕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从商县移至镇安、柞水、宁陕三县驻防。在开明人士、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等人的配合下,鄂豫陕特委在红七十四师的驻防区内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柞水县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时吸收 400 多名青年参加红军。4 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到长安县大峪口整训。6 月,特委书记郑位三奉调回延安。8 月,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至此,中共鄂豫陕特委结束。

第十三章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西北根据地的形成及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一 根据地的形成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后，陕甘边、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5年初，陕北苏区有9个县苏维埃政权，陕甘边苏区有11个县苏维埃政权。两块苏区的迅速发展给国民党在陕甘乃至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国民党对这两块苏区开始了新的大规模“围剿”。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集中兵力，统一领导，以便更有力地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区特委经过协商，并征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出的巡视员黄翰的同意，拟建立统一的党组织领导两个苏区的斗争。为此，刘志丹专程从陕甘边到赤源县水晶沟，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的谢子长，并就建立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等问题与谢子长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刺儿圪塔举行联席会议，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马明方等出席。谢子长因伤情加重未能出席会议。^①会议由刘志丹主持，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两个苏区实

①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病情恶化逝世。

行统一领导,对红军游击队实行统一指挥;撤销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特委所属的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领导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组织。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惠子俊任书记(在惠子俊返回陕甘边传达联席会议精神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部长。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

周家峪会议是中共陕西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二 党组织的建立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归中共中央驻北京代表孔原领导,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神府工委。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由李生华任书记,蔡子伟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黄逢春任宣传部部长,刘景范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特委下辖南区区委,张邦英、唐洪澄先后任书记;马文瑞为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

中共神府工委由王达成任书记,组织委员贾令德,宣传委员张晨钟,青年委员贾怀琪,下辖四个县委。

此外,西北工委直接领导的县委(工委)先后有26个,其中延长、红泉、宜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是2月至9月期间新建的。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先后派朱理治、聂洪钧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到达永坪镇,朱理治、聂洪钧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共同组成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

团,朱理治任书记。

9月1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与军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西北工委的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和鄂豫陕省委的徐海东、戴季英等30多人出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

中共陕甘晋省委由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等组成,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部长白茜。改组后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

中共陕甘晋省委仍旧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神府工委。李景林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晨钟为神府工委书记。

这时,西北根据地仍有26个中共县委(工委)、市委,其中佳芦、永红、韩城、赤安县工委和瓦窑堡市委是新建的,韩城县委在国民党统治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对外用“西北中央局”称谓,成立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陕甘晋省委改为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中共陕甘特委改为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指出,现在陕甘地区是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作战地区,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作“占据重要地位”。目前省委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群众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要扩大苏区,向关中及陇东地区发展。

经过中央的调整,西北根据地境内分设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及三边特委、神府特委和关中特委。两个省委和三个特委的管

辖区域分别是：陕北省委以甘泉县下寺湾以北的苏区为辖区，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部长贾拓夫，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妇女部部长白茜，秘书长马文瑞。省委先后辖吴堡、米西、绥德、清涧、靖边、定边、新城、赤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安塞、赤安、延安、瓦窑堡等县（市）的党组织。陕甘省委以甘泉下寺湾以南的苏区为辖区，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部长李景林，军事部部长萧劲光，妇女部部长蔡畅，秘书长曹力如。省委下辖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中宜县的党组织。1936年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主力东征，国民党军乘虚而入，相继占领划归陕甘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区和中宜、富县、甘洛等县辖区的大部。5月，中共中央撤销陕甘省委，其辖区大部分划归陕北省委，小部分划为新设立的陕甘宁省委。三边特委以定边、安边、靖边的苏区为辖区，谢维俊任书记，慕生忠任副书记。^① 神府特委以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的苏区为辖区，杨和亭任书记，下辖神木、府谷、佳芦、佳北、榆林等县的党组织。关中特委以陕甘边的苏区为辖区，贾拓夫任书记，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等县的党组织。

5月，红军西征，中共中央新设陕甘宁省。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组织部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部长李一氓，军事部部长萧劲光，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妇女部部长李学善，秘书长左觉农，下辖定边、安边、赤安、华池、赤庆、环县、曲子、静宁、合水、固北、定环、盐池、豫旺、豫海等县的党组织。

12月，中共中央恢复陕甘省。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部长杨木一，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妇女部部长刘锦茹，秘书长申力生，下辖淳耀、赤水、永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党的组织。

^① 1935年11月27日，谢维俊等十余人被叛匪杀害，三边特委停止工作。

三 政权组织的建立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并未有格局性的变化。陕北苏区县、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仍由陕北区苏维埃政府领导,陕甘边苏区县、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仍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此时,全根据地设有陕甘边南区、陕甘边东区和31个县苏维埃政权,其中府谷、子长、米西、延长、红泉、宜川、定边、西靖边、东靖边、肤施、肤甘、延安和淳耀县苏维埃政权是1935年2月至9月期间建立的。

9月17日,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并确定于1936年1月28日召开陕甘晋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

10月5日,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作出《关于苏维埃选举法与苏维埃组织条例的决定》。该决定分选举法和苏维埃组织条例两部分。选举法规定: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凡16岁以上的工农群众,不分性别、教育程度及宗教、种族,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政权剥夺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及一切剥削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为巩固工农政权,在选举中,产业工人每5人、雇工及手工业工人每7人、贫农及中农和自由职业者每20人各选代表1名,红军每连选代表3名,游击队和政治保卫队每20人选代表1名。组织条例对乡、区、县、省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苏维埃各部的职能和组成等做了具体的规定。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领导陕北区、陕甘边区、陕甘边南区和东区及29个县(市)的苏维埃政权,其中永红县和瓦窑堡市苏维埃政权是这一时期新设的。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额发布告,决定在西北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作为西

北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府机关,博古、林伯渠先后任主席,博古兼任外交部部长,林伯渠任财政部部长(后任主席兼财政部部长),邓发任粮食部部长,王观澜任土地部部长,崔田民、毛泽民先后任经济部部长,徐特立任教育部部长,蔡树藩任司法内务部部长,邓振珩任劳动部部长,罗梓铭任工农检查局局长。西北办事处领导陕北、陕甘、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

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由马明方、马佩勋任主席,霍维德(兼工农监察部部长)、崔田夫、惠子明(兼国民经济部部长)任副主席,艾楚南任财政部部长,辛兰亭、王晦山先后任土地部部长,祁明珍、梁月明先后任劳动部部长,高旭光任粮食部部长,陈蓬飞、郭青廷先后任教育部部长,钟赤兵任军事部部长,罗成德任裁判部部长,刘子义任保卫局局长,惠子明、陈蓬飞先后任秘书长。

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先后由王生玉、李生华、朱开铨(兼土地裁判部部长)任主席,国民经济部部长马锡五,财政部部长张慕尧,粮食部部长王朴,内务部部长马仰西,教育部部长王子匀,工农监察部部长任泽义,保卫局局长郑自兴;1936年12月以后,主席刘景范,副主席霍维德、艾楚南(兼财政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李会友,教育部部长李子欽,粮食部部长郭子青。

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由马锡五任主席,副主席兼土地部部长、裁判部部长朱开铨,秘书长杨培源,张慕尧、赵耀先先后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杨玉亭、张慕尧先后任财政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王子宜,王子匀、刘国声、康洁先后任教育部部长,郑自兴、李握如先后任保卫局局长。省苏维埃政府下设五个地区、特区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后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黄子文、张邦英、秦善秀先后任主席;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后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东地区

办事处,主任王海山。

这一时期,苏区还新建了甘洛、红宜、富县、安边、赤安、横山、安定、佳芦、新城、榆林、新宁、曲子、环县、赤庆、定环、盐池、豫旺、隆海、固北、静宁 20 个县苏维埃政府。

四 军事组织的建立

1935 年 2 月 7 日,刘志丹在赤源县冯家稍壩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白坚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朱子休任军委参谋长。5 月 1 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在白庙岔会师,总兵力约 4000 人。西北军委成立前敌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治委员。

这一时期,西北根据地共有 40 多支大小不等的游击队,约 3000 余人,各区、县还普遍成立了农民赤卫军。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地方武装的作用,西北军委对苏区的地方武装普遍进行了整编。

在陕北,由第一、第十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第一纵队,纵队队长高步仁,政治委员刘明山;由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二纵队,纵队队长郭玉人(兼),政治委员马万里(兼);由第八、第十三支队合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陈世恩、牛刚、王子长先后任纵队队长,惠艾深、黄振邦、魏国良先后任政治委员;西北军委还将投诚的国民党军史文华部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师长史文华,根据党的指示,王兆相带十余名干部去部队做政治工作,兼任师政治委员。

在陕甘边,成立了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陈国栋、张邦英分别担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领导富县游击队、中宜游击队、中宜独立营、淳耀第六支队、淳耀第七支队、赤水第十二支队,活动于淳化、旬邑、中部、宜君、耀县、正宁、宁县等地;成立陕甘边区直属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刘金声和王继之分别担任总指挥和副总指

挥,下设3个赤卫军大队,有赤卫队员700多人;由宜川县赤卫游击队、宜川第十支队、宜川第一支队合编为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黑志德和赵正化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由宜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支队,延长第十八支队,延安第四支队,甘泉第六支队合编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邵凤林和杨凤岐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设第一、二、三、六、十、十八、十九支队。

1935年9月17日,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聂洪钧为主席,范子文为军委秘书长,戴季英兼任军委参谋长。

9月18日,长征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西北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水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下设三个师。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梯,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第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师长杨森(后田守尧),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张达志),辖第二三二团、第二三四团、骑兵团;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后崔田民),参谋长任浪花,辖第二四一团、第二四三团。十五军团共约六七千人。

为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西北军委对苏区的地方武装继续进行整编。9月,在集中各地游击小分队的基础上恢复神府独立三团,团长王兆相,政治委员杨文谟,下辖3个连,共120多人。同时成立了陕北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白炳新(马义),参谋长乔红(白宏德),政治部主任惠庆祺(一说杨和亭)。军分区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延水、清涧等县的地方武装。

10月,西北军委将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合编为米西游击师,师长柴福俊,政治委员魏国亮。全师辖4个连,共500余人。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

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

11月30日，西北军委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同时任命了22名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的军政干部。西北苏区的红军主力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其他军事组织是按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区域分别开展活动的。

这时，陕西省大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军，由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统一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地方军事组织有：神府独立第三团，王兆相、贺伟、刘明山先后任团长，杨文谟、张汉武、毛凤翔、陈景堂先后任政治委员；神府独立第四团，王兆相、贺伟成分别担任团长和政治委员；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王宝珊先后任政治委员；东地区游击司令部，黄罗斌、慕生忠、赵启民先后任司令员。

后来，西北军委将陕甘省的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治委员宋理治，副军长谢嵩，下辖第二五五团、第二五六团、第二五七团，共900余人。其他地方武装组织有：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政治委员贾拓夫，副司令员陈国栋，下辖淳耀第六、第九支队，赤水独立三营、第十二支队、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关中红军司令部，江华、贾拓夫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两个团；陕东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曾征，政治委员郭子清；陕甘南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曹力如，政治委员欧阳欣，下辖三个独立营和十余支游击队，在甘泉、中宜、富县、甘洛等县开展游击活动。

1936年4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在陕甘宁省环县曲子镇成立，姚喆任师长，李志民、黎林先后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团，由西北军委和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领导。其他地方武装组

织有,定边县骑兵支队,安边县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赤安县保卫队及甘肃、宁夏境内的合水、庆阳、环县、曲子、盐池、豫旺、豫海、固北、驿马关等县的游击队,共14支。

五 群众组织的建立

1935年2月5日中共西北工委成立时,西北根据地没有建立统一的共青团领导机构,决定由共青团陕北特委领导团陕甘边区特委和整个西北苏区团的工作。

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慕纯农,专职委员崔田民,巡视员刘英勇、惠碧海、白耀明,秘书高朗山,组织部部长王月明,宣传部部长李铁轮(后白治民),青年妇女部部长史秀云,儿童部部长黄静波。团陕北特委先后下辖团陕甘边区特委和24个团县(市)委。团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碧海,特派员李光亚,组织部部长白光。24个团县(市)委是,佳县、吴堡、米东、绥德、清涧、赤源、秀延、神木、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延安、肤甘、安塞、红泉、米西、肤施、西靖边、赤安、宜川等县委和瓦窑堡市委。

11月,中共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共青团组织进行了改建。共青团陕北特委改建为少共陕西省委员会,慕纯农、陈时夫、高朗山先后任书记,秘书长霍建德,王月明、白治民、张方海先后任组织部部长,高朗山、白志明先后任宣传部部长,史秀云、白霞、史翠峰先后任青年妇女部部长,刘英勇、鱼振东先后任少先队部部长,黄静波、袁呈祥先后任儿童局局长。1937年4月,少共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省青年救国会,高朗山、白向银先后任陕西省青救会党团书记、主任,白志明任文化教育部部长,张方海、王治周先后任组织部部长,鱼振东任军体部部长,张志明、白向银先后任儿童部部长。少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青救会先后下辖神府特区、陕北东地区、关中特区、三边特区以及佳县、米西、绥德、清涧、靖边、新城、横山、赤源、秀延、安定、子长、延川、延水、赤安、安塞、延安、瓦窑堡等县

(市)少共县委和青教会。

同月,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改为少共陕甘省委,自治民、揭俊勋、李光业先后任省委书记,刘宗煥、李阳山先后任秘书长,李光业、盛占英先后任组织部部长,揭俊勋、盛占英先后任宣传部部长,白凌云任青年妇女部部长,白光、韩国庆先后任少先队部部长,李富城任白区工作部部长,薛道信任儿童局书记。少共陕甘省委由中共陕甘省委和少共中央局领导,下辖关中特区和淳耀、赤水、水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的少共县委。1936年5月,陕甘省撤销,少共陕甘省委随之撤销。同年12月,陕甘省恢复,少共陕甘省委于1937年1月再次成立,书记白向银,组织部部长王朗超,宣传部部长黄静波,少先队部部长王兴爱,儿童局书记袁呈祥,下辖少共关中特委和淳耀、赤水、水红、甘洛、肤施、红泉、宜川、富县委员会。

1936年5月,少共陕甘宁省委在红军西征中成立,省委书记自治民,秘书长刘进芳,组织部部长李光业,宣传部部长白成铭,少先队部部长韩国庆,青年妇女部部长白凌云,白区工作部部长薛道信,儿童局书记杨正禄。1937年4月,陕甘宁省青年救国会成立,李光业任党团书记、主任,白成铭任组织部部长。少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青教会下辖少共三边特委,少共定边中心县委,少共定边、安边、赤安县委以及甘肃境内的北华池、赤庆、环县、曲子,宁夏境内的盐池、豫旺、固北等县委和青教会。

1935年7月,为了加强对以手工业者和雇农为主体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了陕北区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高长久,组织部部长马汉三,福利部部长刘俊杰,青工部部长惠云武,女工部部长王秀卿,文教部部长萧彩峰。11月,陕北区工会筹备委员会改称陕北区总工会,主席高长久(后主席改称委员长,李子厚任委员长),先后下辖横山、米西、吴堡、靖边、清涧、赤源、安定、瓦窑堡、延川、延水、延长、安塞、志丹、延安、肤施等县(市)工会以及神

府特区工会(先李世臣任主席,后杨万清任委员长)。1936年2月20日,陕西省总工会在瓦窑堡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陕西省党、政领导人李维汉、郭洪涛、马明方等到会祝贺并讲话,邓振刚、高长久作工作报告,要求加强教育,巩固工会组织,努力生产,支援战争,改善工人生活福利条件。这次大会促进了各级工会的快速发展。

1935年11月设立陕甘省时,没有成立省级工会的领导机构,只建立了宜川、富县、肤施三个县工会。陕甘省重新恢复后,1937年1月成立了陕甘省总工会,高长久任主任。

1936年5月,陕甘宁省总工会成立,主任管瑞才,组织部部长旷坚,秘书长惠安民,青工部部长惠丰,女工部部长白青山。陕甘宁省总工会先后下辖三边特区工会、定边中心县工会。1937年4月,总工会主任改称委员长,由旷坚担任。

三边特区工会1936年10月成立,主席刘长胜,下辖定边、安边工会和宁夏境内的盐池县工会;1937年5月三边特区工会撤销,定边中心县工会成立,主席马汉三。

西北根据地的妇女组织均设在县一级。1935年2月到9月,清涧、绥德、赤源、秀延、子长、延安、红泉、延川八个县有妇女会。10月以后,新增肤施、延长和瓦窑堡三个县(市)妇女会。11月以后,陕西省新增佳芦、榆林、延水、安定、赤安、安塞、延安市妇女会。陕甘省新增宜川、甘洛、富县妇女会。陕甘宁省新设赤安县妇女会。

第二节 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一 解放六座县城

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935年2月初,蒋介石集团不断调集军队,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共投入近 30 个团的兵力。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五个团重点进攻神府和米（脂）、横（山）地区；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四个团重点进攻安定、清涧及延川、延长地区；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四个团、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七个团、蒋介石嫡系杨步飞部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在根据地的南、西边境“围防”；阎锡山部第七十一师的一个旅渡过黄河，占据吴堡、绥德一线；同时以保定行营参谋处长毛佩为主任组成参谋团，常驻绥德县城，协调各部作战。国民党军采用分区“进剿”、围堵结合、驻点修堡、步步为营的办法，企图彻底消灭西北根据地及其工农武装力量。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势“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一成立，就开始对第二次反“围剿”进行了具体部署，决定组织红军主力兵团，重点打击装备精良，但人地两生、官骄兵狂并对苏区构成严重威胁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2月18日，西北军委发出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5月1日，从陕甘边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村。5月7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首战安定县吴家寨，歼灭国民党军1个营，击毙营长郭子丰，俘敌450多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5月9日，红军主力再战马家坪，歼灭国民党军1个营，击毙营长左象亨，连长王兆凤，俘敌450多人，缴获各种枪、炮以及其他大量辎重。5月10日，红军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5月20日，红军主力兵团从安定南下，25日在绥德、清涧交界处的张家圪台村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击毙连长孔庆山，俘敌150多人，缴获各种枪100余支。又在绥西歼灭国民党军1个连，击毙连长翟文启。5月30日，红军攻克延长县城，俘虜国民党县长董公慎、骑兵团连长任进河以下500多人，击毙民团总指挥李明五，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战马170余匹，无线电台1部及大批军用物资。国民党延川县守城部队闻风

丧胆,弃城逃往清涧,红军一弹未发解放了延川县城。6月15日,红军在延安县高桥镇击溃民团1个连,击毙民团总指挥李汉华,俘敌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支。6月20日,红军解放安塞县城,俘国民党卸任县长杨任之和新任县长蔺某以下官员数十名。6月22日,红军攻克安塞重镇李家塌,毙、俘敌数百名,缴获各种枪200多支。6月28日,红军攻克靖边县城,击毙国民党守军营长屈志鹏,俘敌500多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迫击炮6门。6月30日,保安县城守敌逃窜至安边,红军一弹未发解放了保安县城。

与此同时,在南线作战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和骑兵团也不断被敌获胜。4月下旬,红二团在杨清川伏击国民党军骑兵团连获胜。5月中旬歼灭宁塞川五城镇民团,摧毁张廷芝设在韩家洼的修械所,击溃吴起镇民团。6月下旬,红二团北上归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参加攻打靖边的战斗。红军骑兵团于5月中旬在宜川县屯石峡歼灭县民团,继而参加解放延长的战斗,后南下消灭合阳县甘井民团。7月,第一团和骑兵团活动于富县、宜君、中部一带,开辟游击区,随后再次南下白水、澄城、韩城。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战斗,西北红军先后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和游击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新的“围剿”取得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二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不甘失败,经过筹划后,于1935年7月对西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西北“剿总”司令,参加“围剿”西北苏区的国民党军计有东北军的2个军7个师、宁夏马鸿逵的3个骑兵团,加上原先在西北苏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15万人。

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围剿”作战,先后取得了慕家原、定仙娥、横山等战斗的胜利,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

1935年9月18日,红十五军团刚刚组成,就投入到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此时,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〇、一二九师已经到达延安,一一〇师一个营驻甘泉;第一〇七师驻守洛川、富县,第一〇〇、一〇六、一〇九、一一七师经合水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龟缩在陕北重要据点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八十四师又蠢蠢欲动,企图与东北军夹击红军,消灭刚刚成立的红十五军团。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分析了形势,认为只有迅速南下,消灭深入到延安一带的东北军,才有可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随后,红十五军团从永坪镇出发,经过三天急行军,绕过延安县城,于9月28日抵达甘泉县城以北的劳山一带。徐海东、刘志丹等带领团以上干部察看了劳山附近的地形,决定以一小部分部队围攻甘泉县城,大部队埋伏于劳山丛林中,准备歼灭延安援助甘泉的国民党军。10月1日下午,援助甘泉的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在劳山中伏被歼,师参谋长范驭州和团长杨德新被击毙,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逃到甘泉后毙命,团长裴焕彩以下2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各种枪数千支。劳山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震动很大,驻守瓦窑堡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一部星夜逃往绥德县城,安定县全部解放。

10月中旬,在取得劳山战斗胜利后,红十五军团挥师南下,包围了富县榆林桥。10月25日拂晓,红军发起攻击,全歼榆林桥守军国民党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俘团长高福源。

第三节 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一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撤离中央

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9月18日,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消息,毛泽东当即提出到陕北去。中央同时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27日,陕甘支队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10月17日,陕甘支队从定边县的五股掌、铁角城分两路进入西北根据地。

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①为将尾追的国民党军消灭于根据地之外,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西山地设伏,于21日全歼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击溃第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两个骑兵团,这就是著名的“切尾巴”战斗。29日,陕甘支队政治部发布《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苏区、游击区和白区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动员起来,积极开展各方面的斗争,保卫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

11月6日,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此时,中央恢复了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番号,陕甘支队改编为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共同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中共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进行了总结,指出红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业绩必将载入史册。他号召红军各部之间要加强团结,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之间要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任务。

二 直罗镇战役

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

^① 今吴起县城。

的中心,也成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再次“围剿”的重点。蒋介石重新调整了部署,调西线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一〇九、一一一、一〇六、一〇八四个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富县进犯,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调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接应董英斌东进,救援甘泉、延安守军,企图打通已被红军分割的洛川、富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并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将红军聚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制定战役计划。在发起战役的前两天,毛泽东组织两个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三面环山,镇北是葫芦河,一条大道由西向东穿镇而过,镇东有个古老的小寨,构成一个口袋形的地势。根据部署,红一军团位于直罗镇东北地区,红十五军团位于直罗镇以南地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国民党军一两个师,而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以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11月6日至7日,红一军团由甘泉以西定边集、下寺湾先后进至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了直罗镇以东的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国民党军东进。

11月19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富县前进,并以其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北地区。毛泽东决定,乘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先出头的有利时机,首先歼其于直罗镇地区。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开进直罗镇。红军乘夜将其包围,第二天拂晓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由

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两面猛烈夹击,战至下午2时,歼一〇九师大部。接着,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团。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一〇九师残部和阻击由富县西援的国民党军一一七师,主力部队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另两个师。国民党军惧怕被歼,于23日下午沿葫芦河西进。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一个团,其余国民党军退回太白镇,由富县出援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富县。与此同时,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500余人被红十五军团围在镇东头的土寨子里,待援无望,23日趁黑夜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戕身亡。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〇九师又一个团,俘虏5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做了《直罗镇战役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三 中共中央对错误“肃反”的纠正

1935年10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时候,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深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却在根据地内发动了一场错误的“肃反”,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错误“肃反”的发生,有其错误指导思想上的根源。1933年2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月15日,陕北代表团通过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中,错误地批评陕北党组织“没有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抛弃了阶级路线,在富农路线领导之下,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①。12月下旬,“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1934年3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边区特委戴上“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帽子;1934年冬和1935年春,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批评陕北特委没有去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偏向等。1935年6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右倾”严重,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暴露和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先后派朱理治、聂洪钧来到陕北,他们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不作正确的估计和分析,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把两块根据地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说成是“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战争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之配合。”9月,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声称帮助“肃反”是他们来陕的主要任务之一。^②

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关于进行“肃反”运动的指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提出“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正式开始“肃反”。“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到洛河川一带逮捕了上自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下至红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② 朱理治:《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聂洪钧:《陕北“肃反”的一些情况》(1945年7月5日)。

二十六军营级和一些连级干部,地方上县科以上干部;马文瑞、张秀山、杨琪、朱子休、蔡子伟、秦武山、惠子俊、刘景范、张策、孔令甫、任浪花、高锡纯、赵启民、高朝亭、王聚德、张文舟、李启明、郭宝珊等五六十人被关在瓦窑堡监狱。除王世泰、康健民、刘均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人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等原因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抓。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尚未查清问题的边区领导干部,审讯时完全袭用法西斯的一整套酷刑。他们依据逼供出来的“口供”,证明陕甘边的领导人“已现出反革命的原形”,打算“肉体消灭”。他们已在监狱后院挖下大坑,以备活埋这些“犯人”。

刘志丹等人被捕后,“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认为“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險”^①。于是大开杀戒,仅下寺湾和陕甘边南区前马埫就有陕甘边县级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也有部分连级)干部以及来自白区,在机关、学校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 200 多人惨遭杀害。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滥杀无辜,连起义后参加革命的民团也不放过。原永宁山保安民团团总卢仲林在刘志丹的规劝下幡然悔悟,投奔革命。“肃反”中,卢仲林和十多名班排长全部被杀掉。

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根据地党政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疑虑和恐惧。干部不敢见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人,如有人来就上山“打游击”。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也往山上跑。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②,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

① 高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4 页。

② 当时多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

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①,有些边沿苏区变成了白区。一些地区党组织瘫痪,游击队离散,红军军心动摇,地主、富农反攻倒算,人民怨声载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组织领导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后,一面部署指挥消灭尾追的敌人,一面调查了解陕北错误“肃反”情况。毛泽东从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定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海、保安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等人的汇报中了解到,陕北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并已造成了严重危机。龚、张明确表示,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此时,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才知道陕北正在经历着一场可疑的“肃反”,中央要找的刘志丹也被作为“肃反”对象关在监牢之中。毛泽东指示龚逢春等人,要发动群众做好边沿苏区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要跑到国民党那边去,并明确表示,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随后,中央派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陕北籍干部贾拓夫、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

贾拓夫等人在甘泉县下寺湾遇见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证实刘志丹等人确实被捕,当即电告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11月底,张闻天、毛泽东在下寺湾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时,明确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指派王首道、贾拓夫等人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政治保卫局,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毛泽东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一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挽

^① 即叛变之意。

了。如果是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11月初,中共西北中央局组成了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郭洪涛。11月7日,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接管了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经过20多天的调查审理,五人党务委员会认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所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桐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抗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①。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说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路线。中央随即释放了被冤屈的刘志丹等十多人,接着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员。

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人的平反大会,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郑重宣布,刘志丹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为他分配工作,同时还宣布了中共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战争环境,没有来得及在路线上分清是非,也没能为蒙冤受屈的干部进行彻底平反,“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②。直到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才对西北党史、军史问题作出正确评价,彻底肃清了“左”的错误。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到达陕北,并采取果断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制止了错误“肃反”,使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幸免于难,也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新的

① 《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4年第1期。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

“落脚点”和“出发点”。

四 东征、西征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有了落脚点,但陕北地瘠民贫,又遭受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红军兵源的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成问题。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也把黄河沿岸 20 余县划为防共区,在东岸构筑碉堡,还派孙楚指挥晋军四个旅在黄河以西的吴堡地区布防,妄图阻挡红军抗日去路。为了抗日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巩固并扩大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1936 年初,按照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东征战役,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1936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参战部队逐步移至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待命。1 月底,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对东征进行了具体部署。2 月 20 日晚,红军从北起绥德县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长达 50 余公里的地段同时渡河。渡河后,红军在关上村及隰县等地首战获胜。3 月 10 日,进行了兑九峪战斗。以后,东征红军兵分三路,分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占领了同蒲路沿线大片地区。红军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把红色种子撒在了山西的大片土地上。

红军渡河东征后,阎锡山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阻拦红军。他将原布防于陕西境内的孙楚部撤回河东,阻拦红军北上。红军乘机收回了吴堡等被占领的地区,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恢复与扩大了神府根据地。

3 月 31 日,在神府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八军也渡河参战。4 月 14 日,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亲临前

沿阵地指挥，不幸左胸中弹牺牲。刘志丹牺牲后，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为他题词。毛泽东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他是“红军模范”。

在红军发起东征战役时，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 10 个师，号称 20 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西北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指派代表同共产党人接触。2 月 27 日，国民党代表到达陕北，同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南京政府可能出现了一部分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力主联俄联共抗日，或有同红军妥协的倾向，于是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五条联合抗日的意见，并表示愿意同南京当局开始切实的谈判。但后来，国民党当局对此没有作出积极回应。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5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 月 5 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将“反蒋抗日”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坚持其“剿共”政策。他调集了 16 个师又 3 个旅的兵力，准备对西北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加派嫡系汤恩伯的一个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及一个旅渡河入陕，协同陕北井岳秀、高桂滋的两个师，采取堡垒主义政策，向西北根据地的东北部进犯，同时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在西北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不愿再同红军作战，与共产党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在此情势下，如果红军不采取必要的对策，势必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扩展,以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西征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又以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相继攻占了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陕西的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征使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了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扩大胜利成果,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当西方野战军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历红千难万险,到达甘肃南部。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后,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驿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22日和23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五 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西北根据地从1931年5月创建渭北根据地起,中经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至1937年2月改制为陕甘宁边区,前后共五年零九个月,其规模之大,坚持时间之长,斗争之艰苦,可谓独树一帜。期间,根据地中心几易其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

过程。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西北根据地是中国北方革命斗争中的一面旗帜。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创建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长期艰苦、曲折的兵运工作的基础上,先后领导建立了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这些革命武装一直坚持到土地革命战争胜利,没有他们就没有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到1935年10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分别下辖十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在西北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其范围东临黄河之滨,西至六盘山下,北迄长城,南抵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立过陕甘边、陕西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及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第二,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红军开始长征后,始终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每次会议,几乎都要讨论落脚点的问题,但都没有实现。1935年9月18日,红军抵达甘肃南部岷县哈达铺,得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获悉陕北还有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据此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此后,中央红军走出甘南的山谷,渡过渭河,攀越六盘山,从陇东高原进入陕北。从此,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工作方针》中指出:“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这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是对西北根据地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

第三,西北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调集重兵“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对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历经十余战,解放了六座县城,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的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长征,同时,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的序幕。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延川永坪镇;11月6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甘泉象鼻子湾;1936年10月,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红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会师。从此,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第四,西北根据地为发展和壮大中国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西北主力红军已发展到4000多人,地方游击队也扩大到4000余人,加上先期长征入陕的红二十五军,西北主力红军已达六七千人,与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大体相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在“扩红”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争先恐后报名参军,出现了不少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面。1936年初,陕西省接受中央下达扩大红军7000人的任务,仅仅3个月时间就有9400人报名参军,超额2400人;富县不到一个月就招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子长县玉家湾村有七八十名青年参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就发展到近3万人,仅渡过黄河东征的正规红军就有14000多人。

第五,西北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高级干部。在西北根据地与红军创建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刘志丹、谢子长是其中的卓越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和培养下,西北苏

区还涌现出了高岗、习仲勋、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崔田民、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亮相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更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中坚骨干。可惜的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年早逝，是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第四节 根据地在执行中央新政策中前进

一 瓦窑堡会议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安定县瓦窑堡城内的田家院张闻天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张浩（林育英）、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会议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统一战线中是否包括剥削阶级即是否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党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他认为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力量，重新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阵线与民族反革命阵线正在重新改组之中，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经过几天讨论，会议基本达成了统一认识。23日，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

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张闻天作总结,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党的历史上的教训和与会人员的意见,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会议所通过。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整的系统理论和正确方针策略的形成。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中央机关、陕西省、瓦窑堡市科级以上干部以及中央党校和西北红军学校县团级以上干部,共400余人。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前提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指出,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将来还要继续发生变化。他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①他明确提出党和红军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他还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后,西北根据地开始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为建立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制定的方针政策,调整根据地内的各项政策,教育干部、群众转变观念,一切工作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 调整阶级政策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是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12月15日,毛泽东发布命令,指出“富农之土地,除封建性之高利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改变了过去把富农与地主、豪绅同样对待、全部没收富农土地财产的政策。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也改变了过去没收地主的商业部分和没收土地财产以后,不给地主分配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做法。

9月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党部与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指出正确地彻底地改正过去定错的成分,是目前许多地方的重要工作。纠正成分一定要经过支部会、乡苏维埃主席团或代表会、贫农团等会议讨论,本村群众通过,经过区苏维埃政府土地科批准后,才能有效;要求各级党政组织正确地执行党的新政策,防止“左”的和右的两种偏向。按照上级的规定和指示精神,根据地的

基层党组织对过去定错了的成分及时做了纠正。

三 调整经济政策

1935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关于工商业的布告,规定完全取消一切工商业者的捐税,甚至对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在苏区投资兴办各种工商业。1936年7月3日,西北办事处颁发的《关于发展志丹市镇贸易的布告》规定,凡工农群众要出卖的生产品,随时都可以拿到市面上来出卖,如卖不出去,由粮食部设立的调剂局收买收卖。这些规定的实施,保护了工农群众的利益。

1936年3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颁发《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纲要》,明确指出劳动互助社是广大农民群众一种自愿实行互相帮助耕种收获的群众组织,凡是农民(富农在内)只要自己愿意加入互助社,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劳动互助社的社员;劳动互助社的组织以乡为单位,一村或二三个小村的社员则组织互助小组;互助社决定每天工资的标准,不应比普通工人的工资高,每个工工资的多少,由大多数社员决定;互助社还应调剂耕牛、农具,牛工可以抵人工,每个牛工可抵两个或三个人工,由牛的使役程度和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工资可以每月和农忙将到时或过后结算一次。各社员做的工数或牛的工数,于结束时出入相抵后,依照出人工数决定收入或付出工资。纠正了过去强迫组织劳动互助社和在社内不执行互利原则的做法。

四 调整其他政策

实行新的选举法。1936年1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公布《西北苏维埃选举法》。这一选举法同1933年中央

苏区颁布的选举法,1935年10月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委会公布的选举法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是:第一,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阵营里划了出来,规定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对资本家参加选举做了界定,规定雇佣工人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的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第三,不再强调选民个人出身,规定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个人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这样就在根据地内扩大了民主,壮大了人民阵线力量。

制定贫农团的新政策。1936年2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该大纲规定: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织工人小组,在内部起积极领导作用;加入贫农团以自愿为原则,那种按户摊派的方式是错误的;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组织;在土地问题解决后,贫农团的重心应转移到怎样去增加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畜牧业等方面去,为改善群众生活,充实革命战争物资供应而斗争。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改变了过去贫农团一度代替政权组织作用的做法。

建立回民自治政府。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原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8月,由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回族干部马青年等组成筹委会,筹备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豫海回族自治县政府成立,回族雇农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根据地内建立的第一个回族自治县政权。

争取和团结哥老会等民间帮会组织。1936年7月15日,中华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该宣言指出：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走上了新的阶段，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现在都应该忘却和抛弃，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哥老会可以在苏维埃政府下公开存在，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立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侠尚义之士。在西北，无论是苏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哥老会都有不少组织，对哥老会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为了更广泛地争取民间各种帮会组织，更广泛地团结和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执行了中央一系列经过调整的新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走向了全面发展的正确轨道。根据地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人民团结，抗日情绪高涨，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

第十四章 中共组织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第一节 中共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工作

一 十七路军的由来和发展

十七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也称“西北军”。它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的一支地方部队,溯源于20世纪初杨虎城在家乡陕西省蒲城县组织的一支农民抗暴武装。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虎城率领蒲城农民武装积极参加起义军,同新成立的秦陇复汉军一起与清军作战,1914年编为蒲城县东乡民团,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驱逐陆建章的斗争,1916年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

1917年12月,陕西爆发了反对北洋政府在陕西新的代理人陈树藩的战争,并成立了陕西靖国军。杨虎城率部参加靖国军,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任司令。1922年1月,设在三原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被迫解体,杨虎城继续举起靖国军的旗帜,迎接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到其驻地武功县,重建靖国军司令部,其部升编为第三路,杨虎城任司令。5月,于右任赴上海向孙中山复命,杨虎城率部转往陕北,编为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所属步兵团。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赞同广东革命政府的国民军成立,井岳秀部改称陕北国民军,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南下,立足渭北,支持驱逐吴新田运动。1925年8月,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率部入陕,杨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任师长。

1926年春,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改称陕军第三师,参加了反对

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围攻西安的战争。1927年2月,陕军第三师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旋即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1928年秋,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杨虎城先后任总司令、军长、师长等职。

1929年4月,杨虎城接受蒋介石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1930年3月以后,杨部相继编为第十七师、第七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先后任师长、军长、总指挥。11月,杨虎城率部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由此至1936年12月,是十七路军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下辖的部队有第七军,第三十八军,陕西警备师,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直属警卫团,特务第一团、第二团,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特务营,教导营等部,总兵力发展到6万多人,主要活动于陕西全省及甘肃、宁夏部分地区,是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地方军事力量。

二 第十七路军中的中共组织概况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始建于1927年初。此前,共产党员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人曾在该部中活动。陈云樵、卫志毅、张振河、李维翰、白怀德、李德兴等人是该部最早的一批党员。从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

1927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政治处中共支部,年初成立,书记曹力如,党员10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中建立的第一个组织。(2)第十军三原留守部队中的中共第四军支,10月成立,张汉民(炮兵营营副)任干事会书记,下属两个支分部。(3)第十军中共特别委员会,11月成立,书记南汉宸,魏野畴和蒋听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继南汉宸之后,书记先后由魏野畴、宋树勋担任,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1928年4月阜阳暴动^①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军中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原来的200多人锐减到二三十人。

1929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新编第十四师中共军事委员会,同年秋成立(一说是1930年初成立),杜理程任书记,董林哲、田静忱为委员(后增加孙永康、冯异楷、张焕民),隶属中共中央领导。(2)新编第十四师第三旅中共支部,同年秋末成立,曾楚川任书记。

1930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新编第十四师南阳教导队中共军事委员会,年初成立,赵莘仁任书记,孙永康、董林哲、曾楚川、王明为委员。在各中队成立了党支部。(2)第十七师中共兵变前敌委员会,同年7月在河南舞阳成立,孙永康任书记,张焕民、王老汉、刘渣、姚丹村为委员。

1931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干训队中共支部,书记汪锋,委员冯世光、李光明。(2)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中共营委员会,书记魏志坚(后为王杰、杜俊杰),委员王杰、杜俊杰、李炳文、李世英、上官克勤,下辖三个连的支部。(3)第十七师中共军委会,书记孙作寅,委员李慕愚、胡振家。不久,十七师分驻汉中与凤翔两地,军委会分为前方、后方军委。(4)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中共支部,书记吕剑人,委员刘敬业、张毓秀。(5)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中共委员会,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先后任书记,下辖一、二、三连和机枪连支部。(6)陕西警备师中共支部,书记阎维良,委员张廷奎、王志远。上述党组织分别隶属中共陕西省委或省委军委。

1932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年初成立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

^① 1928年4月,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人在安徽阜阳领导的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高桂滋部)教导团、第十军(杨虎城部)军校和阜阳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赤卫队。起义因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而失败,魏野畴等人被俘后牺牲。

三旅三个支部。(2)随后,该旅第二团中共委员会成立,书记张东蛟,副书记牛化东。(3)第十七师第五十旅补充二团支部,书记贺修之。(4)十七路军总部第一骑兵团一连支部。

1933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中共安康军特别支部,5月成立,书记梁布鲁,委员王辛德、袁作舟、王泰诚,后王辛德接任书记。(2)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军官支部和士兵支部,同年夏成立,军官支部书记雷展如,委员翟松生、李明轩;士兵支部负责人马学文。上述党组织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3)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支部,同年秋成立,书记谢华,委员金阔生、童陆生。谢华返上海后,支部工作由金阔生负责,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4)第十七师补充团支部,年底成立,书记胡振家,委员杨嘉瑞、贺修之,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

1934年成立的中共党组织:(1)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士兵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崔廷儒,下辖团直和各连党支部。到年底党员增至200多人。(2)第三十八军军部支部,书记崔尽善。(3)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四期骑兵队支部,书记王志仁,委员刘侯楷、陈涛。(4)步兵训练班第四期学生队临时支部,同年秋成立,负责人李启明,委员张涛、张文舟(另有一支部,书记程天鹏)。(5)第三十八军教导大队支部,同年冬成立,书记李锐,委员常清平、张涛。上述党组织分别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陕南特委领导。

1935年冬,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第三连支部成立,书记刘湘卿(王力),委员吕建勋、刘振雅,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

1936年成立的中共组织:(1)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新兵训练排支部,1月成立,书记刘子义,委员李卡兰(夏飞)、苏育涵。(2)西安绥靖公署教导营营委员会,3月成立,书记杨正人(杨永根),委员翟程九、巩克中,下属两个连支部,隶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3)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中共委员会,9月成立,王建基(王国)任书记,张一平、高兴中(王写剑)、刘家驹(杨信)、秋含章(秋宏)为成

员,下属军官支部、团直和各连士兵支部,党员最多时发展到 200 多人。(4)秋,十七路军总部宪兵营改编为特务营,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指示,在第三连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营总支委员会,书记刘湘卿,委员吕建勋,下辖三个连的支部。西安事变后,营总支委员会进行了调整,书记韩学礼,委员刘湘卿、吕建勋,下辖四个连的支部;各连支部书记均为总支委员会委员,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在这期间,陕西警备第二旅、西北文化日报社等都有共产党员,但未成立党的组织。还有一些在国民党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如张汉民(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许权中(独立旅旅长)、武勉之(四十二师旅长)、唐哲民(十七路军总部军械处处长)、阎揆要(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团长)、刘威诚(陕西警备第一旅团长)、宋文梅(特务营营长)等,大都没有或大部分时间内没有编入党的基层组织,其组织关系或在中共中央,或在中共陕西省委。

三 中共与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合作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关系最密切、实践最成功的,当属与杨虎城及其所部十七路军的合作。

1927 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和奉系军阀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疯狂追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陕西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去驻防皖北的杨虎城部第十军“避难”。杨虎城外抵政治压力,内排非议,对于前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不但予以收留,而且委以重任。他自己也曾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0 年主政陕西后,杨虎城继续任用共产党员和开明进步人士。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的合作,是从帮助杨虎城举办干部学校开始的。杨虎城先后举办的干部学校有三民军官学校、第十军军

事政治干部学校、南阳教导队、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等。杨虎城名义上兼任这些学校的领导职务，但学校的实际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人魏野畴、吕佑乾、南汉宸等人担任，许多共产党员如金国生、邹桂五、陈云樵、纪子中、贾振中、宋文梅、张希钦、张希文、薛蔚等先后在训练班担任各级干部。大革命时期，学校主要讲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还公开讲授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传播进步思想，提高了学员的觉悟，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共产党员常黎夫、李启明、张文舟、蒙定军、李慕愚、王汝昭、王敬中、上官克勤、李醒吾、崔治堂、杜瑜华、张涛等先后在校学习。

在与杨虎城的合作中，共产党人利用各种途径先后创办了《青天白日报》、《宛南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运用这些报刊对广大官兵和民众进行反军阀、反列强的爱国主义教育，并适时得体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员赵薇华、宋树藩、宋绮云、冯异僧、曹冷泉、曹俊祉等担任报刊的领导和具体编务工作。他们利用报纸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反共政策。1936年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宋绮云撰写了社论，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国人大彻大悟，坚持抗战。蒋介石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后，《西北文化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驳，呼吁四万万同胞起来，反对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由于杨虎城对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比较信任的态度，这些党员和进步人士便利用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中供职的合法身份，开展革命活动。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为高级参议和省清乡总局副局长，还任命其他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军政机关供职。其间，南汉宸以合法身份整顿狱治，借机释放一大批长期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对于借十七路军入陕，冯玉祥系刘郁芬部溃败混乱之际破狱而出的共产党干部，南汉宸表面上声言要将其“搜捕入狱”，以应付蒋介石

石,实则通过杨虎城以资助出国留学等办法予以保护。刘志丹在地方军阀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时被捕,也是南汉宸和杜斌丞以陕西省政府名义出函保释的。

南汉宸等人还通过合法形式,发动学生捣毁反共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了学生中的一些职业特务分子,驱逐了亲蒋介石的省教育厅厅长,抵制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至西安邮电局邮件检查所的特务徐玉柱,打击了反动势力。

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还努力推动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联合反蒋”的秘密协定。

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长期合作,杨部地下党组织基础较好,加上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十七路军官兵中的反对内战、抗日爱国情绪高涨。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①、进逼长城各隘口时,杨虎城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参加抗战。蒋介石的态度极其冷淡,以“中央自有整个计划”为托词,拒绝了杨虎城的要求。杨虎城意识到希望蒋介石抗战是靠不住的,国家民族不抗战就没有出路,他和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他说:“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②这种联共反蒋抗日的信念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第二节 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5年夏,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以吞并华北为目的的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关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的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

① 旧省名,1955年7月撤销,辖区分别划入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② 李智凯:《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掀起了空前规模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12月24日,西安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向国民党中宣会、中政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学生发出通电,请求政府锄奸救国,维护并领导学生运动,释放被捕学生;请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彻底铲除汉奸,保护爱国运动;表示誓做北平学生后盾。12月25日,省立一中、省立二中和西安师范等学校的师生4000余人在革命公园集会,之后到陕西省政府请愿。向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递交了请愿书。随后,学生又到梁府街向省教育厅请愿。厅长周学昌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横加指责,企图压制学生运动。学生毫无畏惧,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我们是读书不忘救国,不把汉奸枭首,国贼铲除,誓不甘休。请愿学生走上大街,呼吁抗日,奋起救亡。在西安学生带动下,华县、三原等地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下乡宣传等活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1936年初,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传达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通过各种渠道向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进行宣传,推动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接着,东北大学中共支部书记、学生救亡工委负责人宋黎等人应张学良之邀来到西安,向东北军和西北军介绍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不久,北平部分学生党员随东北大学工学院一同来到西安,进一步壮大了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

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西安各界民众以各种形式举行救亡活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3月7日,西安民众4000余人在革命公园聚会,举行追悼被日本监工打死的上海大公纱厂工人梅世钧大会,抗议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9月18日,西安学生

4000 余人和旅陕东北军民 8000 多人在南院门“西北剿匪总部”联合举行东北沦亡五周年紀念大会，群情激奋，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许多官兵为之动容；10 月中旬，西安师范学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田杰生的斗争，迫使当局罢免了田杰生的校长职务；11 月 7 日，西安学生 5000 余人聚集革命公园南广场，举行追悼鲁迅逝世大会，驱逐了破坏大会会场的西安警察局局长马志超；11 月下旬，西安学生为声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抗日斗争，自觉行动起来，半天上课，半天募捐，有的学生携带捐款和慰劳品奔赴绥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受到傅作义的接见；11 月 28 日，张学良、杨虎城亲率所部官兵，参加了西安各界民众纪念西安解围胜利十周年大会，显示了陕西人民抗日爱国力量的大凝聚、大团结。

1936 年 12 月陕西省委恢复后，十分重视对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使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组织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西安队部^①、西安学联、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东救会”）等群众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意义。从 1936 年 12 月到 1937 年 2 月，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公务员等各行业人员，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示威游行和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成了民众的一致呼声。1937 年 1 月 9 日，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大华纺织厂、华丰面粉厂、成丰面粉厂、中南火柴公司及各行业的工人、城郊农民 15 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接着，蓝田、蒲城、三原、宝鸡、凤翔、山阳、卢县等 20 余县约 60 多万人参加了当地的游行示威和武装自卫大会。在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五周年时，西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了 15 万余人，在

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 年 1 月成立于北平。西安队部是它在陕西的分支机构。

革命公园召开纪念大会,痛斥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群众一致团结起来,抗日绥绥,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次日,西安人力车工人 2000 多人在革命公园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示威游行。

二 中共西北特支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中共陕西组织屡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又屡次恢复建立。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重建陕西党组织领导机构十分重视。11 月 9 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谈国帆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12 月初,谈国帆向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做了汇报,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带回了中央给陕西地下党的指示和瓦窑堡会议文件。1936 年 4 月,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临时省委有被完全破坏的危险,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与孙作宾等又到陕北,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央决定高克林留陕北工作,孙作宾担任中央交通。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出现了转机。

在高克林、孙作宾到陕北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到在十七路军从事地下工作的谢华的报告,立即亲自复信,对谢华等人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指示尽快重新建立陕西地方党组织,着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此,中共中央与陕西地下党的联系开始恢复。

四、五月间,谢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十七路军宪兵营中共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委员徐彬如、李木庵。鉴于陕西省委屡遭破坏,西北特支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组织关系,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其任务是继续做兵运工作,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领导和发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一度负责江苏徐州及鲁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共西北特支成立后,首先从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的学生运动入手,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

接着又在二中、女师、女中、一中、私立中学等校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同时把西安以外的三原三中、女中和汉中、兰州的一些学校也组织起来，成立了教职工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各行各业的救国会也都先后成立。6月1日，为了统一行动，中共西北特支把西安各救国会组织起来，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先后由谢华、杨明轩、徐彬如、李木庵等担任。“西救会”在西安建立和领导的救亡团体有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西安妇女救国会、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以及西安近郊和长安县的农民抗日救国会等。七、八月间，在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西北文化日报社组织了工人救国会和国民救国会等，8月又领导成立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陕西的学生运动空前高涨。

三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建立

1935年12月，在陕南“追剿”红军的陕西警备第二旅第四团发生了两起士兵起义。12月7日，第四连的一个班长张子新和士兵王展（王武林）在柞水县营盘带领一个排起义。12月11日，第九连的一个排长何继周在长安县引驾回率领全连百余人起义，进入秦岭山区，请求红七十四师改编和领导。红七十四师因组建不久，无力派人改编何部，于是建议何继周暂时不要打出红军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的名义进行活动。于是，何继周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并自任总指挥，苗鸿鑫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何继周改名何振亚。不久，张子新、王展率领的24名起义人员在宁陕、镇安边界与陕南游击纵队会合。1936年2月8日，汉阴进步青年李柏亭打死蒲溪联保主任汤新吾，带领20余人，枪参加陕南游击纵队。陕南游击纵队在宁陕、镇安、柞水、石泉、汉阴、安康^①等县开展游击

^① 今安康市汉滨区。

活动,发展到 500 多人。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一直在追击“围剿”陕南游击纵队。在没有和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又无后方支援、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何振亚采取缓兵之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镇安县政府和安康专署的“收编”,同时采取巧妙的方式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斗争,始终保持着部队的革命性。部队还先后派出五批工作人员,深入各县保安队进行策反工作,并在安康等地设立秘密联络站,掌握国民党军的动向,为下一步起义做准备。为便于部队独立发展,他们借“剿匪”之机,从距安康城 10 公里的驻地牛山庙移驻到距安康城 75 公里、位于安康、旬阳、镇安三县接合部的安康县东镇(东沟口)。

5 月,原在陕西警备第二旅四团手枪班任班长的沈敏得知游击队被收编的消息后,立即从北平回到西安,与在杨虎城部充兵营任营长的中共党员金阔生取得联系,经金阔生和共产党员杨江(杨文贤)、杜瑜华向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请示,西北特支决定派杨江、杜瑜华和沈敏到陕南做何振亚的工作,争取把这支武装掌握到中共组织的手中。6 月初,杨江等到达安康东镇,何振亚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待机率部举行起义。

8 月 9 日,根据何振亚与杜瑜华等人的安排,何振亚以“开赴安康进行整训”为名,率部离开东镇,向茨沟进发。此时,杨江带中共党员杜超赶回部队,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关于立即举行起义、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指示。

8 月 10 日,部队从茨沟向五里铺进发,沿途收缴了保安队的枪支。8 月 13 日,部队到达镇安县紫荆乡刘家大院,举行抗日第一军成立大会,宣布:(1)部队正式命名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2)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治委员,沈敏为军委主席,杜瑜华为参谋长,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3)抗日第一军下辖四个支队和特务队、侦察队、少年先锋队。(4)军内成立陕南抗日救国联合会,杨

江、沈敏、何振亚、杜瑜华、徐海山为常委。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后，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何振亚、杨江等率部打退敌人的尾追，挥戈北上，在镇安、宁陕、石泉交界处与国民党军周旋。9月1日，部队途经石泉县三官庙街时，一举歼灭大地主贺元山、蔡乐成的寨丁20余人，攻克太平寨。10月中旬，抗日第一军在安康县马坪一带全歼王普三保安队，缴获步枪30余支。接着，又在镇安县杨泗庙乡与国民党军一部激战，毙伤敌人2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11月23日，抗日第一军在洋县周家坝夜袭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运输队，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第二天，部队行至迷峰岭山腰，突然与国民党军一个团遭遇，国民党军居高临下，猛烈进攻，部队被压在半山腰，激战数小时后跳崖撤出。突围后，部队经四亩地、海棠园急行100公里，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12月初，部队到达宁陕县江口休整。这时，抗日第一军已发展到900余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徐彬如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的名义，于12月20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西救会”在“民众武装组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一军的建制”^①。12月下旬，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共代表罗瑞卿。这时，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尚不知西安事变发生，部队集结在汉阴县双庙子，准备攻打汉阴县城。红七十四师送来中共代表的命令后，何振亚立即率领部队挥师北上。1937年3月初，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甘肃庆阳县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治委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杜瑜华、张英勃负责政治处工作。

四 铁佛寺起义

1936年8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崔廷儒先后派吕剑人、

^①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刘庚、张涛、李持生、谈国帆等人去乾县地方民团开展工作，相机发动起义，铁佛寺保安中队成为他们工作的目标。铁佛寺保安中队原是国民党西北民军的一支地方武装，其首领是张科科、张熬娃。在此之前，为了争取这支武装力量，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二张的同族兄弟、共产党员张庚良前去工作，张庚良担任了这支武装的头目。保安中队虽然成分复杂，组织纪律性差，但成员大多出身贫苦，不满现状，并受乾县保安大队的威胁压迫，早已心怀怨气。刘庚、张涛、夏飞等人通过保安中队长张庚良和一些队员、头目的同乡关系，广泛结交朋友，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保安中队逐渐有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基础。10月7日，张庚良、刘庚等发动铁佛寺保安中队起义。起义部队攻进永寿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10月8日，部队转往麟游山区，宣布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总指挥张庚良，政治委员兼参谋长刘庚，下设3个大队和特务队，共200余人。后来，起义部队在与强敌战斗中兵力不支，分散隐蔽。

第三节 西安事变与中共陕西省委的恢复

一 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

1935年9月，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领东北军由鄂豫皖地区来陕甘地区“围剿”红军，任西安“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从9月到11月，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与红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交战中，连续被消灭近三个主力师，南京政府不但不给予补充，反而取消了被歼灭师的番号。东北军在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事实，深深触动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他们看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新路。于是，张学良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联络。

鉴于张学良和东北军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

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反蒋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打红军是东北军的绝路,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作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为了与张学良建立直接联系,1936年1月,中共中央派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思想有很大变化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返回东北军驻地会见王以哲和张学良。高福源向张学良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说明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东北军可靠的盟军,如果愿意合作,可以派正式代表谈判。张学良为之感动,随即指定高福源去陕北,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谈判有关事宜。1月16日,高福源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见张学良的经过。中共中央即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

2月26日至2月29日,李克农与王以哲等就第六十七军与红军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最后达成口头协议:(1)为共同抗日,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至富县公路上的交通和通商。(3)肤施、甘泉的六十七军所需粮草可向苏区民众购买,恢复正常交易。(4)恢复红、白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安全之责,双方采购人员均着便衣。3月4日和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围绕对蒋介石的态度、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关于红军派代表去苏联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最后,双方在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总目标下取得了一致,达成了几项协议:(1)应张学良要求,中共在博古、周恩来、彭德怀三人中推一人做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会晤地点在东北军驻地肤施,时间由中共确定。(2)去苏联问题,红军派代表经新疆出国前,张学良先和新疆盛世

才商量并探听飞机航线情况。(3)中共派一相当负责又非声名显赫的人,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常驻西安,和各有关方面联系,以利于开展筹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工作。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促使他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通过会谈,中共和张学良彼此增进了了解,为后来周恩来、张学良举行肤施会谈铺平了道路。

洛川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3月16日赶往红军东征前线山西石楼,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也派刘鼎到东北军中做统战工作。

4月9日晚,依照洛川会谈的协议,中共派周恩来、李克农以及刘鼎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对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表示欢迎,并承诺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会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据他两年的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蒋介石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蒋介石惜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把这一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从外边逼,内外夹攻,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表示,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在后来作出“联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回到山西前线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任命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继续谈判;派白坚任驻张学良处联络员;派李克农继续保持与王

以暂的密切关系；在延安、洛川、宜川、店子、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

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了第二次会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

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和争取工作。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是典型的地方势力。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所以杨虎城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中共与杨虎城长期合作的基础，联合西北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

1935年10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住在天津的南汉宸约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申伯纯秘密会晤。南汉宸向申伯纯介绍了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安排申伯纯去南京，向正在出席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说明中共的主张。11月初，申伯纯到南京向杨虎城做了汇报，并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杨虎城希望南汉宸到西安，双方制定详细的联合抗日办法。经党组织研究同意，以南汉宸的名义向杨虎城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1）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2）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4）甲方（十七路军）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红军）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12月中旬，申伯纯由北平到西安，把南汉宸的意见转达给杨虎城。

12月初，汪锋带着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和毛泽东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汪锋与杨虎城进行了多次会谈。杨虎城对毛泽东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汪锋向杨虎城表示，今后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能

保全实力,这对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展,防止损失,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之后,杨虎城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与汪锋继续会谈,双方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做抗日准备工作”等协议。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等人从华北来到西安,就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与杨虎城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王世英希望杨虎城:(1)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2)加紧内部团结,培养青年干部。(3)与其他反蒋派别联合一致,以推动全国反蒋抗日新局面。杨虎城希望红军:(1)维持原防,互不侵犯。(2)交通运输方面尽可能地予以帮助。(3)对他的部队不要策动哗变。(4)绝对保守秘密,可以建立电台联系,不要写信或派人来。(5)红军对井岳秀保持与他同样的关系。王世英表示同意杨虎城的上述意见。后来,王世英到达陕北,又转赴山西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与杨虎城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的情况。中央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4月底,王世英由晋西经瓦窑堡、延安、西安到达杨部行辕驻地韩城,向杨虎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虎城完全同意上述原则,并答应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8月26日,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持毛泽东8月13日给杨虎城的信由陕北到达西安。9月上旬,杨虎城会见张文彬,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

虎城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物品。(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常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保持联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杨虎城任命他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此后,秘密交通站建立,西安城内设有三处,苏区边境设有淳化、洛川、宜川等处。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张、杨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结束了敌对状态,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后来,叶剑英作为红军联络处负责人常驻西安,进一步开展联合抗日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实现,从而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 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

正当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行停战、合作抗日,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调遣重兵入陕,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10月22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来到了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遭到张、杨的反对。接着,蒋介石又以避寿为名去洛阳,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并于10月31日颁布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

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全局出发,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名红军领导人名义致书蒋介石及国民党西北各将领,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不容再有“冀豆之争”,一切问题

都可以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下求得解决。张学良也上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北上抗日。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主张毁家纾难,舍身卫国。蒋介石无视中共为团结抗日所做的努力,对张、杨的规劝也无动于衷,在洛阳等地完成了一系列“剿共”部署后,于12月4日再度来到西安,驻节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东北军、西北军师以上将领讲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个是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围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另一个是张、杨如不愿意“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剿共”。这两个方案显然是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的。继续“剿共”,不但张、杨不愿意,两军广大官兵也不会接受。事实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与红军实行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为蒋介石分别吃掉两军提供了方便。因此,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并且秘密商定对策: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扣蒋,逼他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蒋介石非但不听,反而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并气急败坏地说,即使把他打死,“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12月8日,杨虎城也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同样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旋即奔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严令张、杨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至此,张、杨深切认识到,“劝谏”已不能改变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除了发动“兵谏”外,别无出路。

12月12日凌晨,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临潼和西安行动。东北军一部迅速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在西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公安局、别动大队和驻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队武装,并在西京招待所拘禁了随蒋介石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蒋作宾、朱绍良、陈继承等10余人。同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所属高级将领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确定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张学良也于当夜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西北特支及时向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报告了事变的经过。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前,西北特支在十七路军的支持下,以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宋绮云负责接管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社和秦风日报社。西北特支还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成立基层救国会组织,并以“西救会”的名义,请进步学生进工厂、机关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支持张、杨义举。

面对西安事变后的错综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①。西安事变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从而把南京置于西安

①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国各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实现后一种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所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也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援助。

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同时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明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19日,再次向南京和西安发出通电,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四项具体建议。与此同时,应张、杨的请求,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以北的泾阳、三原、富平和陕南的商洛等地,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2月17日,受张学良邀请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张学良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并表示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需要慎重。事变的处置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二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这样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

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张文彬的陪同下,去西安城内止园拜会杨虎城,商谈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杨虎城一是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二是怕蒋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对杨虎城做了解释,指出,现在不但全国人民用极大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就是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力量在争取他抗日。蒋介石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因此,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现在,蒋介石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的抗日可能性增大了。至于将来蒋介石是否报复的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除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外,周恩来还广泛接触了西安各界人士,出席各方面举行的座谈会、报告会等,同时,还分别同南京方面派来的端纳、宋子文等进行了会谈,为同蒋介石谈判的顺利举行打开了通途。

12月23日、24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城内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民主建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5)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6)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两天的谈判,基本上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条主张进行,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如下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绝对负责并保证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绝对负责,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

令飞往洛阳,办理停战撤兵手续。(3)蒋介石回京后释放“七君子”^①。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释放事宜。(4)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6)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7)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8)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0)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接受六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26日同去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了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被军中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又重新出现。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巩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战之新阶段的开始。”^②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西地区首先出现了和平的局面。西

① 指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

②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301页。

北“剿共”总司令部正式取消，国民党的“剿共”活动也在陕西地区暂时停止；驻防延安的东北军陆续撤离，红军遂驻防于此。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由保安迁到延安。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新形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1936年12月25日，中共代表博古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恢复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新的省委以贾拓夫为书记，张德生为组织部部长，李一氓为宣传部部长，彭加伦为省委秘书长。同时，省委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和民运指导委员会，分别由宋理治、欧阳钦、赵伯平任书记。1937年1月，省委又设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分别由王俊、危拱之任部长。省委机关先设在西安二府街，后迁到纸坊巷，1937年初迁往泾阳县云阳镇。

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后，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国民党的疯狂镇压，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到西安事变前，仅有极个别的党组织在活动，坚持下来的少数党员零星分散在各地。因此，省委重新建立后，把恢复全省各地、各级党的组织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1937年初，省委成员贾拓夫、张德生、惠子俊、崔廷儒以及谢华等人在西安及附近地区寻找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到1月底，西安已有党员60多人。1月下旬，中共西安市委成立，惠子俊任书记。3月25日，省委决定将中共西安市委改为中共西安市工委，张德生兼任书记，直接领导西安市的组织发展工作。期间，市委先后在西北文化日报社、泾阳东部地区工人和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党员领导干部分赴全省各地，考察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省委在直接恢复了一批老党员的党籍后，选派一些党员干部赴各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3月25日，省委“依照地域便利，依照工作基础”，将

所辖区域划分为西安、渭华、蒲白、韩合、三原、北路、关中、鄠长、平泾、泾阳、乾县、扶风 12 个区,实行分区领导。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恢复和建立了 21 个县、市党的组织,国统区共产党员有 900 多人,连同省委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员,全省共有党员 1350 多人。

省委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学习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教育,掌握统一战线工作的艺术。

1937 年 5 月 22 日至 27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会议并先后讲话。贾拓夫做了题为《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抗战而奋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要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转移到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要停止武装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改苏区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要以和平、合法、民主的工作方式代替过去的武装斗争方式。

针对当时党内不少人还习惯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斗争方式,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不够理解的情况,省委在党内刊物《党的生活》发表了《谈谈斗争方式的新变化问题》等文章,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的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判的等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能完成党促进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是要加强群众斗争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为了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将军事部改为统战部,由省委常委欧阳钦、汪锋先后担任部长。省委通过西北青年社、八路军留守处、联络站等公开和半公开组织,推动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各阶层民众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省委统战部初期工作对象主要局限在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进步的中下层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及教育界进步名流等。后来,省委将统战范围扩大到国民党政权的上层人物、中间人士和广大乡村。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历经艰难曲折的陕西省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和坚强,领导陕西人民以高昂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去。

第三编 陕西全面抗战时期的形成

第三编

中共陕西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第十五章 陕西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

一 中共中央为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努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本侵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实施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毛泽东并致电在天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汉宸,要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与国民党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要红军做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并致电在西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叶剑英,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征;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

特长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7月中旬再上江西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以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直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提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二 洛川会议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文章指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

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这一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因此,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善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之际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三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此时,北平、天津已

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蒋介石因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办事处。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治训练处等。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全军编制共4.6万人。

中央军委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保证红军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八路军重新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关于陕北红军改编

和驻防的决定》，决定：原七十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驻防富县、甘泉一带；原独立二师改编为第一二〇师工兵营，驻防神府；原独立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编为第一二〇师特务营，拟驻防靖边、横山一带；原二十七军改为第一二〇师辎重营、炮兵营，拟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原三十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以陕甘宁第三团之二、三两连及关中警卫营合编为第一二九师辎重营，驻防宁县一带；陕甘宁之一、二、四团合编为第一二九师工兵营，驻防环县、合水一带；原二十九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特务营，驻防定边、盐池；第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同官或洛川；第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淳化、旬邑、正宁之线。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红军改编完成后，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桥底镇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广大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为出师抗日的子弟兵壮行。誓师大会后，八路军各部于8月底至9月初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往抗日前线。

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民运部部长赵伯平前往东府，在八路军经过的沿途各县发动群众，迎送八路军。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给沿途各县下达命令，由地方政府负责迎送和支应事宜。

八路军途经各地，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他们通过文艺演出、书写抗日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也加深了群众对八路军的了解。八路军每到一地，群众奔走相告，犹如欢庆盛大节日，杀猪宰羊，草食壶浆，慰问子弟兵。有的地方群众搭起牌楼，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欢迎。在黄河渡口的芝川镇，由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名流参加的韩城各界迎送八路军筹备委员会，在黄河

渡口筹集了百余条渡船,调集了数百名船夫。在群众的大力协助下,数万名八路军将士顺利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第二节 陕西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一 中共陕西省委就卢沟桥事变发出 告各界同胞书和党内工作指示

西安事变后恢复的中共陕西省委,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派出多路巡视员整顿和健全各地党的组织;另一方面,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于7月10日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指出,卢沟桥事件“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外交烟幕,说明日寇对华新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就在我们面前。平津正陷于日军重围之中,整个华北处于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的前夜”,“六年来血的教训证明,这种‘退让’政策绝不能减轻日寇的进攻,相反只能增加日寇的贪欲与蛮横”^①,号召全西北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从工厂、农村、学校、兵营出来,到街道上去,参加示威!到华北去,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西安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示威,开展了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

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发出《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日寇对平津、华北进攻的总方针之下,各地党部及党团应坚决进行下列工作:(1)加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页。

紧开展抗战的宣传鼓动,广泛深入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中共中央通电和省委告同胞书的内容与立场,经过各救亡团体、群众组织发表宣言、通电,张贴标语口号,街头讲演、演剧、唱歌,把报纸、刊物、图画等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工具及方式,用到我们手中,或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为抗战而宣传鼓励。(2)立刻开始援助第二十九军运动,鼓励第二十九军将士抗战到底。(3)加紧组织抗日人民的工作,把一些只有机关没有基础、只有干部没有群众的救亡团体,转变为有群众基础的救亡团体。(4)争取抗日救国的民主自由,用民众的力量,要求地方当局立即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给民众以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反对检查与扣留救亡刊物及新闻,反对压迫民众爱国运动。(5)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从各种实际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中拥护国共合作,以实现全民族抗战。(6)保护群众利益,要发动千百万群众走上抗战的道路,首先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群众饿着肚皮,何能要求他们去抗日。(7)加强党对于一切民众运动的领导,肃清党内一切关门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

同一天,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安工委并报中共中央,卢沟桥事变扩大,西安应即进行下列工作:(1)动员各救亡团体、各学校、各界人民,发起平津抗战后援会,组织抗日示威运动,向陕西省当局举行请愿运动,慰劳坚持平津抗战的第二十九军。(2)由各团体致电第二十九军,请再坚决抗战,保卫平津、华北,并通电国民党最高当局立即派大军北上援助第二十九军。(3)动员各报纸、刊物加紧抗战宣传,组织宣传队到街头、近郊宣传,标语、口号、传单应广泛,扩大保卫平津与抗战宣传。(4)由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动员各界救亡团体及回家学生推动各界救亡运动。(5)肃清汉奸、日本侦探的反动口号,并发动群众予以打击。(6)以上工作与扩大巩固抗日救国会及争取民主运动密切联系之。

陕西省委发布的《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和两个党内指示,对于动员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支持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具体领导和坚决支持下,陕西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首先以满腔的爱国热忱迅速投入抗战宣传的行列。7月13日,在陕西省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发布《告各界同胞书》,指出:“值此平津危急,中华民族最后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国同胞总动员实行对日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誓死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为保卫祖国的完整愿流最后一滴血!”接着,西安各青年团体负责人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商讨陕西国统区青年学生推动和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具体措施。15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分别发出《为日寇进攻华北宣言》和致国民政府电,表示誓死保卫国土完整,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要求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作战,支持第二十九军英勇作战。为扩大抗日宣传,从1937年9月开始,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各校学生在西安郊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宣传,随后连续组织了150多个农村工作团和寒假回乡工作团,分赴关中和陕南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救亡团体。在西安各救亡团体的影响下,许多县的中小学生也迅速采取同样的形式到农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

在国难当头之际,陕西妇女界也奋起救亡。1937年8月16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的陕西妇女慰劳分会在西安成立。陕西妇女慰劳分会成立后,随即组织了工作团,深入农村,向广大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分会创办的《西北妇女》,深受妇女界的欢迎,是陕西国统区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经过妇女慰劳分会深入细致地工作,陕西国统区有35个县建立了妇女慰劳会支会,她们为前线募集现金折合银币5000多元,金银器

100 多件,募到 10 万条棉被和大量的鞋袜。她们还救护伤员,慰问抗日军队,广大妇女成为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38 年,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建立的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 15 个,成员近 4 万人。抗日团体创办的和在中共陕西组织影响下的报刊有《西北战线》、《老百姓》、《学生呼声》、《大团结》等 20 多种。这些报刊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 年 6 月 15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恢复,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安市各界救国会等 14 个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于 16 日书面请求其领导,并要求参加更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提出组织抗敌后援会,中共陕西省委于 19 日致函表示赞同,并要求其开放民众运动,增强抗日力量,扩大救亡运动,促使陕西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扩大。但是,坚持蒋介石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对抗日救亡团体采取了敌视、限制、打击、取缔的方针,以省抗敌后援会要“统一指挥,整齐步伐,合一意志”为名,诬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为“非法团体”,并于 8 月 24 日在《西京日报》刊登了取缔 14 个抗日救亡团体的第 15 号通告,不准青年学生上街为抗日募捐,不准下乡宣传,不准组织战地服务团,不准上街讲演、演救国戏剧,不准召开群众大会,不准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杂志,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社会各界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例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8 月 28 日,被下令解散的 14 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发表《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一封公开信》,申述各救亡团体为群众爱国热忱所结成,批评陕西省党部第 18 号通告“实为自抛其卵,自覆其巢的政策”。9 月 1 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快邮代电,支持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合理要求,建议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包办的抗敌后援会实行改组,允许西北各界

救国联合会等各团体全体加入抗敌后援会,以求集中抗敌力量,统一救亡运动。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据理力争,通过谈判、斗争和必要的让步,在省抗敌后援会实行改组的条件下,停止了活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改名为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各县学生救国联合会也相继改名为合法的县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

各地的学生分会运用合法地位,广泛地开展各种救亡运动。10月1日,西安学生分会呈文国民党陕西省当局,要求实施战时教育,实行抗日自由和开放民众运动。19日,在中共西安市工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西安学生万余人在易俗社广场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高呼“开放民众运动”、“实施国难教育”等口号,各界代表纷纷发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错误政策,会后进行了游行请愿。经过斗争,陕西省中等学校的学生基本上获得了半日上课半日参加救亡活动、到农村去做抗日宣传等抗日民主权利。

为了团结抗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和支持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支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成立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西北教盟”)开展活动。共产党员杨明轩等积极加入“西北教盟”,杨明轩还被选为“西北教盟”的主席。

“西北教盟”成立后,首先起草了《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并附《寒假工作提纲》,由省教育厅铅印成册,分发全省使用;继而又编拟了《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以中学、师范、小学和大众教育(社会教育)等部分别提出各类学校在国难期间的教育目标、实施原则、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西北教盟”还借省教育厅名义在三原县设立陕西省教育厅初等教育人员训练班,并由杨明轩任所长,对原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进行改组,对教师进行国难教育的集训。1938年7月23日,“西北教盟”在西安举行代表大会,杨

明轩、李寿亭、车向忱、张寒晖、张耀斗等当选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杨明轩继续当选为主席。由共产党员领导的“西北教盟”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宣传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 保卫陕西和支援抗日前线的斗争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日军侵华战争的战略重点是占领华中及华南，但同时也妄图以山西为基地，强行西渡黄河，进犯陕西及西北。11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为全陕紧急动员保卫陕西通电》，及时向陕西各界提出“保卫陕西及西北”的口号，要求国民党陕西当局及一切民众团体，为保卫陕西及西北紧急行动起来，组织陕西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迎击日军进攻。随后，省委派巡视员到黄河沿岸各县国统区，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好抗击日军的准备。

1938年3月初，日军占领风陵渡，进逼潼关，疯狂炮击陕西河防阵地。陕西直接处于日军的进攻之下，形势骤然危急。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保卫陕西宣言》，号召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最高原则下，为保卫陕西而奋斗，并提出加强潼关及沿河防线，划分适合战时的行政区域，建立全省、县、区乡动员民众机关，巩固陕西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力量的团结等具体主张。同时，省委还以省妇女慰劳分会名义发起组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平津同学会、西安抗协总会、东北救亡会等20多个救亡团体，先后赴黄河沿县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并到黄河防线的国民党军队里进行慰问。

在保卫陕西的斗争中，中共组织积极进行民众武装建设，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中共沿河特委与驻防沿河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相配合，成立了沿河九县动员委员会，各县都成立了战时工作团，发动民众协助部队守卫河西防线，并举办军事训练大队，

对沿河各县的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各县成立了抗日民众自卫队,平民^①、朝邑、合阳等县的民众自卫队渡河参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动员 300 多名队员到前线参军参战,还在西安城南举行了四五千人参加的军事演习。西安 500 多名进步学生组织的 19 个战时工作团,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奔赴华阴、潼关、合阳、富平、澄城等 10 余县,组织动员武装群众。

陕西各界群众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投入保卫陕西的战斗。

四 支持“陕军”开赴抗日前线

中共陕西组织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扩大统一战线范围,推动驻陕国民党军队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扎在陕西国统区境内的国民党部队陆续离开陕西,开赴抗日前线。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动员群众进行慰问和欢送。

1937 年 7 月 10 日,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率部从驻地绥德东渡黄河,首战参加平型关战役。

7 月 21 日,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率万余将士在三原县城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各界代表及数万群众热烈欢送。24 日,十七师抵达河北省深县,与日军初战于保定。

8 月 14 日,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率 2800 余名壮士在西安北校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8 月 28 日,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在三原县城举行欢送第五二九旅开赴抗日前线参战大会。李兴中师长、许权中旅长、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及群众代表讲话。9 月 1 日,第五二九旅从三原出发,

^① 旧县名,1950 年撤销,辖区并入朝邑县,1954 年随朝邑县一起并入大荔县。

10日与日军激战于山西忻口。

12月,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和驻晋绥边的第三十五军各一部合编为伊东游击纵队,计7000余人。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兼纵队司令,高部团长高致凯任副司令,代司令,与日军战于陕晋绥边。

1938年1月1日,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司令张飞生、副司令张介恒在武功县宣誓就职。义勇军是由有志于抗日的回乡退伍军人和劳动青年自发组成的,下辖5个团,5000多人枪。不久,张飞生改任参议,何文鼎为司令。该部出省后与日军首战于晋西南永济县。

5月3日,第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率师直属部队及第五三〇旅东渡黄河,与日军激战于晋西南。

6月,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率部东渡黄河,坚守永济县,阻挡日伪军进攻陕西。

由三秦子弟组成的“陕军”,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在陕西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开赴抗日前线,屡建战功。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由十七路军改编而成的第三十八军。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八军中长期、广泛、深入地开展团结抗日工作,也由于部队中广大党员不怕牺牲、英勇抗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得三十八军成为抗日的一支劲旅。在八年抗战中,三十八军率先参加了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进行了空前惨烈的永济战役,坚守中条山两年多,打退日军11次进攻和扫荡,使得日军视中条山为中国战区的“盲肠”。卫立煌称赞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在守卫洛阳至郑州段黄河防务期间,三十八军发动了广武战役,开展了豫北游击战,将日军围困在黄河桥头,两年不得挪动。在河南战役中,坚守巩东阵地,血战虎牢关,后又拒敌于洛宁、卢氏一线,保证了西安及关中的安全。三十八军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坚强的抗日部队之一。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上)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和巩固

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之指导”。随后,陕甘宁苏区开始了更名改制的准备工作。

苏区更名改制的准备工作,是从苏区内部和苏区外部两个方面进行的。

在苏区内部,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负责筹备苏区的更名改制工作。4月26日,西北办事处决定成立选举法、政府系统组织法、文化建设计划、经济建设计划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由蔡树藩、谢觉哉、徐特立、蔡子伟负责,起草有关条例和计划。5月,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出“关于工会工作”、“关于改造赤卫军”、“关于改造贫农团”、“关于妇女组织”等指示,决定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面前,对边区工作中的政策作必要的调整。所有政策方面的调整,都是为苏区的更名改制做准备的。

在苏区外部,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上海、庐山、南京等地,就苏区改制后的名称、辖区和行政长官人选等问题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并要求国民党发表公开文件,承认更名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3月8日,双方代表意见趋于一致: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其行政人员经

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委任”。但顾祝同在向蒋介石上报由周恩来起草、经双方同意的书面条文时,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分属陕、甘、宁三省的“地方行政区”,并称此为中共代表单方面所提出。3月下旬,周恩来对蒋介石表示:陕甘宁边区为整个区域,不能分割。蒋介石说: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5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由九人组成,中共方面的是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南京方面的是张冲、杜斌丞。7月18日,周恩来提出12条谈判意见交蒋介石,其中有: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称,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选择一人担任边区政府正职,林伯渠担任副职,其管辖范围是现在所辖的18个县(延安、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8月29日,国民党代表康泽转告叶剑英,陕甘宁边区公署主任内定丁维汾,副主任林伯渠。9月2日,周恩来致电康泽转蒋介石,拒绝丁维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中共坚持以林伯渠、张国焘为边区政府正、副长官。

由于国共双方代表在陕甘宁边区的名称、行政长官人选和管辖区域等问题上的谈判难趋一致,为了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不得已先行实践关于苏区更名改制的承诺,于9月6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二 争取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的斗争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使边区合法化,中共中央继续派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193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林伯渠、秦邦宪、叶剑英等,在谈判中,应向南京方面提出下列六项要求,速为发表,以保障红军在前线安心杀敌。甲,承认特区的民选制度,特区政府经人民选出后可以由南京委任。乙,委任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特区政府委员,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坚决拒绝丁维汾)。丙,设民政、建设、教育、农工、财政五厅(反对设处)及保安司令部。丁,特区范围包括宜川、富县、洛川、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西峰镇、镇原、预旺、环县、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横山南中部、安定(包括瓦窑堡)、米脂、绥德、清涧、佳县、吴堡、神府苏区、延川、延长在内。戊,特区经费每月15万元,另善后遣散费60万元。己,保安师编制9500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将此电原文抄送蒋鼎文。但是10月12日举行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却通过了军事委员会的函请,决议“简派丁维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①为副行政长官,丁维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会议虽然通过将陕甘宁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但未明文公布。此后,国民党出尔反尔,拒不兑现承诺。

11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敌人侵入山西、绥远,整个陕北已成直接抗战区域,又是八路军直接后方,故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宜川及原有神府苏区必须划入特区方利抗战;三边及横山南部亦为我们抗战必要,盐池、预旺亦然;镇原、西峰、庆阳、合水、正宁、宁县、淳化、旬邑原为八路军补充区,现各留有营底,洛川是通往西安的大道,延安被轰炸,机关即须移往该处。上述各县,连同苏区各中心县与27个整县,加上神木、府谷、横山3个半县,再加安边、西峰2个市镇,必须为陕甘宁边区的管辖区域。

在1938年进行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陕甘宁边区管辖

① 即林伯渠。

区域为23个县;边区政府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国民党坚持:边区所辖区域限于18个县,不允许增加;丁惟汾为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不允许边区政府设立农工厅,并向边区政府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各派两人任职。谈判竟年,没有结果。

1939年2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边区的行政区域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1)陕甘宁边区现在实际管辖者为下列各县:肤施、甘泉、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另有神木、府谷之一部。(2)查民国二十六年^①十二月签呈陕甘宁边区所辖范围,除上列县区外,原因洛川、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等五县环绕边区,而各县之内亦多原有苏区,故曾将此五县一并划归边区管辖,今为行政管理方便计,该五县请仍隶原省,不必改划。惟另请将清涧、米脂、吴堡、绥德、佳县等五县划归边区管理,此则因该各县早已划归八路军河防部队驻守,且与边区有历史联系,为此可便于指挥和管理也。”^②并附陕甘宁边区管辖区域图,要求行政院予以备案。但是,林伯渠的呈呈仍然石沉大海。

1940年1月9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叶剑英谈判时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专员区,将原定的18个县划去淳化、旬邑、正宁、宁县,为14个县。7月2日,国民党中央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陕北行政区,辖15个县,行政区公署隶属行政院,归陕西省政府指导;第十八集团军留陕甘宁部队一律撤至陕北行政区。1941年2月25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张冲提出,国民政府必须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时隔三年,国民党又在1944年4月16日拟定的《中共政治问

^① 即1937年。

^②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6页。

题解决办法草案》中,再次提出“改陕甘宁边区为陕北行政区,陕北行政公署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辖 18 个县(内 3 县系一部分)”。5 月 9 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又托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以书面形式转告在重庆的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的管辖区域,“以原有区域为范围,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林伯渠将“以原有区域为范围”改为“以现有区域为范围”,签字后退还雷震。此后,国民党再无下文。

国民党和蒋介石虽然曾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由于他们畏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壮大,所以坚持“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始终不予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其所辖的行政区域。1944 年 6 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说:“边区这地方,原来由军委会划给 26 个县,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同时经国民政府行政院 333 次会议通过。当时没有明文公布。到以后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骗局,以便不实行诺言。”“因为是一个骗局,虽然承认了,但不实行诺言,以后我们屡次提出,他们不能否认。”^①

三 “双重政权”局面的结束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初期,管辖的区域里情形复杂,大致有三种情况:(1)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辟的苏维埃区域。(2)一部分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撤出的驻防区。(3)一部分是西安事变和平谈判中国民党给部分红军指定的驻扎区。因此,半数县份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共产党领导的由苏维埃政权更名改制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其县政府大都设在农村集镇;国民党领导的县政府大都设在县城里,也有两个县政府都设在一个县城里的。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18 页。

在边区的国民党政权中,反动的顽固分子居多。因国民政府行政院迟迟不公开承认边区及其行政长官的合法地位,加之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陕西省党部推行《推进陕甘宁边境党务办法》,诬蔑边区为“恶势力盘踞”,将边区划分为四个督导区,由国民党中央派员进行“秘密调查分化工作”。因此,反动的顽固分子有恃无恐。他们指示部属公开进行反共宣传,制造谣言,假冒八路军进行破坏活动,挑拨离间八路军与群众的关系;唆使一些原先逃离苏区的地主分子返乡,同在乡的反动地主相勾结,一起进行反攻倒算,向农民夺土地,收旧租,要旧账;唆使反动民团、土匪骚扰民主政府辖区,解散抗日救亡组织,以至枪杀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其中绥德的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洛川的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钟相毓、安定县长田杰生等更是反共、破坏统一抗战的“摩擦”专家。

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国民党政权已成为破坏国共合作抗战、欺压群众的恶劣势力。“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2块钱,一个是月饷180块钱,拿2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180块钱的是反共专家。然而反共专家管的地方,只有窑洞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反共,破坏,搞特务工作。他们这样反共下去,一定要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天下没有不走之狗,也没有不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专家。”^①因此,中共中央、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强烈要求国民党撤出他们派在边区境内的行政专员和县长。

1940年2月3日,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要求撤职严办国民党委派的贪赃枉法、纵兵为匪、扰乱后方的富县县长蒋隆堪,该县行政应完全受边区政府节制,洛川专员不得干涉。后边区政府委派罗成德为富县县长。2月18日,罗成德颁发《富县县政府布告》,宣告富县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区域。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天水行营主任程潜、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在陈述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的七条劣迹后指出:为地方计,为人民计,为抗战团结计,拟请将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提请援米佳吴清警备区司令王震兼理专员一职,并将绥德警备区五县行政区划归边区管辖。

2月19日,萧劲光再电程潜,要求陕西省政府将陕甘宁边区内的淳化、旬邑、甘泉、肤施、延长、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靖边、定边13个县的县长撤走,以杜绝纠纷,巩固团结。程潜回电同意撤销国民党委派在边区13个县的县长。

国民党设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的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和13个县政府退出了边区。在13名县长中,除自愿留在边区民主政府担任公职外,或潜逃,或被驱逐出境。边区境内的双重政权局面结束了。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的行政区域。全区设5个分区,下辖1个市,30个县。延属分区辖延安市及延安、甘泉、富县、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固临9个县,人口约38万;绥德分区辖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子洲、吴堡、神府7个县,人口约56.2万;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人口约12.1万;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6个县,人口约26.2万;三边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①4个县,人口约10.5万。其中延安市和固临、子洲、神府、淳耀、赤水、新正、新宁、吴旗是边区政府新设置的县。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虽然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但边

① 今吴起县。

区政府辖1个市,30个县的实际行政区域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

一 党组织的发展沿革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根据地由地方根据地转变为中央根据地,中共中央开始直接领导根据地的工作。为了适应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特区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地党的工作。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正式执委17人: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建贞、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候补执委6人: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佩勋。5月17日,第一次执委会推选郭洪涛为书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特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中共陕北省委,分别成立陕北东分区委员会(书记张达志)、西分区委员会(书记马文瑞),原归陕北省委管辖的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改由特区党委领导。1937年9月,陕甘宁特区党委改称陕甘宁边区党委后,边区党委撤销了中共陕北东分区委员会和西分区委员会,其所属县委由边区党委直接管辖;撤销中共陕甘宁省委,成立庆环分区委员会(书记马文瑞)。10月,在定边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改中共关中特委为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此后,边区党委还在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和边区南部洛川一带,分别成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郭洪涛兼书记)和洛川工委(书记高克林)。1938年4月,郭洪涛调往山东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接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

员会,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等西北各省党的秘密工作。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边区党委抓紧有利时机,大量吸收新党员,至1939年底,边区党员由1937年5月的3.2万余人发展到5.4万多人。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举行。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指出边区党的各级组织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再次号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陈云分别做了题为《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边区党委,高岗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

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党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5月17日,中共中央任命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西北局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统管西北地区党的工作。194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1944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

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庆环分委,成立中共陇东分区特委。1941年11月,洛川特委并入富县县委。1942年底,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这一时期,西北中央局对边区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调整,陇东、三边分委分别改为陇东、三边地委,成立延属地委,地委书记兼任警备区司令部或军分区政治委员。

截至1941年春,边区各县都成立了县委,基层党组织遍布乡

镇、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

1943年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人民武装逐步对日伪军展开反攻。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壮大党的队伍,发展革命力量。1944年4月,西北局召开党务工作座谈会,决定“吸收各个战线上发现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反顽锄奸和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有威信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会议还规定,凡符合党员条件的青年,满15岁不满18岁者,可以吸收为预备党员;18岁以上者,可以吸收为正式党员。会后,各级党委及时制定发展计划,努力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严格审查,广泛吸收党员。

二 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和文化学习

在发展组织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党组织还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教育,并加强文化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竞赛的号召。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将边区党、政、军干部按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丙类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社论、重要文章等。同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特别强调,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指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一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领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而努力地学习,并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

1940年春,边区党委对全边区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检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明确规定党、政、军机关均增设干部教育科,建立干部学习日制度,定期组织干部进行学习讨

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边区党委在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政治教育方面,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边区党校轮流训练区级干部及乡级主要干部,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干部训练班,在职干部实行每日两小时学习制;由边区党委提供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由边区干部和小学教师中的党员担当训练班教员。在干部文化教育方面,为改变干部不识字的情况,动员他们参加识字班、夜校、冬学及其他补习学校。

1941年5月,毛泽东在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据此,中共西北中央局号召把理论学习与研究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9月,西北局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临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固临调查》一书。12月,林伯渠率边区政府考察团去富县、甘泉,深入区、乡实地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写出《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随后,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分赴各县,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地考察。

经过两年的学习和调查研究,边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对边区的实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边区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加强,党的政策得到较好地贯彻执行。

三 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到1943年,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党的作风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运动。由于这次整风运动发端于延安,又以延安为典型,所以一般称之为“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演说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发表。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新的团结。

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是按系统进行的。4月14日,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边区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其下设立党、政、军三个学习委员会,领导各个系统的整风学习。

4月2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边区总学委召开有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做了具体安排。会后,边区各系统、各单位分层次、自上而下地陆续掀起了整风学习的热潮。各系统的1.2万名干部和学校师生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检查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较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深化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准则的认识。经过整风,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状况、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和作风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在全党整风期间,鉴于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了特务活动,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部分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干工作。但在审干过程中对国民党特务活动作出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身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兼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审干和反特斗争中发动了所谓的“抢

“抢救失足者运动”，采用逼供信的方法，制造了一个个冤假错案。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被“抢救”者达百余人，以致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并立即坚决加以纠正。毛泽东在干部会上首先承担了责任，中共中央于1943年8月15日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精神，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历时数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得以遏制。

“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挫伤了一批党员干部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①从1943年12月开始，西北局对边区一级和各地的冤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了甄别平反。

四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和西北历史座谈会

在边区整风运动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把边区党组织建设得更好，中共西北中央局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在开幕日和闭幕日都到会讲话，并且在会议期间做了两个重要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人也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各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的干部。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

西北局确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正确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是正确的。清算了“左”倾错误给边区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对1935年九十月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西北根据地实行情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造成西北根据地的危机的问題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彻底的平反,解决了长期以来对陕北地区党内历史问题的争论。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与会者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及民众团体平列的观点,明确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切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原则。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一致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形成了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的团结。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党的基本任务。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从1938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根据1941年统计,边区的农民已经开荒230余万亩,种棉花9.4万余亩,其他如畜牧、纺织、运盐和合作社事业也都有了发展。人民政府已经建立了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自给工业的基础,军队生产已经自给了经费的60%~80%,机关学校生产已经自给了经常经费的57%~90%。这三部分公营经济总起来已经占整个财政供给的五分之三。但是,多数人还没有深

刻了解到经济建设工作是边区相对和平环境下唯一的中心工作。为了明确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边区的建设方针,毛泽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写了长达10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由贺龙向高干会议进行了传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以及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为要完全解决经济财政问题,必须厉行精兵简政,纠正过去不愿彻底精简的态度,大量地减少消费人员而增加生产人员。

西北局高干会议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于边区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起了先行一步的试点作用。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1944年3月初,周恩来做了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提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并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结论。

1945年6月26日至8月2日,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参加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会议对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做了较为深入的回顾分析,对历史上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以及对

西北根据地“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一些当事人也在一些问题上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承担了责任。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是非,达到了加强团结的目的。

五 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整风学习

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的整风学习,较边区晚一步。

参加中共关中地委领导的整风学习的人员有两部分,一是边区内的分区、县两级机关的干部,一是进入边区的陕西国统区党组织所属的党员和干部。对于边区内的学习人员,地委按照西北局1942年8月15日的指示,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或每月集中几天集体学习,或给干部规定学习具体任务,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或举办学习班。地委要求在深入学习党内整风文件的同时,还要结合评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深刻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从而保持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纯洁性,提高坚持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自觉性。

中共关中地委领导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进行整风,主要办法是把在当地已经暴露,站不住脚的党员、干部调进边区,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地委将商洛地区进入边区的80多名党员干部组成“德记骡马店”,以巩德芳为经理,谢兴军为副经理,刘拓、王杰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集中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办了有百亩土地的两个农场,粮食生产逐步实现自给有余,还办了磨坊、粉坊、挂面坊、豆腐坊、木炭窑和杂货店,养猪,跑运输,学习和生产两丰收。谈国帆、王志温带领临潼县交口镇的40多名党员、干部进入边区后,也是用这种办法进行整风学习的。零星进入边区的党员、干部则是住地委招待所,由地委组织部或统战部指定人员帮助他们进行整风学习。对在国统区坚持隐蔽斗争的党员、干部,则由地委派出的交通员口头传达整风学习文件精神。

1943年3月,中共关中地委开展了审干工作,开始对保卫、组织、机要、统战等部门的少数干部进行在职审查。5月28日,地委建立了地方干部整风训练班,先后将9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审查。7月,由于环境变化,遵照西北局指示,关中地委将一批知识分子新干部送往延安学习、审查。8月29日,地委确定从9月1日起,地委、专员公署、保安分处、整训班及其他机关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干部,以审查干部思想历史、清查奸细为主。9月5日,军队整风队成立。10月7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正式布置各县普遍审查干部工作。受边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审干中出现了“左”的偏向,一些人被打成“特务”,造成了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审干工作九条方针下达后,地委从12月初开始坚决纠正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给受委屈的同志甄别平反,赔礼道歉,并认真总结审干工作中的教训。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一 边区的政权体系与职能

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陕甘宁边区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成立了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政权分边区、县、乡三级,由议会、政府和法院组成。

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最重要民主制度。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1937年12月,选举产生了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边区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其职权是: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及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的政务人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地方军事等项计划;通过和审查边区政府的预决算;决定征收、

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发行地方公债;审议和决定议员的各项提案及其他兴革事宜。议长、副议长和其他常驻议员,也由参议会选举产生。由常驻议员组成的常驻委员会,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监督政府执行参议会的决议案,听取工作报告,提出询问和建议,出席政府委员会议和召集临时参议会。边区参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政府委员会,是参议会闭会期间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边区的政务,并向参议会负责和报告工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是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设专员、副专员,按照边区政府的命令和指示,指导和监督所辖各县政务及边区政府驻分区的附属机关。

县政权是推行边区各项政策的中坚力量。县参议会是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性质、职权在本县范围内同边区参议会大体一致。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和县政府委员及县法院院长。县政府委员会在县参议会闭会期间负责政务实施。县政府下设秘书、民政、财务、建设、教育、粮食、保安等科室及司法处、保安大队等机构。县的派出代表机关是区公署,协助县政府指导所属各乡的政权工作。

乡政府是边区的基层政权组织。乡参议会是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设议长和常驻议员,只在每次开会时推选三人组成主席团(乡长为当然成员)主持会议。乡一级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制度,乡参议会选举乡长,乡政府委员组成乡政府委员会,执行全乡政务,并对上级政府和乡参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下设行政村,行政村辖若干自然村。

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分区设高等法院分庭,县设县法院。高等法院和县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

二 边区的两次普选与两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制度是使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各族

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选举制度。抗战期间,边区共进行了两次民主选举。

1937年7月,经过试点后,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选举由下而上逐步展开,各阶级、党派和社团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竞选名单。每20人选举一名乡代表,每200人选举一名县议员,每1500人选举一名边区代表。《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陕甘宁边区“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选举制,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月6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出《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重申“现在是普选,除汉奸外,不分阶级,都有选举权。苏区现虽无别党,但我们已允许别的党存在”。11月,在完成乡选、县选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各县市的党委陆续提出边区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12月,经过各地直接选举或县代表大会选举,选出边区代表500多名。至此,历时半年多的边区选举运动全部结束。

为了使人民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边区政府根据老百姓文化程度低下,居住分散的情况,在普选过程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选举方法:识字者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者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者采用简单易行的投豆法、烙票法、举手法等;交通不便的则采用挨户送票法。选举谁和不选举谁,选民有充分的自由,并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保障这种自由权。这些生动有趣、别开生面的选举方法,折射出边区人民追求民主的精神,也反映了边区民主的普遍性和真实性。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选举林伯渠(主席)、高自立(副主席)、雷经天(高等法院院长)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高岗(参议会议长)、张邦英(副议长)等9人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党

内指示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 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 1/3。”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

1941 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民主普选,这是一次贯彻“三三制”精神的选举运动。为贯彻这一精神,边区首先在绥德、陇东分区及富县试行“三三制”,以取得经验。从 5 月开始,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选举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自下而上普遍展开。7 月,乡(市)选举陆续完成,边区 80% 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共选出乡(市)参议员近 3 万名,共产党员占 1/3 强。各乡召开了乡参议会或代表会,选举了乡长,组成了新的乡政府。之后,县和边区两级参议会也开始选举,选出县参议员 2624 名,边区参议员 242 名(含 31 名候补参议员)。选举边区参议员时,由于很多党外候选人落选,边区政府正式聘请了 46 名非党人士担任边区参议员,一些县政府也聘请了非党人士担任县参议员。经过选举和聘请,边区和各县参议会的组成人员大体符合“三三制”的原则。

1941 年 11 月 6 日至 21 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隆重举行。大会接受并通过了中共边区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两个决议,9 个重要条例和 400 余件提案,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因当选的边区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超出 1/3,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召开,为“三三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政权建设中,边区还注意把“三三制”的原则贯彻到政府的各项工作、各级各类组织机构之中,充分团结非党进步人士和中间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他们从事抗战、建设边区的作用。边区政府经常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征询他们对政府大政方针的意

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与民主人士领导干部深交朋友,虚心听取意见;边区政府还切实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参议员中的少数民族名额按人口比例高于汉族。党外人士也从心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合作得非常融洽。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非党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①

在实行“三三制”,解决民主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注重发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作用,倾听他们的意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创造,提拔他们中的一部分参加各级政权工作,作为政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并通过他们去团结更广大的劳动群众。这不仅是“三三制”的一种极好的补充形式,而且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三级民主选举中,不少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当选为各级参议会的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三 精兵简政与各项制度建设

精兵简政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精简,基本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

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毛泽东看了议案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②此后,精兵简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开始在边区贯彻执行。第一次精简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结束,共裁减归并机构百余个,缩减1598人,占边区各级机关原有人数的24%。缩减的人员大部分充实到区、乡级行政机构。第

①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502页。

二次精简从1942年5月部署,到9月结束,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提高县政府的职能。1943年3月24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开始进行第三次精简,把35个机构减为22个,409人减为279人,其他各级政府也相应做了精简。经过三次精简,达到了机构精干、工作效能提高、作风改进、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党政军组织的统一领导等目的,使抗日民主政策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成立的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把加强政权建设列为整风的重要内容。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林伯渠做了《政权工作中的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简政整政问题》和《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等报告和发言。会后,边区政府在原已公布的各项规章、条例的基础上,又陆续公布了一些规范公务人员行为,使各级政府工作制度化的条例,如《修正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

边区对司法工作也很重视,逐步健全了司法机关,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在司法工作实践中,还结合边区实际形成了马锡五审判方式。^①这种审判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把握案情;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合理合法地处理案件;就地审判,不拘形式;可以调解的尽量调解。

人权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受到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写有保障人权的条款。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施政纲领和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

^① 马锡五时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总结的一种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审判方式的新的审判方式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

业与宗教,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信仰及抗日自卫的自由;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个人均无逮捕、审讯、处理及侵犯他人的权利;而人民则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权观念,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加强各抗日阶层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上述政权建设措施的实施,对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一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和八路军留守兵团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时,各师均在陕甘宁边区境内留了一部分部队,这是边区军事建设的主体。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并分设东区、西区留守处。神府、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为东地区,驻守部队为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辐重营,第一二〇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辐重营及第三五九旅七一一八团;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县等为西地区,驻守部队为第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辐重营及第三八五旅七七〇团。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为参谋长,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所辖兵力约9000人。

10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驻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陕甘宁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后又将第七一八团改编为警备第八团。第七七〇团番号未变。

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为八路军留

守兵团(后“总留守处”和“留守兵团”的名义根据需要分别使用),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据此,留守兵团切实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以适应战时及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首先,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从1937年底到1938年7月,留守兵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强调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心,积极开展“生产、学习”两大运动和“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大工作,提出了“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的口号,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教育制度,组织学习小组,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以及文化的学习。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增强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进行组织和纪律整顿。经过整顿,部队严格了军事生活,建立了正常秩序,加强了团结,改善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再次,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技术的学习,不断提高战斗力。技术训练着重于刺杀、射击、投弹和近迫作业的提高;战术训练以近战为中心,训练班排动作、夜间战斗、河川战斗以及森林、沙漠、高梁地等特殊地形条件下的战斗;提出“任务重于生命”的口号,培养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经过军事训练和学习,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

在边区军队建设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首创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双拥”运动。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前后,驻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同时发起拥军拥政运动月活动。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拥军公约》和《开展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

驻军。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出《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贺年,增进军民感情。此后,“双拥”活动在边区迅速展开。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将拥政爱民列为抗日根据地十大政策之一。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双拥”运动,是政府、军队和人民之间相互联系,增进团结的重要活动,成为人民军队和各级政府的优良传统。

二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保安司令部下辖10多个保安基干大队,共约5000人。

边区的保安部队是由各地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其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救国,镇压汉奸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协助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指挥。后又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指挥。

1942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吕振球为政治委员,陈伯钧为副司令员。

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全边区保安部队,下辖庆环、陇东、三边、神府、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及各县保安队。

1942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警备第三旅。

三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与晋西北联防军

政治部,管辖两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任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并入联防军政治部。

1942年6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正式成立。9月1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并入联防军司令部(对外仍称留守兵团司令部)。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后高岗代理),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副政治委员高岗、林枫,参谋长张经武。10月1日,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整编会议。经过整编,各独立团、队扩编为旅,每旅辖一、二个主力团,其余编为小团,总兵力为5个旅21个团,共3.2万余人。其中,第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第三五九旅驻防延属分区,警备第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备第三旅驻防三边分区,骑兵旅驻防葫芦河。后,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第三五九旅兼延属军分区。

四 群众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军

组建广泛的群众武装组织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8月2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赤卫军改名为抗日自卫军,规定抗日自卫军“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保卫边区的武装力量,是抗日的后备军”,“由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条例》共10条,对自卫军的性质、任务、队员、编制、武器、各级首长选任、纪律、训练、指挥做了具体的规定。自卫军的任务是:“甲.保卫边区;乙.配合保安

队或单独负责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匪徒,捕捉侦探;丙,担任警戒,设置盘查哨;丁,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戊,经常进行抗战训练,负担战时有关军事的工作。”凡年龄在 18 岁以上 45 岁以下身体健壮的人民,均有自愿加入自卫军的权利,自卫军的最高建制为营,营长由边区保安司令部任免,连、排、班长及副职由连、排、班队员大会选举,报经上级批准。按实际情况,自卫军编制有基于自卫军的班、排、连,并由保安司令部发给一部分新式武器。

边区的自卫军组织发展很快。到 1938 年底,自卫军队员发展到 22 万人,其中基于自卫军 3 万多人。为加强对这支武装的领导,边区保安司令部专门设立了人民武装科,各县设保安大队部,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另设脱产的副大队长一人;各区设自卫军营,区长兼营长;各乡设连或排,由乡党支部或乡政府领导。

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性群众武装团体,平时利用农闲操练,战时担任后方勤务,协助主力部队作战。自卫军在维护地方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自卫军,三位一体,胜利地保卫了千里河防线,剿灭了土匪,阻止或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从而使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得以顺利进行各项建设。

第十七章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下)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一 农业生产

陕甘宁边区处于分散的经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从边区经济状况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农业第一、工业(主要是手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经济建设方针。

为落实“农业第一”的经济建设方针,边区首先要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而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关键又是土地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已有半数以上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未经土改的地区则在抗战开始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规定,租佃债权债务双方均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1942年10月11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后,未经土改的地区召开租户会议,成立农会、减租会、减租保地会、租户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据绥德县6个区、米脂县3个区、子洲县5个区、清涧县3个半乡、佳县个别村的综合统计,除按条例减租外,还勾销欠租3.17万多石,退租1800多石,并在抽约换约的同时进行土地回赎。通过减租减息,适当地调节了边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也使地主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是边区经济的主体。抗战期间,边区的农业生产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

1937年至1939年为恢复阶段。这个阶段实行争取外援、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在内战时期遭到很大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号召一切可能的地方发展农业和工业,开展合作化运动,自己动手,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这一年,全边区开荒105.5万多亩,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万亩增至10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由103万石左右增至137万多石,牛、驴由10多万头增至28万多头,羊由50万只左右增至117万只。

1940年至1942年为自力更生、克服严重困难阶段。1940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强调“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2月3日,边区中央局在延安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提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完全的自给”。1941年至1942年,边区党政机关的工作重点是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农业生产。1942年,粮食总产量150多万石,棉花总产量140.3万余斤,公粮征收则由上年的20万石减为16万石。1940年到1942年三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3年以后,是为丰衣足食而斗争的全面发展阶段。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几年来生产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提出了生产第一的任务。194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丰衣足食”的号召。3月4日,中央生产委员会召开延安各机关、部队、

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以此为契机,边区军民开展了以“丰衣足食”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11月,边区举办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从展出的情况看,全边区耕地总面积约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约181万石,除满足消费外,尚节余21万石;总劳力33万人,参加互助组的占1/4;安置移民约8000户;棉花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产棉约173万斤,达需要量的50%以上。1944年以后,农业又有新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耕三余一”的要求。到1945年,耕地为1520多万亩,植棉约35万亩,牛、驴约40万头,羊约196万只。公粮降至12.4万石。

二 工业、交通、通讯

陕甘宁边区原没有工业基础。从1938年起,边区开始建设公营工业。1939年,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为此,边区政府曾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开办企业,为工业投资;欢迎海外华侨到边区兴办实业。1938年2月,沈鸿带领7名技术工人和10部工作“母机”,从上海来到延安,建立了兵工厂,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1941年,边区的公营工业有了飞速发展,政府、部队、机关、学校都创办了一批工厂。三、四月,延安公营工厂职工开展竞赛月活动,大大加强了劳动纪律,提高了生产效率,平均产量超过原计划的43%,产品质量显著好转,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这一年,政府经营的工厂共22个。1942年,边区公营工厂进行调整合并,到年底,已有工厂74个,资金约5967万元,职工4036人,连同私营和生产合作社,职工达21万人(小手工业工人未计)。这一年,边区生产土布约10万大匹,造纸约6900令,许多产品结束了零的历史,全部或部分地满足了军需民用。同时,私营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农村约有土织布机1.2万架,手拉机6.8万架,纺妇约7.5万人,织妇约1.3万

人,年产土布约5.4万匹;造纸厂48家。1943年3月,边区政府建设厅召开厂长联席会议,确定在进一步开展赵占魁运动^①的基础上,对公营工厂进行整顿,改进领导作风,肃清自由主义、官僚主义,调动工人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和参加工业建设的积极性。1944年5月,边区举行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提出了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相统一、工厂企业化等原则。7月,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要求各工业管理部门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陶瓷等工业;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重视技术、尊重技术人员;加强领导和深化赵占魁运动。在这些正确方针的指引下,边区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44年底,公营工业已建立起纺织、被服、肥皂、火柴、造纸、印刷、煤矿、石油、化工、炼铸、盐业、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123个,职工达1.2万余人。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多家,职工4500多人。棉布的自给率约达70.3%,其他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的要求。到抗战胜利时,在重工业和化工方面,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制造盐酸、硝酸、硫酸、玻璃和陶瓷;在轻工业方面,年产土布15万大匹以上,纸张近2万令,还创办了火柴厂;民间纺妇达15万人以上,织妇近5万人,各种织布机近3万架。

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等牲畜。为了发展经济,沟通边区内部以及与外部的联系,边区下大力气发展交通运输事业。1937年秋冬,边区政府建设厅与国民党陕西省建设厅协作,修复了富县至清涧段的211公里公路。此后,边区政府又组织补

^① 赵占魁,山西定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工人,曾两次荣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1942年,边区总工会在工厂开展“赵占魁运动”,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

修,并由清涧延至米脂,使这段公路增长到365公里。1940年,边区政府拨款200万元,修通了延(安)定(边)、延(安)庆(阳)两条大车路。至1945年8月,运输合作社发展到317个,运输牲口由1942年的246头发展到1944年6月的近6900头,并以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等形式,在各交通要点设立了交通站和过载站、骡马店、草料店等。

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于1938年5月成立,主要任务是传递境内党政军民的各种报纸、文件、信件、书籍等,并与晋西北沟通联系。到1940年3月,通讯站系统的组织机构大体形成,总站下设绥德、关中、庆环、陇东、三边5个分站。分站下设15个县站,另设13个联络站,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讯路线10余条。之后,撤销了陇东、庆环2个分站,设立庆阳分站,新增9个县站和33个宿站,20个食站,各站计有干部52人,通讯员129人。边区通讯站后改名为边区邮政管理局。

三 财政、金融、商贸

陕甘宁边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战需要,促进生产发展,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

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40年以前,是边区财政工作的创建时期,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是争取外援与休养民力。外援占全部国民经济收入的比例,1937年为77.3%,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财政收入首先用于扶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征收公粮1.4万石,人均1升多(1升为3市斤);1938年征收公粮1.59万石,人均1升2合。边区各级工作人员厉行节约,减少开支,实行极低的津贴制,最高津贴每人每月5元,县长2.5元。1939年,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劳动,减少了财政支出,增加了对生产建设的投资。

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费,并对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外援断绝,加上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物价上涨,边区财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边区财政工作最艰难的时期,边区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克服困难,主要是:向人民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发行边区货币,巩固金融,稳定市场;成立税务机构,统一税制;开发食盐业,促进农工业的发展。采取这些措施后,增加了财政收入。

1943年,由于广大军民为实现丰衣足食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的财政工作进入好转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边区政府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投资逐年增长,1943年比1942年增加9倍,1944年比1943年增加50%,1945年仅农业投资就超过1944年全部经济建设投资的总和,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有了自己的小积蓄。据1945年对27个县统计,生产收入平均占财政支出50%以上的为10个县,占33%以上的为7个县,占20%以上的为4个县,不足20%的为6个县。这一年,各县基本上实现了经费自给,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开始减少,党政军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到1944年,边区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保证了抗日战争的供给,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1937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政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境内流通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1938年,边区银行发行“光华代价券”六种,以解决市场辅币的不足。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边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颁布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2月18日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的边币,作为边区唯一的本位币,并逐步收回光华券。1944年5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1元等于边币20元。边区又以民办公助、统一领导、入股退股自由为原则,倡办农村信用社。1945年,信用社

发展到 80 余家,吸收存款约 15 亿元,起到了小银行的作用。与此同时,银行的主要财力则用于发放贷款、发展生产等方面。

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商业贸易。边区政府推行保护商业,团结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鼓励边区以外的工商业者到边区投资经营等政策,对商业给予扶持帮助。到 1940 年,边区第一个公营商业机构——光华商店,商品流转量已由初期的约 400 万元法币增加到约 2000 万元,公营商店仅延安就有 46 家;到 1943 年,私人商店仅延安就有 473 家,资本 22 亿元;到 1944 年,机关、学校分散经营的大小商店,仅延安就有 67 家。1938 年 1 月,政府成立了消费合作社边区总社,各县建立了县联社。到 1944 年,全边区有消费合作社 281 个,方便了社员的交换,改善了人民生活。在边区受到国民党军队重点封锁之后,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内外贸易。1941 年 2 月恢复了边区贸易总局,并规定了“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1943 年,边区出口总值法币 53 万余元。1944 年,仅盐业公司就卖出食盐 24 万多驮,土产公司换进法币 10 亿多元,进口总值 299 万余元,资本增值极快,仅土产公司就增值约 22 亿元,相当于该公司 1942 年成立时资本的 202 倍。公营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控制着边区的内外贸易,成为边区商业贸易的骨干和开展贸易斗争的基石。此外,还在商业集中的城镇形成了一些街市,恢复和发展了农村集市和骡马大会。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经济建设“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

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①。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

一 教育和新闻出版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原来十分落后,全边区 99% 的人口是文盲。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党组织和民主政权遵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国防教育思想与抗战教育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1938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国防教育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成立了国防教育会。随后,边区政府教育厅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强调边区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1939 年 1 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一届参政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为要普及边区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同年 11 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之后,边区政府作出了许多决定和指示,对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并从上到下建立健全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1943 年 12 月召开的边区政府第三次委员会议明确规定,边区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在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组织的保障下,边区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40 页。

干部教育的途径一是在职教育,二是在校培训。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都规定了干部在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同时有计划地抽调干部离职学习。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均办有党校,先后培训县、区干部 3700 多人。1942 年以后,边区师范学校、三边师范学校、绥德师范学校增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行政干部 400 多人。1943 年以后,各县都在冬季举办干部训练班,每年培训区、乡干部 2000 人左右。中共中央在延安办的干部学校也吸收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参加学习。干部教育工作的大力开展,对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行政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边区十分重视国民教育。1937 年春,全边区仅有小学 320 所,在校生约 5600 人。到 1940 年春,已有小学 1340 所,在校学生 4.1 万余人,学校增长 3 倍多,学生增长 6 倍多。此后,小学教育不断发展,民办小学也在逐年增多。到 1944 年上半年,小学达 1377 所,其中民办小学 1057 所,在校学生约 3.4 万人。1937 年以前,边区内没有中学。1937 年 3 月成立鲁迅师范学校,1938 年成立边区中学,到 1942 年,边区中学由 2 所增加到 10 所,其中普通中学 2 所,师范学校 5 所,中等专业学校 3 所,在校学生 2000 多人。

边区还加强了以成年农民为主要对象的不脱产的社会教育。1937 年 9 月,边区政府提出开展识字运动,并开始办理冬学,建立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半日校和夜校,进行不脱产的扫盲教育。1940 年 10 月 6 日,边区党委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保安司令部和边区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给各界的指示信》,要求动员 14 岁至 40 岁的文盲、半文盲,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入冬学学习,并由县、区、乡建立冬学委员会,主持这一工作。此后,边区政府教育厅陆续发出关于办好冬学的指示,使冬学运动在边区广泛开展起来。在政府的领导和必要帮助下,以民办办公助为基本方针,以需要和自愿参加为原则,以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书班、民教馆等形式,社会教育在边区迅速发展。

到1944年,各类识字组、读报组几乎遍及各村,全边区参加冬学的农民约5万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写、算以及群众迫切需要的卫生知识。

中共中央和边区党组织先后恢复和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打日本》、《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救亡报》、《战声报》、《部队生活报》、《关中报》、《三边报》、《绥德大众报》、《佳县报》、《新神府》、《靖边报》、《战旗报》、《米脂报》、《赤水报》等,到1944年10月,边区共出版报纸40种,为报纸写稿的通讯员达1952人,其中1114人是区、乡、村干部。边区还陆续出版了《解放》、《共产党人》、《学习导报》、《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诗刊》、《国防卫生》等60多种刊物。此外,还有668块黑板报,各部队、机关、学校都有墙报。在图书出版方面,成立了解放出版社和边区出版社,开办了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小学的文化课本。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首次播音,主要广播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文告及国内外新闻,影响全国以至国外。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卫生工作

随着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的开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民主权利都得到了提高,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医少药、迷信、愚昧和不讲卫生的现象还严重存在,疫病流行,巫神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一些地方婴儿死亡率曾高达60%,成人死亡率达3%。这些严重问题引起了边区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高度重视。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指出:应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卫生所,发展医疗工

作。1940年以后,边区医药卫生工作逐步发展起来,边区成立了专门的医药卫生工作管理机构。6月,边区召开国医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边区医药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中华医药研究会、边区医药学会等一些医药教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全边区开展了广泛的卫生运动,改善了卫生状况。

1944年春,延安数县传染病急剧流行,边区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工作,组织流动医疗队下乡救治疫病患者。6月30日,边区卫生动员大会在延安召开,号召人民群众讲究卫生,医务工作者热心为群众服务,造成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会后,举行了夏季卫生运动宣传周,各医疗队在乡村巡回医疗,举办展览、助产训练班,给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开展群众卫生工作,使疫病得到控制。在边区政府发出的“卫生第一”、“婴儿死亡率降至60%以下”的号召下,各地还在冬学运动中创办了一批以妇婴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推广新法接生,宣传科学卫生道理和妇婴保健常识,启发群众起来同愚昧现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

到1945年初,边区有医院11处,卫生所75处,休养所7处,西医276人,中医1074人,接生员61人,兽医54人,药店390家。通过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组织医疗人员下乡、广泛宣传 and 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农村不讲卫生的陋习逐步得到改变,人民的体质不断增强。

三 文学艺术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环境为文学艺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云集延安,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发展革命的文艺工作,开展抗战宣传活动,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1937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之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等专业协会相继成立。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其下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队、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工作团体。这些文化团体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组织起来的文化人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战宣传工作之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抗战。1938年8月,丁玲、周巍峙等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足迹遍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战地服务。抗战剧团、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延安电影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烽火剧团、边区保安剧团、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延安平剧研究院等文艺团体更是活跃在陕甘宁城乡大地。据1940年统计,抗战以来,边区在美术方面,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创作在3500件以上;音乐方面的创作,从小调歌曲到大合唱,共计300首以上;戏剧作品,由活报杂耍到两三幕的大戏,有10种以上;文学创作如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量之多,无从估计。

1942年5月2日,边区文艺座谈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做了结论,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进行整风学习。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有关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文化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中去,文武结合,进行对敌斗争。1943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委确定各抗日根据地戏剧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文艺界提出“到农村

去,到工厂去,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行动口号,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1944年4月28日和5月2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文委两次召开会议,总结剧团下乡和当年春节延安市宣传队工作,强调戏剧和戏剧创作要为政治任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秧歌剧运动要有群众性,从实际出发,以普及为主。

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延安文艺界的勃勃生机,加之1943年全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为文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活跃起来,创作出了大批反映群众斗争生活,反映抗日战争重大题材的作品。许多优秀作品如《兄妹开荒》、《改造二流子》、《南泥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血泪仇》、《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风靡边区,并迅速传播到其他根据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流传至今。边区革命斗争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

边区专业性文艺协会有边区音协、剧协、美协等,文艺刊物有《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时报》、《大众文艺》、《部队文艺》、《新诗歌》等20多种。电影从无到有,先后拍摄了《南泥湾》、《延安与八路军》等十分珍贵的纪录片。艺术教育除业余的星期音乐学校和星期文艺学校外,有专业的鲁迅艺术文学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这一时期文艺运动的特点是:文艺与人民,特别是与工农兵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艺术创作者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大幅度接近、结合;艺术主体形象中劳动人民大幅度地替代了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物和生活;艺术欣赏者突破知识阶层,大幅度地走向劳动阶层。

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在服务人民大众,服务抗战方面书写了彪炳史册的业绩,也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营养。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活动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是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保卫千里河防

陕甘宁边区东临黄河,保卫南自宜川、北至府谷的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进,守护西北大后方的安全,是边区军民的头等大事。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侵入晋西北,河防吃紧。10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河防中段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县的工作。会议要求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建立群众工作,在统一战线斗争中巩固河防。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驻防榆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拟派八路军陈奇涵部由肤施出发,阎红彦部由庆阳出发,前往清、绥、米、佳、吴五县接防。此前21日,毛泽东、萧劲光已电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从黄陵、洛川开往清涧河口一带巩固河防。八路军绥德警备区司令部随即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郭洪涛兼任政治委员,下辖警备第一团、第三团、第八团。随后,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神府第一河防司令部也相继成立。两延河防司令部由何长工任司令员,负责河防南段的防务;第一河防司令部由神府保安司令部改设,黄罗斌任司令员,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兼任政治委员,负责河防北段的防务。边区政府动员数千青年参军,募送毛袜和手套10万双,沿河各县组成运输队运输军需物资,支援河防前线。

1938年2月25日18时,日军2000余人占领山西离石,进扰

军渡。另一部进至川口,意向河西。毛泽东、滕代远、萧劲光随即对河防作出如下部署:河合村至大河坪为第一河防区,黄罗斌负责;大河坪至丁家畔为第二河防区(镇口对面),贺晋年负责;丁家畔至沟口为第三河防区(军渡对面),文年生负责;沟口至河口为第四河防区,阎红彦负责;以上四区统归陈奇涵指挥。河口至马头关为第五河防区,白志文负责;马头关至凉水崖为第六河防区,陈先瑞负责;以上两区统归白志文指挥。并指示各地加紧动员民众,巩固河防,以策应河东的八路军和友军作战。

为了配合河防战斗,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于3月3日发表《告民众书》,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的先进地区,是八路军和全国军队的后方”,“边区的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决心领导边区民众誓死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而奋斗”,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军队参加抗战,努力参加抗战动员工作,粉碎日寇进攻边区”。《新中华报》也于3月5日发表了题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社论,号召广大军民“紧紧地团结,击破日寇的进攻”。

3月12日,日军一部2000多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占领山西兴县,13日向神府河段发动攻击。日军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企图强渡黄河。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术,当日军开始渡河,队形密集之际,给以猛烈炮击,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日军侧背。日军因受两面夹击,强渡失败,死伤100余人,退回兴县。

5月初,日军在离石一带集结了1个团的兵力,附炮30余门,再次沿汾(阳)离(石)公路西进,企图占领渡口,进犯河西宋家川河防阵地。宋家川是黄河岸边一个极为重要的渡口,陕晋两省的重要水上通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在离石西北地区采取袭击、伏击等手段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军200余人,迫使日军不敢贸然西进,其进占宋家川的企图失败。

为了保卫河防北段的安全,毛泽东于12月5日致函驻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编第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指出“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①,并派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持函赴榆林报告防务,争取友军的支持与配合。

1939年元旦,侵占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日军分兵3路,每路约1000余人,附大炮10门,同时炮击河西固临县混金滩和延长县马头关、凉水崖,妄图强渡黄河。延长县抗日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凉水崖渡口西岸的石崖上凿出一条长石洞,洞口开在侧面,正面凿有许多射击孔,洞外用杂草、树枝伪装,使整个渡口形成了一道具有相对纵深的坚固防御体系。警备第五团二营官兵早已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严阵以待。进犯日军一阵狂轰之后,分乘大小橡皮船、筏子渡河。当日军距西岸只有200米时,八路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日军射击,河中日兵死的死,伤的伤,落水的落水,其后倭部队见状落荒而逃。与此同时,驻守混金滩、马头关的警备第五团也打败了日军的进攻,共击毙日军80余人。

6月5日,日军万余人进占军渡后,以大炮集中轰炸西岸宋家川、枣林坪一线的河防阵地。6日,日军进攻孟口、磧口,并以飞机轰炸西岸李家沟河防阵地及沿河村镇。日军的另一部2000余人占领马头关、凉水崖东岸的阵地,企图强渡西犯。9月4日,日军再次进占军渡,炮击宋家川。11月23日,日军进占磧口、孟口两镇,炮轰河西河防村镇,并在炮火掩护下以2000余人实施强渡。12月初,日军再次进犯军渡,占领李家崖,炮轰宋家川等地。在河东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河西河防部队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犯,使其强渡屡屡失败。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八路军河防部队不仅要同企图西犯的日伪军进行战斗,而且要与企图破坏河防的顽固派进行斗争。1940年春,顽固派以增援陕西河防为名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河东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西渡,进驻绥德警备区所属各县。顽固派又阴谋以李文第九十军的三个师西渡,进占绥德警备区。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负责人连发明电,质问蒋介石、程潜、阎锡山意欲何为?同时指示各地加强河防。蒋介石等人得知边区已有准备,遂改变了李文部西渡的计划。

1942年3月,日军“扫荡”河东沿岸各地,炮轰河西阵地,我军在反“扫荡”中击退日军。此后,河东沿线皆为八路军、游击队及友军所驻防。在几年的保卫河防战斗中,河防部队指战员以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坚定信念和高昂的战斗热情,与日军英勇作战78次。边区民众以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积极参加抗日自卫军,为河防部队运送粮草,随同作战部队上前线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固临、延长、延川县有4000多名自卫军,1000多头牲口配合主力开赴前线,而且多次主动出击河东,扰乱并钳制日军。宋家川120名水手全部参加自卫军,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在保卫河防战斗期间,边区政府组织民众自卫军站岗、放哨、查户口,发动军民清除汉奸、土匪,边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安定,使河防部队有一个可靠安定的后方。由于军民大联合,军政大团结,使千里河防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坚固防线,胜利地保卫了边区的安全。

二 为抗战人员提供后勤保障

陕甘宁边区是个经济落后的地方,同时又是个政治特殊的地方。由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设在延安,由于这里实行彻底的抗日民主政策,所以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全边区脱离生产的抗日工作人员逐年增加,1937年

1.4 万多人,1938 年 1.6 万多人,1939 年猛增到近 5 万人。为脱离生产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成为边区财政的重大任务。

“国民党在 1937、1938、1939 年还给我们发饷,从 1940 年开始就实行封锁。”^①1940 年 11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通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自即日起停发八路军的经费,10 月份欠发的 20 万元亦行停止。此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每月 60 万元的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再“无粮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②。加之国民政府对边区实行断邮,外来货币无法汇兑,边区政府的外援收入断绝。

但是,进入边区的抗日志士还在增加。1941 年,全边区脱离生产的公务人员增加到 73117 人,加上安置了 11500 多名伤、病退伍军人,边区脱产人员最多时达 10 万人,还有 8120 匹军政使役骡马。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状况。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何应钦“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④。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的经济困难”形势,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面努力生产,一面节衣缩食,尽力完成以至超额完成缴纳救国公粮的任务,支持政府渡过难关。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 年的 9 万担,1941 年的 20 万担,1942 年的 16 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2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2 页。

员的食粮。”陕甘宁边区“只有 150 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 年还买了 500 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①。在抗日战争的后三年,虽然由于军队屯田、机关生产实现了部分自给,人民的负担逐年下降,但是人民缴纳的救国公粮每年仍在 10 万石以上,1943 年 18.4 万石,1944 年 16 万石,1945 年 12.4 万石。

“仅有人口 150 万的边区,却养活了 10 万公家人”^②。这是陕甘宁边区人民为支持长期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 安置外来移民和难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沦陷区的难民纷纷流向大后方。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外来的难民和移民采取了积极安置和优待的政策,深得民心,广受赞扬。

1940 年 3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凡沦陷区或非沦陷区之难民或贫民,如愿入陕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均得自行移入。”难民或贫民“得享受下列各项之优待:甲.得请求政府分配土地及房屋;乙.得请求政府协助解决生产工具;丙.得免纳两年至五年之土地税(或救国公粮);丁.得酌量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享受和边区人民同等之民主权利;有同等选举被选举权,得参加一切抗日团体,得受免费义务教育,得享受边区一切法令的保护,有选择正当职业的自由权”。各级政府对移民边区的难民和贫民不得“强迫服兵役,强迫其他劳动服役,强迫交纳捐税”,“违者惩罚之”。难民或移民“愿为人雇工者,得请求政府介绍并保障其不受雇主虐待”。

边区政府不仅对长住的外来难民和贫民实行安置和优待,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对路过本地的难民也应尽可能地予以帮助,使其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2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0 页。

安全过往。为此,边区政府于1941年10月1日发出训令,通报延安市公安局关于妥善处理来延安难民的意见,明确提出:第一,由市政府设立难民调查登记所,负责登记来延安的难民。第二,调查登记所根据难民的具体情形,或分配地方给难民住,或给难民路费介绍到别处,有劳动能力,愿在延安居住的,由工会介绍做工或者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总之,对难民要有适当的处理。第三,临时路过需要住宿一两晚的难民,也要指定地方让他住,不致因东跑西窜找不到地方而引起混乱。

在总结几年来安置和优待移民难民经验的基础上,边区政府于1942年2月6日发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办法共12条,其中规定:延安、甘泉、华池、志丹、靖边、富县、曲子等7县为移民开垦区;绥德、陇东、关中3个专员公署及安定、靖边、富县3个县政府应设立移民站,专门管理移民事务;移民安家以后如缺耕牛,政府应帮助其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政府应调整移民与老户的关系,教育老户帮助移民;帮助移民组织移民村及移民乡政府。4月5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规定:“凡边区内和边区外的人民,本人并不能自力耕种,但愿以其资本雇人开荒或伙种者,均得自愿移入(优待移民实施办法)所指定的区域,或其他有多余荒地的地区,并得依据地权条例取得公荒公地之所有权”;移民“依照《优待移民实施办法》的规定,享受下列优待:免征救国公粮三年;减轻义务劳动负担;其他负担三年减半征收之”。

1943年3月19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条例》共19条,是在总结几年来实行《陕甘宁边区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优待移民的布告》、《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等文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使边区的外来难民移民的安置优待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陕甘宁边区安置优待移民、难民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仅1941年至1945年的5年,全边区就安置移民、难民10万人。他们在边区各地安居乐业,成为一支新的生产劳动大军,在边区的生产建设和抗日救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戏剧家马健翎创作的秦腔剧《血泪仇》,反映了边区政府安置优待沦陷区难民这一史实,至今演唱不衰。

四 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重视培养干部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为全民族抗战培养了大量的抗日干部。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干部队伍损失很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开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随着部队的迅速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前方干部奇缺,加之形势变化和党的任务的转换,原有的干部也需要学习提高。抗战初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不畏艰险,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这是党和革命事业宝贵的人才资源。如何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特别是把大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培养造就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骨干力量,是摆在党面前的头等大事,也是作为抗日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责任。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窑洞大学”,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为革命培养干部。

延安创办的干部学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学院、民族学院、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西北局党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等。这些学校,有的是中共中央创办的,有的是属于边区的。学校的领导人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干部,许多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学者,学生多

是来自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也有来自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员在这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研究抗战时期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经过短期学习后,学员被派往各抗日根据地。学校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学以致用、言行一致的教學方针,为人民军队和各根据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此外,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也分期培训边区县区干部;在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等学校附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干部;各县每年冬季都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培训区乡干部。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取得了突出成绩,不仅使边区的干部得到了提高,也为其他解放区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八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先后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4万多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并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派出由百余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工作团到各解放区工作。

第十八章 中共陕西省委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在陕西国统区发展中共组织

一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壮大中共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的活动范围包括陕西的关中、陕南和甘肃天水一带的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初期,省委机关在泾阳县云阳镇办公。红军改编出师后,为安全起见,陕西省委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省委一方面调整省委的组织机构,一方面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省委机关除继续保留组织部、宣传部外,增设了妇女部、民运部、青年部、工人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随着东北军陆续离陕,省委撤销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为省委军事委员会(随后又改为统战部)。省委抽调部分委员到西安开展工作,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党领导了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为中共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党员人数由省委刚恢复时的300多人增加到1300多人。

1937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书记贾拓夫提出:在党的组织建设中,要克服关门主义和“拉夫”现象,注意吸收工人、农民、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会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派出党员干部到党组织空白地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到1938年底,在国民党统治的关中、陕南地区建立了53个县的中共

组织。成立县委或工委的有韩城、澄城县、合阳、朝邑、华县、渭南、临潼、高陵、泾阳、富平、耀县、同官、蒲城、礼泉、乾县、永寿、麟游、蓝田、长安、户县、周至、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武功、商县、洋县、城固、西乡、南郑、勉县、宁强、安康、石泉、岚皋、旬阳等39个县；成立特支或支部的有潼关、白水、咸阳、彬县、长武、兴平、陇县、千阳和陕南一部分县。甘肃的天水、甘谷、秦安等地也建立了中共组织。为便于领导，省委先后将西路工委改为西路特委，陕东南工委改为安康地委，沿河特委改为沿河地委，汉中特委改为汉中地委，并新建了西府地委和甘肃陇南临时工委。西安和外县的中等学校或建立了中共组织，或有了个别党员。西安大华纱厂，铁路、邮电等部门的职工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地方上党员人数达8000多人。

这一阶段，中共陕西组织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西安为中心，向各县发展。西安事变后，中共组织在西安得到快速发展，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大批学生宣传队、工作团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宣传中培养和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建立了当地的中共组织。

二是以学校为中心，向农村发展。很多县的中学和高小建立了中共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在农村开办夜校、识字班等形式，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积极进行建党工作。

三是以军队为中心，向地方发展。西安事变后，红军进驻渭北的同官、富平、耀县、泾阳、三原等地，在驻地建立中共组织，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工人、农民党员。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中共组织和党员也在驻地进行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四是以空白地区为重点，派党员干部建立中共组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了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向南发展”，即向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的陕南地区发展。会后，

省委派党员干部到安康、汉中和甘肃天水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中共组织。

二 创办省委机关刊物《西北》

随着中共陕西地方各级组织的恢复、建立和迅速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建立和迅速发展。为指导陕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公开创办省委机关刊物《西北》,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钦为主编并负责筹备工作,郭有仪、李初梨等负责编辑,徐彬如等为发行人。1938年1月21日,《西北》创刊,先为周刊,后不定期出版发行。

《西北》以“加强抗战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以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发动群众、团结抗战为中心任务。《西北》的主要内容:一是经常转载《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的社论、专论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谈话,省委领导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以及泾阳安吴青训班负责人胡乔木等经常为《西北》撰稿,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借以指导和推动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二是及时反映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总结斗争经验和教训;三是报道国共两党的重大活动、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消息以及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消息;四是对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国共合作、压制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坚持团结抗战。

1938年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西安各报发表《通告》,以“未经合法登记”为借口,宣布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27日,《西北》第4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解散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的社论,指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务于抗日”的原则下,抗日救亡是重要的,“合法”、“非法”是次要的,而且“合法”也应是為了“抗日救亡的利益”,要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

允许 13 个团体登记,给予合法地位。6 月 22 日,《西北》第 17 期发表了欧阳钦《我们的意见》一文,揭露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抗日团体是违抗抗战建国纲领,破坏抗日团体,分裂抗战力量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在《西北》的带动下,西安各界纷纷抗议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倒行逆施。1938 年秋以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多方刁难,阻挠《西北》出版发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命令,《西北》出版前要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过程中,每期均有被审查删掉的段落、句子,有的甚至全文涂抹掉,强迫《西北》开“天窗”。为了对抗国民党压制舆论的行径,《西北》对一些被“审”掉的重要文章另行印发,通过零售点、报童在群众中广为散发。

《西北》形式活泼,贴近民众关注的问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西北》设有社论、时评、专论、通讯、文艺、读者信箱、读者论坛、诗歌、大众抗日故事、一周时事等版面和栏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工作的需要,《西北》经常向延安的重要干部约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为第 5 期撰写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13 周年》的文章。广大群众关心华北战场形势,《西北》记者便走访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第 23 期刊登了朱德关于华北抗战形势的谈话和为《西北》写的“精诚团结,巩固后方”的题词。为了动员民众保卫陕西,《西北》第 24 期发表了由成仿吾作词、吕驥作曲的《保卫陕西之歌》:“日本强盗打到了陕西的门前,黄河两岸都成了抗日的前线;野兽般的敌人在向咱们逼近,他想占领咱们的城市和田园。咱们是黄帝子孙,咱们是三秦好汉,起来,男女老少,一千万同胞,大家联合加入抗战。为了保卫家乡、土地、老婆、娃娃、生命、财产,咱们排成队伍,一起拿起枪杆。在城市,在乡村,八百里秦川到处燃起抗战的烽烟,让日寇的鲜血染红泾河渭水,让日寇的尸骨飞不出华岳终南。保卫陕西,保卫长安,拼着头颅热血,保卫我们的河山、河山!”歌词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和浓郁的乡情,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密切同广大读者的关系,《西北》还

开辟了“问题解答”栏,答复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西北》每一期一出版,迅速邮寄,并通过多种形式零售,不仅风行陕西及全西北,其订户还远及香港、广州、南昌、武汉等地,甚至在海外都有订户及代销处,发行量最多时达到1万多份,成为西北刊物中销量最多、发行最广的一种,深受群众的欢迎和赞扬,群众称它是“革命的向导”、“民众的喉舌”。

1938年秋,国民党实行“限共”、“溶共”、“反共”政策,《西北》在西安出版发行遇到困难,从第30期以后迁入陕甘宁边区。

第二节 支持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抗战

一 中共陕西省委公开支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进步政策

中共陕西省委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实行抗战政策。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但却没有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关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而且有不少内容不过是好听的诺言,根本不打算实行。但是,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和这次会议决议设立国民参政会,还是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政治的某些进步以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它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这些进步的方面得到了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赞同和支持。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遵照

孙中山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

5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公开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进步政策。文章指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颁布之《抗战建国纲领》及《大会宣言》,一般是抗日救亡所急需的政策,该纲领与本党以前所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相矛盾的。今天,国民党能颁布这样的纲领和宣言,可以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大进步。”文章同时表示纲领和宣言也是有“不够与缺点的:(1)在宣言中解释三民主义时,民族主义对国内各少数民族未能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权’问题,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在民权主义中,提出‘政治之统一较政治之自由为急,政府对人民之自由必须加以尊重同时亦必加以约束’;对民生主义的解释则空洞而缺乏内容,并根本否认中国有阶级的存在。(2)对宣言和纲领没有提出具体实行的步骤和办法。(3)对于各党派合作的关系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因此在大会后,有少数的死硬派,反共派继续其破坏团结的勾当,甚至有变本加厉,采取引诱威吓与打击的办法以对付我们的”。

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对这一纲领和宣言表示了如下的态度:“(1)以完全诚恳的态度来切实拥护,对其中不够与缺点的地方,也只是采取善意的解释和补充。(2)正确的运用宣言与纲领每一进步的条文,来对付那些挑拨离间破坏统一战线者。(3)采取一切方法,来切实的执行《纲领》中每一条文,并在纲领中发展正确的思想。(4)尽量的使民意机关扩大起来。(5)继续主张革命联盟的组织。(6)加强国民党中进步分子的力量,尽量地赞助扩大之。(7)加强本党的力量,提高党员的警觉性,以防止日寇汉奸、一切坏分子对我们的破坏。(8)注意正确的解释统一战线与共产党、统一战线与民主、统一战线与阶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道德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等等理论问题。(9)特别注意改善我们

的工作方式,以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切实加强党内的教育工作,以充实每个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①

7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省县临时参政会工作的决定》,指出:“由于抗战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以及我党的努力,全国参政会已经决定在省、县建立参政会的组织。这是抗战以来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虽然在其议员产生方法上不是人民的普选,人民团体代表名额很少,完全‘指定’、‘圈定’的办法缺少民主精神;对议员还没有很充分给予各种代表民意的职权,仍有许多缺点,然而这并不能抹煞其进步意义”,“党对于临时省、县参政会的态度和方针不是消极的批评,而应从积极方面去赞助和推动发扬其进步处,使之向好的方面发展”,“利用一切可能争取我们党员及先进人士的议席,打击、孤立和削弱顽固派”,使“临时参政会可能成为战时相当的民意机关”。

中共陕西省委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立场,帮助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抗战的诚恳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赞许。

二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发表“对于保卫 陕西与西北”的意见书

为了帮助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团结抗战政策,1938年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李初梨、徐彬如、惠子俊、汪锋、张英、陈煦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西北的意见》。

意见书分为前言、关于军事问题的一般意见、关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关于民众运动的意见、关于西北回蒙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关于加强团结与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关于干部问题的意见八个部分,文过万言,意见详尽。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第1册),第153—154页。

意见书要求国民党陕西军政当局“调集必要数量的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潼关沿河战线,巩固河防,用最大决心守卫若干战略据点,并在这些守备部队中配备必要数量的重兵器”;“完全拆毁内战时代所建筑的堡垒,改建新式的地下支撑点,以免为敌人利用而便利于我们发展游击战争”;“武装广大民众,首先是整理现有的地方武装(包括保卫团、保安队、警察、民团、保甲队等正式地方武装),并给他们以正式的军事训练,使这些地方武装不但不因战争而溃散,相反的要使他们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一切非正式的地方民众武装如黄带会、红枪会,必须用一切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吸收他们参加抗战,在抗战中改造他们并使他们进步”。

意见书要求国民党陕西行政当局“选择坚决抗日与有力量领导抗战的人员到各级政府中去,提倡廉洁,肃清贪污腐化分子,振肃行政纲纪”;“厉行肃奸运动,不使一个汉奸、托派分子隐藏在我们的政治机构中实行‘城狐社鼠’式的阴谋,依靠法律与民众力量把这些分子从政治机关中清洗出去”;“肃清保甲中假借政府法令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改变保甲负责人员”;“立刻派遣最好最得力的行政人员,到接近敌人的各个县份去,首先建立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工作,组织与动员千百万的民众来实行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战斗任务”。

意见书指出:“中共陕西省委3月8日保卫陕西的宣言即已指出,‘巩固陕西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力量的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是保卫陕西的先决条件’”,“然而不可讳言,几个月来,关于加强团结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各方面都做得异常不够,加之汉奸、托派各种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阴谋与活动层出不穷,造成数月来吾陕各种不断的‘纷争’与摩擦现象,而这些纷争与摩擦现象就大大地阻碍了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各种动员工作”。“建立与加强陕西国共两党的亲密团结,仿照两党中央的办法,建

议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共陕西省委双方派代表成立联络委员会,以便协力同心解决吾陕当前各救亡工作问题”;“建立陕西及西北各省、县参政会,吸收各党派、各民族、各界同胞有威望的人士参加,以便使省、县参政会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立刻停止各种足以破坏团结与影响统一的刊物,并停止他们一切破坏团结的活动”;“建议由蒋鼎文主席立刻召集各党派、各救亡团体、各界有力人士的谈话会,讨论解决目前陕西和西北救亡运动中的一切‘纷争’与‘摩擦’现象,打破一切顽固分子的成见,以实现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大团结”。

意见书表示:“我们曾经屡次提出‘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及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斗争,需要成千成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干部’,‘吸收一切对救亡工作有经验的干部参加动员’”;“中国共产党以 17 年来的英勇奋斗团结不少优秀的干部,曾经以自己的斗争博得世界的赞扬,这些干部也正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军事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动员民众武装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征募兵役和动员工作、物资动员工作、训练青年与训练干部工作,确有相当经验,我们愿以这些经验公诸全国同胞”,“我们愿意在任何困难、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去负责工作,在工作中与友党诚恳合作,并帮助友党的进步与发展”。

贾拓夫等人的意见书,是中共陕西省委帮助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真诚建议,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三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1938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1 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泾阳县云阳镇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60 余人出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决

定》、《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致蒋委员长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致中共中央电》等，并全部公开发表。

《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指出：“中共陕西省委对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之事业素极关怀，从去年太原失陷起就不断地提出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具体意见，并不断地在各种实际工作方面努力。这次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又督促自己的党员并号召全体民众在政府当局领导之下，加紧一切战时动员工作，用全陕民众组织与武装的力量阻止敌人进攻，即使敌人铁蹄踏进陕西，我们更应顽强地作殊死战。”“谁无田园庐舍？难道能让敌人来摧毁吗？谁无祖宗坟墓？难道能让敌人来践踏吗？谁无父母兄弟？难道能让敌人来屠杀吗？谁无妻女姊妹？难道能让敌人来污辱吗？不！决不！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家乡，一定要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本着互相尊重与互助互让的精神，继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府当局的统一领导之下，紧急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上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当游击队员去，为保卫陕西保卫西北坚持持久战，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中指出：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一致认为，根据 17 个月的抗战经验，要顺利地达到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之目的，必须全陕人士首先是国共两党更加亲密团结，唯团结方能发动全陕西全西北的力量，唯团结方能克服目前阶段中一切困难，唯团结方能在持久战斗中战胜敌寇。为了巩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完全一致拥护我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宣言：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主张共产党员用公开交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时再一次声明：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合作及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

共陕西省委必将贯彻我党六中全会决议精神于一切实际工作中，我们深信国共两党及全陕人士诚能亲密团结，互相谅解，互相友爱，互相帮助，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保卫陕西、保卫西北的任务！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告全陕全西北同胞书》和《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信》表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障碍不在共产党方面，而在于国民党的顽固派。

第三节 加强对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一 全省抗日积极分子会议

1938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全省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县级以上干部30多人出席。根据日军逼近黄河东岸，陕西有可能变为沦陷区的形势，会议着重讨论并部署了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省委书记贾拓夫做了题为《巩固团结保卫陕西当前的迫切任务与工作》的报告及讨论这个报告的《总结》。

贾拓夫的报告分为八个部分：（1）抗战进入第三期陕西战争动员情况。（2）巩固团结克服战争动员中的障碍。（3）继续加强党在青年中的工作。（4）扩大统一战线运动。（5）加强党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中的工作。（6）关于武装部队及民众武装中的工作。（7）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8）巩固党与扩大党。

报告指出：“为了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首先应抓紧文化教育界的工作，把广大文化教育界人士团结在党的口号周围，在他们中先形成有力的统一战线，然后，经过他们去开展各方面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在团结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坚持抗战保卫陕西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的完全以我们的观点出发，而应照顾到各种各样人的特性和条件，不论是从保卫乡土出发的，从英雄主义出发的，从干大事出发的，甚至从升官发财出发的，这些一切都不要紧，只

要他们是抗日甚至有抗日的因素,我们就应当赞助他,联合他,并推动他们前进。我们绝不能希望无论什么人都要和我们共产党员的态度主张完全一样,因为这是做不到的。这里我想利用陕西过去靖国军、国民军二军、三军的传统,来动员许多人起来进行武装保卫家乡的斗争是必要的,甚至我们可以拿出胡笠僧^①、井勿幕等来号召团结一批在乡军人”。“一切上层关系,我们都不能对之要求过高,而应从最小的可能的事项上做起,应设法维持他的地位,他同我们的关系应当隐蔽,不宜突出,不要过早地暴露目标,每一个上层关系都应巩固,不应轻易放弃。这里应避免那种急躁病,不要希望一下子把什么弄好,结果是更加失望,帮助了顽固派”。“应当很好地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配合起来,所谓配合是经过党的领导与组织”。“尽可能地争取省委在西安更公开的活动,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做公开工作的干部”。

会议估计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可能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党总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陕西党目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就是巩固团结,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工作。陕西战争动员工作的领导力量和全国范围一样,主要是国共两党。会议要求,在政治上应当广泛地进行关于武装工作的宣传,提醒全陕人民的注意,鼓动每个有武装的同胞随时准备着打敌人,这种工作应广泛地公开地经常地去做,但组织上准备工作必须是绝对秘密的,暴露就等于帮助敌人,帮助顽固派,各县委必须成立武装部,专门负责领导武装工作,重点是做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工作和改造非法武装,在这些武装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根据云阳会议精神,陕西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国民党地方武装和非法武装中开展了统战工作。陕西的非法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仅10个县不完全统计就有53股,约1.5万至

① 即胡景翼。

2 万人,长短枪 7000 余支。党对他们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抗战,逐步说服改造,帮助进步,保存枪支,准备在时局变化时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力量。在工作方法上是先从上层着手,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以私人名义交朋友,结拜兄弟,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建立威信,协助改造不良习气。

做国民党退伍回乡军人的工作也是中共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批人数量多,能量大,大都是地方名流,与地方政权、士绅及在职军人都有联系,与国民党中央系有较深的矛盾,同情共产党。国民党开始对他们排斥打击,后来又采取怀疑政策,拉打结合。中共组织则采取了“集中力量争取之”的策略,和他们广交朋友,讲究社会道德,重人情世故,谦虚谨慎,尊重礼遇,并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对进步的,帮助其巩固扩大社会基础;中间的,通过一切办法,使其接近中共组织;有成见的,循循善诱,解释误会,使其逐渐转变态度,并在经济文化方面予以合作,吸收他们共同办工厂、学校、报刊,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照顾其经济利益,使之成为抗日的可靠的同盟者。云阳会议精神的贯彻,使陕西国统区的军事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临潼县的交口镇、栎阳镇,耀县的柳林镇等地的地方武装,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二 积极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陕东、陕东南地区是陕西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抗日前线,形势严峻。从 1938 年初春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和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就努力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陕东地区。1938 年 2 月 27 日,续约斋(续儉)奉命抵达平民县任县长。此前,续约斋曾赴延安考察边区财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告诉续约斋:“打日本,救中国。”平民县是陕东最前沿的一个小县,原名大庆关,与山西永济县隔河相望。日军在山西永济县城城门楼架设大炮五六门,隔河日夜轰击平民县。续约斋应

民众要求,选择有胆识、习水性的 40 余人,编为华北挺进军第一队,于 4 月 19 日渡河参战 47 天,11 人为国捐躯。7 月 1 日,续约斋专程到西安向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通报,受到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的接见和赞扬。中共渭南县组织协助渭南县政府筹建的常备抗日义勇军壮丁队,由共产党员宋蔚青任队长,迅速发展至 150 余人,有枪 100 多支,由县城移驻尤河川堡岗岭,挖战壕,修工事,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共沿河组织大力倡导下,合阳县政府与国民党军第一七七师配合,成立了合阳县抗日民众自卫队总指挥部,苏资琛县长兼任指挥,共产党员、一七七师参谋长梁步六任副指挥,全县 23 个联保分别建立自卫队中队,总计约 2 万队员。一批共产党员到各中队担任指导员。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二尹联、共和联、如意联等五六个自卫中队先后跟随一七七师东渡黄河,在山西荣河、稷山等地奋勇杀敌。在中共富平县委大力支持下,由共产党员师源、刘茂坤发起组织 60 名爱国青年成立了富平县抗日义勇军,随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胡景铎营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激战多次,12 名战士为国捐躯。中共蒲城中心县委以共产党员为核心,联络农村进步青年,组织特务队进行操练,准备战时打游击。中共华县组织积极协助县政府,组织了 450 人参加的自卫军游击队,配枪 150 支,并在各乡建立警备队。中共韩城县委在“民先队”基础上组织义勇队,共产党员自己拿钱购买枪支弹药,并建立造枪所,造枪数十支,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中共朝邑、澄城县组织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核心,购买、收集枪支,组织武装,依托黄龙山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商洛地区。1937 年 11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柏栋为中共商洛工作委员会书记,回乡领导商洛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 年 2 月,王柏栋派“民先”队员王柏梁和抗日积极分子谢华^①、余谦等人

① 与中共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同名同姓,并非一人。

到商南县大岭观、豫西荆紫关等地宣传民众,筹建抗日游击纵队,被顽固派破坏未成。6月8日,谢华、余谦击毙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吴子俊,拉起民众抗日武装。9月,共产党员周宝航和进步青年杜景做商县武关民团团长田兆丰的工作,后将该民团改为抗日特训队。

安康地区。193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干部王力随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刘威威,中共党员)到安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离开安康后,部分掉队战士和伤病员仍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活动,王力派党员与联络,准备将他们再次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宁陕县四亩地曾是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开展游击活动的地方,有部分伤病员和掉队人员,中共四亩地支部联络了这部分红军战士,收集了一些枪支,准备建立民众抗日武装;旬阳县城附近有一批参加过国民党地方游杂部队的在乡军人,生活困难,不能安居,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满,中共旬阳县工委同他们联系,准备建立抗日武装组织;岚皋县佐龙联保的进步青年也准备建立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但这些活动均因国民党顽固派从中干扰、破坏,未能成功。

第十九章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 陕西发动的反共高潮

第一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 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 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的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反共倒退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陕西国统区的形势随之发生逆转。

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免除孙蔚如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蒋鼎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集军权、政权于一身,国民党陕西当局打击抗日力量的活动日益表面化。

11月,在豫西南作战失利的国民党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团撤回陕西。陕西干扰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加。

12月19日,蒋介石在武功县主持召开有长江以北第一、第二、第五、第八、第十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但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将领全部被排除在外。会议名为协调各战区对日作战的行动,实则是蒋介石以防止日军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再经陕甘进入四川、威胁陪都重庆为由,将胡宗南武装集团布防在陕甘宁地区,目的在于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蒋鼎文挂名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并特准设立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部,全权指挥这个集团军。此时,胡宗南掌管的兵

力由原来的三个军扩大到六个军。

以蒋鼎文、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开始形成。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秘密通过党务报告决议案,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正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秘密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进行防范、限制、排斥和打击。

1月25日,国民政府撤销西安行营,任命程潜为新设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天水行营驻西安。

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是反共专家谷正鼎。谷正鼎将原西安行营民运会对付陕甘宁边区的一套反共办法呈报蒋介石,深得蒋介石的赞赏。为了加紧反共活动,对付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谷正鼎召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陕西省民政厅长、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教育长等人,秘密拟定了《封锁陕甘宁边区计划》。这个计划分“建立封锁边区的领导机构”、“党务封锁”、“行政封锁”、“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宣传封锁”、“教育封锁”、“民运封锁”、“特务封锁”、“执行封锁计划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等10条,提出:陕甘宁边区周围的榆林、洛川、彬县行政督察区分设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办事处,由反共坚决的省党部委员兼任办事处主任;沿边区各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县长、组训民众的社训队队长,必须由坚决反共的分子充任;沿边区各县的保长、甲长,必须选择与“异党”有仇恨的地方士绅充任;以国民党正规军为主,地方团队为辅,构成沿边区的封锁线;在三原、庆阳分设军事封锁指挥部,以彬县、洛川、宜川、庆阳、正宁为据点,各据点常

驻师长以上军官一人,作为前线临时指挥官;由天水行营制发运往边区的物资通行证,钢铁、电机、化学器材、棉花、纱布、医疗器械、药物等军用和主要日用品不得进入边区,各县设物资盘查站,违反规定者一律查扣;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和左倾文章,取缔左倾书刊;选派特务人员打入边区邮政等部门,担任沿边区重点县的警察局长,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络。这个计划分别由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负责执行,并建立了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制度,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并以天水行营的名义指导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四省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包围和封锁活动。行营汇报会先后由谷正鼎、胡宗南主持。洛川、彬县、榆林及所属各县的党政军特种联席汇报会设有专任汇报秘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所有封锁边区计划,统由各区联席汇报机构执行。国民党陕西当局《封锁陕甘宁边区计划》的长期实施,给陕甘宁边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破坏。

1939年冬,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其所辖部队由6个军扩大到10个军。甘、青、宁、绥为第八战区,陕、豫、晋为第一战区。为协调两个战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行动,蒋介石又令胡宗南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样,胡宗南所指挥的部队就有6个集团军,共50多个师,50多万人。另外,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洛阳第一分校、特种兵联合分校、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也都受胡宗南的指挥。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去洛阳后,胡宗南独霸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专事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中坐大。

二 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组织的破坏

国民党西安反共中心形成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将矛头直

接指向共产党,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查封抗日救亡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破坏团结抗战。

1938年7月25日,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被国民党商洛当局枪杀于商县显神庙村。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行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汪锋代表省委致悼词,怀念这位“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并对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表示严重的抗议。7月31日晚,八路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宣侠父在西安“失踪”,8月1日被西安行营特务秘密杀害。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赵希愚赴商洛视察民众抗日救亡工作,被驻商南县的国民党军预备第一师非法逮捕。同月,国民党朝邑县党部查封了中共朝邑县工委领导的七七书报社。

对于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1939年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报告:“近二、三月来,行营、省党部与省政府更加进一步采取各种办法来打击我党的活动,他们不仅注意西安,而且注意外县(派出许多视察团);不仅注意城市,而且注意乡村(派出许多社训人员);不仅打击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如取消西安学生分会等),而且积极破坏党的组织(如彬县强迫党员自首、武功、汉南逮捕党员等),对我们同志不是威迫就是利诱,不是撤职就是逮捕,这样从各方面积极排斥、打击我党活动与力量。”^①

1939年5月16日,接替贾拓夫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报告中共中央:“在‘限共’、‘溶共’政策下的陕西党政当局,目前向我们的进攻是日益表面化、具体化、激烈化。西安的妇女慰劳会,他们已决定强迫改组,排斥我们的人。在西安、汉中、武功、安康、商洛各地不断发生逮捕、破坏组织事,到处强迫‘民先’自首,到处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1册),第161页。

布置特务工作。”^①6月7日,欧阳钦再次报告中央书记处:“最近全陕西省各地摩擦更加严重起来,顽固分子用反共名义,利用与推动党政军机关到处进行其反共的宣传,对本党及先进分子乱加打击、破坏与逮捕,查禁书报,封闭书店,强迫改组慰劳会,检查交通道路,并到处组织其暗杀队,制造毫无根据的情报,无理的造谣”,“顽固分子在‘限共’与‘防共’的政策下面,把陕西弄得特别的严重与尖锐,除此来打击我们,以缩小我们组织及其活动的范围外,更企图逼使我们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然后找出一些冲突事件作为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及边区之口实,并进一步企图更大的打击我们。顽固分子又利用反共名义作为他们争权夺利、排除异己、制造一切罪恶的口实”。他建议对国民党当局“种种无理的攻击,应采取防卫性的回击,但特别要注意与群众站在一起,暴露每一事件的真相,引起社会一般人士对他们不满,陷他们于孤立,使他们的企图失败,而争取社会人士对我们更多的同情”^②。

193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先后逮捕和杀害了多名共产党员。中共安康地委组织部长刘华于3月被捕,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惠子俊于4月被捕,中共汉中地委书记任戈白于6月被捕。9月,共产党员王化蛰、刘生哲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渭南。10月,国民党蒲城县当局镇压要求迁校的蒲城中学学潮,逮捕学生50余人,并将其中8人送西安劳动营关押,其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许尚志。11月,中共韩城县委领导的少年书报社被国民党驻军非法查封。12月,中共西路地委组织部长兼永寿县委书记严克伦被捕。国民党陕西当局的例行逆施,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共两党在陕西的团结抗战。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2册),第132页。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2册),第132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9年第2册),第137—138页。

三 中共陕西省委迁入边区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在国民党顽固派对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群众运动采取镇压政策的严峻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于1939年12月从国统区的泾阳县云阳镇迁移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淳耀县安社镇,后又相继迁移到淳耀县照金镇、新正县马栏镇,在边区境内领导陕西国统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1月,省委在安社镇召开扩大会议,省委特派员、有关县委书记及省委机关科长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着重检查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张德生做了《关于巩固党的报告》,指出前一段发展党员对质量不够重视,有些基层组织过大,活动规模亦大,党员出头露面多,没有社会职业掩护。对此,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教育,继续审查党员干部,开展反奸细斗争,健全秘密工作制度,改变党的领导方式。

同时,省委发出《告全陕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在省委周围,为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机,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并通报了陕西党内在日常生活方面、在党内工作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违反秘密工作的一些现象及工作中的不正确的倾向,要求全体党员坚决执行秘密工作的规定,保卫党的组织,巩固党的组织。

4月10日,省委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时局正处在严重关头,各级党组织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时刻准备顽固分子的袭击与阴谋,以保卫党的组织;为了保存干部,应坚决地、迅速地把已经暴露的干部、党员和非党干部分别调到省委或送往延安学习;立即焚毁表册、记录、通知等所有党内秘密文件;省委机关已全部搬迁边区,凡到省委汇报工作的党员、干部今后一律不要再前往云阳镇。

4月16日,省委致电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李华:“已接到中央决定,云阳、安吴各机关撤退,紧急电令你们去省府谈判撤退日期,请要求能有较长时间,以便结束工作,避免不必要损失。谈判决定后,请立即在西安各报纸用大字登一启事,说明云阳、安吴各机关均撤退,以免各地继续去人致受打击。”

四 国民党陕西当局非法监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在摧残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肆无忌惮地摧残设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代表机关,破坏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

设在西安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是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设立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1)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2)为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采购和运输物资。(3)代表八路军总部与国民政府军政部等部门办理有关公务事项。(4)接送进出延安的抗日干部、爱国志士、国际友人和青年学生,同时协助中共陕西省委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既是八路军总部设在西安的代表机关,也是中共中央在西安的公开机关,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的林伯渠、董必武就曾住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公开对外进行活动。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以“八办”工作人员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通往延安的红色桥梁。到1938年,有近万名爱国青年通过办事处奔赴延安。国际友人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白求恩、爱泼斯坦、马海德、路易·艾黎、米勒、詹金斯、伊文思、范查理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等都是经过办事处的周到安排进入延安的。西安的一些知名爱国人士如杜斌丞、宋联奎、马德涵、刘古风、侯外庐、陈建晨等也时常来往于办事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了顽固派“关注”的地

方。

1939年春,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以“特联汇报会”秘书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特联汇报会,讨论如何“对付”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因办事处是公开、合法的机关,会议确定在行营秘书处直接领导下设一个组,专门对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进行秘密监视。

谷正鼎的“特联汇报会”不仅对“八办”实行每天24小时的监视、侦察,而且秘密逮捕与“八办”有来往的商人,并警告一些商店不准给“八办”采购人员卖货物。

1939年10月间,“八办”与《新秦日报》社签订合同,由《新秦日报》社用八办提供的纸型印刷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特务警告新秦报社不能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报社则以《新华日报》是重庆出版的合法报纸,并已与“八办”签订有“代印合同”为由继续代印。西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即强行搬走报社仅有的浇版机,迫使报纸停刊。后在报社具结不再承印《新华日报》,并“聘用”两名特务分子为报社编辑、记者的条件下,《新秦日报》始得复刊。但是,顽固派并未善罢甘休。新秦报社隔壁的钢笔大王商号,因学徒点汽灯不慎引起大火,烧毁商店18家。警察一分局竟以新秦报社未被烧毁并曾代印《新华日报》纵火嫌疑最大为由,将新秦报社社长俞嗣如拘留,移送长安地方法院关押。后经钢笔大王商号点汽灯的学徒出庭作证,顽固派对《新秦日报》的政治陷害才未得逞。

五 西安情报处的建立

1939年秋,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指示在中央采购委员会工作的王超北,在采购抗战物资的同时,要注意收集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报,并且随时报告中共中央。同年冬,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途经西安,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建立西安情报处,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下属的情报机构。西安情报处由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直

接领导。

遵照林伯渠、董必武的指示,王超北具体负责西安情报处的筹建工作。为了掩护情报工作,保证情报人员的安全,王超北在自己居住的西安市雷神庙街5号修建了秘密工作的暗室。周恩来视察了这个工作暗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超北又用变卖家产的钱购买了大莲花池街7号、王家巷24号、24号之甲和25号等院落,建成了相互联结的秘密工作室。关于西安情报处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明确指示: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搜集顽固派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使中央有所准备;第二,要全力支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工作,驻陕办事处是党在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顽固派暗中的破坏活动他们不可能知道,西安情报处要紧密配合,全力支援;第三,要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第四,要保持西安情报处工作的极端秘密性,保护组织的绝对安全,当好党的耳目。

西安情报处由小到大,最后发展为有100多人的庞大情报组织,下设4个科。情报科:先后由艾毓青、萧德、王心源、蔡茂林、马之江等任正、副科长;交通科:先后由吴卜亭、史剑北、朱官义、武志平、秦治安等任正、副科长;机要科:先后由王释奇、骆伯安、王惠令、高秀芳、杨碧涛等任正、副科长,电台台长先后有杨嘉德、雷光斗、王释奇、胡家兆、师亮华等;保卫科由梅永和担任科长。各科下设有情报员、交通员、机要员、掩护员。西安情报处还在市内设立了两个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站——春生水车行和奇园茶社。

在抗战时期,西安情报处搜集了大量的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重要情报,为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反共阴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也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顺利开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情报处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六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断扩大,由制造小规模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之一。早在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就在边区的陇东分区制造了严重的摩擦事件。3月,因河防吃紧,设在黄河岸边的八路军残废院奉命西移到旬邑县城南边的土桥镇,被国民党保安队800多人包围,肆意凌辱殴打。残废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旬邑县城。为此,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电告蒋介石,要求制止。5月24日,八路军残废院军人陈通外出采购时,被保安队枪杀。伤残人员群情激奋,20多名代表前往旬邑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县长张仲堂不但拒绝代表所提条件,反而下令保安队开枪,20多名代表当场被枪杀。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团,会同陕西保安第六团一营,围攻八路军驻防旬邑部队独一营和荣军排,昼夜猛攻。八路军被迫退出旬邑县城,17名重残伤员掉队被捕,全部被杀害。旬邑事件发生后,萧劲光、林伯渠等多次致电蒋介石、程潜、蒋鼎文等人,陈述事实原委,揭露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罪恶行径,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

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先后在边区南、西、北三面部署了19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伺机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在边区西部,1939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一个团配合庆阳县保安队突然袭击驻宁县的八路军一个营,进占宁县县城。合水县县长率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直属队,配合进攻宁县。14日夜,九十七师步炮兵又配合数县保安队围攻八路军驻镇原县城内的一个营,

16日进占镇原县城。在边区南部,1940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突然包围淳化县城,迫使八路军驻军退出淳化县城。至此,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5座县城及6个区、43个乡被国民党军占领。5月8日,国民党军向新正县进犯,20日占领县政府驻地马家堡。5月10日,国民党军以4个团以上的兵力,向富县店头镇的八路军军运联络站、独立营猛攻。6月8日,预备第三师向关中分区大举围攻,强占底庙、东牛堡、西牛堡、马栏、刘家店、湫头等地,并继续进攻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杀伤八路军指战员。在边区北部,陕西省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何绍南纠集13个保安中队,企图偷袭八路军驻军,并煽动清涧、安定、吴堡等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第七一七团,抢占了部分阵地。

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方面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毫无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来犯的顽军。同时,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由雁北进驻绥德,迅速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安定。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强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的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构筑了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的五道封锁线和近万座碉堡。在这五道封锁线中,顽固派对南线的封锁尤为重视,除构筑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均由胡宗南的国民党正规军把守。

第二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 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 国民党继续破坏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陕西当局继续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

在渭南地区,1940年4月25日,共产党员王韵清被国民党蒲城县县长王抚洲派人暗杀。5月,共产党员刘生俊被国民党渭南县委部派人暗杀,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贺修之被捕。12月20日,驻华县的国民党第一军特务营寻衅包围威林中学,逮捕共产党员白万诚和进步青年王西周、李祥文、时万成、时万发等人。

在商洛地区,1940年6月20日,中共商县县委委员王士哲被捕,次年10月31日,与早先被捕的中共商洛工委委员雷振杰在商县同时被杀害。

在安康地区,1940年5月13日,国民党紫阳县县长带队破坏中共安康地委秘密机关,地委书记刘文彬、委员刘华被国民党安康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通缉。1941年2月10日至22日,安康保安副司令张英与国民党旬阳县党部书记长胡爱媛、县长施德广、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樊佑席合谋,捕杀共产党员梁宏、魏凌玉、李兆众、鲁世鑫和非党人士王昌民等17人。安康县政府逮捕了中共安康县委书记王崇法、共产党员刘振清、何伯淳及进步青年王复荫、张慕桓等15人。9月,安康县恒口镇共产党员张家贵、吕国藻等八人被县长赵文质杀害。

在汉中地区,1940年10月14日,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共产党员、南郑县新集小学校长戴树人,次日又逮捕了进步教师宋鑫泉,11月12日将两人枪杀于汉中城东门外牛集坎。1941

年4月4日,女共产党员刘彩凤被国民党勉县县长王慕曾枪杀于勉县城北何家营村。5月,中共洋县中心县委副书记梁志宇被国民党杀害于南郑。10月22日,中共城固县西北区委书记张书行和穆春发、李长青、王勃兴、胡永沧被汉中警备司令部枪杀于南郑北门外。

在宝鸡地区。1940年12月,中共扶风县委书记韩耀华被国民党扶风县当局逮捕,押送西安劳动营。1941年1月,中共眉县县委书记任光烈领导小学教师反对贪污公款的县教育科长陈日章,被县长逮捕,押送西安劳动营。3月,武功西北农学院共产党员郭必忠等被捕。5月30日,宝鸡“工合”事务所永清堡毛纺站女共产党员章若雾被捕;同时,中共宝鸡县委组织部长倪子裕被捕。7月15日,凤翔竞存中学中共总支委员滕净东(校务主任)、学生支部委员时保泽等被捕。

在咸阳地区。1940年6月,共产党员、三原中学学生韩壬戌被国民党三原县党部逮捕,并被押送西安劳动营。1942年10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萧蓼、三原西阳镇东寨支部书记周新轩被捕。

在西安地区。1940年7月,在临潼县中正中学求学的鲁宗周、王克哲等5名共产党员和13名进步学生被捕。9月,西安陇海铁路管理局机关中共党员孙宝球、侯孟甫被铁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逮捕,孙宝球被迫害致死。1941年初,在周至县甘西小学任校长的共产党员李萃亭及几名进步群众被捕,关押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囚室,遭严刑拷打。年近六旬的李萃亭出狱即亡故。

这些被捕、被杀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的所谓“罪行”,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民众起来抗日救国。南郑县新集小学的教师人和宋鑫泉,除给学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外,就是在工艺美术课中组织师生用胶泥塑造了两尺多高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鲁迅等人的半身像,在新集街口展出。这成了他们必死的“罪证”。

大量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被捕、被杀,足以证明国民党是破坏抗战团结的罪魁祸首,同时,也对中共陕西组织在国统区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 贯彻中共中央“荫蔽精干”的方针

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党的力量,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也加发给了全党。中共陕西省委及时传达了中央的“荫蔽精干”政策。

1940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8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指出“陕西党过去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大量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中存在着不足,“陕西党今天还极不巩固”。因此,中央要求“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①。

《决定》强调:首先需要巩固党的组织。为此,要抓住中心县区,审查与配备干部,建立坚强的领导机关;采取明确彻底而慎重具体的方针,抓住中心县区整顿各地党的组织;慎重地、彻底地审查党员,洗刷混入党内的奸细投机分子,保存党的基干部分;有计划有系统地加强党内关于党的策略、工作方针及组织等各方面的具体教育;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作风。其次,必须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此,必须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这个中心环节,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与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在国民党的机关中,党除了保持党员已获得地位外,应尽量推动与帮助中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

间分子及进步分子取得各级政府机关的地位,特别是下层保甲机构中的地位;加强文化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党员在文化教育界中的地位,同时,扩大党与各高等、中等及初等学校广大教职员的联系,并在其中建立坚强的领导;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一般党员,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应允许其加入国民党;在领导上把公开的统一战线关系与秘密党的组织分开管理。再次,必须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去进行群众工作;经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去开展各种文化经济等社会的改良活动;一切群众斗争都必须经过统一战线来进行;在群众运动中,经常地注意培养和保存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关心群众福利而为群众所爱戴的党与非党的群众领袖。

《决定》指出,应该使陕西全党同志懂得,短小精悍的秘密的党组织与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及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巩固党的两位一体的任务。脱离社会与群众,秘密党的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党员都应深入社会,深入群众中去,一方面同社会、同群众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而同时又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与党的组织,以达到长期埋伏的目的。

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为陕西各级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9月2日至7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中共中央的《决定》,部署进一步巩固党的工作,确定在巩固党的工作方面,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干部问题;各级党的干部必须选择政治上坚定可靠的同志;必须职业化、社会化,不能随意丢掉自己的社会职业;必须培养锻炼自己分析环境、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要事事依靠上级;必须准备候补干部,保证工作连续进行;必须调动暴露的干部,一般调到边区学习,也可离开本地,改业谋生;必须特别重视审查干部,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在国民党中受训的问题,不要随意作结论,不要弄错一点。其次,要继续审查和清洗异

己分子、投机分子、自首分子，特别是暗藏的好坏分子；要加强反奸细斗争，保证党内不暗藏一个奸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对那些政治上尚未成熟，年龄太小，或者觉悟太差，不够党员资格的人，劝其暂时退出党的组织。再次，要改变组织形式，改进领导方式与领导作风。12月18日，省委制定了《关于保卫党的组织条规》。1940年，省委直接审查了190名干部和一部分党员，其中县级以上干部100名。还审查了22个县委与县工委。次年2月18日，省委又作出了《关于防止国民党破坏我党组织的指示》，将“荫蔽精干”政策进一步具体化。

1941年4月22日，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使关中分区更好地配合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辖的关中分委改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5月6日，中共中央对陕西省委的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省委由欧阳钦（书记）、张德生（组织部长）、赵伯平（宣传部长）、汪锋（统战部长）、习仲勋（关中分委书记）、文年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中（秘书长）组成。

6月，欧阳钦和张德生先后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听取汇报后指出，在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地下党只有坚持“荫蔽精干”的方针，方能生存和发展。之后，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有关文稿，报经中央和毛泽东修改后，以西北局名义下发陕西省委。

12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决定》肯定了“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路线与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虽然遭受了许多破坏，但基本上保存了党的基础”。同时指出，“目前陕西党内，尚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的残余”，“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则仍多不适合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严重环

境”^①。鉴于陕西处于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必须坚决肃清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倾向,扩大社会活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方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在整顿和发展组织中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党员活动最大部分应公开化、社会化,尽量减少秘密活动,党的会议一般不召开,改为个别接头,秘密文件一律停止印发,改用口头传达;继续审查党员,清洗不坚定分子。强调要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利用各种矛盾,同国民党反共力量作斗争。同时,要熟悉社会,深入社会,广交朋友,联系群众。

194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接替欧阳钦任省委书记的张德生做了会议总结报告。会议指出,自执行中央“荫蔽精干”政策以来,陕西党组织不仅“保存了量”,而且“提高了质”。会议决定进一步贯彻“荫蔽精干”的方针,彻底改变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会后,省委派出21名干部,以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的形式,到有党组织的30多个县传达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形式,来隐蔽和巩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斗争。12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由张德生(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张仲良(分区行政专员)、文年生(警备第一旅旅长兼分区警备司令员)、张鹏图(副专员)、高仰云(宣传部长)组成地委常委会,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

三 再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总长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

长叶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无理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地区,并将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密令顾祝同、汤恩伯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为了配合顾祝同等部制造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于11月22日密电胡宗南,将在豫西、晋南抗日前线的第三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西调关中。其阴谋是:第一步夺取关中分区,第二步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夺取三边和陇东地区。

1941年1月初,驻关中分区赤水县附近的国民党预备第三师首先抢占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到处烧杀抢掠,并明令凡逮捕边区人员者,县级赏钱300元,区级赏钱200元,乡级赏钱100元。国民党军相继在三边分区的张家畔、陇东分区的宁塞堡、绥德分区的吉镇等地挑起摩擦,并侵占了边区一些地方。

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及甘泉、富县等地,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警备第一旅抵达关中分区后,旅长文年生、政治委员阎红彦率警备第三团、第八团和部分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文石村、凤王山一带与胡宗南部激战三天,将其赶回凤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柳林,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来犯者赶回原地。

边区南线的摩擦基本平息下来,北线的形势又紧张起来。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定边、安边、靖边进逼。为了打击何文鼎部,确保三边分区安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第四支队、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保安司令部保安第二团和骑兵团组成野战兵团,王震为司令员,贺晋年为副司令员,率部急进。11

月6日,野战兵团集结于靖边县张家畔,其中一部已到人口稀少的伊克昭盟四十里铺、黑头梁、银头梁一线,迎击南下的何文鼎部。得悉边区部队已有充分防范,加之驻三边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部新编第十一旅承诺保持中立,何文鼎不得不于1942年1月14日龟缩回绥远原防地。

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进攻被迫暂时停止。

第三节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 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第三次进攻

1943年3月10日,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变相割据”,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反对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取消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企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6月18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拟分九路“闪击”延安。28日,国民党第十六军炮兵团第一营由河防前线合阳开抵耀县。30日,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八师由西安开抵同官,游击纵队王裕民部由河东晋南撤抵大荔。7月4日,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部闪击边区富县峪口村。7月6日,国民党第九十军第二十八师由合阳开抵洛川县交口河桥子镇,第六十一师开抵洛川县东南圪台镇,第八十

军直属队由耀县开抵同官,新编第二十七师由富平西开抵庄里镇、口头镇,第一军直属队及第七十八师由华县开抵彬县。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关中分区八路军警戒阵地。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7月4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谈判代表董必武,蒋介石正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特别通告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责问胡宗南何以将河防大军西调,北向边区?7月5日,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各将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边区、重开内战的阴谋。7月9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议国民党军炮击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同日,延安3万军民举行大会,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警卫部队一次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苏、美、英等国大使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等地撤回。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即被制止。

二 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国统区继续捕杀抗日志士

在对陕甘宁边区准备武装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

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抗日志士以及无辜群众，破坏团结抗战。

1943年6月26日，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县委委员巩德胜在商县县城西门外英勇就义。

8月3日，国民党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温良儒和临潼县县长王家麟带领保安团一个营、工兵一个连和咸阳、临潼、高陵、泾阳县军警以及渭北12个镇的保甲武装3000人，将临潼县施家堡、白杨寨子、花刘村包围，企图将交口镇的民众抗日武装一网打尽。交口地区长期以来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控制，是西安附近的一个红色据点。在温良儒带队包围交口镇之前，包括胡宗南部的高级参谋、第十行政督察区副专员、渭北“剿匪”总指挥等党外朋友已将情报送给了交口镇中共组织负责人谈国帆、王志温。谈国帆、王志温和有关人员紧急疏散、隐蔽。温良儒等未捕到谈国帆、王志温，即将共产党员戚玉平等八人杀害，逮捕了进步人士杨耀山，包文长，并查抄了谈国帆、王志温等人的家，解散交口乡各保，撤销交口乡的行政建制。谈国帆、王志温、王廷益等40多名已经暴露或可能受到迫害的人员全部撤入陕甘宁边区。

8月20日，国民党西乡县党部书记长赵寿阶、县长温恭、警察局长于聪生分头逮捕了中共黄池支部书记刘继哲等九名共产党员和两名进步青年。11月29日晚，刘继哲就义。之前，其母亲和嫂嫂带着他四岁的儿子去探监，他一边给啼哭的儿子擦眼泪，一边叮咛儿子“长大了要跟爸一样”，并将新写的《甘将热血献八荒》诗交嫂嫂带给党组织。诗的全文是：“你问啥，我不讲，你动刑，我不降；你要杀，我昂头，甘将热血献八荒；今日鲜血浇棉田，明日红旗满天扬！”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意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共西乡县简易师范学校支部书记陈鼎昌和支部成员万发明、冯忠恕被移送到西安劳动营关押，陈鼎昌遭受酷刑死于狱中。

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陕南调查专员王文楼、安

康县长袁德新带领军警到安康县恒口区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共产党员杨麟科等 23 人被捕。

12 月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李犹龙带领省党部调统室、三青团陕西省分团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的特工人员到礼泉县进行大搜捕，破坏当地的中共组织。23 名共产党员和 25 名党外民主人士被捕，并被押送西安的监狱。被捕人员被施酷刑，但无人屈服。

12 月 9 日，共产党员许权中、任耕三、刘兴坤被国民党杀害，许部特务排排长阎麦绪同时遇难。抗战爆发后，许权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五二九旅旅长、第一七七师参谋长，驰骋于华北抗日前线，后任第四集团军中将参议兼第四集团军眉县万家堰垦区主任，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他以生产为名组织了两个连的武装，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在眉县教坊村窑店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4 年 3 月 22 日，中共麟游县委书记王乐天在宝鸡英勇就义。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残酷打击、迫害，使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损失。

三 恢复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为了有效地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关中地委开始领导恢复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

1944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中共关中地委召开地委统战部部务委员和各县县委统战部长联席会议。由于康生诬蔑陕西党是“红旗党”、“假党”而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陕西党组织的现状和对陕西党组织的认识问题。会议认为：内战时期，陕西党只留下了一些零星党员，党组织主要是在西安事变后的群众抗日救亡高潮中建立和恢复起来的，是由几个系统发展起来的。

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彭加伦、汪锋、潘自力、惠子俊、王俊、张策等都是中央和西北局派出的。陕西党组织不是什么“红旗党”，也不是“假党”。八年来，陕西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做了很多工作，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这几年来积蓄了党的力量，保存了党的基本组织。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与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认为陕西党基本上是好的，是可靠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地委也是这样的认识。这就是党对陕西组织的结论和评价。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审干和为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根据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指示，关中地委陆续派出干部到陕西国统区与地下党组织联系，逐步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恢复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是积极而又非常审慎地进行的。工作方式步骤一般是：第一，从边区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尤其是通过一些到边区做生意、探亲的人员了解国统区的情况。第二，从侧面了解地下党员的情况。第三，恢复联系的方式，一种是从边区选派合适的干部外出，到原来领导管理的地区，同认识的发生过关系的党员接头，进一步了解情况，确定哪些党员可恢复联系，这是主要的方式；另一种是派交通员外出，调有关党员干部到边区，详细了解本人与所领导的党组织情况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经过认真研究，确定恢复联系的党员。此外，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自行到边区寻找组织，汇报工作，恢复联系。首先恢复联系的党员，绝大部分为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党员、中上层社会职业的党员以及地方武装中的党员，其中知识分子党员居多。

为了适应形势与工作任务的需要，中共关中地委在恢复各地党员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各地党的组织形式以“精干、短小、分散、多样、自然”为原则，这样不仅可以

防止组织被大破坏,而且有利于组织发展。

四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在陕西的建立和发展

1941年夏,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民族大众同盟是在周恩来的提议和董必武、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由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筹划成立的。一年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参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活动中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内愿意进步的人尽量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它从国民党内部去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1941年秋末,在西南进行抗日民主活动的杜斌丞经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任陕西组组长。共产党员杨明轩、李敷仁、武伯伦、赵寿山、王雄祺等也加入了这个组织。杜斌丞和杨明轩还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主张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指出: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及其发布的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1942年5月初,民主政团同盟总部特派员郭则沉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商讨建立民盟西北组织与开展抗日民主

运动问题。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10月,郭则沉持民盟主席张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即与杨明轩、王菊人等秘密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过几个月的积极工作,西北民盟在西安、三原、韩城等27个市、县和甘肃、宁夏等地发展了150多名盟员,其中一些是共产党员。次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主任委员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为执行委员。民盟西北支部确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为发展盟组织的政治原则。杨明轩协助杜斌丞主持盟务并负责组织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在陕西的组织十分注重与西北军人的联络工作。1944年12月,杜斌丞到固原,与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商讨西北军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问题。高桂滋表示,在西北军联合反蒋之前,第十七军将进一步保持固原与陕甘宁边区商旅的畅通。高桂滋向守备边界的部队下达了与八路军互不侵犯、各守边界的命令,建立了由固原经王洼子到三岔的秘密交通线,并把第十七军盖有关防印信的通行证、护照,交边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使用。杜斌丞在固原期间,中共西北中央局数次截获蒋介石要胡宗南“逮捕杜斌丞就地适宜处理”的密电,均派专人到固原,向杜斌丞和高桂滋通报,并诚邀杜斌丞进入延安,以保障他的安全,并就近请教。

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在配合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有效的

第二十章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一 王树声、戴季英率部挺进豫西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①此时,陕甘宁边区河防压力减轻,中共中央决定抽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分部队和边区部分干部,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5月11日,鉴于河南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被日本侵占,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九、十月间,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后改为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和以太岳军区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和陇海路新安、渑池段南北建立了拥有20个县、3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并成立了河南行政公署和河南军区。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任命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司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员,戴季英为军区政治委员,率两个团及大批干部从陕北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一个月后,王树声、戴季英率部从延安出发。12月19日,毛泽东指示王、戴,要备足鞋袜,以免指战员在途中冻伤腿脚而致残。12月底,从延安出发的中共中央党校百余名干部和晋绥军第六支队一部进入豫西新安地区。

194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平原分局、山东分局从财政上援助河南。因为“迅速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打通华北与鄂、湘联系,这是准备反攻、夺取华北、巩固苏北的重要步骤之一,没有河南之发展与巩固,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将发生严重困难”,并指示河南区党委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克服财政困难。

河南新解放区的开辟,扩大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湘鄂赣

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遣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和一批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南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片,力求开辟湘粤赣边区的五岭山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全国各抗日战场实行强大的反攻作战。随后,毛泽东同延安警备区司令员、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王震谈话,对中共中央准备组织部队南下的问题做了指示,并分析了这次南征的前途,提醒王震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月31日,第三五九旅主力部队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全支队4000余人。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南下支队举行的誓师大

会。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以东再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在鄂豫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后在新四军第五师一部的配合下,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酃县、宜章等地区开辟了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赣抗日解放区。4月,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后部队继续远征,沿湘赣边向南挺进,一直打到广东的南雄、始兴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三 骑兵团北上大青山

在平绥铁路以北,依托大青山脉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既是晋察冀边区的屏障,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春,在姚喆、高克林等人率领下,中共领导的绥远抗日军队发动强大攻势,连克绥中、绥东、绥南的日伪据点10多处,将大青山绥南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平绥铁路处于抗日武装的钳制之中。这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派回了臭名昭著的“自卫军”,委任“游击县长”,到大青山地区向抗日军民收复失地。顽匪鄂友三也乘机挤进绥西地区。抗日时躲在后面的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也到了绥西,顽匪苏黄龙则由绥南跑到绥中。他们勾结日军,破坏解放区,暗杀解放区工作人员,并集结兵力侵占了抗日根据地所属的井尔沟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康建民、朱子休率领的骑兵团北上大青山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和开辟解放区的工作。在姚喆和高克林的领导下,骑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在武川县的井尔沟痛打“挺进第五纵队”鄂四儿部,在后脑包将其全部歼灭,然后乘胜连克武川县城、陶林等地日伪据点三处,扩大了解放区,使绥西、绥中、绥东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中共中央又从陕甘宁边区抽调独立第一旅全部,教导旅第五团,独立团,抗大七分教第一,第三大队等部先后开赴晋西北,攻占日伪据点,开辟新的解放区,以支援和配合其他抗日大军准备反攻。

四 文年生、张启龙率部南下

194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前往湘鄂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警一旅南下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文年生任支队司令员,雷经天任支队政治委员;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南下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刘转连任支队司令员,张启龙代理支队政治委员。两个支队的任务除了经中原、江南同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合并开展工作外,还担负着护送中共中央派往两广工作的第九干部队和派往中原工作的第五干部队的任务。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行动,成立了以文年生为指挥,刘转连为副指挥,张启龙为政治委员,晏福生为副政治委员的临时指挥部。

6月7日,毛泽东在准备南下的警备第一旅和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说,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系中华民族解放的问题。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12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次讨论文年生、张启龙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

6月18日,文年生、张启龙率部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太岳根据地,而后由晋南抵豫北,从陕县再次过黄河南下。当部队到达河南省新安县时,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节 学习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一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早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就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在此时提出适当的纲领,这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刘少奇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扩大党的民主,包括党员在一定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4月20日,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军事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的议程。六届七中全会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8次全体会议,完成了七大的筹备工作。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召开。任弼时报告了七大的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日,这固然是缺点,但也有好处。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亿,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做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预备会通过了七中全会提议的由毛

泽东等 15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等 6 项提案。

4 月 23 日,延安中央礼堂的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艳的党旗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下午,中共七大在庄严肃穆的《国际歌》声中揭开帷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4 月 24 日,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希特勒德国就要被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也为时不远。他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但由于战争的胜利,为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有了强大的解放区,但国内仍存在着危机。在人民面前有两个前途:光明的前途和黑暗的前途。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为了实现全党的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大会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4 月 25 日,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精神和毛泽东军事学说以及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大会制定了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基本内容的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

5 月 14 至 15 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科学地阐述了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和干部问题。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在新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

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5月24日,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建议。大会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圆满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经原中共陕西省委选举和中共中央调整,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以上为正式代表)、彭毓泰、胡达明(以上为候补代表)代表中共关中地委所属的党组织和党员出席了中共七大。

二 学习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为了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路线,1945年6月2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陕甘宁边区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从7月1日起认真学习七大文件,“学习的目的在于深入七大路线的传达,给干部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团结全党,实现七大路线”,并规定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新党章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西北局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文件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关于各单位学习步骤、方法及组织领导等问题,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军队政治机关、政府及民众团体中的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订出计划并具体指导,不必强求一律。西北局特别强调,边区各单位、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采取细致的与实际密切联系的方法,防止教条主义与形式

主义倾向的发生,提倡精读、思考、漫谈与争辩学习,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及时总结与交流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使干部、党员对七大文件的学习能深入,获得良好的效果。

7月1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根据部队的实际,作出了关于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边区部队应以深入传达七大路线,系统地宣传与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及其建党建军的方针为学习的重心,并根据它来检查和改进思想与工作。经过学习七大文件,务必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党性上、政策的理解及党内军内团结上有所改善,有所提高,强调在干部和部队中,要克服存在着的若干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及个人主义等等倾向,以及一切有碍团结、有碍进步的思想,为促进部队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系统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文件精神的同时,边区文教单位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热潮。延安大学积极组织各院教职学员,采取联系实际、民主讨论的方法,深入学习七大文件。他们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举行学习报告会,由校长周扬及张宗麟、何思敬、萧军、艾青等分别讲述七大文件的中心内容和意义,讲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启发、引导大家克服学习中的盲目性,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执行七大路线的自觉性。

中共关中地委就中共七大文件的学习安排向西北局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在干部中学习七大文件配合检查领导作风,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消除上下隔阂,组织边区内的干部学习好、贯彻好七大路线。地委并指定联络员熟背七大的主要文件,到国统区向党员口头传达七大精神,着手恢复整顿党的组织,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做准备。

第三节 延安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一 陕甘宁边区发起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护，却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悍然拒绝。他们顽固地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并玩弄“还政于民”的阴谋。为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当年11月在延安召开。为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在延安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各解放区的筹备工作，由各解放区的参议会社会委员会兼任。

为了贯彻七大路线，进一步推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性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于6月21日召开了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曾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及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建立，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及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亟宜正式发起筹备这一伟大的人民会议，并认为在目前时机下，筹备事宜，刻不容缓，故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共商进行。会议向各解放区发出了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

7月7日，延安各机关代表及延安市群众千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大会。马豫章市长发表讲话，赞扬八年来各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号召延安人民认真

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在备荒中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准备反攻力量,帮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及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

7月10日,延安、富县、庆阳等地的天主教友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和拥护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公开发表了致朱德总司令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抗日将士的专函。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国,只有迅速召开代表人民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动员全国力量,同心协力准备反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表示拥护。

随后,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及各人民团体也表示拥护陕甘宁边区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

二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朱德出席,林伯渠报告筹备经过,周恩来作《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报告。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28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的高岗、李鼎铭、谢觉哉等9人;晋绥解放区的续范亭、刘少白等8人;晋察冀解放区的成仿吾、沙可夫等9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邢肇棠、薄一波等9人;山东解放区的齐燕铭、黄春圃等8人;华中东部各解放区的惲子强、贺绿汀等8人;华南解放区的陈郁、何干之等7人;湘鄂赣解放区的徐特立、陈奇涵等3人;鄂豫皖解放区的钱瑛、苏井观等3人;河南解放区的范文澜等3人;中共中央的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第十八集团军的杨尚昆、边章五等9人;新四军的潘汉年、伍云甫等6人;解放区职工会的崔田夫、赵占魁等3人;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冯文彬、胡乔木等5人;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蔡畅、邓颖超等4人;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周扬、丁玲等5人;蒙古

文化协会的乌兰夫；回民协会的张凤午等3人；东北救亡总会延安分会的李延禄、刘澜波等3人；中西医协会的毕光斗等2人；解放区新闻记者协会的柳漫、范长江等5人；抗大2人；延安4人；医科大学3人；护士协会3人。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林伯渠、姚范亭、邢肇棠、李鼎铭为副主任；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筹委会通电全国，阐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使命，并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为中国的最后胜利与全国民主开辟广大的道路。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是一个加强抗战、配合盟国、准备对日反攻的大会，将是一个加强团结、制止分裂与内战的大会，将是一个促进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通电号召解放区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致起来，为使这个会议得以如期召开并获得伟大成功而努力。”

7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实施《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和起草行动纲领等有关问题。

8月1日，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纲领起草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谢觉哉、刘少白、成仿吾、邢肇棠等29人组成纲领起草委员会。

第四节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夺取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

一 淳化事件

1945年2月，以梁干乔为副指挥官的国民党彬洛区军训民众指挥部由耀县移驻淳化县，主管淳化、旬邑、耀县壮丁训练。

梁干乔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到淳化几个月,竟残杀无辜群众118人,关押所谓“嫌疑犯”200多人,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纷纷向陕西省政府告状。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于5月19日以“破坏行政,纵属扰民”为由,将梁干乔撤职,派亲信李静谋接替梁干乔的职务。

彬洛区军训民众指挥部下属第二守备区保安第二、第三、第四团。李静谋上任时,带来90多名军官,大换各级主官,激起了梁干乔委任的军官的强烈不满和反抗。6月26日,第二团团团长刘文华发动兵变,攻占国民党淳化县党部、淳化县政府和彬洛区指挥部。同时,淳化县方里镇的一排守军起义,向边区赤水县保安大队投诚。

7月11日,刘文华率部到马栏镇。后刘文华去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的接见。毛泽东在接见和宴请刘文华时高度评价他的革命行动,风趣地说“这是逼上梁山”。10月,刘文华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淳化事件”。

“淳化事件”本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逼兵反,但胡宗南却反诬“淳化事件”是陕甘宁边区插手策划所致,借此大举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从7月15日起,胡宗南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急速调动国民党军九个师,部署于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旬邑一带。反动分子还制造所谓“共产党要打西安”的谣言,声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要“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在一片反共内战的喧嚣声中,7月21日拂晓,胡宗南命令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爷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

7月23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揭露其制造反共内战的阴谋,并要求调查、制止。紧接着,延安权威人士通过新华通讯社,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严重警告,指出:大敌当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的同盟,

这是犯了滔天大罪,真的要打的话,那就无异于玩弄一堆燎原的大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玩火的人应当注意,全民族正用自己的精力向民族敌人苦战的时候,若干败类要想违反这个意志以逞自己的私图,那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从7月21日至23日,国民党军数次疯狂进攻八路军爷台山阵地,均未得逞。24日,国民党军第十六军预备第三师投入战斗,并调集大批野炮、山炮、迫击炮及美国火箭炮,向爷台山阵地猛烈轰击。爷台山守军新编第四旅六个连的指战员坚守阵地,进行英勇反击。关中分区由1129人组成的56个游击小组和由37人组成的3个爆破组,分别有效地配合了正规军作战。26日,国民党军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爷台山阵地轰击,大部分村庄被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政治委员关向应,副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张经武联名致电胡宗南,指出:“大敌当前,既属黄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兹与先生约,如先生尚无破裂决心,即请约束贵部,停止攻击。如先生执迷不悟,必欲大举进攻,激动边区广大军民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然而,胡宗南一意孤行,调集重兵继续向爷台山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7日晚,为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八路军主动撤出爷台山阵地及爷台山西面的官庄、于村、野狐嘴、十里原、符子沟等41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上述地区,并在边区边境的官庄、梁庄、龙局、彬县、耀县、洛川一线集结重兵,企图扩大进攻。

二 爷台山反击战

为了打退胡宗南部的疯狂进攻,取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赤水、淳耀县成立了战地工作团,负责担架、运输等各种支前工作。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扩大内战的阴谋,八路军决心在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反击。在张宗逊、习仲勋的指挥下,八路军以爷台山为战役的主攻方向,以新编第四旅五个营为主攻部队,第三五八旅为助攻部队,教导第一旅、第二旅为预备队。同时,边区的广大群众也积极动员起来,支援八路军反击顽军的战斗。他们不仅有组织地送饭送水,护理伤员,而且组织了担架队、游击队,配合八路军的作战。8月7日,朱德、彭德怀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撤退来犯的国民党军,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蒋、胡置若罔闻。8月8日,边区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联防军司令部关于反对内战、坚持自卫的原则,对国民党军队予以坚决还击,一举攻占爷台山。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到8月10日,八路军全部收复爷台山等失地,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的全胜。

爷台山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后方多次制造反共摩擦的最后一仗,也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的信号。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和侵占爷台山阵地后,中共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深刻的揭露,而且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给来犯者以歼灭性的打击;同时又在收复边区失地后就停止了进攻,严阵以待,使顽固派不敢越雷池一步。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在国民党军以强大的兵力发动进攻,而爷台山驻军只有少数兵力守卫阵地的情况下,八路军采取了既坚守又不死守的作战方针,在防守中消耗敌人,在赢得时间后主动撤出战斗,待敌深入边区后,八路军利用地形、地物、群众支援等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这次反击战的胜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使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蚕食陕甘宁边区并挑起

内战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毛泽东对平台山反击战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而易举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①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1945年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由于日军在关内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因此,解放区军民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作战任务。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②

8月10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晋察冀军区于8月11日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发出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所属日军投降。日军拒绝后，晋察冀军区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一部攻夺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一部配合晋绥解放区的部队进攻太原，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一部攻天津、塘沽，一部攻石家庄、保定。

晋绥军区于8月11日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限时投降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晋绥军区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克太原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

晋冀鲁豫地区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对日、伪军全面反攻。太行部队一部向新乡、博爱段进攻，并于8月16日晚突入博爱城内，一部向太原进攻；太岳部队于8月20日进抵平遥，随即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的日、伪军进攻；冀豫部队一部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一部配合山东解放区部队进攻济南；冀南部队首先对运河以东的伪军展开进攻，接着攻击临清城，突入城内，并截歼逃敌大部。

山东军区于8月11日部署全面反攻任务，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以五路大军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在华中，从8月中旬开始，新四军的苏浙军区、淮北军区、淮南军区、苏北军区、苏中军区及鄂豫皖湘赣军区、河南军区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各地日、伪军举行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解放了华中地区大

片国土。

在华南,从8月14日开始,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直逼广州、汕头、海口等城市。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准备向东北进军。东北抗日联军在中苏边界营地召开反攻誓师大会后,回国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并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占领战略要地,解放了东北一批城市和乡村。

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在对日军实行全面反攻中,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华北重镇张家口。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一些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9月5日,延安各界2万人集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到会讲演。朱德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抗战八年,功勋卓著,如果没有这样能打仗、能生产,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就不会有今天抗战的胜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

的中国”。^① 西安 10 万民众于 9 月 3 日举行了庆祝大会。

二 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既是全国抗日战略总后方之一，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又是中共中央的抗战指挥中心。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发动组织陕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陕西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中共陕西地方组织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忠实的实践者，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者。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陕西省委就明确提出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

全民抗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各级组织利用卢沟桥事变及其发展的形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人民的组织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部署和领导下，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空前的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西安、咸阳、安康、汉中等地纷纷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他们通过召开抗敌大会、农民大会、讲演会、座谈会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街头演讲、演唱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侵华暴行，讲解防空、防毒及救护意识，动员人民参军支前。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青年积极要求报名参军，百姓慷慨解囊，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要求转交前方将士。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也以民族

^① 《解放日报》，1945 年 9 月 6 日。

大义为重,支持民众的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武装保境安民,有的还率部到前线与日军直接作战。

从1937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八路军沿陕西的泾阳、富平、蒲城、同官、澄城、合阳、韩城一带东渡抗日。沿途各县民众在中共陕西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下,迎送八路军出征,热情慰问出征将士,许多青年投笔从戎,踊跃参军。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开赴抗日前线,抗敌救国,奋勇杀敌,用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群众,并要求每个党员和支部在特殊情况下都要有独立工作的精神,以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救亡。

中共陕西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动员,使陕西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二) 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保卫河防,巩固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与日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终因敌强我弱和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使华北、华东、华中迅速陷入敌手。在这种形势下,巩固西北、西南大后方,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陕西东依黄河,自古以来就有看重要的军事地位,无论是群山环绕的关中,还是黄土高原的陕北、秦巴山区的陕南,均需据险设防。尤其是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逼近潼关后,陕西不仅成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中、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连接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保卫陕西,抗击日军,支援前线,就成为中共陕西组织和广大民众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陕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陕甘宁边区军民为保卫河防英勇奋战。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加强对留守陕甘宁边区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为保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1938年3月,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也划归留守兵团管辖,从村、乡、区到县还建立了抗日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余人。这些武装成为陕甘宁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从1938年初至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及边区军民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8次,粉碎日军数十次进攻,共歼灭日军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保卫河防的任务。

1938年初,日寇进逼潼关,炮轰陕西河防,陕西即将成为国防前线和战区,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在保卫陕西的神圣战斗中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要求“陕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更加紧学习军事,学会打仗,时刻准备上前线!共产党员应当站在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斗争前线!为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奋斗到底!”^①中共陕西各级组织积极组织 and 动员民众抗日力量,参加或配合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西进锋芒。由成仿吾作词、吕驥谱曲的《保卫陕西之歌》迅速唱遍全省,它反映了1000万陕西同胞的共同心声,无数热血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而朱德总司令在东渡黄河时气壮山河的誓言:“古人中流击楫而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我们这次出征,不把日寇赶出中国,也决不复渡黄河。我们要打到敌人后方去,打到鸭绿江,直抵黄龙府,再与诸君痛饮!”^②更是时时激励着三秦儿女奋勇杀敌。

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没有能够侵占陕西一寸土地。三秦儿女用血肉之躯保卫家乡,确保了全国抗日战略大后方的安全。

① 罗凤栖等,《中国共产党陕西80年》,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军民抗战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三) 积极支援前线,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

抗战时期,陕西约有 937 万人口,耕地面积 3692 万余亩,陕西人民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均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积极为抗战输送兵源。抗战时期,陕西人民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兵员。在陕甘宁边区,“1937 年至 1938 年两年中,全边区动员了 8000 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和边区保安队。1939 年 12 月 28 日,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与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发出训令,动员壮丁 1710 名补充留守兵团和保安队,要求三个月内完成,而延安县这次完成 130 名,占补充总数的 7.6%。1940 年春,边区政府原计划动员 3500 名青年参军,结果有 5000 多名青年参军。抗战期间,边区先后动员了 3 万多名青年参军。延安县和延安市的青年表现得非常积极,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延安前后参军的青年人数占到当时县、市总人口的 10%。”^①另据国民党陕西军管区的统计,八年抗战期间,陕西历年征兵额为:1937 年自 10 月征兵为 5.0108 万名,1938 年 11.2372 万名,1939 年 18.2025 万名,1940 年 18.3276 万名,1941 年 15.4285 万名,1942 年 15.6904 万名,1943 年 9.2864 万名,1944 年 13.8264 万名,1945 年初至 9 月 3 日为 8.6119 万名。^②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约 160 万以上。以当时陕西人口计,几乎不到 9 人就有 1 人应征。这些数字,一方面反映了陕西人民对抗战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陕西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

其次,田赋征收与军粮调配。陕西驻着胡宗南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事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军粮均取自于陕西人民。陕西人民年需负担军粮 256 万石,加之阎锡山的部队每年也要向陕

① 《陕西军民抗战记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4—55 页。

② 范宝信《陕西省政纪要》,陕西省政府统计室 1947 年 7 月印行。

西采购军粮 10 余万石,陕西人民的负担极为沉重。另外,自抗战爆发,冀、鲁、晋、豫诸省相继沦陷,难民流亡,云集关中陇海铁路沿线各地。尤其是在黄河决口以后,黄泛区灾民更像潮水般涌入陕西。据当时官方统计,为数约 10 万左右。因此,在抗战开始后不久,陕西就把开垦荒地、扩大农村耕地面积视为重要问题之一。当时,陕西纳粮数及人均负担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 年至 1945 年,陕西每年的纳粮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6.6%、7.3%、7.4%、8.7%、8.5%;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 0.574 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 1.564 石;以粮食产量与捐纳赋粮的比例计算,1944 年度后方 15 省粮食产量中捐纳田赋者,还不到 4%,而陕西竟达 10%以上。^①

(四) 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创建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贫穷、闭塞、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举世称誉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先进的区域。国内外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新中国的试管”。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和以它为样板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②

陕甘宁边区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模范。民选的参议会是边区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边区政府和法院由它组建,受它的监督并对它负责;参议会的参议员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边区的政权在组织上实行“三三制”,不论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均吸收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① 范宝信《陕西省政述要》,陕西省政府统计室 1947 年 7 月印行。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45 页。

和开明绅士代表参加。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管理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在我们这个没有民主传统国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创造。”“全国人民渴望着的民主政治,毕竟在适宜于它生长的土壤上,结出灿烂的果实。”^①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模范。边区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穷,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总的方针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依靠和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策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实行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在土地政策上,除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外,一律实行减租减息。上述方针政策的实行,合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对于战胜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模范。边区各项文化事业原本就十分落后,文盲高达90%以上,城乡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边区党组织和政府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拓荒”式的工作。特别是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决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两大任务后,边区文化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是大办干部学校,提高边区干部文化素养和理论政策水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平；二是从扫盲入手，办好识字班、夜校、冬学和小学、中学，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三是逐级建立医药社、卫生社、卫生院和医院等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条件，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四是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活动。各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使边区呈现出欣欣向来的景象。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楷模，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五）在中共中央领导培养下，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培育、铸造了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延安精神。

革命圣地延安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1942年，毛泽东考察延安县的工作，对延安县的干部不怕艰难困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十分赞赏。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高度评价：“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精神。”^①此后，“延安县同志的精神”在各方面被广泛传播、发扬和充实，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连同“整风精神”、“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被一起概括、升华为“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②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保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民主中国的摇篮——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② 胡锦涛2004年2月在延安慰问和考察时的讲话。

第四编

中共陕西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第二十一章 中共陕西组织领导的 陕西人民反内战斗争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陕西形势

一 陕北解放区的和平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建国方针,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方针,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坚持独裁、反共、内战,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方针。这两个建国方针的矛盾与斗争,贯穿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陕西省境内存在着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行政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解放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解放区地处陕北和关中的西北部,共有 23 个县(市、区),即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市和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固临、甘泉、富县、延安、清涧、绥德、吴堡、子洲、米脂、佳县、定边、靖边、吴旗、赤水、淳耀县及南泥湾垦区、晋绥边区的神府县。陕北解放区的面积近 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20 万。

陕北解放区人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积极进行和平建设。解放区的和平建设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广泛开展选举、减租、生产三大群众运动。

陕甘宁边区自下而上进行的乡、县、边区三级民主选举,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进行普选

的区域,为国内外所关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①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这次普选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边区政府就于1945年8月4日召开政务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第三次民主选举的准备工作,并聘请党、政、军、民和少数民族及劳动英雄代表11人组成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9月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选举工作的训令》,指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全国人民已经进入为和平、民主、团结奋斗的时期”,“我们更要全心全意地继续提高边区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方面建设上作出更好榜样,有力地参加和推动为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的事业”。这就是第三次民主选举运动的政治出发点。训令强调,此次选举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信仰,不受财产与文化程度限制,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2)发动人民彻底检查各种政策的正确性及其执行程度,检查政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改进工作。(3)选举中任何公民任何抗日党派与民众团体均有依选举条例提出候选人的权利,有为自己或他人实行竞选的权利。10月5日,西北局发出《关于选举问题的指示》,指出:今年的普选,对外是要以新民主主义的具体事实与民主实质揭发与对抗国民党独裁与玩弄假民主的把戏,对边区内部则是要从民主运动中教育、识别干部,教育、团结人民,改造各级政府,增进人民福利,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让群众大胆批评政府工作人员,检查政府工作;政权机关的“三三制”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性质,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不要超过1/3,以便使许多能与共产党合作的进步与中间人士到政权机关中来,共同担负起革命工作,同时也不能让反共反民主的分

^① 根据1949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局名称的统一规定》,各中央局一律称为中共中央某某局。在此之前,西北局有称中共西北中央局的,也有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为叙述方便,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局一律称为中共中央西北局。

子钻入政权机关中。10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要全国人民前面作出好的榜样》的社论,指出:“在抗战胜利结束以后,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进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的地区。边区这次普选,对于全国政治的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行,将会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因此,这次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极重大的意义。”社论号召全解放区的公民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号召各级干部诚恳地鼓励人民检查自己的工作,向人民进行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改进自己的作风,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更好地和一切民主分子进行合作,并在倾听群众意见和自我批评上做大家的模范。

经过半年的选举运动,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于1946年3月21日宣布,乡、县、边区三级的选举已经完成,其中选出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135人,候补参议员35人。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号召边区人民把边区建设成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光明的灯塔,更坚强的堡垒,并且与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反动派的阴谋,推进全国的民主事业和建设事业。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陕甘宁边区1946年至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并发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政协决议,彻底实行停战协定,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会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选举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高愉庭、霍祝三、马济川、柯仲平、吴满有、杜瑞兰、鲜维俊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田绍锡等四人为候补代表。4月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以此为标志,陕甘宁边区的乡、县、边区三级选举工作正式结束。

陕甘宁边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积极开展减租活动。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陕甘宁边区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际情况,对开展减租运动做了具体安排。西北局在1945年12月28日发出的《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地“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1946年4月,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进行查租保佃、贯彻减租方针”的提案。5月29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彻底进行查租保佃是全区1946年下半年的五项中心工作之一。7月1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具体规定: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并且重申,地主非法倒算的土地应退还农民耕种,地主假典假卖、抬高租额、骗取陈租、明减暗不减等不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补偿农民的损失。各地的选举工作普遍与减租查租工作相结合。绥德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于1945年11月14日发出《1945年减租办法》,要求各地结合乡选认真减租和查租。《办法》不但对定租、活租、伙种、安庄稼^②的减租交租做了具体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5页。

② 安庄稼又称招门客,是陕北农村的一种租佃形式。出租人将土地、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及窑洞、房屋等出租给承租入,土地的收获按出租者高于承租者的比例进行分配。

定,还对伙种、安庄穆的副产物——糜草的分配、灾后的减租以及公地、学田、水地、树木的地租等也做了具体规定,深受群众欢迎。关中分区的马栏在试选检查政府工作中,提出有关租佃纠纷的议案68件,主要是地主违犯租佃法令多收租子、灾年不按法令减租而在次年补收租子、一地多佃制造纠纷等,除调解处理外,市人民代表会还对其中较普遍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进行纠正。富县张村驿、黑水寺、大义等区通过群众性的查租,地主向佃农退回了违法收取的租子,包括献地共折合土地2343亩,窑洞37孔,房屋3间。减租政策的贯彻落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开展。

随着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五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引中农参加运动,决不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巩固党的统一战线和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农村土地关系变革的阻力,《五四指示》还规定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方法。主要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是通过清算、减租、减息和献田献地^①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家属中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

^① 献田献地,即地主无偿将土地献给农民,这是土改初期各解放区对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开明士绅所采取的方式。

对于在抗战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给多留下一些土地;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相当的照顾;要给汉奸、豪绅、恶霸留下能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陕北解放区绝大部分是老根据地,一半地区的地主、富农已基本消失,另一半地区经过多次的减租减息,地主、富农已被削弱,其中不少还是开明士绅。基于这个特点,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6年12月13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中,决定对地主除按规定留下自耕土地外,其余由政府发行公债征购,并将征购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公债作为地价交付地主,分10年还本。规定地主的土地征购后应留的土地数量,一般地主应多于当地中农人均数量的50%,在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中卓有功绩的地主应多于当地中农人均的一倍,地主自己耕种的土地不得征购;地主家在边区外者,征购后应留之土地由当地政府代为经营,地主回来后即交还其自行经营;地主献地后其所有土地不足应留地数者,由政府酌情补发土地公债;富农土地不得征购,一切非地主成分、因无劳力而出租的土地不得征购。在具体征购的方法上,各级政府和上级下派的工作团(队、组)在征购土地之前,首先发动农民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清算,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然后讨论征购中的具体问题,如根据清算应退赔多少、留下多少、征购多少、地价定多少等。通过这种办法,大部分土地无偿退赔给了农民,一部分土地以公债形式转移到农民手中。中共中央对此充分肯定,并向各解放区通报了这种征购方式的经验。1947年2月8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对《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作出了部分修正。然而,就在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的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了对陕北解放区的军事进攻,致使这场伟大的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解放区军民集中力量进行自卫反击战。

物质生产是解放区和平建设的基础。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7日提出：“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①12月15日，中央进一步提出：“按照11月7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②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解放日报》于1946年2月10日发表了题为《前进一步》的社论，专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号召“陕甘宁的干部认真研究和及早布置自己所在地区当年的生产运动，以期当年的生产成绩能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全国和平、民主建设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开展生产运动做了具体部署。西北局在《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努力发展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在农业方面以增产粮食为中心”，“工业方面，除公营的某些自给工业仍坚持与改善外，应特别着重发展家庭纺织”，“争取明年粮食、布匹的增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指示》还要求继续整理各种合作社，使合作社经济与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救济受灾群众，坚持机关、部队、学校的自给性生产，开展全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1946年至1948年的建设计划方案，号召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实现。

农业生产是解放区生产的中心。为改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质量，西北局于1945年12月29日邀请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进行座谈，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主持座谈会的习仲勋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为扶植农业生产，边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11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5—1176页。

政府财政厅于1946年3月9日拨发救济粮4000石,移民贷款1000万元、粮食2000石。生产运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45年边区的冬小麦种得比较多,达到600万亩,播种质量也比较好。1946年春季的植棉生产也很顺利,到6月,全边区共播种了35.6万多亩。

在加强农业生产领导的同时,边区政府于1946年9月25日召开政务会议,讨论工业生产问题,确定公营工厂的性质及工业局的业务方针是:(1)公营工厂应以供给为主,以公家需要为主,营业推销为辅。经营力求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各厂的发展除依靠本身的努力及政府的帮助外,还应争取境外资本家的投资与合作,并依靠边区群众力量的帮助。(2)工业局除直接领导各公营工厂外,应该有计划地帮助发展民营企业 and 大量推广民间纺织及手工业,在政策上予以倡导,在技术和资金上予以推动和帮助。为加强对工业技术方面的领导,建设厅设立了技术室。

同时,边区政府继续推动机关的农业和副业生产。1946年1月19日,边区政府召开直属机关生产动员大会,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在会上作报告,号召边区干部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厉行节约,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给全国作出更好的榜样。6月4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由财政厅代厅长范子文、中共中央管理局局长邓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部长方仲如、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史唯然、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组成边区生产节约委员会,负责领导与推动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节约运动。1947年1月,边区政府通过《关于开展1947年大生产运动的决定》,确定“保持粮产,提高棉产”为1947年度战时农业生产的方针。

为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陕北解放区积极开展精简复员工作。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1946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

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局于1946年3月25日作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决定5月底前边区党政军民学必须复员1.5万余人,由政府与军队系统分别组织复员委员会,指导所属系统进行复员工作。对复员人员的处理办法是:家在其他解放区者,动员其返回原籍,并建议当地政府适当安置;家在陕甘宁边区者,动员其回家生产及参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作。回到家乡的复员人员,当地政府应宣传与动员群众进行欢迎并帮助他们解决工具、土地、种子、住房等困难。4月23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确定边区地方部队与边区政府系统共复员1.16万人,占原有3.5万人的33.1%。5月1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司令部联合举行晚会,欢送200多名复员军人回乡参加生产,毛泽东到会向回乡军人表示敬意。6月21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指出安置好坏是决定复员工作成败的关键,各地要加强对复员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及复员委员会对复员人员集中或较多的村乡应派员前往协助安置,教育乡村干部和群众帮助复员人员解决困难问题,切实做好安置工作,使复员人员各得其所,各尽其力。

陕北解放区人民的和平劳动建设,在全国人民面前做了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好榜样,也为进行自卫反击战争并取得胜利做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二 国民党在陕西统治区推行反共内战政策

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主要在关中和陕南,包括陕南的全部,关中的绝大部分和陕北的一部分,其辖区除西安市和黄龙设治局外,有80个县,其中陕北的府谷、神木、靖边、定边、佳县、黄陵、关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8页。

中的耀县、淳化、旬邑县境内有解放区。佳县的国统区最小,仅有一条又窄又短的小川道,所以国民党的佳县县政府和县党部“流亡”在神木县的国民党统治区乔岔滩。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下设榆林、大荔、渭南、三原、彬县、宝鸡、南郑、安康、商县九个行政督察区(国民政府内政部1948年4月公布,陕西省增设两个行政督察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140万。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省政府主席(先是祝绍周,后为董钊)。由于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各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任各督察区的保安司令部司令,所以他们都要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设在西安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7年3月18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节制,陕西国统区的最高行政权实际掌握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手里。胡宗南通过节制陕西的军事,控制了陕西的行政、财政等大权。

长期以来,陕西国统区一直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最重要的基地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一面密令其军队经常侵犯陕北解放区,一面在陕西国统区全面实行内战动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陕甘宁边区。

在政治上,国民党陕西当局公开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治。他们通过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在“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下,“统一”军政,“建设”国家;诬蔑人民军队是“封建藩镇”,人民解放区是“封建割据”,“破坏国家的统一”,“有碍陕西省政的统一”;叫嚣“取消陕甘宁边区”,“统一陕西的行政”。他们在靠近解放区的国统区召开所谓“民众大会”,由解放区的逃亡地主和地痞流氓“控告”解放区的民主制度,煽动解放区内的反动分子起来推翻民主政权,并组织以逃亡地主为主体的所谓“还乡复仇团”、“还乡光复团”、“反共义勇队”、“剿共团”等,伺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派出大批人员,加强在解放区周围设

立的情报据点的力量,同时派出不少特务分子混入解放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实行暗杀。不论城乡,国民党当局普遍加强了反动的保甲组织,定期不定期地抽查、清查户口,在交通要道设立盘查哨站,在机关学校建立秘密情报网,对大中学校的学生实行以内战为目标的军训,从各个方面对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实行特务控制。在对人民群众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国民党陕西当局又以“选举”成立所谓的“民意机关”——县、省参议会来掩饰其反动统治。1945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公布了《各县参议会筹设办法》,限于当年10月前成立各县参议会。同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双十协定”公布,其中规定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否定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普选”的所谓“选举”。国民党陕西当局无视“双十协定”中关于实行“普选”的规定,坚持其非“普选”的“选举”,突击“选举”成立了县、省参议会。其县选的程序是:先由保召开保民大会,选出乡(镇)民代表,组成乡(镇)民代表会;再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具有“公职候选人资格”的人当乡(镇)长和县参议员。所谓“公职候选人资格”,主要是必须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必须是委任级以上的文官或尉级以上的武官,必须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这样的规定,不仅把广大劳动人民排除在外,而且将非国民党、非文武官吏的知识分子也都排除在外。不仅如此,为使省上圈定的反共好战的顽固分子在县参议会的选举中全部当选为省参议会参议员,省政府民政厅还密电各县要严防异己、亲共分子当选,以致有的县公开由特务人员使用特务手段进行“选举”,结果是反动的地主、富农、官吏进一步控制了国统区的乡(镇)政权,控制了县和省的参议会,忠实地为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内战尽力效命。1945年12月25日开幕的陕西省参议会,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国民党中央“讨伐”中国共产党。

在财政上,国民党陕西当局实行的是战时财政,以内战军费需

要为第一,横征暴敛,千方百计筹措军粮和军费。陕西国统区的工商业极为落后,其财政收入主要是农民的田粮赋税。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宗南为收买人心,公开宣布“在陕西免赋一年”,即1946年不征收田粮赋税。但时过不久,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又宣布1946年减半征收120万石田赋,而且要“征实”,即征收小麦,随后又明令预借1947年田粮赋税一半,也是“征实”小麦120万石,再加上随田赋带征的省县两级的36万石公粮,三项合计276万石,大大超过了1945年实际征收的田粮赋税。所谓“免赋一年”、“减半征实”都是欺骗人民群众的鬼话。不仅如此,各地还催收前多年的“陈欠”,逼得贫苦农民卖儿鬻女。到了1947年,仍然美其名曰“减半”征实小麦120万石,但仍然是“征一借一”,实为240万石,不但1946年预借的120万石不能抵还1947年征实的120万石,而且明令宣布这次“征借”的120万石“不发库券,不计利息,自民国41年起分5年平均抵还”^①。民国41年即公元1952年。这就是说,1947年“征借”的120万石小麦,不但不能抵作1948年的田赋征实,而且要从5年后的1952年起,分5年平均抵还,前后共达10个年头,而且“不计利息”。这哪里是“借”,分明是明火执仗的抢劫!1947年的省县两级公粮仍是36万石,算上1946年“预借”的120万石,1947年陕西国统区的农民实际要负担396万石田粮赋税。这一年,陕西省政府又将靠近陕北解放区的榆林、府谷、神木、佳县、横山、靖边、定边、洛川、宜川、黄陵、宜君、铜官、旬邑、淳化、耀县和黄龙设治局划为所谓“绥靖区”,其县(局)政府可以依《绥靖区绥靖临时费筹集办法》,“以地方绥靖工作所需”,筹措“各项临时支出”,其中又多按田赋带征实物,这就更加重了这些地方的人民负担。1947年下半年,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又以陕西增编保安旅团为由,命令陕西省政府随田赋一次带征“绥靖公粮”90万石。

^① 国民党陕西田赋粮食管理处1947年8月28日给陕西省参议会的公函,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于7月发布《为带征绥靖公粮告全省同胞书》，将“绥靖公粮”列入常赋，使陕西国统区的田粮赋税增加37.5%。1948年陕西省政府令征田粮赋税小麦188.6万石，征借小麦183万石，带征省县两级公粮小麦65.8万石，绥靖公粮小麦94.3万石，合计531.7万石，比1947年的396万石又多出135.7万石，而且还严令催收1944年至1947年的“旧欠粮”。^①农民除了缴纳田赋这个“正粮正税”外，还要负担许许多多的“捐”、“费”，如“自治捐”、“富户捐”、“截建费”、“乡公所麦”、“保公所麦”、“代购军麦费”、“代运军麦费”，名目不可胜数。所谓“代购”、“代运”，就是以比市价低得多的价钱，要民众“代购”、“代运”军粮，将差额转嫁给人民群众，这是国民党军政机关巧取豪夺的一种重要手段。捐费奇重，不少地方的捐费超过田赋粮税的许多倍。城镇的工商户除了“照章”纳税，也要负担许许多多的捐费，最多最重的也是各种名目的“代购”、“代运”、“代储”、“代办”，以致陕西国民党军政机关所需的芦苇、铺草也要委托代购。有的地方甚至连国民党党员的“特别捐”，也要由商会和行业公会正式行文摊派给工商户缴纳，名曰“代缴”。城镇的商会和行业公会，实际上成为专向工商户征收捐费的“第二政府”。由于税捐过重，正当经营的工商户特别是中小工商户不堪重负，一批一批申请“歇业”，一批一批关门倒闭。

在军事上，国民党陕西当局率先恢复了征兵制度，为内战扩充兵源。省政府命令各地严格普查户口和壮丁，分甲、乙、丙三类编制“抽丁”清册，家有三丁者为“甲类”，家有二丁者为“乙类”，家有一丁者为“丙类”。说是先抽三丁，再抽二丁，一丁不抽，实际只分贫、富两类，富者虽多丁而不抽，贫者虽一丁也得当兵。为加强征兵工作，在陕西省军管区下，将原设的长武、华潼、凤彬、汉中、安石五个师管区，改设为陕北、陕南两个师管区及肤施、大荔、西安、宝

^①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1948年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鸡、南郑、安康六个团管区，将各县国民兵团部改为县政府军事科，专事新兵的征集和训练。以后又在关中增设了第十八绥靖区和第十九绥靖区，加强征兵工作和指挥辖区的保安团队。1946年，国民党在陕西3次征兵，计划征集3万人，其中2.8万人用于补充胡宗南部的“正规军”。由于各地群众极力反抗征兵，到年底只给胡宗南部补充了15186人，仅完成任务的一半。1947年的征兵数额较1946年又多一倍。到1948年，省政府的征兵计划竟剧增到10万人。完不成征兵任务，各地就“抓壮丁”，弄得贫寒之户家家不安。各地又普遍组织“自卫队”，保为中队，乡（镇）为大队，县为总队，保长、乡（镇）长、县长分别兼任中队长、大队长、总队长，另设中队、大队、总队的队副专职其事。各县的“自卫队”总队人数不一，一般在千人以上。“自卫队”的枪支大多是从民间“征借”的，有的地方还强迫民众买枪而后“借”给自卫队使用。陕西国统区的保安部队亦不断扩充，原有14个省属保安团，后来扩编为16个团，又在彬县、宝鸡、商县等地增编了6个突击大队，再加上关中各县的保安大队，陕西国统区保安部队的总兵力在4万人以上。省保安司令部增设了五个保安旅旅部，分别指挥这些保安部队。国民党陕西当局还成立了陕西全省戒严总司令部，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全省戒严总司令，实行全省戒严。为配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国民党政府在西安新设了空军第三军区，空军第三供应分处，空军第三气象大队等。

国民党将其陕西统治区完全推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战车。

第二节 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

一 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

蒋介石、胡宗南的例行逆施激起了陕西国统区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使斗

争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和镇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陕西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遵照中共中央“荫蔽精干”的指示精神,从1941年起就停止了活动,转入保存力量的“休眠”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指示各地委和各有关县委,切实恢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并且直接派出重要干部到关中、陕南恢复建立组织。1945年10月“双十协定”公布后,西北局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抓紧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加强领导教育,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民主运动,为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而奋斗。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前夕,西北局于1946年11月13日发出关于在国统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打垮胡宗南的军事进攻,保卫解放区,解放陕西国统区。

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大致分为陕北北部、陕北南部、关中、陕南四大块。西北局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形式,对党在陕西国统区的工作进行领导。

陕北北部的国统区是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的驻防区。邓宝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大革命时期同中国共产党有过很成功的合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国共产党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使陕甘宁边区的北线长时期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致书邓宝珊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①因此,西北局没有陕北北部国统区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主要是由中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共延属、绥德、三边地委及有关县委统战部运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充分发挥进步民主人士的积极影响和作用来推动陕北北部国统区的民主斗争。后来,三边、横山、榆林等地的国民党军相继起义,证明这种方式是有效的,成功的。

陕北南部的国统区,包括洛川、宜川、黄陵、宜君、同官、富平、蒲城、白水、澄城、韩城、合阳等县。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西北局任命中共延属地委副书记白清江兼任中共洛川工作委员会书记,专管陕北南部国统区党的工作。洛川工委以延属地委统战部的名义派出干部到黄龙、澄城、蒲城、合阳等地恢复党的组织,举办训练班和教导队培养干部。1945年10月,中共洛川工委在黄陵县双龙镇成立了中共雁门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宜君、富平、同官、黄陵、白水、蒲城部分地方党的工作。1946年7月,西北局将洛川工委改为中共黄龙特别委员会,强自修任书记,特委机关驻富县川口村。特委又成立了中共黄龙山区工作委员会,机关驻黄龙后川健儿沟,归西北局和黄龙特委双重领导,负责领导黄龙、韩城、合阳、澄城、宜川等县的党组织。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黄龙山南麓国统区的党组织大都划归陕西省工委领导。

关中和陕南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在1945年年底前由中共关中地委领导。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加强关中和陕南国统区的工作,西北局于1946年1月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汪锋任书记,张中任秘书长,王俊任组织部长,周芝轩任宣传部长,吕剑人任统战部长,刘护平任社会部长。省工委机关驻关中分区的马栏镇。同年8月,汪锋调豫鄂陕区工作,赵伯平接任陕西省工委书记。省工委成立后,遵照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的指示,先后派出337名干部到各地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并将关中各县划分为8个战略区,有重点地加强关中国统区的工作。这8个战略区域是:(1)西府区,包括扶风、凤翔、麟游、彬县、长武及岐山、宝鸡渭河以北的辖区。(2)太白区,包括户县、周至、眉县

及长安、咸阳、兴平、岐山、宝鸡的部分地区。(3)西路区,包括永寿、乾县、礼泉及兴平、咸阳的部分地区。(4)渭北区,包括耀县、淳化、三原、泾阳、高陵及临潼渭河以北的地区。(5)北路区,包括同官、富平、蒲城、白水。(6)东路区,包括华阴、华县、渭南及临潼渭河以南的地区、长安东部的地区。(7)沿河区,包括韩城、合阳、大荔、朝邑、平民、潼关。(8)西安市。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6年底,共建立了13个跨县区的工作委员会、3个县委员会、11个县工作委员会。13个跨县区的工委是:中共蒲潼工委(书记张军)、商洛工委(书记王力)、长柞工委(书记严丕显)、西府工委(书记赵伯经)、平朝工委(书记韩增友)、泾三工委(书记张中涛)、蒲白工委(书记张军)、富同工委(书记雷振东)、东府工委(书记苏史青)、渭北工委(书记谈国帆)、华潼工委(书记刘邦显)、乾永工委(书记上官克勤)、鄂陕工委(书记黄正甫)。建立县委的3个县是:眉县、韩城、渭南。建立县工委的11个县是:临潼、高陵、周至、咸阳、凤翔、澄城、耀县、户县、三原、泾阳、礼泉。省工委所属组织共有党员2255人。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西北局将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成立新的关中地委,地委成立了专门主管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国统区工作委员会,地委第一副书记赵伯平兼任国统区工委书记。

在建立陕西省工委之前,西北局还建立了中共汉中工作委员会,伍力任书记。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地下组织的迅速发展,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全面展开。

二 陕西国统区的人民武装

随着陕西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国统区的地下人民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47年3月以前,陕西国统区的地下人民武装主要创建并活动于秦岭山区中段、麟游山区、黄龙山南

麓、黄龙山北麓及靠近这些山区的地方。

创建并活动于秦岭山区中段的人民武装是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陕南游击队和中共长柞工委领导的长柞游击队。陕南游击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陕西地下党建立的第一支秘密人民武装。1945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派商洛籍共产党员巩德芳返回家乡,组织秘密武装。巩德芳返回商洛后,将原隐蔽下来的200多人枪集中起来开展活动。1946年4月,中共陕西省工委增派王力、薛兴军回商洛。6月上旬,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成立,巩德芳任指挥,王力任政治委员,薛兴军任副指挥,下辖4个大队,共1000余人枪,主要活动于山阳、商南、商县的边沿地区。陕南游击队先后在密庄、灰袍子、庾家河、龙驹寨、商洛镇等战斗中毙、伤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3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余支,子弹47箱,手榴弹2箱。长柞游击队成立于1946年9月10日,队长为中共长柞工委委员李志中,下设3个分队,共40余人。

创建并活动于麟游山区及其附近浅山区的人民武装是西府游击支队和扶风、麟游、岐山、凤翔、乾县、礼泉等县的游击队和武装工作队。西府游击支队是西北局于1946年8月在马栏镇组建的,赵伯经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懋功任副司令员。后一部撤回解放区,一部留在西府坚持斗争。麟扶岐武工队成立于1946年6月,刘章天任队长,段福祥任政治指导员,活动于麟游、扶风和岐山交界的观山地区。中共扶风工委领导的魏文德游击大队成立于1946年8月,游击队成立后,打击国民党的乡镇政权和保甲武装,并与麟扶岐武工队配合,袭击甘肃灵台县邵寨镇镇公所,缴获长短枪16支。凤翔武工队成立于1946年10月,欧阳德为队长,邵云亭为政治指导员,活动于凤翔、岐山交界的北山地区,并协助中共岐山县工委成功改造刘岐周武装力量,成立了以刘岐周为队长的游击大队。此外,靠近麟游山区东段平原地区的秘密人民武装也有较快的发展,到1947年初,以罗恒彩为队长,张思明为政治委员

的礼泉游击队发展到 130 人,以陈玉林为队长的乾县游击独立大队发展到 80 人。

创建并活动于黄龙山南麓地区的人民武装是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和同官、耀县、富平、三原、泾阳、澄城、合阳等县的武工队和游击队。1946 年 9 月,蒲城民间武装首领韩子芳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中共蒲白工委争取韩子芳的部属王振邦等 10 余人携枪进入解放区。10 月,西北民主联军第六总队成立,王振邦任司令员,蒲白工委书记张军兼任政治委员,工委副书记刘拓兼任副政治委员。11 月,以民间武装首领王玉成为队长,黄罗武为政治委员的同东支队编入第六总队。1946 年 8 月 26 日,黄龙与澄城地下党组织领导将军庙暴动,摧毁国民党的乡保公所,毙俘 30 多人,缴获长短枪 38 支,子弹 700 发,建立了振中支队。9 月,振中支队改编为黄南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周庆才,政治委员孟树林。1946 年 9 月 8 日,在国民党合阳县五福乡任警备队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史建堂率部 120 人起义,击毙乡长及自卫队指导员,随即成立了合阳游击支队,后改为黄龙游击队第九支队。10 月,游击队在蝎子沟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营。1946 年 9 月,中共陕西省工委派王方民、雷振东、许天洁率领两支武工队在同官、富平交界的山区活动,争取惠璋杰等民间武装成功,10 月成立了以惠璋杰为队长的富同游击第一支队和以许天洁为队长的富同游击第二支队,富同工委书记雷振东兼任两个支队的政治委员。两支游击队先后在顺水沟等地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 100 余人,缴枪 10 支,驮骡 10 匹,并多次截击国民党军运输车辆。1945 年 8 月成立的泾阳武工队,在队长王丁秀、政治指导员寇帮旺率领下,于 1946 年 1 月在淳化八里店歼灭淳化县自卫团 40 余人。

创建并活动于黄龙山北麓地区的人民武装是雁门支队和宜川、洛川、黄龙、黄陵等县的武工队和游击队。1946 年 9 月,中共黄龙特委以中共雁门工委举办的教导队为基础,组建了雁门支队,薛

志仁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雷治启任副支队长,张文秀任副政治委员。年底,雁门支队发展到300多人,分设4个大队,活动于东至洛河畔,西到子午岭,南到同官、富平、耀县交界的广大区域,摧毁国民党保甲组织,并配合解放军进行了丈八原、许家原、白家沟等战斗。各县建立的武工队和游击队有:宜川游击支队(支队长谭守棠,政治委员薛天敏)、洛川武工队(队长雷雨天)、洛川县游击第三大队(队长雷治国)、洛川县城北游击大队(队长师志春,政治委员杜军)、黄龙第十三游击支队(队长朱志英,政治指导员张景春)、中部游击第一支队(队长郭景棠,政治委员傅泰川)、中部游击第二支队(队长雷治启,政治指导员李建斌)以及黄龙的徐善有游击队、姚金山游击队,黄陵的韦明海武工队等。这些秘密人民武装除打击国民党的乡保公所,镇压反动的乡保人员外,多次袭击国民党军的运输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创建人民武装、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一些地方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自发地武装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5年9月3日,山阳县农民谭道鹏组织11个贫苦农民暴动,到11月发展到450人,长短枪230支,多次击溃山阳县国民党当局的“清剿”。后来,谭道鹏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46年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回乡的项鸿国,组织旬阳、白河和湖北郧西交界处的贫苦农民举行暴动,建立农民武装,打击作恶多端的国民党乡保人员。在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下,暴动不久失败,项鸿国、王西成、杨益万等主要领导人牺牲。

1947年3月以前建立的陕西国统区人民武装,在配合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及在后来的保卫陕北解放区和解放陕西国统区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陕西国统区的反内战起义

一 新十一旅在安边起义

陕西国民党军队的反内战起义,是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大众争民主反内战斗争的重要一翼。其中陕北安边的邓宝珊部新编第十一旅起义,早于全国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高树勋起义。

新编第十一旅原系西北地方武装,接受国民党政府改编后,从1939年起一直驻防在三边的国统区。十一旅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和旅部驻安边(国民党定边县政府亦驻此),第二团驻靖边县的宁条梁。胡宗南一直认为这个旅的主官和第一团不可靠,伺机加以“解决”。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利用“军队整编”之机,一面假邓宝珊之手宣布新编第十一旅即将开往包头进行改编,并令代旅长曹又参到榆林“面商”军务,一面密令副旅长吴葵,第二团团长沙舫城等人乘机将第一团的武装缴械,就地改编。第一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有中共秘密组织,团副牛化东、营长李树林和11名连长均是共产党员。在此紧急关头,共产党员冯世光和旅部参谋主任王子庄秘密赶赴定边县城,向中共三边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的负责人汇报。经请示上级党组织,三边地委决定由警备第三旅派两个团赶往安边,配合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起义。

1945年10月25日拂晓,新编第十一旅旅部和第一团共2000名官兵起义。同日下午,警备第三旅副旅长吴岱峰、参谋长张文舟率部进入安边城。27日,两军官兵和群众举行会师和庆祝大会,王子庄宣布新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举行武装起义成功。11月3日,从榆林赶回的曹又参参加起义,起义部队和警三旅联合作战,攻克宁条梁,击毙史舫城以下100余人,俘虏800人。11月5日,曹又参领衔通电全国,历数国民党借“整编军队消灭异己”,“使

军队特务化、私人化”等罪行，表示要“为和平建国奋斗到底”。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后，曹又参任旅长，郭秉坤任政治委员，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1946年1月，十一旅又兼三边军分区，曹又参任军分区司令员，牛化东任第三副司令员，王子庄任副参谋长。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安边起义，毛泽东在接见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随后，《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十一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

二 进犯陕北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起义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后，集结在陕北解放区南线和北线、随时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发生反对内战的起义。

1946年8月14日晚，驻宜川需白据点的国民党军第一六五旅四九四团一营一连第一排起义。在向解放区开进途中，起义官兵与追军激战半小时，其中8人携带轻机枪2挺、步枪8支进入解放区。

1946年8月15日，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团第三大队大队长董策成事部在旬邑县张洪镇起义，进入解放区。全大队207人，携带长短枪168支，机枪4挺。8月22日，关中分区各界数千人在马栏镇集会，欢迎陕保六团起义官兵，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张德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阎揆要等分别致欢迎词。9月10日，陕西人民自卫武装，新的“陕保六团”在马栏镇正式成立，董策成任团长。在董策成起义后的一个月，国民党新拼凑的陕保六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一个班，在班长王振川、林英华率领下起义，携带步枪5支、子弹1箱到达马栏镇，编入新的“陕保六团”。

1946年8月27日，驻耀县小丘镇的国民党军第一二三旅三六九团五连一个班10人，在班长陈宗元率领下起义，携带步枪7支、

子弹 600 发进入解放区,参加了人民军队。

1946 年 9 月,梅廷栋率领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一个连在佳县打火店起义。佳县的绝大部分地域是解放区,只有从打火店到白泥沟的一小块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从 1943 年起,梅廷栋任连长的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一营第三连一直驻防在打火店。因梅廷栋与解放区有较多的友好来往,三连的指导员张宏儒(国民党特务分子)密告梅廷栋要率部投奔解放区。军部遂数次急令梅廷栋回榆“述职”,意欲拘捕。梅廷栋决心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并请求中共佳县县委予以支持和配合。经请示中共绥德地委,中共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和绥德分区保安处长薛克明于 9 月 23 日到靠近打火店的通泰镇,同梅廷栋确定了起义的具体方案。25 日凌晨,梅廷栋按计划率全连进入解放区,绥德军分区的部队和民兵立即接管了梅连的全部防地。30 日,佳县各界举行庆祝梅廷栋连起义大会。会后,梅连与佳县游击队、警卫队合编为独立团,梅廷栋任团长。梅廷栋连起义后,佳县全境成了解放区,原来相隔的金明、东会、响石、佳芦等四个区连成了一片。后来,梅廷栋到延安,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三 横山起义

1946 年 10 月,胡景铎率部在横山起义。

胡景铎是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统辖陕西保安第九团及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第十一旅各一部,驻扎在紧邻陕北解放区北线边境的横山县和榆林县南部的国民党统治区。为迫使驻陕北北部的邓宝珊部从北线向南进犯,以配合胡宗南部从南线向北进犯,从而夹击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胡宗南相继派陈长捷、董钊、何文鼎到榆林督战,甚至将其嫡系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空运到榆林,编入邓宝珊作战集团。在此形势下,不愿打内战而又处在前线的胡景铎决心起义,并请求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予指示和支持。西北局和绥德

地委先后派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西北局统战部白区工作处处长范明等密赴横山，同胡景翼商谈起义具体计划，并命令绥德军分区部队在军事上给予配合，以确保胡部起义成功。

10月12日晚，胡景翼在横山县波罗堡发动起义，战斗两天，起义成功。13日，胡景翼率第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编第十一旅各一部及榆林保安指挥部、保安第九团全体官兵5000人通电全国，宣布“退出内战”。

11月4日，以胡景翼为师长的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正式成立。在榆林各界庆祝骑六师正式成立的大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及各群众团体讲话，祝贺横山起义成功。12月22日，胡景翼率部抵达延安，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贾拓夫、张德生、曹力如、王子宜、常黎夫，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王世泰及延安各界代表出城列队欢迎。后来，毛泽东三次接见胡景翼，勉励有加。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陕西的国民党军队有近万人因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的独裁、内战政策宣布退出内战，光荣起义。这又一次证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独裁、内战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第四节 陕西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

一 民盟西北总支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成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组织发展很快。到1946年4月，西北民盟已有盟员800多人。民盟的核心组织为在重庆的民主革命同盟，西北民盟参加民主革命同盟的有杨明轩、李敷仁、王堆棋、武伯伦等。西北民盟的活动主要是团结组织地方势力，开展文化运动和青年运动，如声援张风翔领衔发起的要求蒋介石

石释放杨虎城运动。民盟所属的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社”)发展也很快,以西安为中心,成员以青年学生为主,在西安各校均有支部和社员,以兴国中学、西安医专、西安商专、西安师专为主,各有10余人。民盟及“民青社”组织成为陕西国统区民主力量的骨干。

1946年2月4日,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返回西安。2月8日,杜斌丞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身份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他一方面向社会公开宣布民盟西北组织的存在,表明民盟跟共产党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道路,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内战政策的政治立场;一面抨击国民党认为政协决议对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力量“让步太过”,不愿放弃独裁、内战政策的谬论。

同时,民盟西北总支部举行紧急会议,对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议:(1)确定“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统一”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政治任务。(2)重申坚定地执行“三反”、“三不反”的组织原则。(3)重申必须坚定地执行民盟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民盟和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是民盟的生命力所在”。(4)健全总支部的组织机构,加强对盟务的切实领导。确定成立组织部(部长杨明轩)、宣传部(部长成柏仁)、国内联络委员会(主任韩兆鹗)、文化委员会(主任郑伯奇)、妇女委员会(主任杨惠莲)、财务委员会(主任韩望尘)、青年委员会(主任李戴仁),并对各部、会的工作做了部署。

这次会议对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会后,除杜斌丞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外,其他人员继续在秘密和半秘密的状态下活动,主要是进行反独裁、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和学生运动。

二 西安的反独裁反内战宣传活动

西安的反独裁、反内战宣传活动,是由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以下简称“联合版”)领头开展起来的。

“联合版”的前身是《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两家独立的报纸。《秦风日报》创刊于1937年5月(发行人成柏仁),《工商日报》创刊于1934年5月(发行人刘文伯),是与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有关系的民营报纸。1943年,为了在西北地区有一个大型的、公开合法的宣传抗日的报纸,共产党员王炳南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在同杜斌丞等人商谈后,于当年6月办起了两家报纸的“联合版”,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

“联合版”面世后,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分裂、倒退、投降倾向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版”没有陶醉于胜利的狂欢,而是提醒民众要过和平生活,必须团结起来防止反动派发动内战。报纸以鲜明的态度热烈欢呼毛泽东由延安飞往重庆和谈,强调团结刻不容缓,绝不容许国民党再走诉诸武力“统一国家”的老路,指出和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民党是否实行诺言,还得全国人民争取。对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日益扩大内战的行径,“联合版”大声疾呼:“人民不要内战,国家无力再支持内战,而内战也解决不了问题。”在政协会议期间,“联合版”刊发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同时积极反映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大力抨击国民党的顽固态度。政协会议结束后,“联合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求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等政治犯,同时刊登了不少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消息报道和评论文章。“联合版”成了西北国统区新闻战线上动员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发动西北地区反饥饿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一只响亮的号角。

“联合版”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之共同战斗的还有西北民主青年社社员编辑的其他报刊,其中主要有“民青社”机关报《文化周刊》及《民众导报》、《儿童旬刊》、《孩子报》、《新妇女》等。“民青社”员还在学校办起了一批有影响的墙报,主要是西北工学院的《新动向》、《旗》、《路》、《学习》、《星火》,西北大学的《西北风》、《笃行》、《春秋》,陕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崇实》、《拓荒》、《涛》、《晓钟》、《实潮》、《寒星》,陕西商业专科学校的《自由钟》,西安师范学校的《钟声》,西北农学院的《亢丁》、《时代剪报》、《新野岗》。这些报纸、刊物和墙报,政治观点鲜明,语言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儿童旬刊》刊登了西安东羊市小学学生张董如写的一首儿歌:“小儿童,体格健,坐飞机,到前线,见军队,好言劝,放下枪,快停战,协商会议有决策,革新政治不内乱,人民才能得平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调派大批军队进犯解放区,打内战,儿童以“劝”的口气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西北农学院的《亢丁》连续刊登《胜利果实属于谁》、《是接收还是劫收》等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西北工学院的《路》在1946年元旦刊出的“反内战”专刊上,刊登了宛毓林的《新灶王爷》漫画:灶王爷是美国阔老,灶王奶是中国摩登女郎,两边各站一中一美两个士兵,下跪的是苦难的百姓,配有“枪炮齐鸣除旧岁,中美国割度新年”的对联,横批是“一团和气”,对蒋介石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制造中国内战的罪恶行径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笞。

三 西安等地的反独裁反内战学生运动

西安等地的反独裁、反内战学生运动,是以瓦解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反苏反共游行特点开展起来的。

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以收回中东铁路路权为幌子,密令全国各地组织反苏游行,借以打击中国共产党,并为进行全面内战做准备。国民党陕西当局还企图借此破坏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打

击同中共合作的民盟组织,整垮《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等进步报刊,为发动内战扫清障碍。而陕西国统区新闻界与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则紧密团结,互相配合,把陕西国统区的反独裁反内战斗争推向高潮。

西安的第一次反苏反共游行发生在1946年3月1日。2月25日,陕西省教育厅召集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开会,要求各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3月1日的反苏反共游行。由于各校“民青社”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不仅使参加游行的人数大为减少,而且大都在途中离散,瓦解了游行。但是混进学生队伍里的特务分子乘机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砸毁了报社在市区街道设置的全部报栏,所幸报社的印刷厂设在别处未被破坏。3月2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了题为《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伎俩是一种全面的“反民主阴谋的暴露”。该报连续刊登全国各界人士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慰问电,把国民党当局置于受审的难堪境地。

由于第一次反苏反共游行未达目的,国民党陕西当局又责令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动员陇海铁路沿线学生参加,准备于3月16日在西安举行第二次游行。3月8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题为《学习“五四”青年优良传统》的专文,“启发学生,从自发的,纯洁民主的,了然清楚的精神,开展真正的民主运动”,提醒学生提高政治警惕性,不再上国民党的当。各校的“民青社”组织采取合法的斗争手段,取得了“由学生会代表表决是否参加游行”的胜利,结果大部分学校难以做到由学生会表决通过以学校名义参加游行。杜斌丞、杨明轩、张锋伯、张凤翔、刘文伯等知名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向重点学校的校长做解释,规劝他们不要再强迫学生参加游行。这样,国民党中央社原来吹嘘将有4万学生参加的西安第二次游行,仅以寥寥千余人参加而草草收场。

在西安进步青年学生同国民党陕西当局进行斗争的时候,尚

在陕南城固的西北大学学生也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月26日,西大校方秉承校长刘季洪(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旨意,以“部分师生和东北同学会”的名义发出通告,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参加反共游行。27日,西大校方又盗用“西北大学全体教授”的名义通电全国,一面反苏,一面诬蔑中国共产党。学校的“民青社”组织和进步教授对此进行了坚决地反对和抵制。陶季达、原政庭、王守礼、徐锡夫、王衍臻、李毓珍教授联名致书新闻界,揭露校方盗用“西北大学全体教授”的名义欲达其一党私利的不光彩行径。师生联席会议否决了校方关于由学校行政当局统一组织游行的议案,成立了由“民青社”成员掌握领导权的西北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3月4日,筹委会把国民党的反苏反共游行变成了反帝爱国游行。由于刘季洪顽固反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全校学生于4月15日举行大会,将其驱逐出校。《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相继刊登了陶季达等六名教授的公开信及西大学生自治会的《告各界人士书》、《为请校长离校告各界人士书》、《再告各界人士书——揭露西大护校团阴谋》,声援、支持西大学生的反独裁、反内战民主斗争。

正当陕西国统区人民民主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陕西当局向要和平反内战的人们举起了屠刀。在西安,4月23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民盟盟员王任被枪杀。4月24日,国民党陕西当局宣布西安全城戒严,搜捕进步青年学生。4月30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西安,检查陕西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情况,并召远在甘肃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到西安听训,严令赵、高远离西北民盟和杜斌丞。5月1日,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咸阳原上枪杀,所幸未中要害,被当地群众救护,进入陕北解放区。5月3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被迫停刊。《文化周报》等进步书刊也未逃脱厄运,或被迫停刊,或被取缔。杨明轩等人被迫离开西安,进入解放区。在渭南,陕西早期党团组织

创始人、渭南赤水农业职业学校校长王尚德于8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城固，刘季洪武装返校，20名进步学生被捕。其后，3名学生被登报通缉，41名学生被开除学籍，27名学生被勒令退学，8名学生被记大过两次，陶季达等6教授被解聘。

针对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暴行，中共中央于5月14日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此事如不给以严重抗议，压下反动派嚣张之气，西安民主运动将有一时期走向消沉，望即与民盟商量，由民盟出面，在外交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我们加以赞助，并在宣传上发动全国的抗议运动。要求律师公会即派调查团到西安调查惨案真相，课国民党以严重之法律上的责任。”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抗议西安新闻界血案》的评论，要求国民党惩凶赔偿，立即停止恐怖暴行。5月29日，民盟中央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抗议国民党制造西安血案的暴行，要求惩办祸首。

第五节 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一 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围攻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中原解放军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进行分路突围。

中原解放军的北路突围部队共约1.5万人，由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中原局代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领，向豫陕边突围，7月17日进入陕南。当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指出：“（1）我党游击武装巩德芳部活动于西荆公路南北地区。其第一大队在洛南、龙驹寨、卢氏间，其第二大队在

商县、山阳、龙驹寨间,其第三大队在郧西、竹林关、山阳、漫川关间,共计200多人;巩及各队长均党员,多来陕北受过训。(2)你们应和巩部联络,给以干部与武装之帮助。(3)你们应考虑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的问題。”^①7月22日,中共中央再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通报陕南游击队分布情况,并指出:陕南在联系陕北与中原区,配合华北斗争上以及对于中原解放军在鄂、豫、川、陕、甘创造根据地都很重要,望给陕南游击队以武装、干部诸方面的帮助,使陕南地方斗争很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7月23日,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讨论在陕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題。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和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等出席。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为七支,在镇安、郧西、商南、山阳等地创建豫鄂陕根据地。7月29日,李先念在寺坪花园岭油房村会见中共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治委员王力,8月2日,又在留仙坪会见陕南游击队指挥巩德芳。

8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致电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提议成立豫鄂陕军区和区党委,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或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任锋任军区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三五九旅、第十三旅、第四十五团及陕南游击队,在豫鄂陕边界发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8月3日,中原局发出《关于成立豫鄂陕第一、二、三军分区发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给各部队的指示》并报中央,王震部所在的安康、镇安、柞水为第一军分区,郭鹏任司令员,王恩茂任政治委员,商州、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北、以东,陇海铁路以南为第二军分区,巩德芳任司令员,黄林任政治委员;蓝田、荆紫关、西峡口公路以南,安康、镇安、柞水、临潼以东,襄河以北为第三军分区,方正平任司令员,张树才任

^① 《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政治委员。8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王震、任质斌、文建武,同意豫鄂陕边成立军区和区党委并划分为三个军分区的建议,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汪锋为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任质斌为区党委第二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周志坚为军区副司令员;区党委可待汪锋到达后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一切仍由李先念等负责。

8月22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作出《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以此来保护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指示各分区要争取团结、依靠群众,迅速建立地方政权,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多方解决部队给养,大力培养地方干部,争取迅速站稳脚跟,以备进行将来的斗争。鉴于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已经西进北上,8月28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同意李先念8月26日的提议,决定以汪锋为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为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为副司令员,方正平为副政治委员,张树才为政治部主任,魏国运为参谋长,以上均为边区党委委员。9月18日,汪锋到达商洛。24日,汪锋在今丹凤县大峪乡封地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豫鄂陕边区委员会。10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汪锋兼豫鄂陕行政公署主任。

豫鄂陕根据地包括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各一部,西起紫阳,东迄浙川,北抵陇海,南达当阳、始兴、镇平。全区总面积约7600余平方公里,下辖5个分区,24个县,55个区。今陕西商洛市的商州区和商南、洛南、丹凤、山阳、镇安、柞水县,安康市的宁陕、旬阳县,西安市的长安区和蓝田县,其中心地带或边境地区是豫鄂陕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分区于1946年8月8日在镇安县七里峡街建立。分区

下辖镇(安)柞(水)、商(县)山(阳)蓝(田)边、南宽坪、镇(安)郧(西)旬(阳)、茅坪五个党的工委,红岩寺县委,蓝(田)镇(安)柞(水)中心县委;山郧镇、镇郧旬、镇柞、商山蓝四个行政办事处,红岩寺县政府;镇郧旬大队和六个支队。张树才、萧元礼先后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周季方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吴世安任军分区司令员。

第二分区于1946年8月4日在今丹凤县留仙坪建立。分区下辖商(南)洛(南)、卢(氏)洛(南)、商县、商南、山(阳)商(县)、蓝(田)洛(南)六个县委,商县、卢洛、蓝洛、商南、山商、商洛六个县政府,先后下辖五个支队。刘庚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薛兴军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巩德芳任军分区司令员。

第三分区于1946年8月3日在山阳县中村建立。分区下辖商(南)山(阳)、郧(西)山(阳)、郧(西)商(南)、山阳四个党的县委,商山、郧商、郧山、山阳四个县政府,第四十五团和四个支队。方正平、王力先后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余益庵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周光策任军分区司令员。

第四分区于1946年8月上旬在今丹凤县庾家河建立。分区下辖卢(氏)灵(宝)洛(南)、卢(氏)嵩(县)等六个党的县委,及卢(氏)灵(宝)洛(南)党的中心县委,六个县政府和一个中心县政府;第六团、第七团、第八团、洛北支队。黄林、韩东山先后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张旺午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阎学圣、黄林先后任军分区司令员。

第五分区于1946年9月下旬在镇安县米粮川建立。分区下辖党的长柞工委、东江口中心县委,第十五旅、东江口中心游击大队、长柞游击队和四个支队。汤成功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陈任远任豫鄂陕边区第五分区办事处主任,王海山任军分区司令员。

二 中共陕西组织配合中原局创建豫鄂陕根据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出大批干部到陕东南地区,积极参加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1946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派出西北局民运科副科长刘庚和秋宏、陈效真等50多名干部,由延安、马栏两地出发,通过关中地下组织与群众的掩护前往商洛。这些干部历经千辛万苦,绝大部分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极少数干部被国民党逮捕,有的牺牲。刘庚、秋宏等人到商洛后,向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扩大武装力量、迎接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到豫鄂陕边的指示。7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致电李先念,任质斌转告商洛工委刘庚、巩德芳、王力、秋宏:中原部队转战一月,极度疲劳,你们应全力活动,使主力得到稍事休息机会,对筹集粮草、安置伤病员更应全力做好。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刘庚、巩德芳、王力领导陕南游击队为迎接中原突围部队做了各种准备,并派出部队四处接应。

在派出大批干部到商洛地区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关中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人民武装,积极配合中原部队和豫鄂陕军区部队进行反“清剿”斗争。遵照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工委先后在关中国统区领导成立了近20个县的工委组织和10余支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

策应第三五九旅突围回到延安。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于8月2日攻占镇安县城和盖云寺镇,15日到达洋县华阳镇。在此,王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三五九旅的行动方向。8月20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若能在陕南文县、武都、成县、康县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发展西北,配合全国斗争均有重大意义;如若不能,则按布置行动,陕甘宁边区已准备三个团相机接援。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第三五九旅由华阳镇继续西进,在凤县东岔河口北渡渭河,并越陇

海铁路。奉中共中央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和第一旅在边区南线全面出击,牵制胡宗南军。西北局还派张德生到关中分区马栏镇,宣布成立中共西府工委及西府游击支队。工委率两个加强连和由80多人组成的干部队进入麟游山区活动,策应三五九旅北上。9月1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抵达延安,林伯渠等边区领导人到城郊迎接。当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三五九旅官兵,毛泽东接见王震,深表慰问。

护送中原局领导人安全回到延安。在豫鄂陕边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健全之后,中共中央中原局负责人奉调回延安。1946年10月2日,李先念、任质斌、戴季英离开商洛山区,进入关中国统区。在商洛山中隐蔽休养的郑位三、陈少敏也于10月中旬出秦岭,进入关中国统区。在中共陕西省工委的精心安排下,李先念、任质斌经蓝田、长安、临潼、三原、耀县到柳林镇进入边区,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分别经蓝田、临潼、耀县、淳化等地进入边区。在护送李先念等人的过程中,各地党组织表现了对党的高度负责精神,他们事前选择路线,约好关系,安置好食宿、休息的地方以及必要的警戒。李先念等人每到一村一户,都有不少革命群众配合地下组织进行掩护。李先念行至临潼县栎阳镇病倒了,整整住了10余天,每日每夜都有许多青年农民配合共产党员在附近村庄的地里拾棉花,或在街巷贩卖,白天携短枪,夜里还加上长枪,实行严密警戒。郑位三由出发地到商县,由商县搭汽车到蒲桥,都是经过地下党派人护送,过渭河后又乘群众特备的马车,以送亲属为名送到耀县地界。

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护送下,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人于10月下旬先后回到延安。中原局在延安恢复了工作,继续指挥豫鄂陕边区坚持斗争。

三 陕东南人民对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的贡献

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是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杀

出一条血路抵达豫鄂陕边的。从1946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起,到1947年7月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奉命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止,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存在了一年时间。豫鄂陕根据地陕东南新解放区的创建和形成是陕西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①194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指出:“我中原军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度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②

陕东南地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创建和发展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

采取征粮、借粮、筹粮、购粮等办法多方筹措粮食,解决部队军需。征粮,是民主政府依法向有负担能力的群众征收公粮;借粮,是向缴纳公粮后尚有余粮的群众求借,由民主政府出具借据以后偿还;筹粮,是宣传动员富户捐献粮食;购粮,是动员商户到国民党军占据的集镇代为购粮。在卢氏、灵宝、洛南边界设置的卢灵洛县民主政府征收公粮7万多斤,分散储藏于农户家中,供过往部队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7页。

② 《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用。在山阳、商县边界设置的山商县民主政府征、借粮食 80 万斤。许多贫苦农民出于对人民军队的热爱,虽然民主政府没向他们征收公粮,但他们都想方设法支援和帮助人民解放军及地方游击队,有的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翻山越岭送到收粮点,硬要收粮人员收下;有的主动把伤病员背到家中精心养护,以减轻军粮缺乏对部队的压力;有的地方在国民党军“清剿”时把粮食藏起来,而当解放军来时便把粮食扒出来,热情地支援解放军。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帮助,在不长的时间里,豫鄂陕军区的部队“恢复了疲劳,吃饭问题已得到解决,指挥系统已经调整,现在部队已由被动的应战转为主动地向敌出击了”^①。同时,民主政府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帮助人民解放军解决穿衣困难的问题。在郧西、商南县边境设置的郧商县民主政府动员群众利用赶集的机会,到周围国民党军占据的集镇代购土布和棉花,组织妇女为部队缝棉衣,做军鞋。蒿坪河群众吴茂珠说服亲戚邻居为军队代购土布近千匹。小川乡办的一个被服厂赶制棉服 1000 多套,组织妇女做军鞋 1000 多双。商山县民主政府为军队提供了 2300 多斤棉花和一揽土布,并组织了 不少缝洗组,为军队缝补和洗涤血衣。军队缺衣少穿的困难,到 1946 年冬基本得到解决。

踊跃参军,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劳苦大众是人民武装的主要源泉,陕东南的劳苦群众除积极参加中原解放军外,更多的是参加和组织地方游击队。不到两个月时间,陕南游击队由 200 多人发展到 4000 多人。回民聚居的镇安县茅坪镇组织了 60 多人的回民支队。随着地方游击队的迅猛发展,为集中兵力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边区党委和军区实行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以加强各军分区独立作战的能力。5 个军分区共组建了 16 个支队,加上 6 个主力团,共有 1 万多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五六十次,歼灭和击

^① 《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 页。

缴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部队 7 个团、3 个营、7 个连，缴获轻重机枪 35 挺，长短枪 1700 支。

积极救治伤病员。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豫鄂陕军区没有野战医院，部队走到哪里，仗打到哪里，伤病员就寄养在哪里，由群众掩护照料，治病养伤。在山阳县龙山头到梅子岭约百里的地带，群众掩护的伤病员就有近千名，几乎家家户户养护伤病员。群众白天把伤员背上山，隐蔽在山林、石洞里，晚上又背回来睡在热炕上。山阳县南宽坪的群众精心掩护杨坤丽等三名离队女干部，为躲避搜查，转家养护。家里不能住了，群众就备了铁锅和米面，把她们藏在深山老林的山洞里，还给将要出生的孩子缝了衣服。丹凤县留仙坪方圆不足 5 公里，群众掩护伤病员 270 人。丹凤县窑庄妇女梁秀英为了帮助受伤的卢洛县县长鲁孚若脱离险境，为鲁孚若剃了头，换了衣服，准备了一副小商贩担子，给了 40 块银元，并让侄子到乡公所开了路条，请哥哥陪鲁孚若走出险境。镇安县穆王乡杨泗村 20 多户群众养护伤病员 46 人，为使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安全出境，当保长的开明人士王忠诚派人到 80 公里以外的县城私刻公章，为每个人发放了路条。

为割断人民群众与人民解放军的血肉关系，国民党军对人民群众实行了残酷的报复。他们在洛南县的保安、金堆城、两岔河、瀛龙庙、青岗坪等地实行无人区，烧毁民房 3500 间，磨子、碾子全被推倒；在留仙坪一次烧毁一条街，毁民房 200 间。镇安县盖云寺的小学教员胡从元因联络多人掩护中原军区教导旅的六名干部安全脱险，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关押，倾家荡产。山阳县靳家河脑 70 多岁的周宏斌因掩护过郧山支队的干部，被国民党县长赵叔彦用棍棒殴打。丹凤县 72 岁的农民张孝仓因李先念和巩德芳在其家住过而被国民党军残杀，他一岁半的孙子被踢死。据不完全统计，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陕东南地区有近千名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献出了生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丹江两岸。

第二十二章 保卫陕北解放区

第一节 抗击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一 陕北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解放区。正在积极进行和平建设的陕北解放区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侵犯。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区军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从1945年9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前,陕北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为第一阶段,历时10个月。这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把戏的时候,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继续进行严密封锁和包围,同时不断进行试探性的武装挑衅和骚扰。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最多时有18个师、3个旅和12个保安团,总兵力约20万人。特别是集结在解放区南面的胡宗南部,加紧进行备战训练,各师均以1个旅专门训练攻击,1个旅专门训练防御,1个旅专门训练“清剿”,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则全部进行攻击训练,准备作为进攻解放区的主力部队。他们在解放区的周围,特别是在南面,增修碉堡,加强工事,并不断进犯解放区,伤害民众,掠夺财物,破坏生产。到1946年,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犯和骚扰有增无减,在半年时间里共有29次之多。

1946年7月至11月为自卫反击斗争的第二阶段,历时5个月。这个阶段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全面内战的时候。为配合全国其他战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

发动了两次相当规模的军事侵犯。第一次是在七八月间。胡宗南调集 10 个旅约 12 万人,陈兵于关中和陇东分区边境,企图闪击延安。8 月 2 日,国民党空军的 8 架飞机轰炸延安,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机关附近投弹 11 枚,扫射子弹约万发。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发言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劳动英雄、商会和市民代表等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向全解放区人民道歉,赔偿损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号召全解放区人民一致行动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此时,中原解放军北路和南路两支突围部队胜利抵达豫陕鄂边,分别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胡宗南不得已调军到秦岭以南进行堵击,蒋介石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搁浅。第二次是在十一二月间。10 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诚、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先后到西安进行新的部署,宁夏马鸿逵、榆林徐之佳也奉召到南京听命,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形成了由南、西、北三面合击的态势。榆林第八十六师首先向绥德分区的佳县、米脂和三边分区的靖边等地进攻,侵占了一些村镇。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翼在横山率部起义后,胡宗南即空运第二十八旅第八十三团到榆林,监督第八十六师等进攻解放区。马鸿逵第八师和第八十一师也从西北方向相继侵犯边区,配合从晋南西渡黄河的胡宗南部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闪击延安。这期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共有 8 个师、23 个旅、15 个保安团、2 个空军大队、2 个独立炮兵团、2 个工兵团、1 个装甲兵团,进攻解放区总计达 70 余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军民进行了坚决反击。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延安与保卫边区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到会讲话。13 日,西北局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到会讲话。他们号召全体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把侵犯者坚决

打出去。同时,边区政府宣布成立总动员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备战疏散工作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些机关和人员向绥德方向疏散。此时,人民解放军在晋西反击取得胜利,解放了吕梁地区,胡宗南部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东渡黄河救援,国民党军闪击延安的计划又一次搁浅。

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为自卫反击斗争的第三阶段,历时3个月。胡宗南部第一师和第九十师东调山西后,国民党对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从兰州、平凉东调的第十二旅集结于彬县地区,第二十八旅一部集结于旬邑县职田镇,第四十八旅和第二二三旅集结于同官、宜君县附近,第七十六师集结于泾渭河间的麟游山区,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共约16万人,重点是进攻关中分区,企图撕开闪击延安的突破口。12月7日至9日,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向关中分区发动第一次进攻,均被边区军民击退。30日,国民党军再次大举进犯关中分区,解放区军民坚决反击,缴获炮20门,机枪44挺,长枪700支。同时,淳化和旬邑的国民党自卫队4个分队在战场起义,68人携带机枪4挺,长枪60支参加人民解放军。关中地方武装还收复了国民党军1940年侵占的永寿县新五区和西阳区,1.1万多人民重返解放区。1947年2月18日,国民党军第三次大举进犯关中分区。此次共出动8个旅,其中7个旅约5万人在两架飞机配合下,兵分五路,从东、南、西三个方面进犯边区。驻防关中分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警备第一旅和第三旅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于19日主动撤出,向延安方向靠拢。21日,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陷落,国民党军占领了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地区。在一个多月的自卫反击战斗中,关中分区军民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613人,其中毙伤388人,俘虏1225人。国民党军对关中分区的大举侵犯,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陕北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的前奏。

二 抗击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军事进攻失败后,从1947年3月开始,集中总兵力的43%即94个旅,重点进攻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的战略目的,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①。

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部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5个旅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部3个整编师向东,榆林邓宝珊部1个军向南,以资配合。全部兵力34个旅,约25万人。此外,国民党还调集94架飞机(占其空军飞机总数的3/5),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战略轰炸。

陕北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野战旅,共2.6万人,另有4个地方旅(师)约1.6万人。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将独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统一指挥陕北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

2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而战斗、而工作”。3月3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提醒全体军民,“胡军主力整第一师与整第九十师,均西渡黄河,正在宜川地区集中,此为进攻延安的主力。胡军进攻庆阳,乃一佯动性质,其目的在吸引我军西向,以便其主力乘虚袭击延安”,“这个袭击,很可能在最近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1页。

天发动”，要求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彻底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3月8日，延安万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到会讲话。朱德号召边区军民“抛弃和平观念，切实坚壁清野，民兵积极配合主力歼灭敌人”。彭德怀在讲话中列举历史事实说明，解放军一定能够打胜仗，不但会把入侵的国民党军消灭在陕北，而且将来一定要打到胡宗南的老巢西安去。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不打垮蒋胡军的进攻，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这里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会向全国各界同胞及海外侨胞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扩大和巩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与蒋介石卖国独裁的民族统一战线，击破蒋介石进攻延安的阴谋，粉碎蒋介石的全部攻势，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

3月10日，胡宗南在洛川城召集旅长以上将领开会，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其计划概要是：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兵团，辖第一师、二十七师、九十师，从宜川出发，经金盆湾、麻洞川、南泥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东北地区后在拐岭待命；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为左兵团，辖第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十七师，从洛川出发，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西南地区后在枣园待命；第七十六师的另两个旅为总预备队，集结于洛川，进攻开始后随左兵团前进，策应左右两个兵团作战；第十七师的另两个旅为第二线部队，修路护路，保证前方补给。参加会议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及时将这一军事部署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告中央：在胡宗南军发动进攻之前，国民党将调集近百架飞机轰炸延安等地，同时监视黄河各渡口，观察其他解放区人民武装驰援陕北的情况。

3月11日下午4时，一架国民党飞机窜入延安上空，低飞三圈后，投弹轰炸人民解放军总部。3月12日，人民解放军总部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表评论，指出：“蒋介石以武力赶走中共在南京、上

海、重庆的代表联络人员，公然斩断国共十年连系之后，现在竟敢对延安滥施轰炸，可见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决心内战到底，而以轰炸延安为其大规模进攻延安之揭幕。”并严正申明：“不论美帝国主义者如何替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撑腰，陕甘宁边区和全解放区人民有充分准备，必能粉碎其进攻，直到最后消灭蒋介石的汉奸卖国贼统治。”

3月13日拂晓，董钊和刘戡率领的两个兵团分别从宜川、洛川出发，向延安攻击前进。上午8时半至晚上8时半，25架国民党飞机轮番轰炸延安，14日和15日又连续轰炸两天，并轰炸了金盆湾、甘泉、安塞、瓦窑堡、清涧等地。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部署在南线的少数部队英勇阻击。在临镇、金盆湾一线阻击敌人的主要是教导旅，在牛武镇、茶坊一线阻击敌人的主要是警备第七团和延属军分区第三团，新四旅为预备队。当地民兵、游击队积极参战，埋设地雷，破坏交通，伏击小股敌人。由于双方兵力过于悬殊，各地的阻击战斗都打得十分艰苦。在空军飞机配合下的胡宗南军，头两天只前进了十余里。战斗激烈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习仲勋亲自到富县、金盆湾前线视察，指挥作战，要求前线将士胜利完成一星期的阻击任务，以便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转移。

为了更好地组织解放区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3月16日发布命令：自3月17日起，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经过6昼夜的节节抗击，歼敌5220人，挫败了胡宗南“3天内占领延安”的狂妄计划，完成了掩护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广大群众安全转移的任务，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

为了配合陕北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根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工委于2月下旬连续召开会议,对陕西国统区的礼泉、乾县、同官、蒲城、白水、大荔、韩城、澄城、合阳、朝邑、平民、潼关、华阴等地的地下斗争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发展组织,在以农民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同时,吸收青年学生入党,要注意发展国民党政权和民间武装中的革命分子,抓紧群众发动工作,以武工队为基础,建立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武装,努力培养人民武装中的骨干分子,提高现有的人民武装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在乡的退伍军人,争取各种武装,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两面政权,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和一切反蒋介石反胡宗南的爱国人士,掩护两面政权为人民做好事,扰乱敌军,破坏敌军后方供应,收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特别注意收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提供给人民解放军使用。会后,上述地区党组织纷纷组织地下斗争,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保卫解放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摧残和破坏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后,西安绥靖公署、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均在延安设立了分支机构,指挥反动力量对陕北解放区进行全面破坏。

在军事方面,西安绥靖公署在延安设立了指挥所和警备司令部,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指挥所指挥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及陕西省政府以关中20多县保安队组编的9个“民兵纵队”,一面寻找陕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一面在其占领区进行“清剿”,祸害百姓。

在政权方面,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新设了陕北行政公署和绥德、延安两个专员公署。胡宗南的亲信顾希平任陕北行署主任。绥德专署辖绥德、清涧、延川、米脂、吴堡、安定六个县,延安专署辖延

安、安塞、保安、延长、富县、甘泉六个县，胡宗南系的骨干邱是唐、周保黎任两个专署的专员兼保安司令。陕西省政府对上述12个县及佳县均派出了县长，有的还加派副县长。这些反动的政权组织主要是强迫编制保甲，建立保安队，搜刮粮草，为其作战部队服务。

在党务及特务方面，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设立了延安办事处，中统华北办事处和陕西训统室派出大批职业特务分子，以开商店、做生意、教书等为掩护，建立情报组织，进行特务活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将原设在榆林的陕北分团部改设延安，并举办了青年服务队和陕北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反共积极分子，分配到各地担任乡长、镇长、保长、指导员、小学校长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国民党陕西当局也采取了一些反动措施，主要是以反共分子控制文化、教育阵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西安绥靖公署还办了一个《延安日报》，欺骗舆论，扩大反动宣传。

早在进犯延安之前，胡宗南就指定西安绥靖公署掌管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处长白崇熙（陕北清涧人）组织了一个“陕北还乡团”。“还乡团”随胡宗南部进入陕北解放区后，肆意进行破坏。白崇熙后被任命为延安县长兼“陕北还乡团”团长。其他被国民党军队侵占的县、区也组织有大大小小的“还乡团”，“复仇团”，向劳苦大众进行反攻倒算。他们配合国民党“清剿”部队敲诈勒索，抢掠财物，屠杀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中共甘泉县委书记田丰年、中共关中天委训练班学员孙奉印、吴志中、魏桂林、康行（生前任中共户县工委书记）、张可文（曾任中共临潼县区委书记）、张志远（原为中共汉中地委干部）、王可学（赤水县土桥区区长）先后被杀害。

在侵占陕北解放区的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作。全边区217个区中，有195个区遭到国民党军的蹂躏和破坏，4000多居民

被拉走和杀害。边区耕地面积由 1500 万亩减少到 1100 万亩,360 万亩荒芜,50 万亩青苗被糟蹋精光。粮食产量由 180 万石减少到 91 万石,棉花产量由 200 万斤减少到五六十万斤。公营工厂损失 50%,合作社和城镇商业大都陷于停顿。边区财政收入减少 90%。

为配合胡宗南在陕北的军事行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以陕西省戒严总司令名义,疯狂镇压关中地区的民主运动。1947 年 6 月 1 日,祝绍周派出大批军警宪特分子,镇压西安学生声援宁沪苏杭学生运动的斗争,逮捕学运骨干及文化界进步人士 200 余人,破坏了西安学界定于 6 月 2 日举行的“全国学生反内战日”示威游行计划。8 月 20 日,中共临潼县委派出工作的党员王宜斋被杀害于铁炉镇。9 月 9 日,凤翔县武工队队长耿阳德被杀害。10 月 7 日,祝绍周以编造的“贩卖烟毒”等罪名,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和共产党员刘伍、张周勤、方廷堂、薛玉瑞、韩生祥、田振英及革命群众李杰三、贾白明、田振玺、王宝英、刘高士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造成震惊全国的血案。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当日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0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就杜斌丞等人遇害一事指出,蒋介石政府对国统区民主运动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说明他们对自己的统治能力已丧失信心,是其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

第二节 收复延安

一 前方以“蘑菇战术”大量歼灭国民党军

194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3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3 月 20 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的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改编而成,7月3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在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下,西北野战军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为陕北战场制定的作战方针,采用“蘑菇战术”对付敌人,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把胡宗南军队拖在陕北,使其往返奔波,疲于奔命,补给困难,士气低落,然后寻找战机逐步消灭其主力。在为期一年多保卫陕北解放区的作战中,西北野战军共对敌人进行了16次重要作战,逐步消灭了胡宗南集团的有生力量。经过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再到外线反攻,西北野战军由弱变强,由被动到主动,终于取得了保卫陕北解放区的最后胜利。

从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到同年8月,西北野战军对敌作战主要是进行内线防御。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以一小部兵力佯装主力边战边退,把敌军主力诱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而将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以南设伏。3月25日,胡宗南部担任侧翼掩护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计2900余人进入伏击圈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西北野战军全歼敌军,俘少将旅长李纪云。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遂令其主力由安塞调头追击。西北野战军以小部兵力牵着敌人主力的鼻子走,使其处处扑空,十分疲惫。4月中旬,胡宗南以8个旅由蟠龙、青化砭向西移动,以驻瓦窑堡的第一三五旅南下配合行动,企图歼灭西北野战军主力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西北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吸引敌军主力,主力部队4个旅则在瓦窑堡以南设伏。4月14日,南下的国民党军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进至羊马河地区,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第一三五旅全部被歼,少将代旅长麦宗禹被俘。羊马河战斗后,西北野战军为使敌人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逐个歼灭,决定袭击胡宗南部在陕北的重要补给站蟠龙镇。西北野战军以第三五九旅诱胡宗南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至绥德地

区,而主力于5月2日完成了对蟠龙镇的包围,并当即发动攻击,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守敌67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5月1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金盆湾,歼灭国民党陕西省自卫总队第二纵队的大部,俘中将总队副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李伙。这样,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45天时间里,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胡宗南部1.4万人,从而稳定了西北战局,增强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5月中旬,边区军民5万余人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陕北的消息。5月21日至7月7日,西北野战军进行了陇东战役,歼敌4000余人。8月6日至11日,为调动胡宗南主力继续北上,配合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西北野战军又对榆林发动围攻,全歼其外围防守部队5200余人。接着,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围,转移到米脂县东北的沙家店地区,准备围歼国民党援军。8月21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6000余人自榆林南下追击解放军,进入伏击圈后全部被歼,少将旅长刘子奇被俘。沙家店战役扭转了西北战局,标志着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沙家店战役前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已胜利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也在豫皖苏地区实施战略展开。8月22日,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威胁西安,关中震动。胡宗南为求自保,急令其主力沿咸榆公路南撤。西北野战军则展开追击,9月1日至16日,在绥德、清涧间的九里山、岔口、关庄等地击溃南逃的国民党军4个旅,歼灭4000余人。10月11日,西北野战军攻克清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俘中将师长寥昂和少将旅长张新。10月27日至11月16日,西北野战军进行第二次榆林战役。在此期间先后收复安塞、志丹、米脂、佳县、吴堡、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子长、安边、靖

边等县城。1947年2月,国民党军又向边区进犯,占领了边区部分县城。

在南线战场,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在解放区内进行作战,王世泰率西北野战军南线部队南下国统区进行外线作战,5月5日攻占耀县县城,俘少将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严崇卿;5月22日收复旬邑县城,中共地下党员马志超率旬邑县自卫队起义;8月24日收复关中分区首府马栏;10月21日攻克宜川县城,子长县南部和固临县全境光复。

为救援中原战场,蒋介石从陕西抽调3个整编师前往豫西,胡宗南兵力减少,又屡遭打击,不敢再对陕北作深入进攻,遂将其主力部署于延安以南的洛川、黄陵、宜君地区,企图确保延安并阻止解放军南进。根据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配合陈谢兵团打击胡宗南,向南发展,威胁西安,策应中原解放军作战。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进入宜川地区,再次攻占宜川县城,取得宜川战役的全胜,并收复甘泉县和富县,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打开了人民解放军向关中进军的门户。

从1947年3月19日到1948年3月18日的一年间,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7万人,其中生俘将领级军官21人,毙将领级军官5人。

二 后方努力支援前线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加强地方工作,更好地支援前线,陕北解放区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1947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分设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委以习仲勋为书记,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为委员;后委以马明方为书记,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周兴为委员。撤离延安后,前委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后委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领导地方工作。延属分区所属的市、县陷落后,

西北局将延属地委分设为西地、东地两个工委，分别领导3个县。边区后方机关还两度精简，由8784人精简为2846人，其中边区政府工作部门由553人精简为220人。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先后转移到安塞县白庙岔、子洲县马路沟、绥德县义合镇等地坚持领导，各地的机关和干部则是县的干部不离县、区的干部不离区、乡的干部不离乡，就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边区党和政府带领广大群众，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在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卫陕北解放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巩固和加强边区的武装力量。在自卫战争的准备阶段，边区政府多次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复员军人归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事训练。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边区政府于1947年5月27日发出《参军动员令》，决定自6月至9月底4个月中，全边区动员2.6万人参军，号召全边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鼓起参军拥军的热情，将边区最优秀、最坚强的青年、壮年动员到游击队中去，到地方兵团中去，到野战兵团中去，为加速消灭胡宗南、收复延安及一切失地、解放大西北而奋斗！动员令发出后，人民群众满怀对国民党军的仇恨和拼性命、洒热血保卫边区的决心，掀起参军热潮。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先参军的动人事例不胜枚举。安塞县县长贺兴旺、志丹县县长赵玉文、三边专署政务秘书仇克庭等干部，刘玉厚、杨步浩等劳动英雄都积极带头参军。绥德县义合区7天内自愿报名参军者达百人，合水县边境区20天内就有250人报名入伍。与此同时，边区群众赠钱、赠物、赠地，优抚军属。延安吴家枣园乡群众5天内就捐献边币270余万元，乌阳区二乡政府给史家沟新入伍战士支丕元家献窑洞1孔、土地60余亩。到1948年4月延安光复以前，全边区有1.9万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有1.6万名地方兵团的战士转入主力部队，有1万多人参加了游击队，地方武装游击队扩大3倍

以上。胡宗南军队在边区人民英勇斗争下，未能达到其目的，被迫撤出边区。

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胡宗南军队入侵边区后，在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的指挥下，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就地斗争，对入侵之敌进行袭扰、牵制和打击。他们经常阻断敌人交通，伏击敌人车辆，攻打敌人据点，缉拿敌特分子，并寻机歼敌，搞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在青化砭战役前后，关中分区游击兵团连续取得了五亭子、高尔堡、柳林、铁王、土桥等战斗的胜利，歼敌 1000 多人，直接威胁到胡宗南集团后方的安全，并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关中分区的四次“清剿”，使边区南线的局势为之一新。延安游击队在敌人侵占期间共作战 128 次，歼敌 731 人，缴获各种武器 590 件，击毁汽车多辆，破坏电话线 20 多公里，还拔除了国民党军设在枣园的一个特务据点。绥德分区的地方武装还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组织的重大战役。边区地方武装和西北野战军密切配合，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组织动员大量的人力、畜力，从事抬担架、运物资、修工事等战勤工作，支援前线。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为了支援部队作战，保证供应部队需要的各种物资，边区人民群众承担了超常的负担。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7 年 3 月到 1948 年 1 月，边区共动员随军担架 6633 副，临时担架 1.5582 万副，随军运输牲口 5440 头。战勤用人工 513 万多个，畜力约 318 万多个。1947 年 8 月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时，仅给前线部队运粮一项，就使用人工和畜力 43.6 万个。在战勤工作中，边区人民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奉献精神，涌现出许多支前模范。在物力方面，边区人民更是竭尽全力支持战争。由于胡宗南军队的破坏，边区粮食大量减产，人民群众不惜节食度日，踊跃缴纳公粮公草，保证部队的给养。1947 年全边区人民缴纳公粮 24.6 万石；1948 年缴纳公粮 32.2 万石，公草 3223 万斤（包括黄龙新区）。1947 年秋，绥德、米脂一带的群众将刚刚收割下来的谷子和高粱不分昼夜地赶打赶碾，送往前线。延川县永

胜区广大川的群众,在家里的粮食已被国民党军队抢光的情况下,抢救地里的高粱、玉米,在炕上烘干后送给解放军。边区妇女积极为前线战士缝制军鞋,仅1947年一年就缝制军鞋58.4万双。

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早在1946年深秋,陕北解放区就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坚壁清野,从边区政府到乡村,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广泛宣传动员,具体组织和领导机关、学校和城乡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这项工作建立在群众的高度政治觉悟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做得认真、彻底,在夺取战争的胜利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解放区人民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国民党军在陕北找不到粮食,只能靠从关中等地长途调运,以致后来发生了严重的粮荒。

组织生产。虽然处在战争环境,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仍对边区的农业生产实行具体领导。在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就开展春耕运动、夏收夏耘、组织副业生产、加强备荒、秋收、发放农业贷款等问题发出指示。同时,边区政府还就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减轻农民战勤动员负担等多次发出布告。区乡干部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传达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学校负责指导当地的生产,并出动人力和畜力帮助农民生产。野战部队和游击队也在战斗空隙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对解决农民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组织运粮救灾。为了克服“胡祸”与天灾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力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从河东太岳解放区借粮10万石(每石300市斤)。194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对涉及两个边区,完全靠人背畜运的“转粮”工程做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在西北救灾委员会下设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罗贵波、惠中权、王子宜为运输指挥员,分驻河东、河西指挥。运粮总站设于山西隰县,沿途设70个分

站,具体组织转运和办理交接转运粮的手续,并帮助安排长途转运人员的食宿。在河东,基本上是农民逐村、逐站义务“接力”转运。吕梁解放区动员妇女赶制运粮口袋 10 万条,组织民工 10 万人,在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的一个月内,把 6 万石粮食运到黄河岸边。在河西,则是采用运粮和救灾相结合的办法,由灾民转运救灾粮,既解决了运力困难,又使一批灾民就食于运粮途中,群众满意。这批救灾粮大部分在春耕大忙前转运到陕北重灾区,对救灾和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边区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解放军,仇恨国民党军,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不分男女老幼,不怕千辛万苦。150 万边区人民都是解放军的耳目和保护者,他们主动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敌情,尽心尽力地照顾解放军伤病员;而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消息,使敌人一进边区就像瞎子、聋子一样。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尽管天上有国民党军飞机侦察,地上有国民党军重兵搜索,却始终找不到中共中央机关的踪迹。

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的胜利,是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正如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说:“没有边区人民这样的支援,要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三 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

在西北野战军顺利转入外线作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进驻华北。

1948 年 3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前委负责人徒步来到吴堡县川口村,在村南元子塔渡口登上渡船,前往华北解放区。3 月 25 日,毛泽东等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然后转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等人会合并开始工

作。

从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到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中央前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陕北转战了一年零五天。这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和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等机关（其番号先后为“三支队”、“九支队”和“亚洲”部等）始终转战在陕北的山峻岭间，仅以4个半连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的20万大军相周旋，始终在胡军的间隙中穿插迂回，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次次挫败其合围企图，反而使胡军屡遭沉重打击，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他们先后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12县的37个村镇工作和居住，行程1000多公里。尽管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曾经战领延安和边区的所有县城，却始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共首脑机关与边区部队、或将他们赶到黄河以东去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一直留驻在陕北，和陕北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这个事实极大地鼓舞着陕北和全国解放区军民，坚定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直接指挥着由彭德怀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西北野战军不怕艰难困苦，坚持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胡宗南军，先后进行了延安以南阻击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沙家店、延清、宜瓦等战役，累计歼敌10万余人。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愈战愈强，不仅迫使胡宗南集团退出陕北，而且胜利地转到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于西北野战军牢牢吸住并大量歼灭了胡军的有生力量，因而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其他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使他们较快地转向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开创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局面。

毛泽东等人在直接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同时，总揽全局，运

军发起西府陇东战役，连克长武、灵台、扶风、麟游县城。在此形势下，困守延安孤城的国民党军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还未接到胡宗南撤离的电令，便于4月21日拂晓率部弃城南逃。

4月21日清晨，何文鼎部刚一逃出延安城，在延安城外活动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延属军分区干部刘秉温等即带领高善祥游击队进入延安城内，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胜利光复，验证了毛泽东关于“敌占延安，少则一年，顶多二年”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在为期一年多的保卫陕北解放区的战斗中，西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西北野战军也由2万多人发展到11万多人。

4月23日，延属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从瓦窑堡返回延安。当晚，中共延属地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戒严三天，划分地段，由分区保安处、市公安局等单位负责，组织力量清除市内和近郊的地雷，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立物资接收委员会，负责统一接收处理国民党军队逃跑时遗弃的一切物资。会议还对保护工商业、处理敌特人员等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同时，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延安市民主政府联合发布《安民布告》，向延安市民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宣布：（1）为恢复经济建设和一切工商业，1948年免收商业税，一个月内免征货物税，半个月允许国民党政府货币流通，过期后向银行、贸易公司兑换边区的农币；外逃人员的工商业由政府暂管，待其返回后即行交还；欢迎外地工商业者到延安营业；禁止买卖毒品。（2）凡敌伪库存的物资，机关住宅、花园树木，均由接收委员会统一接收，其他任何人不得破坏和窃取。（3）参加敌伪组织助敌为虐者，应立即向政府登记，交出一切文件、证章，政府当予宽大，既往不咎；否则，定予严惩不贷。布告发出后不久，全市500多家商店、作坊、摊贩纷纷开门营业。

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和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延安光复，特向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

全体人民表示慰问。

4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要求各地各军在采取各种形式庆祝延安光复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围攻少数残敌的据点,肃清反动团队,猛烈追击逃敌;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协助人民解放军作战;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巩固新的解放区。

5月4日,延安万人集会,隆重庆祝延安光复,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等到会讲话。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继续发扬创业精神,发展生产,恢复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力争各项事业在一二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大会还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发出致敬电。

延安光复后,陕北解放区在恢复建设时首先抓了农业生产和救灾两项工作。在农业生产方面,边区政府采取各种奖励和扶植生产的政策,如奖励劳模,消灭熟荒,加强技术指导,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添补农具、种子,减免部分税收等,领导广大农民彻底进行土地改革,进一步提高农民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边区政府在1948年《恢复与发展生产计划(草案)》中提出了具体要求:力争消灭熟荒地,完成1400万亩耕种面积,多打粮食;严禁宰杀役用母畜,严禁母畜出口,奖励多养牲口,保护耕畜;保护老棉区的播种面积,扩大新的植棉区;实行生产劳动与战争勤务相结合,生产劳动与人民武装相结合,解决战后劳动力缺乏的困难。各级干部下乡到村,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8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广种冬麦,增产粮食”,在600万亩麦田的基础上扩大60万亩。为推动扩大麦田,边区政府贷发麦籽1000石、农业贷款边币3亿元。9月27日,《群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边区的干部、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动员起来,迎接秋收,把秋庄稼收好。

由于胡宗南部队的蹂躏破坏,陕北解放区发生严重灾荒。灾

民人数达 40 万之众,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瘟疫。在救灾方面,陕北解放区采取组织群众自救互济、调剂口粮与种子、运粮接济、移民就食(从重灾区移出 3 万群众)等办法,并动员机关、部队、学校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还从晋绥、晋冀鲁豫解放区调拨了一批粮食支援陕北解放区,对战胜灾荒起了很大作用。根据战后的疫情,中共中央西北局于 7 月 12 日发出关于扑灭时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切实加强对防疫灭疫工作的具体领导,把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扩充为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普查疫情,组织中西医下乡防疫治病。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派出 12 支医疗队,分赴重灾区进行疫病的防治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陕北解放区基本上渡过了难关,生产和各项事业开始恢复。1948 年,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达战前水平的 70% 以上,耕畜头数达战前水平的 80% 左右,公营企业中军工生产超过 1946 年两倍,石油产量超过 1946 年的 3 倍,火柴、造纸等产量恢复一半以上。合作社恢复一半,民间家庭副业、手工业及商业集市都有了相当恢复,边区的教育事业也基本恢复。

第二十三章 解放陕西国统区(上)

第一节 解放陕北北部国统区

一 解放三边和榆横国统区

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是从解放三边和榆横国统区开始的。

1945年10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部队的应援下,驻安边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起义成功,安边和定边、靖边两县的国统区获得解放。11月,中共安边县委和安边县民主政府成立,李维钧任县委书记,刘文卿任县长(后叛变)。1946年,安边县开展了减租、查租运动,14户地主给145户佃农退租近10万斤粮食。接着,政府号召地主献地,仅东滩区11户地主就献出耕地2万多亩,全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人均分得土地10亩左右。县政府还成立了“收回教区土地委员会”,经与小桥畔教堂神父谈判,收回教堂长期霸占的土地,原来租种教堂土地的1.3万多农民人均可以分得25亩耕地。

1946年10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绥德军分区部队的应援下,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起义成功,其部驻防地横山县和榆林县南部国统区获得解放。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榆横政务委员会、榆横军分区成立,刘文卿任特委书记,胡景铎任政务委员会主任,吴岱峰和高朗亭分任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榆横解放区分设了镇川、横山两个县。镇川县是以榆林县南部解放区为辖区新设的县,县治在镇川镇,下辖镇川市和盐湾、鱼河、吴庄、响水、武镇五个区,李广业任中共镇

川县委书记,史文秀任镇川县政务委员会主任。横山县设城关、波罗、武威、石湾、韩家岔、李继先六个区,赵文献任中共横山县委书记,李坤润任横山县民主政府县长。榆横地区解放后,普遍进行了减租查租运动和土地改革,8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粮食和耕畜。

1947年春夏,驻宁夏、榆林的国民党军队从北线配合南线的胡宗南部进攻陕北解放区,安边城、横山城及大部分集镇数次陷落。安边和横山县的党政机关退到乡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反“清剿”斗争。镇川县则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作战,在5个月里,支前民工达1.7万多人次,大牲畜2万多头次,参军856人。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三边和榆横解放区陷落的地方相继光复。

二 解放神府国统区

神府地区地处陕、晋、绥三省接合部,是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国民党陕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张子英常驻神木县高家堡,严督分驻神木、府谷县国统区的第八十六师两个团和两个县的自卫队,一面对辖区的人民群众实施高压政策,一面伺机武装侵犯神府解放区。

神府地区1946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1947年发生大饥荒,贫苦群众以草根、树皮填腹求生。而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继续横征暴敛,勒收军粮,以致粮价飞涨,粮店关门歇业。人民群众开始了自发的抗粮和“要粮食、要饭吃”的斗争,并迫切要求解放区的人民武装支援他们的斗争。

1947年7月16日,晋绥边区第二分区工作团进入府谷,接着兴(县)岚(县)支队也西渡黄河进入府谷。中共府谷县工作委员会在新解放的花坞镇成立,赵希贤任书记。8月6日,晋绥地方兵团第五支队攻克府谷县城,后撤出。9月,陕甘宁边区神府工作团进入府谷。10月中旬,中共府谷县委、府谷县民主政府成立,白志明

任书记，杨沛琛任县长。中共府谷县工作委员会和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派出的两个工作团均撤销。1948年1月17日，晋绥军区第三十一团（由原神府支队改编）再度收复府谷县城。同时晋绥军区和绥蒙军区各一部合力作战，全歼国民党一个保安团，毙俘500余人，府谷县全境解放。

1947年8月7日，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旅和神府支队相互配合，在神木县高家堡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团，俘国民党陕北警备副司令张子英、二五六团团长李含芳以下1400余人，毙伤200余人。中共神木县委成立，李子川任书记。10月30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旅和神府支队攻占神木县城。1948年5月，神木县民主政府成立，王殿威任县长。1949年6月，国民党神木县政府溃败四散，神木县全境解放。

三 西北野战军两次围攻榆林城

1947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的各路大军相继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此时，为了配合陈赓、谢富治大军南渡黄河，进军豫陕鄂边，正在陕北解放区进行内线防御作战的西北野战军两次到外线作战，围攻榆林城。

第一次围攻榆林城是8月6日开始的。榆林是晋陕绥边境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其得失对陕北战局影响很大。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后，蒋介石一面严令第二十二军坚守待援，一面严令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主力分路向榆林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六师轻装行进，星夜兼程，避开解放军的阻击部队，于11日抵横山县刘家嘴并继续北进。此时，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的另一部也已北进至青阳岔、瓦窑堡地区。为争取主动，西北野战军于12日撤围榆林，南下沙家店地区休整，另寻战机。13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进入榆林城，随后又奉胡宗南之命南下，追歼西北野战军主力。此次围攻榆林，西北野战军虽未破城，但在城外毙伤国民党军2000余人，

俘3200人,并于8月20日在沙家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第一二三旅。

第二次围攻榆林城是10月22日开始的。为保榆林城不失,蒋介石命令归绥^①、太原、西安等地的空军助战,每天不下50架次,不停地轰炸扫射。蒋介石又命令宁夏马鸿逵以整编第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宁夏保安第一纵队等共3.5万人,绥远邓宝珊部暂编第十七师约6000人组成援榆兵团,分别由三边、包头出发驰援榆林。11月12日,宁夏援榆军逼近榆林。西北野战军除一部兵力继续攻打榆林城外,主力西移打援,在元大滩等地歼敌4000人,但国民党援榆军主力却绕道进入榆林城。11月16日,西北野战军撤围。此役共歼敌6806人。

为配合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中共中央西北局设立了榆林分区,张德生任分区地委书记兼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达志任军分区司令员。分区领导机关随军活动,1947年底撤销。

四 榆林和平解放

西北野战军两次围攻榆林,对榆林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二军官兵的影响甚大,其中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和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加强榆林国统区周围人民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第二十二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其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

1947年底,中共榆林工作委员会成立,宋侠夫任书记。榆林工委成立后,从各方面加强争取和平解放榆林的统战工作,一方面在第二十二军内部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和平解放榆林运动。由中共地下党员周济信、汤昭武、高广昌等发起成立的榆林和平促进会,散发《告榆林同胞书》和《促进榆

^① 今呼和浩特市。

林和平解放宣言》，发动群众参加反战游行，参加争取和平解放榆林的签名运动。特别是全国解放战场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的成功，更加促进了第二十二军与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

1949年4月上旬，中共榆林工委委员罗明再度进入榆林城，敦促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尽快派出代表进行和谈。4月下旬，第二十二军组成以军参谋长张之因为团长的代表团。5月5日，二十二军代表团到达延安与解放军进行谈判。5月6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接见第二十二军代表团，对第二十二军屡失义举良机表示惋惜，希望这次谈判能够解决问题。5月10日，以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为团长的西北军区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草案》条款精神，与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代表团开始会谈，确定了协议的基本精神。5月15日，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突然电令张之因等停止谈判，返回榆林。17日，左协中又电令张之因继续与解放军谈判。由于左协中的反复，双方代表团于24日北上榆林继续谈判。27日，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为团长的西北军区代表团与以左协中为团长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代表团在榆林正式开始谈判。29日，双方达成《榆林局部和谈协议》，第二十二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西北军区。榆林和平解放。

6月1日，榆林3万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榆林城。6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榆林城防司令部、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成立，曹力如任军管会主任，王心镜任城防司令部司令员，朱侠夫任市委书记，罗明任市长。

至此，陕北北部国民党统治区全部解放。

第二节 解放陕北南部国统区

一 黄龙山战役

陕北南部的国民党统治区在黄龙山脉东段。北麓是宜川、洛

川、宜君县和黄龙设治局的全部,黄陵县的大部;南麓是陕东北部的韩城、合阳、白水、澄城县的全部。

解放陕西北部国统区的第一次作战,是西北野战军进行的黄龙山战役。1947年9月24日,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世泰率部由关中分区阳坡头出发,经同官、蒲城,抵达白水县城下。当晚,中共地下党员杨培才、田焕贵率领国民党白水警备队、白水预备队起义。次日,白水县城解放,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白水游击支队,杨培才和田焕贵分任支队长和副支队长。26日,王世泰率部撤出白水县城,东进韩城、合阳,月底进驻洛川县东南的石头镇。

10月1日,奉命南下与第四纵队联合作战的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部经南泥湾、九龙泉抵石头镇,与王世泰研究制定了开辟黄龙山区的行动计划,两个纵队联合南下作战,10月2日收复了黄龙山区重镇石堡^①,10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设立黄龙县,以景志仁为中共黄龙县委书记兼黄龙县民主政府县长;11日占领韩城县城,俘敌300人,缴获野炮6门,长短枪300支,中共韩城县委(书记段洁)、韩城县民主政府(县长吉文超)进驻县城;21日,西北野战军占领宜川县城,歼国民党守军一个团,俘宜川指挥部中将总指挥徐用修,少将宜川县长徐沛以下2954人,毙伤350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宜川战斗后,第四纵队北上,参加第二次围攻榆林城的战斗;第二纵队东渡黄河,在晋南休整。白水、韩城、黄龙、宜川被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

1948年1月28日,黄龙分区成立,强自修任中共黄龙地委书记,黄龙军分区政治委员,黑志德任黄龙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牛书申任黄龙军分区司令员。

^① 今黄龙县城。

二 宜川战役

宜川战役是在宜川县城至瓦子街的狭长河川进行的。

1948年2月12日,经过新式整军运动^①教育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分别从绥德、米脂、清涧、安塞地区南下,到国统区进行外线作战。2月22日,第一纵队、第四纵队集结于宜川外线待命,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向宜川攻击前进。23日,第二纵队从晋南西渡黄河,北上参加宜川战役。

在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集结宜瓦一线的同时,彭德怀司令员和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急电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限3天以内搞清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及行动计划。赵伯平一面发动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在分区周围监视敌军行动,了解敌军情况,一面派机要交通员孙光明急赴西安,通过中共西安地下组织的韩夏存、崔一民找到打入国民党第七补给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杨荫东。杨荫东通过敌军给养补给、运输等情况,掌握了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两个整编师从洛川开往宜川的情况。中共关中地委在限期内完成了秘密调查任务,并报告西北野战军总部。

2月24日,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包围宜川县城,其他部队设伏于瓦子街,待歼由洛川东援宜川之敌。3月1日,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附近全歼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师部及所属四个整编旅,击毙中将师长严明,少将旅长周由之,李达及少将副旅长韩指针,俘少将刘振世,李奇亨,曾文思。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3月3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宜川县城,俘中将旅长张汉初。宜川战役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各类炮218门,轻重机枪

① 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战役间隙,开展了诉苦(诉说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的痛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毛泽东称此为新式整军运动。

1021 挺,冲锋枪 429 支,长短枪 6547 支,炮弹 2000 发,子弹 136 万发,电台 20 部,报话机 11 部,电话 144 部(内总机 13 部),汽车 6 辆,骡马 983 匹,面粉 7000 袋。

宜川城解放后,中共宜川县委(书记封应书)、宜川县民主政府(县长白彦博)移驻城内。

宜川大捷后,西北野战军继续猛追南逃的国民党军队,3月6日收复黄龙县,3月10日收复黄陵县,中共黄陵县委(书记冯力生)、黄陵县民主政府(县长岳嵩)成立;收复宜君县,中共宜君县委(书记杨西林)、宜君县民主政府(代理县长冯德厚)成立;收复白水县城,中共白水县委(书记屈计君)、白水县民主政府(代理县长杨培才)移驻县城;3月24日收复韩城县;3月25日收复合阳县城,击毙国民党合阳县长周鸿,俘 200 余人,中共合阳县委(书记白云峰)、合阳县民主政府(兼县长戈文)移驻县城;3月27日收复澄城县城,俘国民党澄城县长拜志修以下 673 人,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兼代理县长孟树林)随军进入县城;4月25日收复洛川,6月,中共洛川县委(书记张俊贤)、洛川县民主政府(县长郭景龙)成立。

陕北南部黄龙山北麓国统区解放后,黄龙分区和关中分区连成一片,黄龙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富县川口村移驻到洛川县城。

三 澄合战役

澄合战役亦称黄龙南线战役。

1948年4月国民党军队溃败放弃延安、洛川后,防线缩短,兵力相对集中,加上有公路、铁路作依托,便于机动,遂趁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返回黄龙解放区整训之机,向黄龙山南麓发起进攻。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了白水、澄城、合阳,并在“扫荡”关中分区后占领了旬邑、马栏等地。

1948年7月底,胡宗南部裴昌会兵团分左右两路,由白水、澄城、合阳一线向黄龙解放区进犯。30日,国民党第三十六师进占澄

城以北的冯原镇、刘家洼地区,后发现其北面有西北野战军主力,随即停止前进,集结于冯原镇地区,转入防御。为诱歼第三十六师,西北野战军左翼兵团主动后撤,吸引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十七师向韩城进犯,并使第三十六师移动,欲在其移动过程中加以歼灭。8月6日,国民党军一部占领韩城,但第三十六师仍停留原地不动,并以冯原镇为中心组织防御。西北野战军遂决定主动出击,围歼在冯原镇周围的第三十六师,以巩固黄龙解放区。

8月8日,西北野战军第一、二、三、四、六共五个纵队及警备第四旅发起澄(城)合(阳)战役。9日,战斗结束。此役歼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第一六五旅旅部及三个整团、第二十八旅和第一二三旅各一部,击毙少将副师长朱侠,俘少将张先觉、李秀、陈定、马国荣以下6080人,缴获大量物资。

8月10日,西北野战军再次收复合阳、澄城县城。至此,陕西南部国统区大部解放,新的黄龙解放区形成。

四 黄龙新解放区的政策

黄龙解放区共有九个县。黄龙地区解放后,各县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有“左”的倾向,也有右的现象。

在土改政策方面。韩城解放之初,急于搞土改,提出“快定快分”,即快定地主、富农成分,快分地主、富农土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党的力量又不强,反被流氓分子钻了空子。结果,真正的贫雇农并没有分到多少胜利果实,而土改过程中出现的乱打、乱斗、“扫地出门”等做法,弄得许多人外逃,恶果不小。后分区领导决定,在一两年内不搞土改,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黄龙山区的大量荒地,公荒谁开归谁,私荒开垦三年不缴租;地主献出的土地,由政府接收,调剂给无地农民。

在城市政策方面。黄龙分区解放后,九座县城城市政策都执行得比较好,其中洛川尤为成功。洛川久为国民党军据点,国民党

军退走时,全城居民逃避一空。解放军进城的当天,城内只有三个市民。新组织的进城委员会立即统一管理城市,城门封三留一,只准城里人进,不准乡间或其他人进;商号无人看管者,均由政府封管,非本店人员不得出入;公共物资收集交政府,民间贮藏的敌方物资暂时不动;进行必要的救济慰问工作。由于措施得当,县城秩序良好,商民无损失,三日后城市开放。

在民主选举方面。在新解放区过早地搞选举,因好人出不来,坏人反而乘机混入,如此等于把政权交给一批坏人,给坏人以合法的地位。黄龙分区没有急于实行民主选举,而是利用旧保甲人员为新政权办事,乡村政府中有的地方60%是旧保甲人员。这种办法反比坏人通过民主选举掌握新政权有利。经过半年的过渡,黄龙分区实行了普选。

在清匪方面。黄龙分区共散存国民党保安警察及土匪武装6000人,后经军事清剿、政治瓦解,这些反动武装很快被消灭。主要经验是剿匪与发动群众紧密配合。剿匪若不与发动群众配合,单纯依靠军事清剿,则会越剿越多。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消灭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处理,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等政策,不久即将土匪全部消灭。

在税收方面。解放后,黄龙分区三个月没有收税,损失很大。后派人办理税收,仅韩城县当月即收税30亿农币(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联合发行的货币),主要是征收出入口货物税(营业税免征)。

在学校方面。开始时注意不够,一切都想由人民政府另行办起,但政府又无力承办,只好拖延置之,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后来对学校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先一律维持现状,教职员中除了国民党特务外,一律继续任职。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不规定登记手续,以便从思想上争取改造他们。

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解放初期,许多地方忽视了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对中上层分子不加分别,一概不理,使新区工作阻力很大。另一方面,地委又不敢放手让群众斗争最坏的国民党的乡长、保长,结果群众自发起来进行斗争,反使人心不安。这是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另一种偏向。

黄龙新解放区紧靠关中国民党统治区,这里党的政策执行的好坏,对于解放关中国统区影响很大。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8年6月6日专门讨论了黄龙分区的工作。7月14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以黄龙分区执行政策的情况为主要内容,向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的报告。7月24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

第三节 解放陕东、陕中国统区

一 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陕东、陕中国统区的解放,是西北野战军通过1948年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和1949年的春季攻势等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实现的。

1948年9月13日至22日,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合阳县雷家庄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总结半年来的新区工作,具体研究制定新区政策和秋季作战方针。会议由前委书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主持,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作《关于新区地方工作》的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西北的实际情况,《关于新区地方工作》对新区工作提出了几项具体意见:(1)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巩固区,首要任务是安定秩序,肃清反动武装,解散反动组织,建立人民统治,支援解放战争,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巩固区又应分为内地区和接敌区,在接敌区的各种工作布置上,基本应和游击区一样。在游击区,首

要任务是发展游击战争,宣传党的政策,建立秘密群众组织。至于其他的社会改革工作,应适合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不能急躁粗率。暂时经过的农村或暂时占领的城市,中心任务是扩大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应急于实行社会改革,尽可能地少逮捕,不没收,对保甲组织一般的不摧毁,争取为我做事。(2)目前在新区继续实行减租减息及酌量调剂种子粮食的社会政策。关于这一策略阶段延长的理由,不但应在党内和部队中反复进行教育,并应向农民解释清楚。(3)取消粮食征借办法。首先依靠缴获敌人的粮食解决军粮,不足时向大中地主预借,再不足时向小地主预借,还不足时向富农预借,在万不得已时才向富裕中农预借,一般中农以下均不能预借。(4)对于民间散枪应一律登记,原则上交政府收存,但在执行时应有步骤地谨慎处理,切不可操之过急,尤须严禁游击队逼交枪弹。(5)对于国民党军政人员,仍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分别对待不能决定于少数人的好恶,而要根据本人真实情况和多数群众的意见。(6)在新解放城市,首要任务是保护民族工商业与维护城市治安。

会议确定了西北野战军目前的作战方针,并从政治上、军事上做好了发动1948年秋季攻势的准备。

二 西北野战军发动1948年秋季攻势

西北野战军1948年8月发动的秋季攻势作战,是在大荔县以北地区进行的,亦称荔北战役。

8月底,在澄合战役中遭受重创,损兵近万的胡宗南在大荔主持召开“冯原作战检讨会”,对逃回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团以上主官严加训斥,当场宣布对师长钟松撤职留任以观后效,将第二十八旅旅长及第八十二团团团长逮捕法办,并宣布杀律多条,通令所属,企图振奋军纪,挽救危局。会后,胡宗南重新调整部署,组成以蒲城、大荔为中心的防御体系,集中兵力于交通线上,企图阻止西北野战

军南下西进。裴昌会第五兵团司令部附整编第三十六师残部驻大荔城内，整编第十七师、第三十八师驻防大荔县县城以北。

针对胡宗南集团的兵力部署，西北野战军总部决定集中主力，采取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办法，歼灭整编第十七师和第三十八师。

10月5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向各军分区、各旅发出指示，要求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并命令警备第四旅和黄龙、关中、西府军分区的部队直接受西北野战军的指挥。

10月6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国民党整编第十七师发起全线攻击。14日，战斗结束。此役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六十五师大部，第三十六师、第一师各一部，毙整编第七十八旅副旅长景纯庵，俘整编第四十八旅少将旅长万有尘以下11050人，投诚1110人；缴获各种炮183门，轻重机枪985挺，长短枪6450支，炮弹6810发，子弹150万发。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员杨海潮、王晏亭于10月6日分别率领国民党朝邑县保警队、朝邑县常备队1000余人，携带机枪8挺，长短枪1000余支，子弹17万发起义，俘国民党朝邑县长以下300人，缴获长短枪200支，电台3部，电话机70部。

10月6日，朝邑县城解放。9日，中共朝邑县委（书记韩增友）、朝邑县民主政府（县长刘仲谐）成立。同日平民县城解放。此役再次收复合阳、澄城县城。

三 西北野战军发动1948年冬季攻势

在遭受了西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打击之后，胡宗南部虽然在兵员、装备、弹药和运输条件方面仍占优势，但士气低落，已完全处于守势。胡宗南遂将其部平分为3个防御集团，以蒲城、澄城、合阳为中心进行防御。

荔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以纵队为单位,各组织三至四个武装工作队,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袭扰敌人,破坏军事运输,利用夜间喊话瓦解与疲惫敌军,同时相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配合地方干部建立新区政权。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白水、澄城、合阳以北地区进行整训,补充。

1948年11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了淮海战役。为了配合淮海战役,阻止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战场,并攻占与巩固澄城、合阳、白水等地区,解决部队粮食问题,保障部队进行冬季整训,西北野战军总部决定发动冬季攻势。冬季攻势主要是在澄城、蒲城间的永丰镇地区进行的,亦称永丰战役。11月15日战斗开始,28日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3个师部、9个团、7个营,毙第十七师少将师长王作栋,俘第七十六军中将军长李日基,第七十六军少将参谋长高宪岗、第二十师少将师长吴永烈,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于厚之以下17724人,投诚300人,缴获各类炮160门,冲锋枪192挺,长短枪6869支,炮弹2000发,子弹78万发,骡马501匹。

此役收复了合阳、澄城、蒲城县的大部分乡村,并第三次攻占合阳县城,巩固了澄城、合阳、白水等地区,解决了部队粮食问题,保障部队进行冬季整训。

四 第一野战军发动1949年春季攻势

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

在此形势下,1949年2月19日至3月24日,第一野战军^②在陕东发起春季攻势,歼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全部,第十四师、第八十

^②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四师、陕西保安第四旅各一部，毙第二四八师少将师长马德胜，俘第二十师少将师长褚静亚，陕保第四旅少将旅长兼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员赵国祜以下 4921 人，投诚 451 人，缴获各类炮 32 门，掷弹筒枪榴筒 92 门，轻重机枪 234 挺，冲锋枪 34 支，长短枪 4689 支，炮弹 7132 发，子弹 79 万发，骡马 128 匹，小麦 373 万斤，火车头 2 台，车皮 34 节。

在此前后，第一野战军于 2 月 1 日再次收复白水县城，国民党白水自卫团 150 人投诚，中共白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于 5 月 23 日迁回县城。2 月 12 日，第一野战军收复旬邑县城，国民党旬邑县县长郝登阁率部起义，中共旬邑县委（书记杨宗耀）、旬邑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德禄）移驻县城。2 月 20 日，同官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同官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一野第四军政治委员张仲良兼任主任，中共同官县委（书记雷炜）、同官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屈计君）随军进入县城。2 月 21 日，耀县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耀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杨伯伦任主任。次日，中共耀县县委（副书记张仲平）、耀县人民政府（县长封正宝）进入县城。2 月 22 日，蒲城解放，中共蒲城县委（书记刘拓）、蒲城县人民政府（县长刘子义）移驻县城。2 月 24 日，第一野战军攻占淳化县城，歼敌 519 人，缴获六〇炮 5 门，轻机枪 18 挺，电台 2 部；次日，中共赤水县委书记白天民）、赤水县人民政府（县长田静忱）进驻淳化县城。28 日，中共赤水县委书记白天民）、赤水县人民政府更名为中共淳化县委、淳化县人民政府。2 月 25 日，富平解放，由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兼任主任的富平县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兼县长邵武轩）随军入城。3 月 4 日，大荔解放，中共大荔县委（书记白云峰）、大荔县人民政府（县长姚一征）成立；朝邑、平民解放，中共平民县委（书记薛建民）、平民县人民政府（县长冯德厚）成立。

5 月，第一野战军发动秦川追击战役，陕东、陕中的国统区全部获得解放。5 月 13 日高陵解放，中共高陵县委（书记严一农）、高陵

县人民政府(县长邢子舟)成立。5月14日三原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原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黄子祥任主任,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军)、三原县人民政府(县长孙一君)成立。5月17日泾阳解放,中共泾阳县委(书记谢玉田)、泾阳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涂洛克)于20日进驻县城。5月20日临潼解放,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兼县长张中涛)于24日进驻县城。5月23日华阴解放,中共华阴县委(书记白加彩)、华阴县人民政府(县长李纪)成立;华县解放,中共华县县委(书记刘耀明)、华县人民政府(县长李连璧)成立;渭南解放,国民党渭南警备司令部起义,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张俊贤)、渭南县人民政府(县长魏光波)成立;蓝田解放,中共蓝田县委(书记宋平)、蓝田县人民政府(县长孙生贤)随军进驻县城。5月29日,潼关县城解放,31日,中共潼关县委(书记李森)、潼关县人民政府(县长崔士杰)正式成立。

随着陕东和陕中国统区的解放,大荔、三原、渭南三个分区的领导机关相继成立。1949年3月7日,东府分区更名为大荔分区,刘文蔚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王恩惠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杨拯民任军分区司令员,分区领导机关于4月29日进驻大荔县城。5月20日,关中分区更名为三原分区,白治民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杨玉亭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黄子祥任军分区司令员,分区领导机关于5月21日移驻三原县城。5月20日,渭华分区更名为渭南分区,白清江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谢怀德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于占彪任军分区司令员,分区领导机关于5月24日进驻渭南县城。

第二十四章 解放陕西国统区(下)

第一节 解放西安

一 中共西安市工委组织群众迎接西安解放

1948年冬,在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为给解放西安做准备,中共关中地委决定并报经西北局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韩夏存任书记。工委的任务是统一领导西安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并与西安情报处等党的地下情报组织密切配合,迎接西安解放。

中共西安市工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壮大队伍。首先理顺组织关系,实行统一领导,撤销了1937年成立的中共西安工人工作委员会,将其工作纳入市工委管理。同时,市工委根据党在国统区“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的规定,在铁路系统、教育系统、大华纱厂、西京汽车修配厂、西京电厂、电信局、邮政局及陇海铁路沿线的一些工厂,甚至在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经理处等党政军要害部门里,秘密扩展或新建党、团组织,使之成为带领群众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与战斗堡垒。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市工委领导的党员有108名,团员161名。

中共西安市工委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扩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稳定人心。西安地下党组织经常收听记录新华社、陕北广播电台的消息,然后印制传单,广为散发,向各界群众宣传国民党全面溃败、解放军频频胜利的形势,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驳斥国民党的欺骗、造谣和污蔑,还通过各种渠道,给国民党各类人员大量写信,寄传单等,劝告他们脱离反动阵营,向人民靠拢;

警告继续为非作歹的军警特分子立即放下屠刀,争取人民宽大处理。这些工作对于鼓舞人民斗志、震慑瓦解敌人起了很大作用。1949年元旦,陕北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继而广播了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等重要文章。西安市工委书记韩夏存凭记忆将这些重要文章的要点写了出来,组织党员张禹良、张瑞兰连夜刻印,通过邮政局的共产党员姚一宽分批寄给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的机关、工厂、学校,并在第三批寄给军、警、宪、特机关的材料中,附有警告其不准继续作恶,要立功赎罪的话语。胡宗南收信后,严令省会警察局彻底追查。1月9日,隐藏在警察局的户籍警员王健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在西一路小学执教的张光庭、白靖中(均为共产党员)、张廷龄、陈璧等被捕。但市工委的宣传工作没有因此停止,而是以更秘密的形式继续进行。

中共西安市工委采取多种形式,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广泛团结各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杨子廉、李虎臣、成柏仁、张凤翔、马彦耕、袁伯扬、寇遐、耿端方、韩望尘、薛道五等社会知名人士,都同中共西安地下组织保持着联络。袁伯扬是陇海铁路管理局局长、民革西北特派员,经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做工作,袁伯扬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的指导。1949年4月,胡宗南要袁伯扬将陇海铁路沿线机车全部调集宝鸡,拟于撤退时破坏。袁伯扬立即通报中共西安市工委委员朱子彬,两人商定将部分机车停放在宝鸡,以应付胡宗南;西安一带完好的机车,动员工人拆卸隐藏;其他各站机车,一律疏散到咸(阳)同(官)支线。5月初,根据中共西安市工委的安排,袁伯扬组织铁路护保团,自任团长,并要求各车站、工厂、路段均建立护路组织,员工坚守岗位,看守桥梁和重要岗位。经过袁伯扬的努力,陇海铁路局70%的机车和客货车得到完好保存。中共西安市工委和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还分别做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的工作,王友

直表示愿意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意向,王友直设法安排向人民靠拢的闵继舜担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专职副总队长,从而使中共组织能够控制这支武装。西安解放时,闵继舜率部起义。

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时,阴谋把大专院校迁到陕南、四川,然后把学生编入他的军队。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及时向各校党、团员布置:“发动群众,开展反迁校、反集训斗争,揭露敌人的欺骗阴谋。”西北大学学生联合教职员发起了反迁校的签名运动,动员外县的学生回乡暂住,本地学生就地疏散。西安市工委还先后组织护送 250 名青年学生到老解放区,成功地粉碎了胡宗南的阴谋。

为随时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向上级提供准确、及时的军事情报,中共关中地委、西安市工委和西安情报处等情报机关先后建立了西安军事情报组(杨荫东负责)“德源银号”、“奇园茶社”、“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调查站”等站点,广泛收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情报。西安情报处的红色电波一直持续到西安解放的前夜。在策反国民党军方面,市工委委员崔一民多次做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司令王子伟的工作,使其认清形势,明晓大义,在西安解放前率部起义。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多次对军统西北第二站站长陈洁生做工作,使陈洁生交出了全陕军统人员名单和编制情况。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共西安市工委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全面开展护厂、护局、护校、护路等斗争。胡宗南逃离前,企图对工厂、企业进行大规模破坏。市工委立即向地下党、团组织和党、团员发出指示,要求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局、护校斗争,保护人民财产,特别是对铁路、邮电、电厂、面粉厂及粮食、枪械、弹药仓库等要害部门和各单位的重要机器器材、档案资料等重点加以保护,要求做到铁路、邮电畅通,重要机器设备不被破坏,居民生命财产保证安全,要求设法阻止工程技术人员不被裹胁或者盲目出走。根据市工委的要求和布置,党、团员积极发动群众,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护

厂、护局、护校组织。电信局的党员团结职工将重要的发讯台拆卸隐藏,邮政局的党、团员设法停驶了全部邮车并妥善保护,三桥车辆厂的职工在国民党军工兵爆破工厂时群起反抗,大华纱厂、西京电厂、西京电讯局、西北大学等厂、校的护厂、护校组织也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顽强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的种种破坏阴谋,使古城西安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

二 西安的解放及接管

1949年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此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董钊、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国民党西安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陈建中等发表通电,反对和平谈判,叫嚣“继续戡乱”。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4月23日,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解放。南京的解放,加速了国民党胡宗南军事集团和陕西省政府从西安向汉中的溃逃。

5月13日,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副参谋长宋早观电报中共中央军委,“胡匪绥署已迁汉中,准备入川,保存实力,主力正准备西撤。”18日,胡宗南和董钊乘飞机逃到汉中。胡宗南撤退时,以其第十七军军长杨德亮兼西安警备司令,率部守卫西安;以李振为第十八兵团司令,率第一军、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撤退到凤翔、宝鸡;以陕西保安部队编成的几个新军为主体编成第五兵团,裴昌会兵团司令,西撤宝鸡后任西安绥靖公署宝鸡指挥所主任;第三十师从三原出发,在乾县与第五十七军

会合,向宝鸡进发,侧背掩护胡宗南主力沿渭河西撤,秦岭中部守备司令何文鼎一面接受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指挥,一面掩护胡部主力西撤,伺机东返。

5月19日晚,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兵临西安城下。20日上午11时,第六军四十九团进至西安城西门时,起义的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撤出城防,解放军顺利进入西安市区,向城内搜索前进。第四十六团从南门攻入。第四十八团在第四十六团配合下占领飞机场。第十七师五十团攻下三桥火车站后,乘坐由三桥铁路工人驾驶的火车快速开进,占领西安火车站,夺下北门,与第四十九团在钟楼会合。部队进入西安城郊时,西安守敌第十七军残部已于18日向城南秦岭山区逃窜,第六军即以一部追击,另一部占领北郊草滩镇。到20日14时,第六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在解放西安的战斗中,第一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四十八师、十二师及暂编第二旅各一部,俘官兵1274人,缴获各种枪1973支,各种炮51门,各种弹药17万发。

5月20日,长安县解放,张方海任中共长安县委书记,鹿鸣任长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5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人城仪式。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安中等学校的师生和西安市民数十万人拥上大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高呼口号欢迎自己的军队,西安火车站及各条大街均张贴出“毛主席万岁”、“解放军是人民的大救星”等巨幅标语。整个古城成为欢腾的海洋,人们热烈欢庆古城的新生。

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张经武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罗元发任副司令员。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杨明轩、张稼夫、张经武、赵伯平、方仲如、李敷仁、陈希云、陈养山为委员。西安市军管会为西安实行军事管

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管理全市军事、民政等事宜。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贾拓夫任市长,方仲如任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任第二副市长。26日,中共西安市委委员会组成,贾拓夫任书记,赵伯平任副书记,张经武、方仲如、董学源、柯华、陈元方、何承华、李甫山、朱子彤、韩夏存、曹冠群、崔一民、李宗林为委员。

西安市军管会、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立即自上而下地有秩序地开展了接管工作。

彻底打碎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级机构及驻西安办事处等单位,除少数因有职工保护较完整外,多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政府系统的公务人员大部分仍在,党军警特等系统的人员皆逃避一空。军管会代表先按原有系统接收其全部财产、文卷、人员名册及附属单位,进行清查整理。对旧公务人员,除对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捉不押,责成其保护财产档案办理移交。而后对他们进行登记、审查,组织学习,一部分送教育机关集训,一部分按本人自愿资遣还乡,有一技之长而无劣迹者,经训练改造后酌情录用。

有秩序地没收官僚资本。对官僚资本企业及公用事业单位,均不打乱其原有生产体系与技术管理制度,按照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责成原主要负责人办理移交手续,同时发动工人群众提供情况,检举监督,并争取尽快恢复生产。军管会代表迅速接收了西安地区所有官僚资本企业和社会公用设施,其中包括咸阳纺织厂、咸阳打包厂、西安机器厂等较具规模的工厂,国民党军需系统所属的印染、制革、装具、汽车修理、机器制造等厂,西京电厂、铁路、公路、电信、邮政、水利等设施,属于官僚资本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孔祥熙的裕华银行等。

坚决保护民族工商业。政府大力宣传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号召私营工商业者立即开门复业，活跃市面，保证其财产与经营活动不受侵犯。对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但不属于接管对象的私人企业，必要时派出联络员，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并在原料上予以照顾，在资金上适当提供贷款，以利于社会生活和稳定人心。对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则暂时实行军管、监理和代管。凡官僚资本企业中的私人股本，一经查明随即发还。

对文化教育单位包括大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体育场等，采取严格保护、维持现状，然后逐步改造的方针。接管的有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省立西安师专、西安医专、西安商专，省立9所中学、7所小学、3个文教机关，市立2所中学及3所职业学校。军代表进校后，宣布接管命令，召集师生员工座谈，宣传党和政府的文教政策，组织政治学习，积极筹备复课。除明令取消某些内容反动的课程和制度外，其余照旧。停办了中正、灵甫、建国等几所反动学校，封闭了国民党办的所有干校、军校。凡私立学校登记审查后即可复课。

接收国民党所办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等13个单位。对于一些中间性的私营报刊，如《经济快报》、《工商晚报》等，则准许复刊，争取并帮助其为人民服务。

西安接管工作从5月24日开始，到8月下旬基本结束。市军管会共接管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240个，登记各类人员约2.6万人。8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决定，西安市军管会将所属各部门及其接管的单位，按照业务性质与工作范围，分别划归边区政府各主管厅局、西北军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西安市政府领导。

在接管工作全面展开的同时，西安市军管会和市委、市人民政府大力动员和组织各界群众努力恢复生产。铁路职工提出了“修

桥通车”的口号,20天修复了潼关至西安的7座铁路桥梁并通车,33天抢修好咸同线并通车,劳动效率超过解放前数倍。电厂工人提出“修炉供电”的口号,抢修被破坏的发电设备,在西安解放两天后就实现部分供电,城内路灯复明。到8月,3台发电机全部修好,每月发电量大大超过解放前。大华纱厂工人连续奋战20天,使3万纱锭重新转动起来。西安的电信业、汽车修理业等一直未停。解放后第三天,邮电系统复业,邮件逐日增加,与全国各解放区的联系畅通无阻。第四天,市内公共汽车恢复运营。原已停产或遭受破坏的机器制造、肥皂、制革、火柴、印刷、面粉等工厂也都恢复生产,国营和私营银行先后展开业务活动。各厂普遍建立起工会筹备会,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各种活动,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西安解放以前,百业萧条,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市面流通的是已经多年不流通的银元和铜板。一些不法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粮价飞涨,广大民众困苦难熬。解放后,军管会 and 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解决市民最紧迫的生计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事先调集了大批粮食、煤炭、食油、盐碱和棉花等物资,准备供应新解放区。西安市贸易公司入城后,在各主要市场分设粮食、煤炭、花纱布、百货四个分公司,在各大街道设立支公司和代销点,平抑物价,保障市民生活基本必需品的供应。在国营商业的带动下,私营商店也纷纷开门营业,市面日趋活跃,社会稳定,人心安定。到12月底,西安工商业已基本恢复到原有水平。

各区人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召开群众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深入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工农群众安心生产。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被彻底废除,基层人民政权普遍建立。政府工作人员下到基层,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为保障工人生活,政府按月发放实物作为维持费(不久改为临时工资)。各级政府妥善调解劳资纠纷,为失业人员安排出路,资助难民返乡从事生产,救济特别贫困户,做了大量的工作。

西安各学校陆续复课。学生除在校学习外,还积极组织宣传队下厂下乡,有的请求上前线为解放军服务。5月22日,《西安新闻简报》在古城创刊。27日,《群众日报》西安版与读者见面。7月1日,从延安迁到西安的《群众日报》正式出版发行。西安广播电台修复并开始播音,电影、戏剧和秧歌活跃。

西安虽已解放,但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仍疯狂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肃清匪特成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从5月20日西安解放到9月底,公安部门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先后破获“中国派遣军”、“中国反共抗俄太行突击军”等9个反革命阴谋暴乱团体,破获国民党潜伏特务组织29个,查获匪特分子数百人,收缴了一批秘密电台、武器和弹药。对少数奸商、不法分子的经济破坏活动也给予了坚决打击。西安的社会秩序与人民生活日趋稳定,并先后平抑了三次金融物价大波动。

7月28日至30日,西安市首届各界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西安市军管会主任贺龙致开幕词,军管会副主任、西安市市长贾拓夫作题为《为建设人民的新西安而奋斗》的工作报告。经大会民主选举,赵伯平当选为西安市首届各界代表会主席,马德涵、杨子廉、朱子彤、王竞秋当选为副主席。西安市各界代表会的成功举行,标志着人民民主生活的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

第二节 解放陕西西部国统区

一 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

陕西西部国统区的解放战争,从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开始,到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取得扶眉战役胜利,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1948年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栏镇

等地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出击西府国民党统治区。中共西府地委书记兼西府军分区政治委员李景庸、西府军分区司令员赵伯经也随西北野战军总部行动,负责做地方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

4月17日,西北野战军攻占旬邑县城及职田、张洪、太峪、上官庄等集镇,俘国民党旬邑县长、陕西保安第十九团团长以下1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挺,步枪600支,电台1部,粮食500石。

4月18日,西北野战军攻占永寿县城及常宁镇,歼灭国民党军第二〇三师两个团及永寿自卫团,俘敌2000人。中共永寿县委、永寿县民主政府成立(魏希文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4月19日,西北野战军攻占彬县县城,俘彬县要点守备指挥部少将指挥官赵璋,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邵少将司令乔维森、上校副司令张树楠以及联勤兵站站长、粮秣供应库长、彬县县长以下1694人,缴获炮7门,轻重机枪45挺,冲锋枪17支,长短枪977支,子弹10万发,炮弹1200发,电台4部,汽车6辆,电话机24部,小麦3000石,面粉1925袋及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1亿元。中共彬县县委(书记任君顺)、彬县民主政府(县长张效良)随军入城。

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攻占长武,俘长武县警察局局长以下720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枪280支,电台1部,粮食2000石,长武县民主政府成立(县长刘刚);同日,攻占麟游县城,俘敌150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枪100余支,粮食200石。麟游县民主政府、麟游县解放委员会成立(王白强任代理县长兼解放委员会主任),并成立了四个区的党委和区公署。

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攻占扶风县城,攻占绛帐火车站,腰斩陇海路西段,控制铁路线15公里,扶风县解放委员会成立(孙克武任主任)。

4月23日,西北野战军攻占凤翔县城,国民党守军和凤翔县政

府溃逃。中共凤翔县委(书记邵光瑞)、凤翔县民主政府(西府总队副司令员董策成兼县长)及凤翔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

4月24日,西北野战军攻占岐山县城,25日攻占蔡家坡火车站,俘保警队370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200支,粮食1.5万石。中共岐山县委(书记王宏谟)、岐山县解放委员会(主任王伟章)成立。

4月26日,西北野战军攻占宝鸡县城,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特务营、工兵营,第一四四旅2个团,陕西保安第二十一团、宝鸡县保警队,俘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徐保以下2248人,缴获兵工厂1座,弹药库数座,满载枪炮弹药的火车3列,机车4辆,装甲车1列,粮秣无计。宝鸡县民主政府(县长萧蓼)配合人民解放军向群众散发大米、小麦数万石,布匹无数。28日,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宝鸡县,因长途运输困难,销毁各种炮120门,步马枪1.4万支,各类炮弹数百吨,各种子弹数千万发,各种炮镜120具。

4月29日,西北野战军攻占千阳县城,开仓济贫,散粮两天。

5月12日,西北野战军回师关中分区,出击西府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1945人,其中俘敌9945人。

二 西府国统区人民的反“清剿”斗争

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国统区胜利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垂死挣扎,全力反扑,一方面屠杀在押的政治犯,一方面在西北野战军经过的地方实行疯狂的“清剿”。

国民党陕西当局屠杀政治犯,最惨无人道的是在耀县药王山下活埋了32人。1948年4月21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将32名“政治犯”从西安押解至耀县药王山下惨杀。32人中有男有女,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青年学生,有的是劳动群众,他们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当他们被推入土坑时,大骂敌人的黑暗残暴,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1954年5月1日,中共耀

县县委、耀县人民政府在 32 名烈士就义的地方为他们立了纪念碑。

国民党对西府统治区的“清剿”也是从 1948 年 4 月下旬开始的。由于西北野战军西进宝鸡,国民党军第八十二师、第一七七师、第二〇三师等部重新占领永寿、彬县、长武县城。他们一面恢复被解放军打烂了的国民党各级政权,一面进行“清剿”。陕西省政府重建了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重新任命了各县县长。彬县新建了 11 个乡、镇公所。永寿县重建了乡、保和军警特务组织,还在地处西兰公路要冲的底脚沟设立据点,盘查来往行人,搜捕革命群众。长武县政府逮捕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及统战对象 23 人。5 月中旬,国民党当局以第一师和 10 个县的保安团对西府国统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清剿”,重点是扶风、麟游、岐山县的接合部山区。在反“清剿”斗争中,扶风县游击队和魏文德大队攻破扶风北乡权家寨,击毙反动地主、少校谍报队长权世禄,并将其 500 多石小麦和 100 多石油菜籽分给贫苦农民;岐山游击队精心养护西北野战军的伤病员,仅冯兴汉游击大队活动区域内就养护西北野战军伤病员 30 多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旅团参谋长强金义在王孝先游击队活动区域内养伤 4 个多月。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孙宪武和通信员孙万林在反“清剿”中被俘,游击队员唐金西、马伦娃、马秃娃等牺牲。

为了加强西府国统区人民的反“清剿”斗争,6 月 26 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联防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电示西府地委:(1)西府在两三个月之内或更长时间里情况会严重的,在此期内还有一段艰苦斗争的过程,望能依据今天情况与将来变化进行有效的各种活动,以便渡过难关,而有力地准备迎接新的形势。(2)目前西府的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并壮大群众,克服困难,争取好转,而不是等待好转。首先改变前一时期的公开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务求能

够隐蔽和存在。凡已公开不能立足进行活动的党员干部均应有计划地撤退,调到安全地区训练。提高与巩固群众胜利信心,积极准备武装活动,有计划地开展广大地区半公开或秘密的游击运动,三五人一组,最多亦不得超过10人一组,由坚强的党员领导,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斗争,争取建立名为“保甲”,实为人民武装的游击小组或游击队。(3)西府主力部分应撤至边区整训,留下的游击队配备坚强干部化整为零或分散活动,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游击战术,行动无踪,飘忽不定,使敌不易合而奔袭。这一时期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做群众工作。

6月29日,习仲勋、马明方再电西府地委,(1)游击区的保甲组织不宜过早摧毁,以免群众过分遭受损失,即在校巩固的游击区,亦不宜于取消保甲,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否则流于形式,反于我军我党不利。在西府广大地区仍应坚决地发展反蒋介石反胡宗南的统一战线,把保甲变为革命的群众力量,当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斗争方针。(2)对地方团队、灰色武装应独立自主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只打其中最反动的个别部分,不要过多树敌,不要过分要求一切同情我们的力量都马上跟上来,这会孤立自己,只要他今天不打我,我今天还要坚持合作,切忌自己把门堵死。(3)杀人要特别慎重,严禁密杀,杀人要经审判,宣布罪状。

7月,国民党千山守备区司令董耀先率领10个县的保安团对西府国统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清剿”,重点仍在麟、扶、岐、凤北部山区。扶风县史俊儒、魏文德、冯俊安三个游击大队协同作战,在涧沟桥沟底伏击敌人。凤翔县游击队打垮洛渠、榆杏、安河三个乡公所,活捉安河乡乡长,处决了参与杀害游击队长欧阳德的保队副李珍,并在封家山伏击国民党县自卫队。8月12日,永寿县宁太游击队围歼国民党乾永自卫队380人,并拔除底脚沟据点,受到边区政府通令嘉奖。8月15日,彬县游击大队攻打义门城获胜,歼灭守敌150余人。在此次反“清剿”斗争中,中共彬县县委书记任君顺

被杀害于淳化县南庄沟。

9月,国民党军第二〇三师和扶风、岐山、麟游、乾县等地保安团对西府国统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清剿”。驻磨盘山的扶风县游击大队遭敌包围,激战一天始突围。魏文德大队在卢敬山毙敌两人后,分散突围,转移到麟游山区。麟游游击队9月20日袭击崔木乡公所,23日在相贤乡陈家沟与国民党县自卫团交战,10月3日在南庙底截获县自卫团军服280套,步枪2支。10月25日,奉命进边区整训的岐山、麟游、扶风游击队员和在边区学习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在永寿县卢家嘴村遭国民党军包围,武启民、李三英牺牲,12人负伤。11月25日,共产党员蔡占甲、胡占彪以及地下工作人员、游击队员赵彦芳、张芳、赵烈虎、徐彦虎、周平子、李占仓等八人被国民党长武县政府枪杀于县城西关外。12月8日,奉命进边区整训的风翔游击大队、岐山刘岐周游击大队和在边区学习的青年学生近500人在永寿县高庙山村被国民党军包围,大部分人员突围,进入边区,11人牺牲,12人被俘。

1949年1月19日晚,驻乾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一支骑兵部队到乾县、扶风县交界处突袭“清剿”,中共扶风县委副书记史汀在天度乡被俘。此后,西府国统区的人民武装转入了寻机打击敌军的阶段。2月5日,风翔县游击大队在县城东寺头村伏击国民党军军需车辆,缴获八二炮3门,轻机枪6挺,长短枪50多支;宝鸡县符友亮、王文章率游击队在渭河南八庙村截击国民党军挽马团一部,缴获长短枪30多支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岐山县,地下党领导游击队瓦解秦岭南各区独立营及西安绥靖公署挺进第四支队,四次袭击长(安)益(门镇)公路、西宝公路的国民党军运输车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拔除岐阳、龙尾、怀郃三个乡公所。在麟游县,游击队于3月28日在漫湾截获国民党军运输车队,缴获牲口100余头及大批粮食;4月3日再次截击国民党运输车辆,毙中队长以下9人,夺回羊200余只;5月初截击国民党往宝鸡运送“壮丁”的车

辆,获救人员一部分回家,一部分参加了游击队。

在反“清剿”斗争中,西府国统区人民在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的同时,也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的力量,新建了凤翔县游击大队、扶风县游击大队,麟游县游击大队。岐山县新成立了郑士奎游击队、王俊杰游击队、王均贵游击队,宝鸡县成立了焦振祥游击队。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多支国民党地方团队起义。这些起义者均参加了当地的人民武装。

三 秦川追击战役

1949年5月11日,第一野战军在取得春季攻势的胜利后,发动了秦川追击战役,追歼从西安向宝鸡、汉中溃逃的胡宗南军。追歼战役进展顺利,四天解放了高陵、三原、泾阳三个县。之后,第六军解放西安,其他各部以渭水为界,分南、北两路西进,解放西府国统区。

西进的北路解放军5月18日收复咸阳和礼泉县城,中共咸阳县委(书记陈香愚)、咸阳县人民政府(县长任廷辉),中共礼泉县委(书记王育英)、礼泉县人民政府(县长康子安)成立;5月19日收复乾县、兴平、武功县城,中共乾县县委(书记苏智)、乾县人民政府(县长谭生晟),中共兴平县委(书记孙晋)、兴平县人民政府(县长田静忱),中共武功县委(书记张志诚)、武功县人民政府(县长张世杰)成立;5月20日收复永寿县、扶风县,中共永寿县委(书记魏希文)、永寿县人民政府(县长苏煥文),中共扶风县委(书记高述先)、扶风县人民政府(县长姚鹏飞)成立;5月21日收复麟游县、岐山县,中共麟游县委(书记黄志诚)、麟游县人民政府(县长鲁鹏),中共岐山县委(书记赵清显)、岐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白元兴)成立;5月22日收复凤翔县及宝鸡县千河以东地区,中共凤翔县委(书记郝仲升)、凤翔县人民政府(县长史文秀),中共宝鸡县委(书记郭进恒)、宝鸡县人民政府(县长岳嵩)成立。

西进的南路解放军5月21日收复户县、眉县,中共户县县委(书记刘泽西)、户县人民政府(县长曹希文),中共眉县县委(书记杨雨亭)、眉县人民政府(县长墨长荣)成立;5月30日收复周至县城,中共周至县委(书记李兴旺)、周至县人民政府(县长张光天)成立。

在此期间,新设置的咸阳、彬县、宝鸡分区成立,张中任咸阳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吴志渊任分区行政公署专员,王宝珊任军分区司令员,杨伯伦任彬县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赵伯经任分区行政公署专员、军分区司令员;吕剑人任宝鸡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张育民任分区行政公署专员,陈国栋任军分区司令员。

在第一野战军追歼西逃的胡宗南部之际,国民党为扭转在西北的危局,决定派马步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青海省政府主席)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内允马鸿逵(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省政府主席)任甘肃省府主席,企图以“二马”与胡宗南合力夺回关中。久欲染指陕西,控制西北大权的青、宁二马迅速拼凑起“陇东兵团”(马步芳部)和“援陕兵团”(马鸿逵部),共11个师,约8万人马,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任总指挥,沿西兰公路相继东进。驻陇南的国民党王治岐第一一九军(系由甘肃保安团组编而成,号称“陇南兵团”)也同时东犯入陕。胡宗南见“二马”入陕,便下令在省西大道上狂逃的所部停止退却,命其主力第十八兵团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从宝鸡向东推进,令已窜入秦岭斜峪关等山口的第三十六军等部回头北犯。

咸阳是胡、马军进攻西安的必经之路,也是解放军保卫西安的一道重要屏障。根据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部署,新入陕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一八一师等部及时赶到咸阳,在西郊、北郊、东郊建起了一个马蹄形的防御体系,并在咸阳城外布置了5个炮兵团,共400多门轻重火炮,设计了一场“炮吃马”的壮剧。马继援一

直派“援陕兵团”作为前锋,当解放军东移后,马继援误以为解放军是败退,萌发了抢先争功的念头,急命“陇东兵团”越过“援陕兵团”的防线,向咸阳猛扑,妄图一举攻占西安。6月13日,“陇东兵团”主力刚到咸阳城郊就开始进行集团冲锋。解放军以炽烈的炮火还击,激战一昼夜,毙敌2000人。马继援慌忙撤到咸阳北原。与此同时,奔袭泾阳的“陇东兵团”骑兵一部也受到解放军严重杀伤。在此形势下,“陇东兵团”向礼泉、乾县以北撤退。

在渭水以南,6月12日,胡宗南部第三十六军孤军冒进至眉县金渠镇地区,被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到13日,第三十六军一六五师大部被歼,少将师长孙铁英以下2200人被俘。其后,胡部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及第三十六军残部沿渭河南岸,第九十军和第一一九军沿渭河北岸,小心向东推进,16日到达周至县终南镇、兴平县马嵬坡一线,因获悉青、宁二马在咸阳遭到重创而向北败逃,不敢再进。在此期间,胡部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六十九军等残部曾从秦岭各山口窜出,企图进袭西安,均被解放军击退,逃回秦岭山中。

胡宗南和“二马”联合反扑西安的行动彻底失败。至6月28日,解放军再次收复礼泉、乾县、兴平、周至诸县。此役胡、马军均受到有力打击,被俘24699人,起义1824人,投诚1720人。

四 扶眉战役

胡宗南和“二马”联合反扑西安失败后,各自回缩。到6月底,青、宁二马退至麟游山区建立防线,胡宗南第十八兵团及王治岐部收缩于武功、扶风、眉县一带,以五个军的兵力夹渭河呈集团配置。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布局是,第十九兵团集结在三原地区,第二兵团前出至礼泉地区,第十八兵团进驻兴平地区,第一兵团仍在户县地区,各部队都在为未来的大会战做准备。

7月6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

中央军委关于“先打胡”的指示,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各个击破。具体部署是用一个兵团钳制青、宁二马,集中三个兵团将胡部主力第十八兵团等部包围在扶眉地区,速战速决,就地全歼,不使南逃;完成此役后,主力转向甘肃,消灭青、宁二马。这个战略计划迅速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7月10日,担任钳制“二马”任务的第十九兵团首先行动,大张声势地开赴乾县、礼泉及其以北地区,摆出进击姿态,使青宁“二马”产生畏惧而不敢妄动。同日,第六十一军主力也向西安南山子午镇地区的胡军第十二师等残部发动进攻,歼敌1000余人。这两个动作迷惑了敌军的指挥部,成功地掩护了西北野战军主力对扶眉之敌实施战略包围的真实意图,并保障了主力两侧翼的安全。随后,第二兵团自武功以北地区向扶眉守敌侧后迅猛插入,力争断其退路;第十八兵团自兴平地区向西发动全线进攻,对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等部作向心压缩;第一兵团则在渭河以南地区西进追击。第二兵团的穿插行动是争取战役胜利的一着要棋。10日晚,第二兵团越过漆水河,第四军于次日凌晨一举攻占敌军撤退的必经咽喉要道——岐山罗局镇和眉县火车站。

7月11日下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第十八兵团沿咸(阳)凤(翔)公路及陇海铁路两侧向西攻击猛进,到12日晨,在武功至扶风间全歼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的三个师。在渭河南岸,第一兵团首歼国民党军第一二三师一部,再在周至哑柏、眉县横渠地区歼国民党军第九十军大部。

12日晨,当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部及所属各军向宝鸡急撤时,碰上了第四军在罗局镇前设下的铜墙铁壁,到中午,被挤压在罗局镇原下渭河滩上的残敌全部被歼。泅渡到渭河南岸的8000人也被第一兵团全部截获。14日,第二兵团攻占宝鸡县城,第一兵团攻占宝鸡县城以南秦岭要隘益门镇。至此,扶眉战役胜利结束。

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和地方游击队的保护,胡宗南集团原拟

彻底破坏西府的罪恶计划未能得逞,蔡家坡、虢镇和宝鸡等地的纺织厂、机器厂、酒精厂、面粉厂、发电厂、铁路、公路和西北农学院等都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

扶眉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精心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围歼战。此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俘敌3.1万人,缴获骡马2400匹,各种炮290门,轻重机枪1160挺,长短枪9000支,汽车6辆,电台26部,收复和解放武功至宝鸡的8座县城和广大乡村,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的空前大胜利。

7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宝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同时,以宝鸡县、岐山县的一部为行政区域的宝鸡市成立,张毅忱任宝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宝鸡市委书记,萧蓼任宝鸡市人民政府市长。

宝鸡解放后,第一野战军分左右两路进军甘肃。左路军于7月16日解放千阳县,中共千阳县委(书记刘立波)、千阳县人民政府(县长魏建鳌)成立;25日解放陇县,中共陇县县委(书记南云)、陇县人民政府(县长刘章天)成立。右路军于20日收复永寿县,24日收复彬县,25日收复长武县。至此,陕西西部国统区全境解放。

第三节 解放陕南国统区

一 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豫陕鄂边

解放陕南国统区的斗争,从1946年8月2日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算起,到1950年1月镇坪县解放,经历了三年又六个月。

1947年春,豫鄂陕根据地形势险恶。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于2月20日和3月19日,分两批从河南新安县北渡黄河,在山西晋城解放区进行休整。余部由2月5日

成立的中共陕南工委和陕南指挥部领导,在豫鄂陕边继续坚持斗争。

按照中共中央部署,从1947年7月起,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相继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8月22日晚,晋冀鲁豫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出击豫陕鄂国统区。8月29日,陈、谢兵团第十二旅(旅长刘金轩、政治委员李耀)、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梁励生)、陕南独立团(团长郝世英、政治委员杨克)与陕南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在商县重镇龙驹寨会师。各部领导人共同商定:第十二旅进入丹江以南地区开辟根据地;陕南独立团在丹江南北山区活动,建立游击根据地;第十七师在丹江以北与国民党军周旋,策应其他部队在豫陕鄂边展开。第十二旅在转进丹江以南地区途中,于10月2日占领商南县城。

1947年10月下旬,豫陕鄂边区第二分区在丹江北成立,王力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王杰任分区行政公署专员,孙光任军分区司令员。商南、商县、洛南是第二分区活动范围的一部分。

在丹江南,第十二旅在一个半月里建起四个县级民主政权:11月11日,攻克山阳县城,中共山阳县委(书记何文俊)、山阳县民主政府(县长邓浩然)成立;12日,攻占山阳县漫川关镇与郧西县上津镇,以漫川关和上津镇附近为行政区域新设上关县,成立中共上关县委(书记王直夫)、上关县民主政府(县长宋景先);17日,攻占镇安县城,次日成立中共镇安县委(书记希庄)、镇安县民主政府(县长李忠正);12月25日,攻占山阳县照川地区,以此为行政区域新设山商县,成立中共山商县委(书记王友常)、山商县民主政府(县长任友恩)。1948年1月1日,豫陕鄂边区第四分区成立,李耀兼任分区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张明(十二旅副政治委员)兼任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刘金轩兼任军分区司令员。山阳、上关、

镇安、山商县属第四分区领导。

晋冀鲁豫解放军一进入陕东南地区,在陕北战场遭受挫折的胡宗南即令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组成以商县、山阳、洛南、商南、镇安、柞水、蓝田七县为作战区域的“西剿地区清剿总指挥部”,以谢辅三为总指挥,先后调集第六十五师、第八十四师、第一三五师、第十七师到商洛,加上地方团队共约万余人,对豫陕鄂边进行反复的残酷的“清剿”,并重点在商县、洛南实行“移民并村”,仅1948年1月17日至2月1日就移民1667户。

1948年3月29日,解放军第十二旅发动旬(阳)白(河)战役,4月1日攻占白河县城,全歼陕西保安第七团2个营、湖北保安第四团6个连,共1700余人,中共白河县委书记张坎)、白河县民主政府(县长刘华)成立;4月13日收复旬阳县城,缴获大批粮食和布匹。次日,中共旬阳县委书记宋静卿)、旬阳县民主政府(县长姜含勋)成立。在丹江北,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于5月19日再次攻占商南县城,商南县民主政府(县长董珉)移驻县城内;5月21日再次攻占商县龙驹寨。人民解放军的进击行动,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军事“清剿”。

二 陕南行政区的建立与巩固

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决定将豫陕鄂边区划分为豫西、陕南两个行政区,分别成立行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6月7日,中共陕南区委、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和陕南军区在鄂西北郧县成立,汪锋任区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军区政治委员,刘金轩任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为军区副司令员,李耀为军区副政治委员。原豫陕鄂边区第二、第四分区划归陕南行政区领导。陕南区下辖8个民主县政权,约200万人口,其主要辖区在今陕南的商洛、安康区域。12月,中共中央决定,张邦英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

书记、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汪锋改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二书记、陕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时逸之任陕南行政公署主任。次年2月1日,陕南区第二分区、第四分区分别更名为商洛分区、两郿分区。

1948年6月25日,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奉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命令,率领陕南军区主力部队东进,参加襄樊战役。主力部队东进后,国民党的“清剿”军立即向陕鄂边的解放区侵犯,解放区内的土顽势力也乘机发动叛乱。8月21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八旅一个团与白(河)竹(溪)平(利)三县联防指挥部所部侵占白河县城,地主恶霸随之反攻倒算,捕杀共产党员、乡村干部和翻身农民,仅8月21日至9月17日,全县就有1200名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和翻身农民被捕,其中400人被杀害。中共白河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率领500名干部群众转移到湖北郧西县边开展游击战争。8月22日,上关县发生叛乱,叛乱分子裹胁800人离村。上关县民主政权的干部转移到郧西县边进行游击活动。8月25日,国民党“清剿”军侵占旬阳县蜀河地区。国民党军的“清剿”和地方土顽的叛乱,对陕鄂边的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陕鄂边解放区内发生叛乱,与民主政府在土改过程中执行“左”的政策有着相当的关系。据时任中共上关县委书记、上关县人民政府县长宋景先后来回忆,“1948年春,我们在漫川关、上津地区的土地改革中发生了‘左’的偏差,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过分伤害了富农的利益,对地主则几乎是‘扫地出门’,人为地使贫雇农处于孤立的境地。”^①因此,中共陕南区委从调整土地政策着手恢复稳固解放区。1948年11月1日,陕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减租减息及调整土地条例》。14日,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又发布《为颁布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条例的布告》,郑重宣告:“实行土地改革,达到耕

^① 《解放安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者有其田,是我民主政府与解放军之基本政策,其目的在废除封建的剥削与豪强压迫的制度,以解放广大农民”,“但要实现土地改革,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广大农民,必须在政治上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在组织上有自己的巩固的农民协会,并有大公无私的农民领袖作为领导”,“本署为广大农民及整个社会前途着想,决定在一切从未进行土改地区”,“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已经进行了土改地区,则进行调整土地,使地主与农民都能安居乐业,从事生产,以便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再来实行土改,以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①。

在调整土地政策的同时,中共陕南区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当第十二旅的四个团奉命参加淮海战役时,区党委将留在根据地的两个主力团和五个独立团集中,用以剿灭解放区周围的国民党土匪武装。参加淮海战役的四个主力团归来后,与陕南军区的部队共同作战,共剿灭反动武装1万多人,并组织农村工作队,发动群众反对恶霸,进行减租减息,恢复和建立人民政权,陕南解放区得到巩固。

三 商洛分区发动西进战役,商洛全境解放

1949年春,陕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两分区的山阳、镇安等县已有60%以上的农村建立了基层民主政权,商洛分区所属的丹江南北根据地也在巩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商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加快了解放商洛地区的部署。按照原第二分区地委1948年11月作出的关于做好解放商县、洛南、蓝田等地准备工作的决定,商洛分区组织了西进战役。1949年2月6日,商洛军分区部队在西坪镇击溃陕西

^① 《解放陕西回眸》(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520页。

保安第二旅白青云、任泰升部 3000 人,7 日解放商南县城。3 月 26 日,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军分区决定集中全分区部队,兵分三路,围歼商南县赵川以西商县县城以东的竹林关、龙驹寨、夜村据点之敌。军分区副司令员薛兴军率独立第五团和商洛武工队为北路,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李书全率独立第四团和商县支队为南路,军分区司令员孙光、政治委员王力率第三十四团一营为中路。29 日,南路部队全歼竹林关守敌。31 日,三路部队进抵龙驹寨,俘敌 379 人。

西进战役加速了商洛国统区的解放步伐。5 月 24 日,商洛武工队第七区干队在洛南官桥河俘国民党洛南县长。30 日,商洛武工队解放洛南县城,中共洛南县委(书记陈效真)、洛南县人民政府(县长严敏)成立。6 月 1 日,商洛武工队收复龙驹寨,以商县以东地区为行政区域,新设丹凤县,治所设龙驹寨,中共丹凤县委(书记胡怡德)、丹凤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庆华)成立。6 月 27 日,独立第五团一部和山阳独立营收复山阳县城,中共山阳县委、山阳县人民政府移驻城内。7 月 12 日,商洛分区主力部队解放商县县城,商洛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移驻商县城;次日,中共商县县委(书记郭茂生)、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亢思邈)正式宣告成立。7 月 16 日,商洛分区主力部队在柞水县红岩寺西歼白青云残部,俘县长以下 162 人。27 日,独立第四团、第五团和洛南支队、商县支队等部围歼溃逃于洛南西岔河一带的残敌,共歼陕保第六旅旅部及地方残余势力 300 人,击毙副旅长姜秉公。

1949 年 11 月上旬,中共商洛地委决定成立镇安工委,孙光任书记,统一领导收复镇安、解放柞水县的工作。11 月中旬,咸阳军分区独立第八团奉命穿越秦岭,进军陕南。21 日,独立第八团在商洛分区柞水县太峪、龙潭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柞水县城,24 日解放镇安县城。27 日,中共镇安县委和镇安县人民政府移驻县城。12 月 1 日,柞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柯史毅)正式宣布成立;次年 3

月,中共柞水县委(书记王丕德)成立。

至此,商洛分区全境解放。

四 解放军第十九军发动西进战役

1949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命令,陕南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刘金轩任第十九军军长,陕南军区司令员,张邦英任第十九军、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汪锋任政治委员。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下辖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七师。5月8日和11日,中共中央军委和第二野战军总部分别发出电令,第十九军和陕南军区归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直接指挥。6月,中共中央电令,由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的中共陕南区委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第十九军的成立及其隶属关系的调整,加速了陕西国统区的解放进程。

5月23日,第一野战军电令第十九军向西发动攻势作战,打击和牵制驻安康地区的国民党军,以配合第一野战军进行的秦川追击战役。此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和陕西省政府已逃驻南郑,城固。他们为了经营陕南,确保入川的退路,将安康列为战略重点进行布防,除原有驻防部队第九十八军外,接连增派第二十七军、第六十七军防守,力阻陕南解放军西进。解放军第十九军和新设的安康军分区部队利用自身山区作战的丰富经验,采取远途奔袭、突然进击、大胆迂回、分割包围等战术,连续向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5月24日,解放军首战告捷,解放白河县城;31日攻占平利县城。次日,中共平利县委(副书记郑存义)、平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龙文宇)进驻县城。6月6日,第十九军奉命撤离平利县,在平利、竹溪交界地区进行了两次阻击战。从5月21日至6月21日,第十九军共俘敌3700人,缴获迫击炮、六〇炮30门,轻重机枪94挺,长短枪800余支,各种弹药10万余发。

7月10日,为配合第一野战军发起的扶眉战役,第十九军向陕

鄂边界关垭子的国民党守军三个师发起攻击,歼第一四四师大部,第一五三师一部,俘师长符树蓬以下 1360 人,解放平利县城。7 月 17 日,第十九军继续西进,22 日直抵牛蹄岭。牛蹄岭位于安康城东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安康城的天然屏障。胡宗南以三个军的兵力,构筑坚固工事,背靠汉江固守。7 月 23 日,第十九军和安康军分区独立第七团向牛蹄岭发起攻击,经 19 次反复争夺,终于占领牛蹄岭。24 日晚,解放军攻进安康新城和老城的西关。牛蹄岭战斗结束后,为配合第二野战军对大西南的国民党军实行战略大包围,第十九军奉命撤离安康,移驻鄂陕边界练兵,等待时机再行西进。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陕南解放军共毙、伤、俘国民党军 12000 人,对第一野战军主力进行的陕中、扶眉等战役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五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军会师汉中,陕西全境解放

1949 年 7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向兰州、西宁进军,以第十八兵团两个军、第一兵团一个军留守宝鸡地区,并为南下汉中消灭胡宗南集团、解放陕南国统区做准备。

此前,胡宗南和董钊于 5 月 18 日逃离西安。国民党陕西当局杀害了一批在狱中的革命者,其中有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孙宪武,中共扶风县委副书记史汀;将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王菊人等政治犯押解汉中。国民党当局还将数千名学生及张凤翔、寇遐、高桂澄等民主人士裹胁到汉中,并强令陕西省银行将全部资金转移到汉中。胡宗南逃到汉中时拼凑了二十五六万人马,企图以秦岭山区为依托作垂死挣扎。他以第三军军长盛文为东路指挥官,指挥第三军、第九十八军及河南挺进第一纵队;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指挥第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八军,依托凤县、留坝、宁陕、洋县,

封锁秦岭各山口；第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指挥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等部，依托徽县、成县、两当县，据守陇南；第一军驻凤县双石铺。为紧急补充军员，由师、团管区责令各县长、乡长、保长协同军队进行强征，并令各部队自行到县“抓壮丁”，先后在陇南、陕南征兵 15.5 万人。国民党当局还将从西安诱骗到汉中的 4000 多名学生和汉中诱骗的 1000 多名学生合编为学生总队，并入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将陕西保安第二团、第十五团合编为陕西保安第一旅，将陕西保安司令部特务团、特务第三营和南郑团管区合编为陕西保安第二旅，将黎坪设治局自卫团扩编为陕西保安第三旅；将逃到汉中的宝鸡师管区与陕南师管区合编为新第七军。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将安康（第五）行政区划分为第五区（安康）和第十二区（石泉），将南郑（第六）行政区划分为第六区（南郑）和第十一区（城固）。

为了做好汉中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并为汉中新解放区培养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宝鸡成立了汉中分区领导机关，白成铭任中共汉中地委书记、汉中军分区政治委员，毛凤翔任汉中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涛任汉中军分区司令员。汉中地委在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新解放区党的政策的同时，配备了南郑市和各县的党政机关领导成员：南郑市委书记刘国声，市长王立人；南郑县委书记张建德，县长刘齐；城固县委书记霍俊高，县长高鲁；洋县县委书记李云龙，县长薛朗夫；勉县县委书记李冰，县长吴政明；宁强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薛怀文；镇巴县委书记熊云，县长薛步华；佛坪县委书记李明，县长崔玉亭；留坝县委书记张志高，县长岳培新；褒城县委书记兼县长韩亚民。以陈先瑞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南郑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

放的国土。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为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抽调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王雄舟、参谋长张经武到西南地区工作。贺龙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随调的干部1731人,战士职工7807人。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西北局及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参加对胡宗南集团作战。

11月15日,第二野战军解放贵阳;22日解放桂林。27日,在重庆的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南下援渝。28日,顶着“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头衔的胡宗南从汉中逃到成都。12月4日,顶着“陕西省政府主席兼陕西反共救国军绥靖总司令”头衔的祝绍周亦从汉中逃到成都。国民党在陕西维持了22年的反动政权彻底垮台。

在第二野战军追歼西南国民党残军的同时,奉命南下的第十八兵团从秦岭一线南下,分路追击胡宗南军。第六十军沿川陕公路追击,11月27日解放凤县县城,中共凤县县委(书记陈光)、凤县人民政府(县长王笃)由乡村迁入县城;12月2日解放留坝县;12月6日解放褒城县、勉县、南郑县。随第六十一军主力从周至南进的咸阳军分区部队12月8日解放佛坪县。从陇南一线南进的第七军12月9日解放略阳县。

在第十八兵团南下追击胡宗南军的同时,第十九军也于11月下旬从平利、旬阳蜀河镇出发,沿汉江分南、北两路进行第二次西进战役。

北路军是第五十七师,11月25日从旬阳蜀河镇出发,沿汉白公路挺进,国民党旬阳县自卫团1200人起义,旬阳县和平解放,中共旬阳县委和旬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刘乃因任县委书记兼县长)。27日,国民党安康县县长兼县自卫团团长鲁泰侠率部2200人起义,安康和平解放,安康县分设为安康市和安康县(周怀瑾任市委

书记、市长，希庄任县委书记、成林任副县长）。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安康军分区政治委员唐方雷，安康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王廷佐，安康军分区司令员谭友夫率领机关干部进驻安康市。29日，国民党汉阴县自卫团投诚，汉阴县和平解放，中共汉阴县委和汉阴县人民政府成立（宋景先任县委书记兼县长）。30日，石泉守军南渡汉江西逃，石泉县城解放，中共石泉县委和石泉县人民政府移驻县城（万雪峰任县委书记、代县长）。第五十七师继续向汉中挺进，12月4日解放洋县，5日解放西乡县，7日解放城固县。18日，汉中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宝鸡移驻城固县城。

南路军是第五十五师，11月26日从平利出发，28日开岚皋国民党守军第九十八军及鄂陕自卫总队各一部，解放岚皋县城，中共岚皋县委和岚皋县人民政府成立（李波香任县委书记兼县长）。30日，紫阳国民党守军新编第四军第九纵队司令郭子彬率部投诚，紫阳县和平解放，中共紫阳县委和紫阳县人民政府成立（罗文任县委书记，徐月卿任县长）。12月5日，奉命南下安康作战的渭南、咸阳军分区部队解放宁陕县城，中共宁陕县委（书记李舟）、宁陕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韩子宴）移驻县城。

12月8日，第十八兵团和第十九军会师于南郑市（今汉中市汉台区）。南郑市军管会成立。中共陕南区委、陕南行政主任公署、陕南军区机关由湖北郧县移驻南郑市。

12月中旬，第十八兵团继续南下作战，11日解放宁强县城，中共宁强县委、宁强县人民政府随军入城；12月17日解放镇巴县城，中共镇巴县委、镇巴县人民政府移驻县城。1950年1月11日，安康军分区独立第七团和平利县独立营解放镇坪县，中共镇坪县委和镇坪县人民政府随军入城（刘建平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至此，陕西国统区全部解放。

第四节 陕西省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一 中共领导陕西国统区解放战争的组织形式

从1945年10月解放陕北定边、靖边县的国统区开始,到1950年1月解放陕南的镇坪县,陕西国统区的解放战争前后经历了4年又3个月。

陕西国统区的解放战争形成了三个战场,陕北北部战场,主要由晋绥军区的部队进行;陕北南部和关中战场,先后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所属的部队进行,其主力部队先后称西北野战兵团、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陕南战场,先后由中原军区和西北军区的所属部队进行,其主力先后是豫鄂陕军区部队、陕南军区部队、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和第十八兵团。三个战场紧密配合,合力取得解放陕西国统区的全胜。

陕西国统区的解放进程是: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少数国统区解放;1946年7月后的全面内战初期,也是少数国统区解放;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至1949年9月以前,陕西国统区的大部及其中心区域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至1950年1月,解放陕南残存的国民党统治区。

解放陕西国统区的方式为四种。一是由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消灭国民党军队而解放国统区,这种方式为大多数;二是由军分区和县的人民武装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而解放国统区,这种方式多在陕南;三是国民党军队举行反内战起义,其驻防地获得解放,这种方式主要在陕北北部;四是国民党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其辖区和平解放,这种方式在陕北、关中、陕南均有。实际为战争的与和平的两种方式,绝大部分国统区是人民军队打下来的,其中有些地方多次“拉锯”,战斗激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经较量,才获得解放。无论是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陕西人民为陕西国统

区的解放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为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和指挥。1946年7月至1949年5月为第二阶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先)、西北军区(后)领导和指挥陕北、关中国统区的解放斗争;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鄂陕军区(先)、陕南军区(后)领导和指挥陕南国统区的解放斗争。1949年6月至陕西国统区全部解放为第三阶段,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陕西境内党、政、军领导机构分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军区领导,其中陕南行政区、陕北行政区、西安市和关中的六个行政分区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军区直辖。陕南行政区1948年6月7日建立,辖商洛、安康、汉中分区和南郑市,张邦英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汪锋任区党委第二书记,陕南军区第二政委,汪锋、时逸之先后任行政公署主任,刘金轩任军区司令员。陕北行政区1949年5月5日建立,辖榆林、绥德、三边、黄龙分区及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志丹、安塞、甘泉七个县,李合邦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景庸任行政公署主任,吴佑峰任军区司令员。西安市辖12个区,大荔分区辖8个县,渭南分区辖6个县,三原分区辖7个县,咸阳分区辖6个县,彬县分区辖7个县,宝鸡分区辖9个县(市)。

二 陕西省级党政军领导机关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省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相继在西安成立。

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以兵团首长兼军区首长。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成立,隶属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

委员,机关驻兰州)领导,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陕西军区司令员,马明方兼第一政治委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耿飚任第一副司令员,刘金轩、吴岱峰、左协中任副司令员。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1950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并在西安隆重举行省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的就职典礼。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张邦英、张凤翔、韩兆鹏,委员方仲如、王复初、毛凤翔、左协中、安文钦、李子健、李文卿、李合邦、李志民、李象九、李德仁、李斌都、吕向晨、吴志渊、吴岱峰、时逸之、袁伯扬、陈光瑞、寇遐、张锋伯、冯一航、黄子祥、景岩征、杨玉亭、杨明轩、杨瑞轩、杨得志、赵伯平、刘文伯、刘金轩、韩望尘、苏资琛。

1950年1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马明方任书记,张邦英、李合邦为副书记,杨得志、李志民、白治民为常委,崔田夫、吴岱峰、杨伯伦、刘文蔚、时逸之、甘一飞、白清江、吕剑人、刘金轩、陈光瑞、李耀、李景庸为委员。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同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宣告结束。陕西省归西北大区领导,辖陕北区(辖榆林、绥德、黄龙三个分区及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志丹、安塞、甘泉、定边、靖边九个县)、陕南区(辖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分区及南郑市)和大荔、渭南、三原、咸阳、彬县、宝鸡六个分区,全省共设有榆林、神府、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子洲、延安、吴旗、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甘泉、富县、洛川、宜川、黄龙、黄陵、渭南、韩城、华县、华阴、潼关、大荔、朝邑、平民、蒲城、澄城、白水、合阳、富平、临潼、蓝田、长安、户县、周至、高陵、宜君、铜川、耀县、咸阳、兴平、武功、三原、泾阳、乾县、礼泉、永寿、彬县、淳化、长武、旬邑、宝鸡、凤翔、岐山、扶风、眉县、郿县、千阳、麟游、凤县、南郑、城固、洋县、西乡、勉县、宁强、略阳、镇巴、留坝、佛坪、褒城、

结束语

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陕西是延安精神的发祥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陕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陕北和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里,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形成并迅速发展,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这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成为中国模范的抗日民族根据地,延安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则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回顾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有以下几点基本经验。

(一)中共陕西组织是领导陕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

无论是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还是白色恐怖、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中共陕西组织始终是领导陕西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中流砥柱。大革命时期,初建的陕西党团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围攻西安的斗争,支持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开展活动,开创了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新局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开展了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相继领导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川陕省委、鄂豫陕省委、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西北特支等省级党的组织,在三秦大地领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殊死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武装自卫等救亡活动,与国民党顽固派镇压群众、破坏抗战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促进了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陕西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组建人民武装,发动并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支援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陕西的统治,解放了全陕西。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陕西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选择。

(二) 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基本特点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中共陕西组织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只有掌握枪杆子革命才能成功。与南方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呼应,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夏,在陕北、陕东、渭北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1931年以后,中共陕西组织先后领导创建了渭北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

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几支革命武装,先后领导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陕南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南方工农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长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出发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极为特殊的重要作用。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共陕西组织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取胜的重要法宝

大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坚定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帮助中国国民党建立陕西的各级组织,诚心诚意地同一切拥护民主、科学、进步,反对军阀独裁统治的各界人士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使陕西成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组织在开展武装斗争中提出“红色、白色、灰色”的建军路线,强调在建立以贫苦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武装的同时,也要注意在国民党军队和民间非法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尽最大努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土地革命后期,中共陕西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加大对杜斌丞、杨虎城、张学良等民主进步人士和国民党高级爱国将领的统战工作,在杨虎城部建立了众多的中共组织,帮助他提高认识,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全力推动西北军、东北军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之后,中共陕西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将统战工作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全省的抗战力量,激发了各阶层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毛泽东对中共陕西组织的统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盛赞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典范”。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主要就是根据中共陕西组织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这个方针对中共组织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 紧紧依靠人民,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陕西胜利的根本条件。

大革命时期,陕西的中共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雷晋笙、刘含初、安存真、吴化之、黄平万、刘天章等创办进步刊物,举办平民学校、暑期学校,广泛传播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提高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意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开展分粮、分地斗争,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开展土地革命的积极性。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缩减机关干部和非生产人员,一方面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压力。人民群众为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关心民众生活、为人民谋利益的感激之情,自发地向毛泽东赠送了“人民大救星”的牌匾。正是由于中共陕西组织始终坚持依靠人民、团结人民的宗旨,正确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得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最大限度地符合群众的要求,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各地都涌现出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兄弟争相参加人民军队的动人场景;各处都有人民群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党组织和人民军队送情报、运公粮、抬担架、养伤员的英雄壮举。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正是陕西

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赢得全省解放的根本原因所在。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陕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全集》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 27152 人,还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为革命献身。先烈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渭水两岸。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刘志丹、谢子长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建立后陕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陕西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

后 记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是在全省二十多年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凝聚了全省广大党史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的编撰过程,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织准备,撰写初稿并进行初编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省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基本完成,编写《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的条件日臻成熟,在这种情况下,经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决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编写组,承担本书的编写任务,具体工作由原宣传研究处(科研规划处的前身)负责。此后,编写组拟定了编写提纲,确定了各编撰稿人,对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体例、文字规范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并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对编写提纲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同时将编写规划、提纲以及本书编委会、编辑组人员建议名单上报省委。

199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各编撰稿人陆续将初稿报送省委党史研究室。

参加撰写初稿的作者是:

第一编:孙启蒙(第一、二、四章)、卢胜利(第三章)、袁武振(第五章);

第二编:梁星亮(第六、十二章)、姚文琦(第七、八章)、姬友文(第九章)、秦益珍(第十、十一章)、孙玲玲(第十二章,与梁星亮合写);

第三编：杨忠虎(第十三章)、史向军(第十四章)、张培林(第十五章)、戴海波(第十六章)、陈瑞(第十七章)；

第四编：贾自新(第十八章)、马启民(第十九章)、成希斌(第二十、二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初稿完成后,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对初稿进行了初编、打印,并先后三次对打印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各编分别进行了统稿,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2005年底。

这一阶段,负责领导、组织工作的有吴崇信、王中新、李彬、赵俊忠,参加《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编辑、修改和分编统稿工作的有姚文琦、卢胜利、熊美杰、贾自新、康中兴、刘玉平。

第二阶段:精编阶段。

2006年,《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重点书目,开始进入精编阶段。2007年6月,姚文琦在陕西国联友好阁主持召开会议,卢胜利、熊美杰、贾自新、康中兴、刘玉平参加,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定对全书的框架结构进行较大调整和修改,补充部分章、节,并将全书结构统一调整为编、章、节、目;确定全书由姚文琦负责,卢胜利负责修改第一编,康中兴协助熊美杰修改第二编,刘玉平协助贾自新修改第三、四编,贾自新对全书进行统稿。调整后的《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由原来的4编21章99节改为4编25章99节。同年底,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分别送给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成员及有关专家、学者审阅,广泛征求意见。

2008年4月18日,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陕西国联友好阁召开审稿会议,李按明、姚文琦、卢胜利、康中兴、邵持文、贾巨川、侯党生、刘玉平以及熊美杰、贾自新、郭洛夫、梁星亮、王继、柯大凡、袁武强、刘景威参加(孙启蒙、张应超提出了书面意见)。与会人员对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本书在框架结构、史实、内容、注释、文字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会后,由编辑组综合审稿会的意见,对本书的框架结构重新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将原来的4编25章99节改为4编24章74节,并分别由熊美杰(一、二编)、贾自新(三、四编)进行了两次修改。在此期间,省委党史研究室邀请张应超、梁星亮、杨志虎、袁武振分别对一、二、三、四编进行了认真修改,杨志虎补写了第三编第二十章第五节第二部分《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袁武振撰写了本书的《结束语》。全书由姚文琦、刘玉平最后定稿。

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经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审议通过。

在本书的撰写、编辑和修改过程中,省委常委、秘书长魏民洲高度重视,并给予具体指导。李振民、房成祥、张广信、宋易风、王克荣、高广厚、姜益珍、席群参加了编写提纲的制定、讨论和修改,王顺铭、郭持文承担了联系部分初稿作者的工作,耿琪、王金强参加了部分校对和编务工作,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刘景巍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活动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力求全面、准确、完整地反映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进程,反映党领导陕西人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从中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但由于作者、编者的水平所限,书中的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编辑组

2009年10月

参考书目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党史资料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陕西历史研究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宋智深：《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陕西省志·军事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 第一卷/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163-2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陕西省 IV. ①D23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848 号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刷: 陕西省水利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33 印张 8 插页

字数: 402 千字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978-7-224-09163-2

定价: 86.00 元
